巴拉圭简史

〔美〕哈·盖·沃伦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巴 拉 圭 简 史

上 册

〔美〕 哈·盖·沃伦著

辽宁大学经济系翻译组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1973年·沈阳

巴拉圭简史

下册

〔美〕 哈·盖·沃伦著
辽宁大学经济系翻译组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73年·沈阳

PARAGUAY

An Informal History

By Harris Gaylord Warre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Norman, 1949

内部读物

巴拉圭简史

（上、下册）

〔美〕哈·盖·沃伦 著

辽宁大学经济系翻译组译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22 $\frac{7}{8}$　插页：25

字数：290,000　印数：1－20,000

1973年9月第1版　1973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90·3　定价：2.4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哈里斯·盖洛德·沃伦，是美国密西西比大学历史学教授，曾在美国驻亚松森使馆任职，回国后著《巴拉圭简史》一书，于1949年出版。此外，作者还写有《刀剑就是护照：美国对墨西哥革命的干涉史》（1943年）以及和他人合写的有关美国陆军第五军军史等著作。

《巴拉圭简史》是用英文写出的第一本综合性的巴拉圭通史。内容广泛，资料比较丰富，对巴拉圭共和国的形成，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情况，都作了具体的描述；对西班牙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奴役和掠夺，以及巴拉圭独立后独裁者对人民的残酷镇压和法西斯统治等，也作了一定的揭露。本书对我们了解巴拉圭和拉丁美洲社会历史发展，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立场和唯心史观的限制，作者对西班牙殖民者的入侵和剥削的实质竭力掩

饰。例如，作者把巴拉圭第一个殖民统治者伊拉拉对印第安人的奴役赞扬为“合乎人道的征服”，把天主教耶稣会在巴拉圭建立的传教区“殖民帝国”描写成瓜拉尼人“免于匮乏、恐慌和压迫”的自由天堂。书中对于美、英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进行的掠夺、干预和渗透活动，有时也竭力为之开脱。希望读者用分析的态度来阅读。

1973年4月

序　　言

本书试图把各种文字的著述，集纳到一部综合性著作中，展现出巴拉圭四个多世纪的历史图景。如果我做得成功，它将作为一部用英文写出的巴拉圭历史概览而满足人们的一定需要。

历来忽视巴拉圭的一个原因，特别就美国作家来说，可能是按统计数字衡量，这个国家并不象其他国家那样重要。巴拉圭的面积为十四万九千八百零一平方公里，在整个南美洲仅厄瓜多尔和乌拉圭的面积小于它；巴拉圭1946年的人口为一百零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三人，在整个拉丁美洲仅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的人口少于它；而且，只有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1945年所持有的黄金与外汇，或对外贸易的数值比它少。美国1945年对巴拉圭的贸易额，不过八百七十万美元，比对其他任何一个拉丁美洲国家的贸易额都低；而我们对巴拉圭的投资也是无足轻重的，虽然它对这

个国家自身来说不是无关紧要的。

统计数字绝不能说明一切。这个国家，不到一个世纪就发生过两次大的战争。它长期以来，就被看成是南美洲外交的十字路口，巴西和阿根廷为了取得巴拉圭的欢心，彼此曾进行并将继续进行争夺。它的资源，决不能说已被开发殆尽，它仍然可以为千万个勤劳的移民提供安身之所。这样一个国家，并不是毫不足取的。即使这些情况都不真实，仅就巴拉圭本身来说，也是值得进行一番研究的。

现在的这一本综合性著作所根据的，除了各国政府就三国同盟战争与查科战争所发表的文件外，大多数是第二手材料。巴拉圭的历史，几乎每个时期和每个方面，都需要广泛地利用档案资料来加以探讨。美国、巴拉圭和阿根廷的一些大学，进行了少量优异的工作，不过总的来说，对这个领域几乎没有触动过。这部综合性著作，除了有一些完全归于我个人的错误之外，研究资料所固有的缺点，也必然要使它受到损失。

我应该感谢泛美联盟所属哥伦布纪念图书馆、哈佛大学、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国会图书馆、路

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得克萨斯大学、丹佛大学与密西西比大学的图书馆馆员们；感谢密西西比大学借书管理员南希·洛夫·康福特小姐耐心而愉快的帮助；还要感谢一位过去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同事埃德温·亚当斯·戴维斯博士，主要由于他的关心与鼓励，我才能从事这项看来十分棘手的工作。我的妻子凯瑟琳·弗莱希曼·沃伦读了原稿，并在使用德文的名称方面给了我相当的帮助。

哈里斯·盖洛德·沃伦

于密西西比大学

1949年4月2日

目　录

第 一 章

自然、奇迹与神话

巴拉圭，在西班牙征服者还没有溯大河扬帆而来之前，是一块天国乐土，伊甸园[1] 就在这里。这个诱人的虚构故事，至今仍然存留在瓜拉尼人[2]和梅斯蒂索人[3] 中间，尽管他们忘记了成群叮人的虫子，有毒的爬行动物，凶猛的野兽，还有那野蛮人。但是，这个传说中的乐园，也许就在伊波亚湖畔，或者就是那隐匿在卡阿库佩低矮丘冈之间的一个溪谷。

就连巴拉圭这个名字，也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有人说，因为印第安人相信，这条河发源于被

① 伊甸园（Garden of Eden）：基督教《圣经》中所述的天国乐土。——译者

② 瓜拉尼人（Guaranís）：巴拉圭印第安人中的一个主要部族，详见本书第 2 章。——译者

③ 梅斯蒂索人（Mestizos）：拉丁美洲的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种，详见本书第 9 章。——译者

洪水淹没的、他们称之为哈拉耶斯的洼地，所以他们给它取名为巴拉圭，意即“加冕之河”。另一些人则复述亚松森的胡安·加西亚的故事。这个加西亚，在十七世纪末叶，曾经多年作过帕亚瓜人① 的不速之客。象旅行家常有的情况，他乐于用自己的漫游故事来款待朋友。据他讲，有一次他和帕亚瓜人向巴拉圭河上游旅行，横渡哈拉耶斯湖，驶入另一条河流，河水从一个蝙蝠逞凶的山洞奔涌而出；加西亚在山洞里足足走了两天，一边走一边和大蝙蝠安弟拉斯搏斗。这条河重见天日后，便通向另一个浩瀚无边的大湖。但那些在雨季里把水漫入巴拉圭河的大沼泽的存在，绝不是什么虚妄的想象。或许因为如此，才称为“加冕之河”吧。

巴拉圭的边界，同它的名称来源一样，模糊不清。它渺无涯际地伸向四方：西至秘鲁的群山，北向亚马孙，东入巴西，南部直到帕达哥尼亚。西班牙人对边界线往往不在意。巴拉圭先被笼统地划归秘鲁副王治下，后来又照样笼统地被划归拉普拉塔副王治下。对西班牙的国王来说，巴拉圭并没

---

① 帕亚瓜人（Payaguás）：巴拉圭印第安人中的一个部族，见本书第2章。——译者

有那么大的重要性，值得他们为了一个准确的地界费脑筋。

从阿根廷北部向亚马孙流域绵延伸展，而位于巴拉圭河西部的查科，在最早期的西班牙人心目中，乃是一块神奇莫测的地方，直到现在，仍然令人感到有几分惊奇。秘鲁的克丘亚人① 把牲畜兴旺叫做“查库”，西班牙人把这个词改成“查科”，并用它给安第斯山以东的低地命名。山地部落，为了逃避征服者而匿居在那里。查科被几条河流分割成三个部分：贝尔梅霍河以南是南查科；贝尔梅霍河与皮科马约河之间是中查科；皮科马约河以北是北查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就在这一带地方发生过流血战争。皮科马约河，是一条变化无常的河流，发源于玻利维亚高地。这条河的某些区段可以通航。但是，河床每经一次洪水泛滥都要改变，大水退后，留下片片沼泽，而且一夜之间，就会出现很大的岛屿。

早期的编年史家，总是要提及淹没过数百平方哩土地、特别是淹没河口附近的查科洪水。每逢

① 克丘亚人(Quechuas)：秘鲁境内的印第安人的一个部族。——译者

这个时节，粗大的树木被卷向下游，甚至一直卷进大西洋。大段大段的堤岸被冲塌，岸上的动物都被冲走。伍德拜因·帕里什爵士说：在蒙得维的亚的街头，曾出现过老虎。今天，老虎在洪水中驭涛漫游之景，虽已不复见，但大水不时还会切断与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的电讯交通。

西班牙人喝了许多条河的水，认为其中某些水具有奇异的治病效果，而对另一些，则敬而远之。贝尔梅霍河的水，是真正的长生不老药，这是遍生两岸的利尿的耶尔巴树所赋予的特质。喝了贝尔梅霍河的水，人可以到老不生皱纹，不犯“肾砂、结石、一切泌尿系统病、痰痛、痛风、浮肿和消化不良症”。甚至在十九世纪时，水手们到拉普拉塔河里，灌了几桶水，去英格兰周游两次后，发现这水依然甘冽可口。巴拉圭河的水，虽说不如巴拉那河水那样清澈，却享有爽喉清音之誉。

巴拉圭的土壤肥沃。但是，这个富饶的自然，未曾出产过欧洲所熟知的那些普通水果和谷物。那里没有无花果、橄榄、苹果、桃、榅桲、梨、石榴、梅子、柑子、柚子、柠檬或香橼树；没有小麦、大麦、茴香、豌豆、莴苣、卷心菜、萝卜、西瓜和洋葱——

所有这些，在西班牙人把它们引进来之前，都是没有的。

按产品的价值来判断，在巴拉圭的树木中首屈一指的是耶尔巴树。它的粗糙的绿叶经烘干、研成粉末，再用开水冲调，便成为无可媲美的茶，名为“马黛”(maté)。自从西班牙人养成饮马黛茶的嗜好后，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就不得不为了采集耶尔巴树叶而死于耶尔巴园中。关于马黛茶的由来，完全是出自神话编造者的杜撰。有些人把它归功于圣·巴脱罗缪；另外一些人却说传授耶尔巴备制和饮用方法的是圣·托马斯，耶稣会教士们坚信他曾在巴西和巴拉圭传过教。饮用这种茶，要用一只叫做马黛的葫芦，所以这种饮料也就由此得名。如果人们对它的种种传说信以为真的话，它简直成了无与伦比的灵丹妙药，不幸的是，它更多地用来为巴拉圭医治土著人口众多之患了。

巴拉圭的杉木长得那样雄伟高大，黎巴嫩的杉木和它比起来简直就是侏儒了。耶稣会历史学家佩德罗·洛萨诺曾见过两只独木船，每只有四十四呎长，用一棵树制成，它的深度足以隐匿一个躺着的人。在阿根廷靠近萨尔塔地方，另有一个耶稣

会教士和他的同伴遇见过一棵倒在地上的杉木，粗大到使人骑在马上都无法隔树看到对面的景物。不同品种的棕榈树，覆盖了许多里格[①]的土地。其中有一些棕榈的心“非常柔嫩鲜美，使人乐于食之”。另一些，树干渗出一种脂润的带有醉性的饮料。还有一种，它结出来的浅黄色的小椰果，可以用来作念珠。非常高大的白干树，树干白色，木质象铅一样重。木棉树极轻，它的粉红色的花转为深紫色后，可供羊毛和亚麻布染色之用，它的树皮可治虎伤。

在那杉松参天高达一百多呎的地方，较矮的拉帕乔树，就显得好象是灌木了。1815年被逐出巴拉圭的英国商人J·P·罗伯逊，对于这种森林奇闻颇感兴趣。他说：“雷亚尔镇的一个葡萄牙人把这些树的一根坚实的树干挖空，制成一只独木船，装载一百包耶尔巴（即二万二千五百磅巴拉圭茶），若干个用几张兽皮缝成装满糖蜜的圆球，一车松木板，七十袋烟草，运到阿萨姆普欣[②]去，还有八

① 一里格（league）等于三英里。——译者

② 阿萨姆普欣（Assumption）：即巴拉圭的首都亚松森（Asunción）。——译者

个巴拉圭（帕亚瓜?）水手掌管这巨大而挖得精致的拉帕乔树干上的三根桅杆和帆篷。"这是那个世纪最大的独木船之一。象破斧树（quebracho）一样，拉帕乔树耐腐蚀，又不怕虫蛀，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亚松森，家家户户都用这种木料来盖房子。巨大的屋梁，有时磨得象红大理石那样光亮，它使耶稣会传教区的教堂，能够抗拒大自然把一切建筑复归尘土的威力。

破斧树在查科和传教区是常见的。这种坚硬的树不透水、不怕蛀，可供作家具和建筑物的木料。它仅有的果实是只"蝴蝶"，生长在它的花丛中，成熟落地后即生根并成长为一棵新树。用破斧树酿成的饮料，具有治疗肺病的奇效。同样地，它也是治疗性病（梅毒）以及各种心神不适症的无比良药。

大松树，它的顶枝伸展着，好象意大利的伞松，生长在越过巴西直入巴拉圭的森林里。这种名贵的树木，它的树干是那样匀称，就好象是车床上旋出来的一样。它的松果，经过焙或煮后，成为一种重要食品。由树干渗出的树脂能治骨科和神经系统的疾患。有一种松树叫库里瓦伊，它的种子可

作泻药，使患者"通过呕吐和其他排泄法，化痰去热，引起剧烈的痉挛"；但是喝口酒或热水，就能止住这种痛苦。巫树（伊维拉帕埃）的树脂，能治疗几乎所有的病。另一种大树叫莫莲树，它出产的树脂，能治重伤，能止血和安神。由莫莲树的种子提取的胶脂和粗粉，尤其同酒精饮料搀和在一起后，能活血祛寒。从月桂树提取的香料，气味难闻，在流行病蔓延全国时，能起防疫作用；它的树叶、花或树皮可制成蛇、虫咬伤后解毒的敷药；它的树根磨成粉末，用热水送服，能化胆结石。在巴拉圭离奇古怪的医书药目中，几乎每一种树都有某些用处。高大美丽的伞树，叫做帕拉帕雷，能治胃痛、外伤、斑疹伤寒以及其他一些怪病。马门树甜美的瓜状果实能退高烧；黄樟树能利尿；生长在湿地或河岸边的卡维拉树产出的胶脂治牙痛有特效。

在许多有用而较小的植物中，有一种野生菠萝，长着长穗，穗上冠以花朵。它的叶子可用以苫房，叶子的坚韧纤维可供打绳或织布之用。果实可以食用，也可榨汁作清凉饮料。野生菠萝的浓液是制酒、醋、糖和糖浆的原料。在当地的植物中，没有一种能比得上木薯，在别处叫卡萨瓦，它过去是现

在仍是巴拉圭人的生活必需品。除一个品种外，这种植物的根，色绿时有毒，但是无处不在的圣·托马斯，即传说中的派·卢马，教人怎样种植和利用它。

马卡瓜既是鸟名又是植物名，马卡瓜树的籽是治蛇咬伤的一种有效的解毒剂，马卡瓜鸟经常与蛇斗，上阵时用一只翅膀放在头前当作盾牌。如果它的对手咬伤了它，便立即飞向马卡瓜树，吃它的籽，然后重返战场，继续战斗。巴拉圭人观察了这种有趣的习性，不久发现马卡瓜树能治头痛、热病和发作性疾病。有一些植物能清血，助消化，驱瘟，增进食欲，提神，增强体力，安眠。烟草，瓜拉尼人叫"佩"，生长繁盛。盛开的花朵为成群的蜜蜂光顾，酿出可口的蜂蜜和大量的蜂蜡。

野鸟和家禽——在巴拉圭远不如令人厌烦的虫类那么多——具有热带繁殖迅速的特点。印第安人饲养鸡、鸭、鹅；随之而来的有大量燕子、鸽子和其他友善的飞禽。在平原、池沼、湖泊和森林地区，可以见到无数的山鸡、鹧鸪、鹰、鹭、秃鹰和野生的水禽。在鸟类学家的乐园里，这种生物的类别是那样繁多，即使是一个经过压缩的巴拉圭鸟类

目录，也会有好几页之多。食腐肉动物中居首位的是卡拉卡拉鸟，它是一种贪吃的飞禽，把全国的腐肉清除得一干二净。大大小小的鹦鹉，羽毛有的华丽，有的灰暗，飞来时遮天蔽日，翅膀的飕飕声充满天空，劫掠播了种的田园。黑色的啄木鸟，有彩色的冠毛，粉红色的胸口，它的嘴坚实而有力，能在最坚硬的树木上挖巢。

在西班牙人进入这个国家之前，欧洲常见的动物在巴拉圭则是闻所未闻的。佩德罗·德·门多萨于1537年引进了马，当时他在阿根廷留下七匹种马和五匹牝马。但是，第一次把马引进巴拉圭本部的，大概是阿尔瓦尔·努涅斯·卡维萨·德·巴卡。到了1600年马已经很多，成群的野马漫游在潘帕斯和查科。驴和其他役畜都同样来自欧洲。

许多种长得好看但没有用处的动物，是巴拉圭本地的。有几种鹿在它们消化管道里结成肠结石。有些野猪和类似猪的动物，肚脐眼长在脊背上。它们由一个带头的领着成群地活动，当遭到敌人的威胁时，在带头的呼唤下，就奋不顾身地与敌搏斗，特别是对付美洲豹。在蚂蚁群集的国土上，孤僻的食蚁兽不会感到食物恐慌。在棕榈树林中，

蚂蚁往往建造圆锥形的土穴，土穴底面的直径有四到五呎，高达八至十呎。三个脚趾的貘，有驴那样大，耳朵象骡子，嘴象小牛犊，是一种温和的动物，它的肠结石和非常坚硬的皮很值钱，瓜拉尼人把天上的银河叫做"貘之路"。巨猫、山狮、美洲虎和美洲豹同温和的貘恰恰相反。"老虎无疑是全西印度的兽中之王，凡是大自然未赋予非洲狮的所有的勇猛和残暴，在它身上都具备了"。佩德罗·洛萨诺认为：这种土生老虎，其实是美洲虎，它除了同狮子杂交外，不同其他野兽合群，两者交配出生的是豹。老虎是一切动物的死敌，时常伤人，对黑人有特别的嗜好。因为老虎善于游泳，即使是水中的动物也并不安全。在白人未来之前，印第安人相信魔鬼时常以老虎的形象出现；但是，基督教义使人大胆起来，他们才敢于骑马猎虎，掷出活索套住老虎的脖子，把它勒死。西班牙人很善于用猎犬、矛和火器捕猎野兽。

据有些轻信的人说，有一种无名的动物，怀有一块巨大的红宝石，在最黑暗的夜晚，发出奇妙的光辉。没有一个人见过这种无从捉摸的动物，因为一旦受到它这奇异的光芒照射，人就会完全失去

辨别方向的能力。当然，也从来没有人杀死过这种“象火一样燃烧的恶魔”。一种身上护以硬壳、外貌象猪的动物，叫基尔金乔，非常爱吃鹿肉，它常仰面躺下，肚子凹进去形成一个水槽，接住雨水，等那只笨鹿到这个临时做成的水槽饮水，就捉住吃掉。

圣·帕特里克在巴拉圭会比在爱尔兰找到更多的工作。为数繁多、大小不等的爬行动物，对保持生态学上的平衡，起着它们的作用。响尾蛇是一种大铃蛇，被它咬伤中毒后，除非立即治疗，否则必致丧命。美洲蟒，身长常超过十五呎，能够完全不经咀嚼吞下整只小鹿。这种可怕的动物，在地上或在有树的大路上捕获到什么活点心，在吞下去之前先要把它的牺牲品碾成肉泥。这种美洲蟒饥饿时从树枝上下垂到水面上，能捕食大量的鱼。它的种种更使人厌恶的习性，如腹部朝上，晒太阳，直到它的塞得满满的肚子腐烂生蛆为止，这些就无需赘述了。

在几乎不能进入的沼泽地里有一种大水蛇，长达八至十二呎，它轻而易举地就能把一个人吞下。关于这种怪物，神甫安东尼奥·鲁伊斯·德·

蒙托亚曾讲过两个尚待证实的故事。这位神甫说，有一次他看见一条蛇吞食了一个印第安人。第二天，这个瓜拉尼人何纳异乎寻常地出现了，尸骨粉碎，好象被磨盘碾过一样。蒙托亚的另一个故事，一直被人经常传述，据信，这种吃人的蛇，按人的方式传种接代。一个印第安妇女“漫不经心地在巴拉那河岸上洗衣服，看到一个这类的兽性东西，没想到它突然向她袭来想要污辱她。这妇女见这巨蛇这样放肆，吓得说不出话来，蛇把她带到河的对岸，达到了兽欲目的”。这个妇女在岸上躺了三天，动弹不得。在这全部时间里，这条蛇从水里出来进去，小心地看守她。神甫蒙托亚发现了这个垂死的妇女，听了她的遭遇，为她举行了教会的临终仪式。在古时候的巴拉圭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一种小的灰色毒蛇，叫弗雷列斯卡，有十五到二十吋长，毒性极大，能致人和兽于死命。另一种蛇与弗雷列斯卡毒蛇相似，颈部有鲜红条纹，皮色黑、绿、黄交杂。并非所有的巴拉圭蛇都是有毒的，但是致人于死命的毒蛇种类很多，所以印第安人种植大量的甘松，用做通常的解毒剂。

在河流和沼泽里生长着许多鱼类和怪物。嗜

食人肉的拉尼亚蛇，小而毒，成群地游动，能在几秒钟内把一个人的肌体撕碎。甚至直到今天，巴拉圭人除非用一个筐作保护，否则就不敢下河游泳。江湖里有大量可吃的鱼，因此从来不缺乏食物的供应。鳄鱼，对那些胆大而敢于寻捕它的人来说，是激奋和冒险的泉源。

这个如此容易使深坐在安乐椅上的人沉思默想起来时而毛骨悚然、时而欢喜若狂的巴拉圭乐园，有着发展文明的巨大可能性。瓜拉尼印第安人，如果再让他们与白人隔绝几个世纪，本可以发展出一个高度的文化。他们也可能对过去未能征服的自然，继续进行他们往昔的斗争而不能获得显著的成效。繁茂的草木，成群的毒虫，惊人的洪水，可怕的热带风暴——这一切都被言之过甚。诚然，没有一个印第安人曾经战胜过他们的自然环境，但是有几个部落却获得了某些更有智慧的成就：不管自然界怎样神奇莫测，他们毕竟学会了如何和它初步地协调相处。

瓜拉尼人相信鬼神，不论大的和小的，善的和恶的。他们觉得有一个永生的灵魂之类的东西存在着，至于天堂和地狱则是基督教介绍进来的。他

们没有僧侣在人和上帝之间铺设通道，女巫、男巫或术士也填补不了这个鸿沟。如果能对在白人到来之前瓜拉尼人反复传诵的神话和传奇进行研究，人们对瓜拉尼人的宗教信仰或许可以有更好的了解。埃洛伊·伐里尼亚·努涅斯说："研究瓜拉尼人的神话，能使我们确定与这些神话相关的宗教信仰的主要因素。简略地说，人们可以断言，瓜拉尼人的宗教是一神教；这个宗教的至高上帝是无处不在、不具形式的圣洁的神灵；它承认灵魂永生的原则，或许还承认天堂的存在；它承认恶神能起的影响是有限制的，它和基督教里的魔鬼有区别；最后，这个宗教没有偶象、神庙或祭祀。"

瓜拉尼人处于外界的动植物——这些变幻莫测的大自然的神奇创造之中，对这些东西的产生，他们很自然地要加以解释。图帕是伟大的造物主，这个神的象征和住所是金色的太阳。阿尼亚或称波拉，同女神亚西避难在日渐亏缺的月亮里。阿尼亚是大祸星，是灾患和不幸的制造者。这两个神或她们的宠儿在瓜拉尼神话中占有显要地位。图帕创造树木，培植森林，用花草覆盖光秃秃的河岸；他创造大蟒和致命的珊瑚蛇、猴子、狐狸以及一切

生物。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创造了人。有一个从无人迹的遥远的森林，图帕希望这些新生物去占领。他派遣他的使者——河神伊—亚拉从那里给他取来一块泥土。图帕用他的双手捏土，塑成两个人形，他们是兄弟。他给以取自太阳的生气，他们就活了。一个兄弟叫皮塔，皮肤棕色或红色，另一个叫莫罗蒂，皮肤白色。河神创造了两姊妹，作为他们的伴侣，图帕自己不去创造妇女，因为这工作对他说来是太卑贱了。

皮塔和莫罗蒂同他们的伴侣一起生活在森林里，相亲相爱，生男育女。皮塔发现了火，莫罗蒂发明了烹调肉食的方法。这些原始人很喜爱肉食，从而放弃了田园生活而成为猎人，制造弓和矛以更利于捕杀猎物。后来，皮塔和莫罗蒂因分配猎物发生了争吵，不久两人就成了两个敌对阵营的头领。

图帕恼怒了。他本来可以把这些受阿尼亚威迫而误入歧途的人毁灭掉，但他没有这样做，决定教育他们：把他们创造出来是要他们和睦相处，而不是要他们相互争斗。图帕召唤雷公奥苏努努震撼大地，雷公让可怕的暴风雨在森林里狂吹猛打了三天三夜。皮塔和莫罗蒂忘了他们的争吵，他们

的孩子在树底下缩成一团，眼睛被闪电刺瞎了，耳朵被雷声震聋了。太阳出现了，从那里走出了伊一亚拉，他装成一个矮子，把人们带到森林中的一条小溪边，在那里他命令皮塔和莫罗蒂相抱。当他们的孩子正看得发呆时，兄弟俩合为一体，随即变成一株灌木——森林中的百合；秋季来临时，红色的百合花慢慢地转变为白色。

在亚松森的植物园里，在一个池塘的平静的水面上漂浮着"维多利亚女王"睡莲的大叶，好象在永远祝福。这个水生植物中的女王，在南美河流中是常见的，它开着悦目的鲜艳花朵，散发出奇异的芳香，为人们提供大量食用的莲子，并献出自己的叶子为青蛙和飞鸟作栖息之处。瓜拉尼人把睡莲叫做"伊鲁佩"，即水玉米，它来源于莫罗蒂和皮塔的爱情故事。

在解说森林中的百合花的故事中，那两种颜色是兄弟俩的化身。而在伊鲁佩的神话里，他俩却是一男一女。当然，皮塔是一个英俊的武士，而莫罗蒂是个最可爱的姑娘，又是一个绝顶妩媚的女子。一天傍晚，正当青年男女在河岸上散步时，莫罗蒂把一只手镯掷进水里，叫皮塔下水去取，以证

明对她的爱情。武士在水下消失了，没有再回来。一个女巫声称她在水妖的富丽堂皇的宫殿里曾见过皮塔，那诱人的水妖劫掠了部落的许多勇士。是的，皮塔不会回来了。莫罗蒂必须去寻找他，只有她才能把他从生命攸关的诱惑中救出来。莫罗蒂双脚绑上石头，跳进水中。天亮了，但这对情侣仍未出现。就在那出事的地方，却涌出了一朵美丽的睡莲，这花的外瓣是红色的，代表莫罗蒂，内瓣是白色的，代表皮塔。图帕使他们在死亡中结合，又使他们在尘世中复活。就这样，伊鲁佩这个“维多利亚女王”被创造出来了。

关于创世的各种情节，从大地、植物、动物开始，到人类的出现，达到了高峰；然后回过头去解释一些植物、鸟或动物的起源。瓜拉尼人对于某些这类的故事，特别关于马黛茶的起源，说法不一。

亚松森建立于1537年，一百年后西班牙人简直放弃了在瓜拉尼土地上寻找黄金国的希望。但黄金梦不是容易破灭的，多少西班牙人为此死于查科荒原或淹没在江河、沼泽之中。但是，巴拉圭有的是富源，耶尔巴树叶就是其中的一种。马黛茶是与巴拉圭分不开的，正如东方的茶与英国分不

开一样。这种树叶经过烘干、碾碎后制成一种苦味的饮料，养成嗜好后就觉得它十分可口。成吨的马黛茶从维利亚里卡、从巴拉圭南部和阿根廷的米西奥内斯省[①]供应布港人[②]，大草原上的高卓人[③]和秘鲁的矿工。马黛茶分三级，其中卡阿米尼是一级品，价格最高。在殖民地时代，马黛茶的声誉达到高峰时，仅秘鲁一年就购入二百五十万磅。阿根廷的高卓人没有它简直就活不下去。牛肉和马黛茶是高卓人的日常饮食品。马黛茶虽然绝不是世间的神丹妙药，但它确是含有少量麻醉剂的有益饮料。

卡阿或称马黛，大概是住在森林里的瓜拉尼人所崇拜的一种树。奇怪的是，这种树的起源竟与恶神阿尼亚有密切联系。在白人到达拉普拉塔地方之前不久，一个瓜拉尼男巫说，他喝了用耶尔巴

---

① 米西奥内斯（Misiones）：西班牙文意为传教区，该省即由原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区组成。——译者

② 布港人（Porteño）：指定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欧洲白人。——译者

③ 高卓人（Gaucho）：南美的一个种族，是阿根廷、乌拉圭地区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种，能骑善战。——译者

树叶泡制的饮料，便能掌握阿尼亚所具有的魔力。这种茶喝了使人神志清醒，能与魔鬼交往。在瓜伊拉工作的耶稣会教士改动了这个故事，引用派·卢马或派·苏梅——这位传说中的施主曾在图皮—瓜拉尼人中传教讲学。他们说：这个派·卢马就是曾在巴拉那传过教的圣·托马斯。他在离开他的皈依教民之前，把有毒的耶尔巴绿叶碾碎、烘炒，冲调成茶。他同他的皈依者喝了这茶。按照耶稣会教士的说法，马黛茶，就其起源来说，是神赐予的。

另有一个记载说，图帕在旅行途中，到一家茅舍借宿，茅舍里住着一个贫苦老人和他的女儿，还养了一只鸡。这个印第安人杀鸡待客。图帕很受感动，因而使他的女儿永生，把她变成耶尔巴树，这是表示感谢的一种特别方式。但是，有些年老的巴拉圭人，对这个故事持有异议，上帝没有使这个姑娘变成一棵树，而是使她成为马黛女王，年轻、金发的卡阿·亚拉。直到今天，耶尔巴园的工人们仍然宣誓忠诚于她，如果她能帮助和保护他们，他们决不接触其他女人。米内罗①——耶尔巴工

① 米内罗（minero）：西班牙文意为矿工，此处指耶尔巴采集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矿工一样恶劣。——译者

人，要是背弃了这个誓言，可怖的死亡就等候着他。

在神话编造者手中，卡阿·亚拉本身受到了可怕的损害。有些人称她为卡阿·波拉——一个森林中的迪安娜[①]，守护她心爱的动物，不让猎人追捕。有人还曾称卡阿·波拉为巨人，她吞食已为猎人打死而后来未能找到的猎物。

关于马黛的一个最使人爱听的故事是从月娥亚西开始的。亚西女神爱扮作一个美丽的金发女郎，裸体或者穿着薄纱似的衣衫，由一个白人姑娘阿赖陪伴，漫步穿越森林。一次，这一对美女迎面遇到一只凶恶的美洲牡虎。为什么这两位金发女郎不行使她们的神力而脱身呢？因为她们化成人形后就失去了超自然的能力。正在这时，一支箭飕地掠过上空，射中老虎的腰部，她俩脱了险。这只野兽向隐藏在树后的一个印第安老人——它的敌人，猛扑过去，老人闪到老虎身下，将一支箭插进它的心脏，把它杀死。这场战斗使亚西和阿赖得以回复到月亮和云彩的原形。那天夜间，她们回来，

① 迪安娜(Diana)：罗马神话中的狩猎女神、森林女神。——译者

在她们的恩人的梦中拜访了他，亚西告诉他，她已给他创造了一棵新树——卡阿，并告诉他怎样用它制茶。

耶德拉或伊埃德拉是一种长着宽阔绿叶的植物，它的树叶能把树木活活闷死，最后用一个有生命的堂皇的假相盖住死了的树干。这种植物来源于一个美女的野心。在巴拉那河畔的某个地方住着一个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瓜拉尼部落。一天，在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个美貌的年轻寡妇，怀里抱着一个孤儿。她曾经是一个酋长的妻子，她丈夫的去世迫使她外逃，以免她的孩子遭到她丈夫的敌人的杀害。这个部落里的一些最显赫的武士向她求爱，均遭拒绝。他们对于这个美丽的陌生人这种奇怪的态度感到诧异。后来才知道，她已成了他们的白发苍苍的酋长的情妇。年轻的武士们恼怒起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妇女怎么能爱上这个老家伙呢？酋长一定是迫使她成为他的女人的；同时，她所以会答应，是为了使她的儿子承袭他继父的职位。这个年轻妇女的爱情，对年迈的酋长来说是过多的：一天，他死在她的怀里。野心驱使她牺牲了青春，但她并没有给她的儿子获得任何东西。葬礼

正在进行的时候，有人进入她的茅屋，一箭射入她儿子的心窝。这个美人又一次成为一个无家可归、踯躅于沼泽和森林的流浪女。最后，图帕怜悯她，把这个不幸的妇女变成了一种攀绕植物，人们可以看到它的绿叶把老树窒闷而死，这永远提醒年轻妇女和老年人都不应该有过分的野心。

多情花是热带藤蔓植物中最美丽的一种，每朵花中有个十字形。虔诚的西班牙人发现多情花是基督受难在自然界里的一种表现。这种植物的多刺的茎根，血红的果实和那花中的十字形，使人想起髑髅地[①] 的征服者们。每一朵娇弱的花是一个杰作——一首伤感的和血泪的诗篇。对瓜拉尼人来说，这个可爱的创造物就是布鲁库亚——从前随父亲来到美洲的一个美丽的西班牙姑娘。这位姑娘同一个瓜拉尼酋长怀有私情，而拒绝嫁给她父亲所选定的一个人。有一段时间，这一对情人不敢相会，但这位酋长每天晚上都在城堡外边守候，吹着笛子，用笛声告知他已到来。后来，布鲁库亚终于再也听不到那传情的笛声了。她为渴望情

① 髑髅地（Calvary）：基督被钉于十字架之地，在耶路撒冷附近。见《圣经》。——译者

人而消瘦下去。有一天，酋长的老母从丛林里走出来，告诉她：她的父亲因为察觉到酋长是他女儿拒绝出嫁的原因，已把酋长杀死。布鲁库亚（她的西班牙名字已被人忘掉）在林中祭坛上找到她情人的尸体。她掘了一个墓穴，请求老妇人把她和那为爱情而死的人埋在一起，随后她就心碎死去。几个月后，在坟上出现了多情花，爱情战胜了死亡。

在巴拉圭的大树中，有一种叫瓜维拉，它的椭圆形叶子的尖端生有一个小穗。谁吃了这种树的果实，就会爱上巴拉圭，甘愿在此度过他的余生。瓜维拉是个赋有超自然能力的姑娘，是图帕和亚西的心腹。她决心做个女巫，她经受各种考验时毫不退缩犹疑。她斋戒，保持贞节，这些在瓜拉尼人中间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可以使一个候补者成为库尼亚一太，即成为女巫医的最后一个考验，曾使许多有志者放弃斋戒和贞节。这就是，她必须喝下用马黛药料和死亡汁调制的饮料，后一种成分取自林中祭坛上腐烂尸体渗出来的汁液。瓜维拉成了一个库尼亚一太。

瓜维拉穿着稀奇古怪的服装，在神树阿瓜赖瓦下坐着。这个女巫戴上一顶用羽毛编成的帽子，

挂上一串用羽毛和有色种子做成的项练，穿上一件用纤维和羽毛织成的短上衣，看上去她就象某种珍禽。瓜维拉吸烟吸得头晕目眩后，便能占卜未来，解答现在。她成为一个有玩蛇绝技的魔术师。后来，她参加一个瓜拉尼姑娘和一个她救过他性命的西班牙人的婚礼。结婚仪式进行到一个阶段，瓜维拉和这个西班牙人不见了。多少年来没有一个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后，另一女巫透露：这两个人逃进了森林，度过了一个情狂的蜜月；之后，西班牙人对瓜维拉感到厌烦了，抛弃了她，另找了个白种人作妻子。瓜维拉由于破坏了守贞的誓言而遭到惩罚。她在颠沛流离中死去。但是图帕把她的身体变成一棵结黄色果实的树。一个男人一旦吃了这种果实，就不再怀念他出生的地方，爱着他的姑娘也就无需担忧她的爱人会离开她了。

另一种树，叫伊萨皮，经常哭泣。它的叶子散发出稀薄的、使人心神爽朗的雾雨。这个现象从一位酋长的美丽的女儿——伊萨皮的故事中得到解释。伊萨皮要不是铁石心肠就是缺少泪腺。什么事情都不能使她哭泣。她能目睹最可怕的灾祸而无动于衷，看着亲爱的人忧戚憔悴而冷漠无情，拒

绝最可怜的哀求而不掉一滴眼泪。灾难降临到她的部落，最后只剩下几个人，其中有伊萨皮。通妖术的人说，这个姑娘是他们灾祸的根源，因为她不肯哭泣。最后，一个女巫祈求阿尼亚发怒，于是阿尼亚把她变成了一棵树，它的叶子不停地哭泣。

被毒蛇尼安杜列咬伤，能致人于死命，除非用伊西波藤制成的解毒药进行医治。这藤和这蛇原来是年轻美貌的姊妹俩，住在巴拉那河上游。当她们的父亲外出打猎时，她俩在家用很多时间来编织华丽的花边叫尼安杜蒂[①]。一天，一个瓜拉尼酋长的儿子阿瓜佩的独木船在她们茅屋附近失事了。他暂住在她们家里，等候河水落潮。这时两姊妹心里互相妒嫉起来。她俩都爱上了阿瓜佩，但阿瓜佩对这两个野美人却无动于衷。姑娘们除了更显露地进行逗情勾引外，还用春药和符咒来补充。尼安杜列按捺不住自己的情欲，就向阿瓜佩求爱，但除了嘲笑以外，一无所获。于是，她在阿瓜佩的食物里下了毒药。阿瓜佩走进森林昏迷将死。伊西波知道解毒药。她找到阿瓜佩，提出如果他愿意做

① 尼安杜蒂(ñandutí)：西班牙文精细之意。——译者

她的爱人，她就救他。武士拒绝了她，伊西波就离开了，让他死在森林里。后来图帕过问此事。他把阿瓜佩变成了水风信子草，它的蓝色、黄色和红色的花，点缀在巴拉那河的浮岛上。两姊妹，一个毒死阿瓜佩，一个拒绝救他的命，都必须受到惩罚。尼安杜列变成了一条丑恶的毒蛇，而伊西波变成了一棵藤，茎部含有对蛇毒的解毒剂。

一个开天辟地的故事描述图帕怎样创造了大地和动物，创造了美丽而芬芳的花草，然后用河岸上的泥土创造了一对灰黑色的男女。后来，图帕知道另一个神创造了一对白色的男女，他实在感到惊奇。这个针锋相对的创造促使图帕再来试一试。但因为他仅有的原料是泥土和树干，造出来的每一件东西都颜色深暗。他造出了绿色的鳄鱼，红色的苍鹭，黄色的蛇和绚丽多彩的蝴蝶，但是在没有造出白色的东西来之前，他是不能满足的。阿尼亚这个机灵鬼从白人的土地上偷来了一个姑娘送给图帕。图帕用这个礼物创造了一只白鸽。但是这只白鸽感到羞愧，因为所有其他生物都是灰色的。她的伤感的咕咕声是对自己悲惨命运的哭诉。最后，她找到图帕，祈求他改变她的颜色，但图帕对自己

的创造太自豪了，没有答应这个请求。这只鸽子飞回森林的僻处，把自己扑刺在荆棘上，无望地试图结束她不幸的一生。殷红的血淌满了她的前胸，鸽子跌落在地上，象死去一样。等她苏醒过来，看见映在池水中的血斑，于是赶到图帕那里；图帕喜欢这个变化，就使它永远这样了。如今，在巴拉圭看到这些受伤的鸽子，都象雪一样洁白，只是在胸口有着鲜红的斑点。

在沿着河岸的树林里，可以看到一种灰色的名叫奥尔内罗的鸟用粘土和草筑成的炉灶形的鸟巢。在自然界的交响乐永世赞美造物主的地方，奥尔内罗的歌声是美妙的。奥尔内罗原来是一个青年武士，他在狩猎时听到了一个年轻姑娘的婉转歌声，就对她迷恋起来。他渴望娶这个少女为妻，但是似乎命中注定要他娶酋长的女儿。在为到达成年期的小伙子举行的竞技中，所有的青年武士都参加比赛，优胜者就自动成为酋长的驸马。这个武士并不想娶酋长的女儿。他的最后一道测验是要他斋戒几天，这个严格的测验难在要用兽皮把他裹起来。他熬过了这个测验，但当酋长解开兽皮时，这个年轻人却慢慢地变成了一只鸟。他飞到一

棵树上，颤声唱了一支壮烈的歌。那个森林中的少女也变成了一只鸟，他俩筑了一个炉灶式的巢，这是当奥尔内罗还是人的时候居住的茅屋的缩影。

隐匿在树林深处的羞怯的乌鲁托[1] 在静谧的黑夜里悲啼。这种苦命的鸟使人们听到它的单调的诉怨声就感到忧伤——一种描绘巴拉圭悲惨历史的忧伤。乌鲁托原是一个酋长的女儿，她爱上图帕敌人的一个武士，因为不可能实现她的爱情，这个少女变成了一只鸟，在森林的幽深处永远悲叹。

神甫们开始传教时可能利用过迷信，因而使他们在瓜拉尼人中的传教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各种神话的一个最普通的共同点，就是认为人或神可以装成其他形态或者可以受罚而被变为其他形状。这样，在欧洲的神话里，阿来克尼[2] 变成蜘蛛，欧洛巴[3] 被一个伪装成公牛的神背走，而一个

① 乌鲁托(urutaú)：是一种猫头鹰。——译者

② 阿来克尼（Arachne)：希腊神话中王室染工的女儿，善织，因触犯雅典女神而自缢，女神可怜她，放松吊绳，结果绳索变成蜘蛛网，阿来克尼变成蜘蛛。——译者

③ 欧洛巴(Europa)：希腊神话中古迦太基王国的公主，宙斯(Zeus)神爱她，变作白公牛游到欧洛巴洗澡的海边，诱她骑上牛背带到克里特岛（Crete）。最后嫁给克里特王，死后克里特人奉她为神。——译者

王子成了一条活蹦乱跳的鱼。瓜拉尼人相信一个人可以变成一只老虎，即一只亚瓜雷特—阿瓦，把未受洗礼的土人津津有味地吃掉。还有捣乱鬼伊萨拉基的种种经历，证明几乎任何事情都能发生。

伊萨拉基出了一点什么毛病。这个可怜虫好象小孩一样，在家呆不住。他在森林里游荡，跟人和野兽争吵，养成了叛逆的性格。他是一个胆大妄为之徒，他的机智和气力可以使自己摆脱最严重的困境。在查科他结交了一位印第安老人，这老人教给他许多东西，还告诉他胡安·图亚如何学到了随心所欲地把自己变成任何一种野兽形状的秘诀。伊萨拉基找到了那个通晓秘诀的老巫婆。这下子巫婆有了个男人，作她和人斗争的同盟者。她把秘诀传授给他，作了神秘的暗号，于是伊萨拉基被引入了门。他第一个行动是变一只威慑森林的老虎——亚瓜雷特。一只狐狸以智取胜了这只人虎后，他就变成狐狸率领一帮豺狼似的野兽劫掠人们的村落。随后他变成了一条蛇，最后变成一只黄蜂。在最后一个形状中，他犯了错误：螫了一个试图偷他蜂蜜的人，因为黄蜂失了刺，就会死掉；不过，伊萨拉基只是回复了人形。他细想一遍自己种

种的冒险，就带着一个奇怪的要求回到喜欢他的女恩人那里。他想要变成一种动物，象老虎一样凶猛，象狐狸一样狡猾，象蛇一样阴险可憎，象黄蜂一样恶毒。于是“女巫把他变成了一个白人”。

第　二　章

瓜拉尼族与瓜伊库鲁族

在南美洲的中心地带，印第安部落之多犹如银河里的星辰。这虽然是一个编年史作家的夸张说法，但其中也有正确的成分，因为这里的主要民族分成部落，部落再分成较小的单位，每一单位又有一个或几个姓氏。在巴拉圭河以西、贝尔梅霍河以北的查科，是瓜伊库鲁人（Guaycurús）和其他许多土人的广阔地区；在巴拉圭东部和巴西，居住着瓜拉尼族（Guaraní）和卡里夫人（Caribes）的其他亲系。

在远古时代，印第安部落侵入北美洲大陆，逐渐向南散居，直至越过巴拿马地峡继续向前，到达火地岛——南美洲尖端之岛。在这个过程中，有个时期图皮—瓜拉尼族占领了亚马孙河和拉普拉塔河流域的一大部分。在巴拉那河系的上游，在巴拉那帕内马河、蒂埃特河、格兰德河以及巴拉那伊巴

河诸流域，瓜拉尼文化有了发展。这些流域的某处是瓜拉尼文明的中心，即向四周传播的核心。卡里奥人、塔佩人、伊塔廷人、奇里瓜诺人、瓜拉霍人以及其他许多部落，都不过是瓜拉尼族的支系。瓜拉尼人仍然怀念"姆巴埃维拉瓜苏的宗教的和富于想象力的祭礼，姆巴埃维拉瓜苏是一个光辉的有千年历史的城，那里居住着大酋长，每个瓜拉尼人在一生中必须至少去那里朝拜一次"。按照吉雷尔莫·特尔·贝尔托尼的说法，这个传说中的城是古老的文化中心，但是这个说法恐怕是经不起深究的。

在所有瓜拉尼部落中最进化的部落是卡里奥人，这个部落从事农业，熟悉棉纺织和制造家庭用具。他们的技术为西班牙人所利用。卡里奥人占据亚松森地区，南至特维夸里河，北至曼杜维拉河，东至约六十哩处。他们拥有金银物品，显然是从同秘鲁的安第斯山地人战争和贸易中获得的。他们有设防的城镇，抵御河民阿加塞人和帕亚瓜人以及查科犷野的瓜伊库鲁人的袭击。其中一座城镇叫兰巴雷，在亚松森南几哩处，它的外围设有两道木栅，相离十二呎。乌尔里克·施米特用明显是赞

赏的字句描写了这个城镇的外部工事："在离城墙十五呎远的地方，他们挖掘了达三人深的陷阱，一个接着一个。陷阱里插着硬木签(不露出地面)，木签尖利如针。井口覆盖柴草和碎石，在陷阱与陷阱之间撒上少许泥土和牧草，他们的用意是让我们基督徒在追击他们或攻打他们的城镇时糊里糊涂地跌入陷阱。但是他们挖了这么多陷阱，结果却坑害了自己。"

巴拉圭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有时竭力试图证明卡里奥人具有奇异的文化特点。第一次见到这个部落的欧洲人的有关陈述，对卡里奥人的文化决不是一致赞美的，但是旅行者往往从读者会欣赏什么着眼来进行写作。这里可以引用施米特关于卡里奥人的一段记载为例："男人的嘴唇上有个小洞，挂着黄的水晶……有两拃长、有羽毛茎或芦苇管那样粗。这个部落的男、女、老、少出外一丝不挂，象上帝创造他们时那样。在印第安人中父亲出卖女儿，丈夫出卖不能取悦于他的妻子，兄弟出卖或交换他的姊妹。一个妇女只值一件衬衫，或一把切面包的刀，或一把小锄头，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卡里奥人如果抓到了人，还吃人

肉。在战争中抓到了俘虏，不论是男或女，他们把这些俘虏养肥，好象我们在德国把猪育肥一样。但如果这个俘虏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妇女，他们就把她留下来，等待一年或一年左右，如果在这个时期内她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就举行庄严的宴会，把她处死，吃她的肉，这种宴会常常和结婚仪式结合起来。”

居住在卡里奥人北面的伊塔廷人，占据现在的内格腊湾北一百多哩、东至瓜伊拉地区的地方。远在西班牙征服以前，伊塔廷人攻打过印加帝国的东部边界（大概靠近丘基萨卡，即拉普拉塔殖民地一带），还在靠近查尔卡斯王室法庭[1]管辖区的西部边界处留下一个奇里瓜诺人殖民地。据说，在西班牙人入侵前一个世纪，卡里奥人也曾出征攻

---

① 查尔卡斯王室法庭（The Audiencia of Charcas）：王室法庭系西班牙殖民时期在管辖区的首都和一些最重要的殖民地中心设立的一种司法机关，一译检审庭，其成员由王室任命，有权对行政机关进行日常监察，审理对官吏行为的控诉案等。查尔卡斯王室法庭于1559年建立，其辖区包括今巴拉圭、玻利维亚等地，见本书第17章。——译者

打过印加帝国[1] 的边远省份。在巴拉圭以南居住的是塔佩人，他们从事农业，很适应十七世纪耶稣会教士在他们中建立的传教区制度。

帕亚瓜人是河盗，最初住在巴拉圭河的一边，后来住到另一边。他们骚扰的地方远达北面的内格腊湾，在那里受到伊塔廷人的阻截；但他们扰乱西班牙殖民者达数十年之久。迟至1815年，这些半裸体的土人还住在亚松森北面的小茅屋里，同梅斯蒂索人和克里奥尔人[2] 做买卖，互相蔑视。这些快速独木船的主人，身强力壮，无所畏惧，抵制任何文化上的和基督教义上的开导。他们身上的特异装饰，使他们显出一种触目的奇怪的形状。男人在耳垂上悬戴木制耳环，有的直径达几吋。女人腰部以上一丝不挂，她们喜欢把银饰品坠在下嘴唇上。医生或巫医常会受到审判：如果经他治疗的病人死去了三个，这个医生自己就要被处死。这种或

① 印加帝国（Inca Empire）：在今秘鲁，是南美印第安的一个部族印加人于1438年建立的强大的奴隶制国家（有人认为实际上是部落联盟）。1532年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国家灭亡，经济文化遭破坏。——译者

② 克里奥尔人（Criollo 或 Creole）：指在拉丁美洲生长的欧洲白人，有译为土生白人。见本书第9章。——译者

许值得赞扬的习俗，近代的巴拉圭人已不再采用。帕亚瓜人当跑差、卖鱼、卖草，挣得的钱足够他们买酒喝，直喝到神志迷糊，似乎再也感觉不到他们住处四周的污秽。为查科印第安人的袭击所激怒的独裁者弗朗西亚[①]，于1820年驱逐帕亚瓜人，把他们赶到亚松森以北一百八十哩的一个居留地。

阿加塞人统治亚松森以南至科连特斯的一段河流。他们和帕亚瓜人一起控制了巴拉圭河五百多哩，成为抵御查科的瓜伊库鲁人袭击的屏障。阿加塞人是背信弃义之徒，又恰巧住在经常发生叛乱的地方。这些河盗比绝大多数的瓜拉尼人长得大些，但他们不愿用他们的气力去搞农业生产。鱼、肉加上俘虏赎身提供的产品是他们的主要食物。阿加塞人就是在获得赎身品后也很少释放俘虏，而以残暴虐待战俘为乐。

在巴拉圭到底有多少瓜拉尼人——十万，或者这个数目的加倍，人们只能作些推测。亚松森地区如果说还不是瓜拉尼人势力的主要汇集点，也似乎曾是它的一个重要中心。他们的村镇不大，由

① 弗朗西亚（Francia）：巴拉圭独立后的第一个元首。见本书第10章。——译者

一些小茅屋聚成，住有三十到六十户，由一个称为鲁维查（或姆布鲁维查）的酋长管辖。这个酋长是由大家选的，他被选上，多少是由于他有讲好听的瓜拉尼语的口才。他治理的人供给他食物、衣服、住房和女人。一个酋长拥有小老婆的数目只受他的性能力的限制。哪个有名望的人拜访村子时，这个村子的酋长就理所当然地从他的二、三十个小老婆中挑一两个送给客人。在瓜拉尼人中夫妻关系是随便的，因为他们除了渔猎以外主要的事情是作战，终身的妻子对于一个武士说来是一种累赘。酋长对于服装是易于满足的，除了偶尔需要较好的领带外，只要头巾、手镯和羽毛制成的项圈就可以了，而这些都是所有人普通的饰物。瓜拉尼人睡在地上、席上或用树枝搭成的简陋的铺上。只有有名望的人享受较为舒适的吊床。

在原始居民中常显得突出的迷信，在瓜拉尼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哪个孕妇吃了双穗玉米，她会生双胎；一只鹿进出村子，必定有人要死亡；一只癞蛤蟆跳入船舱，乘客中有人即将归天。孕妇吃了大动物的肉，将来生出的孩子会有个畸形的鼻子；而那些吃了小鸟的孕妇将来生出的将

是小巧的婴儿。快做父亲的人必须不杀害野兽，不制造箭弩，不制造打仗用的棍棒和其他战争工具。婴儿出生后，做父亲的要离群隐居，斋戒十五天，以保佑孩子的健康和未来。鉴于瓜拉尼人有巨大的生殖力，不能不使人惊疑：男人哪能还有时间制造武器，而妇女除了吃小鸟的肉外是否还吃过别的肉。

男巫（埃奇塞罗斯）与阿尼亚结盟，在这些巫师的邪恶的眼光里，阿尼亚的形象是和地狱苦难世界的可怕图景相伴随的。恶魔教他们用什么符咒，如何引人发烧、咳嗽，以及如何使人疼痛、失明。如果这些妖法失灵，男巫就可能把一只癞蛤蟆或一条蛇或别的令人讨厌的动物绑在一棵树上，使它饿死、渴死。当这些被绑的动物力竭而死时，被他作魔的人也就有同样的下场。这些妖法的制作者，没有那种自称没有地上的父亲而只有人间的母亲的男巫有权势。这些神怪的子孙是先知，是预知未来的占卜者。他们能召唤森林里的野兽，能在水上兴起狂风，从而使人打不到猎物，捉不到鱼；他们能使河水干涸，洪水泛滥大地。他们是面目狰狞的催眠师，为了从恶魔那里取得权力，他们

曾经受过斋戒和折磨。但巫医并不假托妖术，他们以舐吸伤病处来治病。

瓜拉尼人熟悉原始农业生产是确实的，但只是妇女生产粮食，搜集木薯，而男人则外出打猎。狩猎和作战的工具是相同的。瓜拉尼武士身带弓箭和马卡纳（一种作战用的重棒），他们是不可轻视的对手。曾写过许多有关瓜拉尼人的学术著作的莫伊塞斯·S·贝尔托尼否认瓜拉尼人在战争中使用过弓箭，并愤慨地驳斥所有试图证明瓜拉尼人是食人者的说法。可是，仍然有许多相反方面的证据。一位编年史家坚持这种说法：一个武士是那样精于使弓，能使“空中的一只苍蝇都很难逃脱他的箭矢”。战俘如果是年老的，立即被吃掉，而年轻小伙子则由姑娘们陪伴他们寻欢作乐，等养肥之后再吃。

这种以战俘作祭品的风俗在美洲印第安人中是寻常的事。佩德罗·洛萨诺曾饶有兴味地描写过瓜拉尼人嗜杀的习俗细节，而受到他人激烈的驳斥。一俟把战俘养肥到适当程度，就邀请全体邻居参加宴会，虽然很难有足够的肉量供给众人。在客人聚集后，捉获俘虏的那个人“就以罗马神

堂[1] 里的征服者的那种派头走出来。他穿上经常赤身露体的人们所能及的盛装——所谓盛装也不过是些彩色羽毛罢了。他在他的所有穿着同样盛装的亲属陪同下，肩上扛着马卡纳，齐步进入木栅栏。那个将用自己的死亡款待别人的倒霉的俘虏，被两条结实的绳子捆绑着，由两个强壮的青年拉着走出来。在栅栏门口六个老太婆迎着那俘虏，这些老太婆比哈佩[2] 还丑，搽着红的、黄的颜色，挂着项圈，这些项圈不是用什么珍贵的玉石或珠宝串成的，而是用她们侍弄过的不幸的殉难者身上取下的尖牙齿串成的。她们敲打着手里的土盆，合着拍子唱歌跳舞。这些土盆是用来盛放牺牲者的血浆和内脏的。威严的征服者走近俘虏，用马卡纳向牺牲者已松绑的胳臂上猛击一棒。其他几下打得比较轻，因为俘虏死亡的时间拖得越长，观众的乐趣就越大。当牺牲者终于到了精疲力竭的时候，征服者就用马卡纳在他的头上最后一击，结束

---

① 罗马神堂（Roman Capitol）：古代罗马为祭主神（Jupiter）而设的神堂。——译者

② 哈佩（harpy）：希腊神话中鸟身女面、鸟爪鸟翼的怪物。——译者

了他的生命，这时喝采声、欢笑声、口哨声四起，天也为之震栗”。

邪恶的老妖婆用土盆盛取牺牲者的鲜血，随后许多人走来摸他的身体或者用棒打他，因为这正是那些没有取名的人为自己选择名字以便日后为人周知的时机。做父母的生了孩子，总是先参照“他们从新生婴儿身上认出来的某些生理上的缺陷或特点”给取个有点滑稽的名字。如果婴儿的皮肤是灰色的，就取名奎尔沃，即乌鸦；如果婴儿的声音沙哑象蛙叫，就取名拉纳，即青蛙。但这时，在这个大典礼上，这些可笑的名字就被扔掉，换上比较更合适的名字。在取名典礼结束后，刽子手把俘虏尸体切成小块。每个人都必须参加这宴会，即使得到的部分只是一根小筋或一口肉汤。吃奶的婴儿也得尝尝肉汤，这时做母亲的就可以为自己的婴儿换名字。

佩罗·埃尔南德斯在他写的卡维萨·德·巴卡的《传记》里，对这些吃人的仪式提出了稍许不同的说法：“他们吃在战争中俘获的敌人的肉。他们把俘虏带到自己居住的地方，使他们愉快，和他们一起欢乐，跳舞唱歌，直到他们长肥。胜利者把自

己的妻子、女儿供给俘虏，使他享受各种快乐。正是这些妻子不辞辛苦地把俘虏养肥。在他们中间享有最大荣誉的人，把俘虏接到自己住处，按照他们的风俗习惯用各种方式打扮他，用羽毛和以白念珠与小石子串成的项圈装饰他，这些东西在他们那里是很高贵的。俘虏开始发胖时，这些妻子就更加倍努力，跳舞、唱歌和各种娱乐随之增加。然后，男人出来，让三个六、七岁的男孩打扮好，准备好，每人手拿一把小斧头。这时，一个他们认为最勇敢的印第安人手持木剑（用他们的话叫马卡纳），领俘虏到一个地方，让他跳上一个钟点的舞，然后这个印第安人走上前去，双手举木剑向俘虏的腰部打去，另一下打在脊骨上，使俘虏跌倒在地。有时出现这样的情景，俘虏的头那样结实，在他头上打了六下仍没有把他打死……他被打倒在地后，三个男孩手持斧子前来，最大的男孩通常是酋长的儿子，开始向俘虏的头上砍去，其他两个孩子跟着砍，直到流出血来……俘虏一死……老太婆就把尸体切成块，用陶盆烹煮，把肉分给大家。”结束欢乐和冒险的一年的一个好方法就是这样的美餐！费利克斯·德·阿萨拉读了《传记》中的这

一段记述后，不相信瓜拉尼人在被征服前有任何食人者。

瓜拉尼人在战争中是凶猛的，对敌人是残酷的，但是对自己的人则和善而殷勤。对于生客总是给以食物和住宿。来客或从外地回来的同族人受到特殊接待，这多少带有普遍性。客人进入茅屋，坐在主人旁边，不讲一句话。以后，妇女们进来，围绕着在座的人，发出高声的悲叹。这些妇女从回忆中提起在座的客人的亲戚，赞扬这些亲戚的美德和成就，他们的好运气，还回忆他们死去的情况。这些妇女悲痛地叹息，男人则低着头，遮着脸。当出外旅行者回来受到欢迎时，妇女们不去追述先辈的事情，而是最悲痛地向他哭诉在他离开后发生的一切不幸。但是这些妇女的怪状很快结束，茅屋立即成了欢乐的中心。

瓜拉尼人的欢乐当然多少有点特别。塞西略·巴埃斯博士在他的《巴拉圭历史纲要》一书中指出，瓜拉尼人不喜欢跳舞、唱歌或游戏，没有家庭生活，没有吃喝、闲谈的友谊聚会。有些作者坚持说，瓜拉尼人喜好辩论。另一些作者却说瓜拉尼人只是在必要时才讲话，他们从不嬉笑或喜形于色，

在悲哀时只是发出叹息，但不流泪。身体受到什么痛苦，他们不出怨言或呻吟。如果这个特性一般说来是真实的话，那真是成了奇迹了。近代瓜拉尼人有敏锐的幽默感，爱好音乐和游戏，会流出真的眼泪来，讲话自然而快，是善于讲故事的人。这些特性可能是由西班牙人的榜样和西班牙人的血液造成的。巴埃斯博士否认瓜拉尼人爱好音乐，否认瓜拉尼人懂得摹仿，那是很难找到证据的。瓜拉尼人有这样一些乐器，如芦笛、骨笛、贝壳角、军号角、喇叭和葫芦六弦琴，可以证明他们能奏出某种音乐来。耶稣会教士一定发现瓜拉尼人在学习唱歌和演奏乐器方面是聪颖的学生。

在瓜拉尼人中家庭生活似乎受一种怎样便利就怎样做的原则所制约。他们实行多妻制不是为了满足性欲，而是为了繁殖后代。贝尔托尼博士证明群婚制不是普遍存在的。有些部落是一夫一妻制，有一些是有限制的多妻制。尽管有妇女容易被男家亲属出卖的说法，做妻子的受到的待遇还是好的。离婚容易：一个妇女只要告诉丈夫一声就可以离开。通奸要受到处死的惩罚。儿童受到抚育，倒不是一种慈爱的伟大表现，而是一种对传宗接

代的本能的爱。

西班牙人进入时，瓜拉尼人还保留着新石器时代后期文化的痕迹。森林提供弓背和箭杆。石子和骨头加以修琢，成为工具、器皿和武器。摩擦取火已有很长的历史，就是在朦胧的古老传说中也已找不到它的起源。陶土器皿上饰有妇女伶俐的手指刻制的和谐的图案。水狼和美洲虎的皮用来做衣服。棉花或植物纤维用来织成吊床。普遍使用的长木凳上面雕刻着森林里的动物和打猎的情景。编筐技艺和纺织使土著美术家有机会采用黑白图案。用精巧的艺术把多彩的羽毛编织起来做成头饰和其他饰物。以植物染料作颜料，用来粉饰人身或恐吓敌人。瓜拉尼美女熟悉涂饰身躯和腿的颜料比远方矫饰的姊妹们用颜料代替日光曝晒要早好几个世纪。她们还如此勤于洗澡，使西班牙人都为之惊诧。

同两个大陆上的印第安人一样，瓜拉尼人把大木头凿成快速的独木船。他们的独木船叫伊加瓦斯，长而薄，载四十到七十人。一个早期旅行者坚持说，他曾看到过一只独木船，竟载了三百人。这些独木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森林小路网是部

落使者从一个部落到另一个部落迅速传递消息用的，它有助于瓜拉尼人的联合。

有些人类学家描绘瓜拉尼人的特性时，所用的字句比通常的解说中所用的要好听得多，这或许是最近颂扬印第安人的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胡安·纳塔利西奥·冈萨雷斯在他的《巴拉圭文化的演进和形成》一书里，赞扬瓜拉尼人驯化了动物，如小鸡、鸭、红褐色的母鸡、鹿和鸟；发现了动物产品的治疗功能；对动植物给予科学的准确的命名，发现了植物的医药用途；培育了大量农作物。即使肯定这些成就的绝大部分，瓜拉尼人也很难比得上阿斯特克人、马亚人、印加人和托尔特克人[①]。

纳塔利西奥·冈萨雷斯写道：在东巴拉圭，大

① 西班牙征服前南美印第安人中发展程度较高的几个部族。阿斯特克人(Aztecs)原占有今墨西哥中部和北部，1519—1521年为西班牙殖民者科尔特斯(Cortes)所征服。马亚人(Mayas)原占有今中美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墨西哥的坎佩切、尤卡坦等地，十六世纪上半叶为殖民者所征服。印加人(Incas)原占有由今哥伦比亚到智利中部，南北三千哩，东西由太平洋沿岸到亚马孙丛林的地区，曾建立印加帝国。1532—1533年为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Pizarro)所灭亡。托尔特克人(Toltecs)于900—1200年左右在阿斯特克人到来之前在今墨西哥中部建立政权。——译者

自然使居民产生群居的意识。那里树木之高犹如大教堂，茂密的森林和丰盛的草木密集在一起，形成一个融洽的防护的整体，个体趋于消失。但是在查科，个体统治了自然界。树木往往是分离的，棕榈树箭似地从地面射出，象一支军队散开在地上，一棵棵棕榈相互分开。这些守卫兵式的棕榈树既无情于动植物，也互相得不到支持。巴拉圭的西部是两片大荒原——安第斯和查科；东部是这样一个地区，那里典雅而绝美的瀑布为大自然的力量蒙上一层幽雅的仪容。巴拉圭河把这些截然不同的地区结合在一起。这种地理上的差异对于一个部落的文化究竟有多大影响，特别考虑到其他因素的作用，这就很难说了。诚然，居住在查科的印第安人和居住在大河东部的印第安人是大不相同的，巴拉圭的中心是在东部；但离奇古怪的事情是到处都会发生的。

跨过巴拉圭河，在查科有几个未开化的部落游荡在沼泽地和干涸的河流上，游荡在覆盖着坚韧草木的广阔平原上，游荡在树岛间。兔子、小鹿、鸟、鱼、蛇和蜥蜴是他们的主要食物，偶然从敌人那里抓来的俘虏也为他们的食物增添了花样。查

尔莱沃伊斯指出，他们的消化力良好，因为“南美洲的所有印第安人都有很强的胃”。在这些部落中再没有比瓜伊库鲁族更凶猛更粗野的了。

容易遭受四面侵袭的查科，它的土壤和一般自然特点，只适宜于狩猎和放牧，对于从事农业的瓜拉尼人是没有吸引力的。瓜拉尼人除了到巴拉圭河岸出击敌人保卫他们的河域村镇外，让瓜伊库鲁人孑然孤处一方，而河界本身可以靠帕亚瓜人和阿加塞人来保护。瓜伊库鲁武士如此靠近瓜拉尼人的土地，这对住在河东的各部落可以认为是有利的，因为瓜拉尼人既然处于经常受袭击的危险境地，就不得不松散地联合起来。这种松散地联合可能曾经促进过瓜拉尼人文化的发展，但是瓜伊库鲁人是感觉不到这种必须联合的胁迫的。不管早期的法兰西斯教派和耶稣会力图在他们中间建立传教区，也不管比较近代的英国圣公会和天主教会试图把基督教引入查科印第安人中去，瓜伊库鲁人在几个世纪里大部分处于无变化的状态。随着1935年查科战争的结束，巴拉圭作出试探性的姿态，要在大河近岸以外的区域进行垦殖，这一发展可以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门

诺教徒的垦殖地得以继续和扩大，并且必不可免地会进逼二十世纪残存的瓜伊库鲁人。但是在西班牙人征服以前的时代里，这些还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

人与人比，瓜伊库鲁人要比瓜拉尼人优秀得多。在西班牙人到来的前夕，姆巴亚人或阿尔瓦亚人渡河攻打在巴拉圭北部的伊塔廷人，并定居在伊帕内河和阿帕河之间的一个地区。许多被赶出的伊塔廷人向南迁移，定居在现在阿根廷的科连特斯省和米西奥内斯省。这些姆巴亚人对于西班牙殖民者始终是一个威胁，在十八世纪中叶他们最后被征服，那时唐·拉斐尔·德拉·莫内达是总督。在此之前，在圣佩德罗、康塞普西翁和罗萨里奥地区留下未走的伊塔廷人同化了入侵者，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姆巴亚文化的痕迹。

瓜伊库鲁人仅在身体外表方面，就足以令人夜里做恶梦的了。男人裸体外出，除戴副手镯或腰带和一顶粗制的帽子外，身上别无所有。妇女头上的头发被拔得光光的，有时身上围着类似铁匠所围的一种围裙。似乎没有人确实知道，这是不是因为瓜伊库鲁人不知道什么是礼貌或羞耻。冷天男

女都穿上兽皮衣，戴上兽皮帽。他们身上都画着或涂着不同的颜色。男孩不满十四岁时，涂黑色，十四岁后的两年涂红色，然后通过仪式他成为武士，武士仪式由一个老武士主持。老武士把候补武士的头发，除了头顶一束紧捆成髻外，都加以拔光，用尖骨刺身，用血摩擦他的头皮，把红土抹在他的身上。这时，男孩就成了武士，是个成年人了。到了二十岁，要举行另一个仪式，在他身上进一步涂色、扎刺，在头上摩擦，通过这一仪式，他成为一个老武士。

瓜伊库鲁人损伤外貌较轻。幼儿的下唇穿孔，使能挂上小东西；耳上穿孔，把孔抻大以便最终能塞上大木塞子。瓜伊库鲁人不留头发，为了增强视力还把眉毛拔去，在身上涂以有色的污物，还用任何一种闪光的东西装饰起来，他们这样打扮成的形状，足以把雨神、雷公和瘟疫恶魔吓跑。

在查科的部落中，有些部落的武士比不带枪炮的西班牙人要强得多。武士用的标枪是硬木做的，在尖端装有矛角。这种标枪掌握在他们手里是难以对付的。武士把矛刺入敌人肉中后，就用扎在枪柄上的绳子把敌人拖近身边。武士用鱼的腭骨

把他的颈根锯断，剥去头皮。这些武士以快速突击著名，他们能用套索捕捉飞奔的野马，跳上马背把它骑走。好几个部落都具有这些特点，特别住在圣克鲁斯到巴拉圭河这一地区的奇里瓜诺人。1556年安德列斯·乌尔塔多·德·门多萨副王[①]派遣安德列斯·曼索队长从秘鲁到皮科马约河南的查科去征服奇里瓜诺人。他们诱使西班牙人堕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中，然后把西班牙人一个个杀死。

哈拉耶斯湖（较正确地说是个沼泽地）的岸边，居住着一个同名的印第安部族。这些居民比卡里奥人更进化，比瓜伊库鲁人更愿意用脑子。属于他们的村镇共有六千住户，他们控制了邻近所有的部落。哈拉耶斯人不同于其他绝大多数的土人，他们养鸡、鹅、兔，种植农作物，承认国王高于部落的酋长。他们有简单的法律，偷窃和奸淫者定死刑；娼妓必须同善良妇女分住，但是她们可以脱离肮脏的职业同人结婚，不遭耻辱的烙印。奇基托人和其他部落，畏惧并尊敬哈拉耶斯人，但是哈拉耶斯人注定要被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奴隶搜捕者所消

① 副王（Viceroy）：西班牙王室派往各殖民地大管辖区的首脑，此处指秘鲁管辖区的副王。——译者

灭。

所有游荡在巴拉圭河东部和西部的印第安人中，只有瓜拉尼人有效地、自愿不自愿地参与了殖民地的开发。在巴拉圭，瓜拉尼人在种族方面实际上压倒了欧洲人，而且在文化方面对欧洲人起了深远的影响。

第 三 章

来自海外的白种人

正如骄傲的巴拉圭人一遇机会就愿告诉每个旅客的那样，亚松森是拉普拉塔河流域最古老的城市，是巴拉圭人生活的中心。那里有主要的河港，货物从此运往下游，同时也为上游各港转运货物。那里是国民政府所在地，有国会、大教堂、大学、大银行和大旅馆，还有外交使团为社坛增光。植物园为人们提供林荫车道和天然的高尔夫球场。经常下雨使街道清洁如洗。出租汽车司机驰车穿过电车轨道。在西班牙路和哥伦比亚大街旁，漂亮的别墅和宜人的庭院鳞次栉比。浓装而赤脚的梅斯蒂索妇女，挑卖着精致的尼安杜蒂花边。

在这棋盘式城市的边缘，柑子园和红桔园四季花开。成行的开花大树宛如天然的深谷峭壁。每天清晨，小毛驴毛茸茸的背上驮着摇摇晃晃的货包，旋动着两只长耳，毫不在乎赶驴人的吆喝和

鞭打，神态自若地向市场走去。妇女们头上平稳地顶着篮子、瓶子、箱子或包裹，在市场上来来往往。

亚松森四通八达，是个热闹的地方。大约每十个巴拉圭人中有一个住在首都，全城人口可能有十三万。在巴拉圭，户口普查既不经常也不准确。亚松森作为一个已有四个多世纪历史的城市，有许多值得纪念的东西。它们有的使人回忆起最初居住在傍河的起伏平缓的丘陵上的瓜拉尼人，从这些丘陵隔水远眺，可以望见皮科马约河，直至查科。它们有的使人回忆起阿约拉斯、伊拉拉、卡维萨·德·巴卡、公社派、弗朗西亚和洛佩斯[1]。它们也有的使人回忆起嵌入粉墙的枪弹，为修筑街垒而被砍倒的电线杆，以及压迫和暴动。

当西班牙人努力夺取通向阿根廷门户的显著标志，还只是留在草原上漫游的一些野马的时候，地处拉普拉塔河口上游一千多哩的亚松森已是一个繁华的殖民地了。亚松森派生了布宜诺斯艾

---

① 这些都是巴拉圭的历史人物，详见本章下文和以下各章。——译者

利斯、圣非、科连特斯和贝尔梅霍河畔的康塞普西翁。有时巴拉圭人说，这些孩子[①]算不得是良家后裔，而是不受人尊敬的私生子。亚松森这个与世隔绝达三十年之久的内陆城市曾是西班牙王室在南美洲广大地区的一个宅园。它是西班牙王室抵挡巴西不安分的葡萄牙人的前哨，它回答了这样一种轻蔑的讥笑，说西班牙人在这样一个金银贫乏之地是不能有所作为的。

在西班牙所有的港口里，没有一个领航员能超过胡安·迪亚斯·德·索利斯。他曾于1508年同维森特·亚涅斯·平松沿南美洲东岸航行，经过拉普拉塔河的河湾，但平松没有注意到这个河湾。五年后，破产的密航者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阿默默地站在达连湾一个山峰上，眺望南海（即太平洋）。那时，斐迪南国王希望能找到一条连接大西洋和南海的隐秘的通道。1515年10月他把三艘装备完好的航船，委托给索利斯，从西班牙启航。1516年元旦索利斯找到了里约热内卢湾；几个星期后，他驶进了一个广阔的泥滩河口，半个大

① 指上举各城镇。——译者

陆的水通过这里流入大西洋。在他访问后，这个河口就取名索利斯河，现称拉普拉塔河。查尔鲁阿族的印第安人，看到大船上的索利斯在东探西寻，就引诱他在乌拉圭一边上岸。这个斐迪南国王的最能干的领航员没有任何防备，就跟着土人走进一片森林地。他们把他吃了。有些人说，拉普拉塔土人不是食人者，但是那些从自己船上无能为力地注视着这件事的西班牙人，讲的却是与此不同的故事。

索利斯被杀害后，他的探险队驶回西班牙。有一艘船在圣卡塔林纳岛附近遇难。声称对这个岛享有所有权的葡萄牙人，称它为尤鲁明林。船上十八名幸存者最终在这个有争议的岛上避难。他们中间有个叫阿来霍·加西亚的，他是参加索利斯航行的几个葡萄牙人之一。加西亚很快获得了有关瓜拉尼人的许多知识，他渴望访问那个传说中的、远在西方并曾遭到瓜拉尼人和其他印第安人袭击的“白王”[①] 的地方。有一种说法，甚至认为早

① 白王（White King）：新大陆发现时传说中富产黄金的秘鲁国王。——译者

在第十世纪，瓜拉尼人的入侵就毁灭了古代的蒂亚瓦纳科帝国[1]。但是有些理由可以使人相信，在十四和十五世纪，瓜拉尼人的入侵威胁了塔瓦廷苏尤(即印加帝国)的边界地区。加西亚偕同五个或许六个伙伴，大概在1524年的早些时候，离开圣卡塔林纳，向西作广泛的旅行，他发现了伊瓜苏瀑布，跨过巴拉那河，进入了灿烂的大花园和深红色的大地，这就是巴拉圭。在十三年后建立亚松森的地方附近，加西亚招募二千武士，协助实现他攻打“白王”的计划。这支军队在出发横穿查科之前，曾沿巴拉圭河北进，到达科仑巴，或许还没有这么远。查尔斯·E·诺威尔指出，胡安·德·阿约拉斯曾于1537年重复走过这条加西亚去查科的路线。加西亚募集新兵，扩充他的奇里瓜诺人部队后，曾到达玻利维亚进行抢劫。印加帝国的统治者瓦那·卡帕克抗击入侵者十分顽强，迫使加西亚暂时撤退，以保全他的战利品。弗朗西斯科·皮

---

[1] 蒂亚瓦纳科(Tiahuanaco)：史前时代的城市废墟，在今玻利维亚的的的喀喀(Titicaca)湖南岸，拉巴斯以西约四十哩。传说中的蒂亚瓦纳科帝国即建于此。——译者

萨罗[1] ——瓦那·卡帕克后代的征服者，那时正全力向哥伦比亚的西岸推进。加西亚退回巴拉圭河，并考虑到自己的安全，就派遣使者携带少量银子去圣卡塔林纳，敦促他过去的伙伴参加他的队伍，但是他们收下财物和信件后却没有冒险的兴趣。幸而他们拒绝了，因为在1525年的晚些时候，加西亚和他的一伙人在亚松森以北约一百五十哩的地方，被他们的同盟者杀害。加西亚的战利品白银留在巴拉圭河的河岸上。塞瓦斯蒂安·卡沃特在瓜拉尼人中曾见到一些白银。

几个欧洲"第一"是属于阿来霍·加西亚的：他第一个横穿南美洲中部的内地；第一个同瓜拉尼人结盟；第一个见到伊瓜苏瀑布；第一个进入巴拉圭；第一个横穿查科；第一个看到印加帝国；同时，他至少是第一批因财物而死的一个。他的惊人探险和极端勇敢，显示出他是一个堪称"征服者"

①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 1470？—1541）：西班牙的著名探险家和侵略者，他经过两次早期探险航海后，在1532年11月带着探险队在秘鲁的坦贝兹登陆。后用诡计抓住了印加帝国的国王阿塔华尔帕，屠杀了无数的印第安人，残酷地征服了秘鲁。——译者

的人。他的探险增强了卡沃特、阿约拉斯、伊拉拉和卡维萨·德·巴卡的想象，在历史学家中引起了混乱，甚至他的存在，有时也被否定了。但是，阿来霍·加西亚不管他现在的形象如何虚无缥缈，决不是一个来自诗人梦中的幽灵。

神圣罗马帝国的候选皇帝查理一世继承了西班牙和西印度[①]的王位后，着手制定占领拉普拉塔河流域的新计划。有一批富商愿意配备一支舰队，由著名的领航员迭戈·加西亚指挥。1526年8月15日，加西亚率领三艘船启航，航行五个多月后于次年1月份抵达后来叫圣维森特的地方。当时，西班牙著名的头号领航员塞瓦斯蒂安·卡沃特同意沿着麦哲伦航线去东方并用他的船满载“金、银、珠宝、医药、香料、丝绸、锦缎以及其他珍贵物品”回来。1526年4月卡沃特的四艘船装载了六百多人从圣卢卡—德—巴拉梅达启航。费利克斯·德·阿萨拉记载：卡沃特有三艘船，船员不到三百人，其中有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阿的三个弟兄。

① 西印度（Indies）：当时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的通称。——译者

卡沃特没有见到东方。由于船员中发生了骚乱并渴望获取秘鲁的财富，他决定去拉普拉塔河区探险。他先于加西亚到达该地。6月，在伯南布哥的葡萄牙人，告诉卡沃特关于阿来霍·加西亚、“白王”和圣卡塔林纳岛上那些遇难者的故事。在这岛上卡沃特找到了加西亚的伙伴，证实了葡萄牙人所讲的故事。他决定致力于征服印加帝国，或在帝国境内获得立足点。他驶入拉普拉塔河，在乌拉圭的河滨建筑一个木寨，称圣萨尔瓦多，留下驻防部队保卫它，然后继续向巴拉那河上游航行约一百哩。在那里，他建筑了堡垒，叫圣斯皮里图，留下另一支驻防部队。他自己率领三艘船向巴拉那上游继续前进，这是第一批白人在这惊险的河流里航行。西班牙人通过巴拉那河和巴拉圭河汇流处是很艰难的。巴拉那河沿岸的瓜拉尼人欢欢喜喜地用食物交换了小件饰物，同时警告白人，前面就是急流。卡沃特回航，驶进巴拉圭河，平安无事的航行了四十里格。随后，用三百艘独木船装载的阿加塞印第安人，在河的狭隘处对卡沃特进行袭击，结果他们自己遭到很大损失，而西班牙人只有三个人死亡。“这个胜利的消息迅速地在邻近

地区传开，使别的部落的土人无不欢乐。因为这次他们遇到的共同敌人比那使他们受到屈辱的、还可能阻碍他们力量发展的阿加塞人更强大，而且战胜了他们大伙过去的征服者”。卡沃特继续航行，几乎到达了亚松森的现址。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瓜拉尼部落有白银，这或许是阿来霍·加西亚的财物。因此，卡沃特给巴拉圭河取名拉普拉塔河，即“银河”。他的梦中城堡腾空飞翔，直至它的尖塔触及十字星座，因为那里是一个财富之国，可以为他赢得那自负的心灵所渴望的名声。

当迭戈·加西亚在1527年早些时候驶进大河时，已存在发生内战的威胁。卡沃特没有权利呆在南美洲；但是他不愿放弃自己所想望的富裕的战利品，并劝说加西亚和他合伙。于是卡沃特派遣两个使者，带上这个地方的土产、白银、他的发现记录和希望给予他征服权利的请求书，回到西班牙。但没有等待答复，卡沃特就于1530年航行回国，留下以努尼奥·德·拉拉为首的一百二十人的驻防部队看守圣斯皮里图堡垒。二年后，这个堡垒和驻防部队的大部人员被廷布印第安人所消灭。用何塞·格瓦拉神甫的话来说，这些廷布印第安人是“温

柔的、情深的、殷勤的人，好如朋友，但恶如仇敌”。

廷布人的酋长曼戈雷曾多次访问圣斯皮里图堡垒。他见到了塞瓦斯蒂安·乌尔塔多忠实的、“非常美丽的、诚实的和贞节的”妻子罗西亚·米兰达，就非要她离开她的丈夫，去做廷布人的王后不可。在曼戈雷引诱罗西亚离开堡垒的所有诡计遭到失败后，这位多情的酋长图谋毁灭这个堡垒。当这个堡垒的一个小分队四出抢劫食物的时候，曼戈雷带领挑着食品的搬运夫来到堡垒。拉拉看到了礼物很高兴，他邀请土人饮酒、吃饭。正在酒宴时，曼戈雷的兄弟西里波带领廷布武士团团围住堡垒，在守卫士兵猝不及防时进行袭击。努尼奥·德·拉拉打得很勇敢，在他身受重伤倒下前，终于把曼戈雷杀死。少数几个幸存者，由罗德里格斯·莫斯克拉队长或别人率领，到达圣维森特南面的巴西海岸。

西里波的武士见到西班牙人就杀，象孩子一样快乐地玩弄战利品。罗西亚成了俘虏被带到西里波那里，西里波很喜欢她；事实上，他是如此地爱她，甚至愿意放弃对其他一切战利品的权利。在廷布的营里，西里波对她百般照顾，恳求她做他的

王后；罗西亚坚定地保持她的美德，但是，这个态度只能激励西里波的爱情。乌尔塔多因出外劫掠食物而没有遭到杀害。后来，他鲁莽地找到西里波那里，西里波下令要杀害他。罗西亚救了她的丈夫，但以不许和他交媾为条件。在西里波的妻子中有一个已被遗弃的干瘪老太婆。有一天下午，她发现这一对爱人正在拥抱合欢，便立即告知酋长。西里波亲眼证实了这个消息，在盛怒中下令将乌尔塔多乱箭射死，而把罗西亚·米兰达绑在火刑柱上烧死。

塞西略·巴埃斯博士以历史为口实，不让我们有这么一段罗曼史。在他写的《巴拉圭和拉普拉塔河殖民史》一书中，这位巴拉圭的精力充沛的历史学家坚持说，圣斯皮里图堡垒是在1529年下半年，即卡沃特和加西亚向上游航行时，被摧毁的。因为发生了这个悲剧，他们才驶回西班牙。在途中“他们还能同那些从堡垒中逃出来的人交谈；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说过，在那个被毁灭的堡垒中有一位卡斯提[①] 妇女叫罗西亚·米兰达，由于她造

① 卡斯提人（Castilian）：即西班牙人。卡斯提是西班牙中部的古王国。——译者

成了堡垒的毁灭。这是巴拉圭编年史家鲁伊·迪亚斯·德·古斯曼所搜集的各种传说中的一种"。那些幸存者，同在巴西的葡萄牙殖民者发生争吵后，在1534年定居于圣卡塔林纳岛。

混乱的欧洲战争使查理一世（他以其神圣罗马帝国查理五世称号而更闻名于世）一直到1534年才重整力量去征服拉普拉塔流域。当时葡萄牙人的行动似乎在企图向南美洲掠取更多的领土，因而变得十分讨厌。查理对巴拉圭必须有所作为。在那里索利斯和卡沃特都失败了，年老的佩德罗·德·门多萨可能会得到成功，即使他没有开拓巴拉圭"荒芜之地"的雄心，他却有个人的运气。在赐以可与王公相比的土地、人民、拉普拉塔河领地、印第安人和所有一切的鼓励下，门多萨带领十一艘船、一千二百人、牡马和牝马以及远征中所需要的物品，于1535年8月启航。他必须建筑三座堡垒，同秘鲁取得联系，并进行殖民。同他一起去的有他的兄弟迭戈·德·门多萨作为舰队指挥，还有许多高贵的放荡者、冒险家、流氓以及诚实人：胡安·德·阿约拉斯、多明戈·马丁内斯·德·伊拉拉、胡安·德·萨拉萨尔·德·埃斯皮诺萨

和另外一些人——他们的传记是阿根廷和巴拉圭的早期历史，在旅途中幸存下来的七十二匹牡马和牝马的重要性并不次于这些人。

唐·佩德罗·德·门多萨名声虽大，但被证明是一个软弱多病的远征队司令。他有功绩，例如他参加过洗劫罗马，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但是，没有疑问，他是一个失败的征服者。争吵破坏了这次从西班牙出发的航行。组成这支远征队的西班牙人、德国人和葡萄牙人分成了几派，这是那个有病的、隔离在自己船舱里的远征队司令所不知道的。门多萨在里约热内卢把他的舰队分开，一部分由他的兄弟指挥去拉普拉塔河；其余部分暂时在巴西港口停泊。在那里，门多萨指定胡安·德·奥索里奥负责，而他自己试图养好他的老病。精心制造的谣言使门多萨相信，奥索里奥正阴谋叛乱。他没有给自己的助手以辩护的机会，就下令处决，由胡安·德·阿约拉斯用短剑杀死。远征队的一个成员，巴伐利亚人乌尔里克·施米特写道：奥索里奥“是被错杀的，全能的上帝知道这事，愿上帝可怜他，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处事公正的、勇敢的武士，他同所有武士都相处得很好”。

远征队司令继续向南航行，到了圣加布列尔岛[1] 与他的兄弟会合。门多萨考察了乌拉圭河岸，1536年2月在阿根廷一边上岸（为满足那些希望把事情说得尽可能古老一些的人起见，这里不妨注明一下：阿萨拉和所有爱国的布港人都说，这次上岸发生于1535年)。要使西班牙征服者所承担的这一次最艰巨的事业取得成功，必须有充分的合作和高尚的精神，可是他们却士气低落，或者比这更坏。在那对人不殷勤的拉普拉塔河岸上，他们没有找到任何期望的财富，许多人谈论要放弃这个地方而去巴西。门多萨制止这种谈论，并决定在航行困难的里亚丘埃洛河滨定居，把他的堡垒取名努埃斯特拉—塞尼奥拉—德尔—布恩—艾雷[2] 。

在这附近，鱼和猎物都很丰富，但勇敢的游牧的克兰迪印第安人也很多，他们憎恨这些外来人的入侵。门多萨派出许多远征队外出寻觅食物和探险。其中一支远征队在胡安・德・阿约拉斯领导下于5月启航，探寻一条到秘鲁去的道路。阿约

① 圣加布列尔（San Gabriel）：位于拉普拉塔河口的一个岛。——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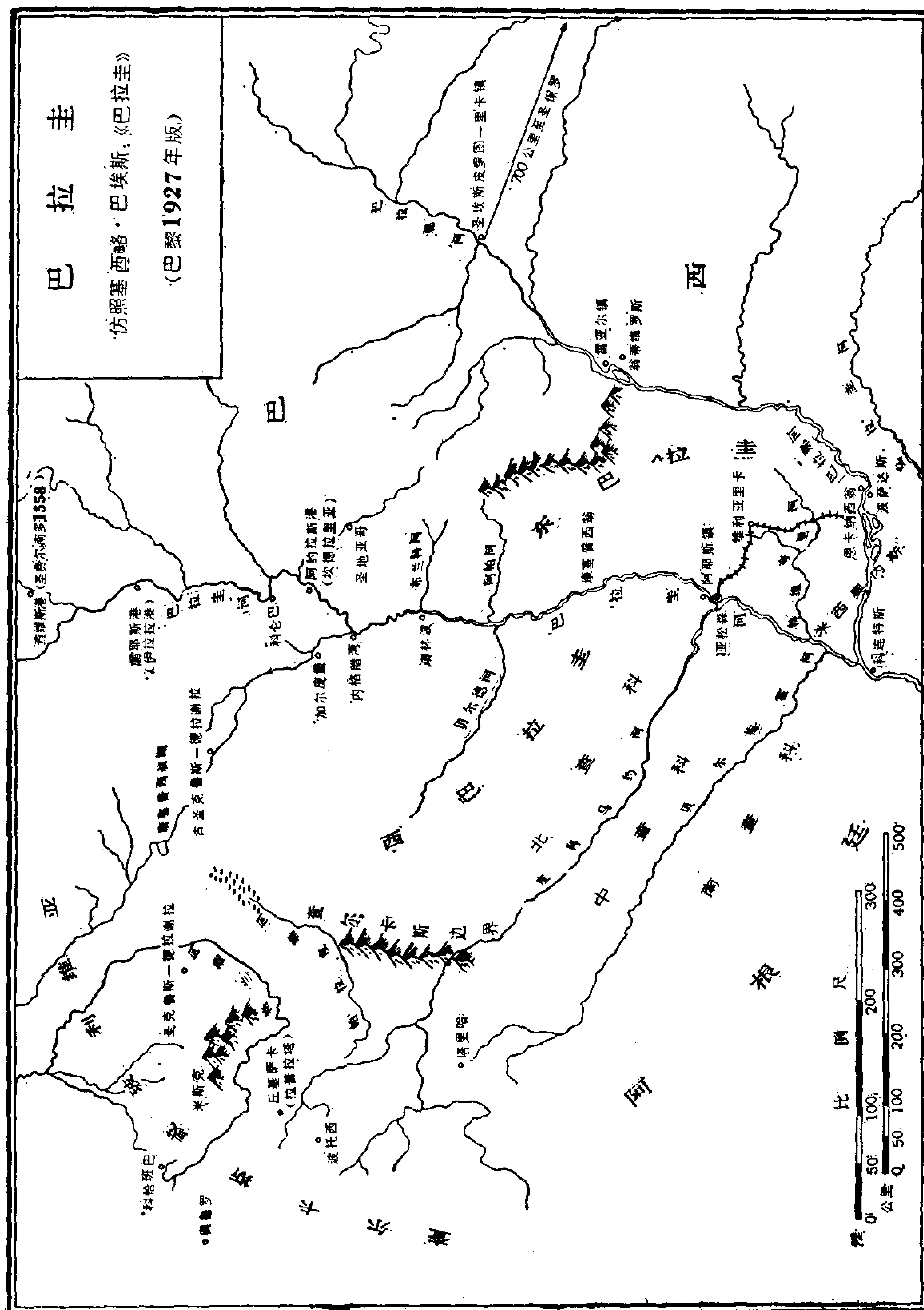
② 即后来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译者

拉斯外出的两个月是这个新殖民地最危急的时刻，因为印第安人使西班牙人受到严重损失。有两周时间克兰迪人曾供给西班牙人鱼和肉，但以后他们就敌对起来。门多萨派使者要求和解，他们却毒打了使者。这时门多萨就下令叫他的兄弟带领三百名步兵和三十名骑兵去惩罚这个部落。在对一千名印第安人进行的战斗中，二十七名西班牙人死亡。在死者中有门多萨的兄弟、舰队指挥迭戈·德·门多萨，他被石球巧妙击中而死。这石球是用一条长绳系上三条皮带，每条皮带末端绑个装满石子的小袋构成的。以后，布宜诺斯艾利斯就经常受到成千的克兰迪、廷布和查尔鲁阿土人的围攻，他们杀害了三十名驻防士兵，焚毁了四艘船，发射火箭把所有茅屋烧毁。在这个小小的殖民地里，食物吃光了，于是，只要骨头上有肉的任何东西——老鼠、猫、蛇以至自己伙伴的尸体，他们都吃。有一天，三个西班牙人偷了一匹马，宰吃了。为了惩罚他们的犯罪行为，这三个西班牙人被绞死。当天晚上，他们的伙伴把这三具尸体解开，吃了比较有肉的部分。到了最后，穿旧了的鞋、腰带和皮革都被看作是可吃的东西。

在堡垒被围期间，一个叫马尔多纳塔的妇女违抗了堡垒司令官发布的任何人不准离开大门的命令。当夜幕降临时，她偷偷出了堡垒，躲进一个山洞。在那里一只牝狮，也许是美洲虎，正在下崽，难产，她就充当它的助产婆。这只牝狮为了感激她的善行，就喂养马尔多纳塔。后来，出于本性，这只和善的野兽才离开了她。有几个印第安人发现了这个妇女，便把她沦为奴隶。以后，西班牙人从堡垒出来把她救了。堡垒司令官大发雷霆，跺着脚，气得胸铠咯吱作响，吼叫道："把她拉出去，绑在树上！"马尔多纳塔被拉出去，绑了起来。一个士兵小分队出于对她命运的好奇，两天后出去看她，发现这个受害者虽然饥饿，但很健康，在她的四周有狮子和老虎保护着。当然，那只洞中牝狮也在她的跟前。这位妇女受到了赦免，因为一个西班牙人不能比狮子更残暴，特别在上帝为她求情时，更不能这样。第一个讲述这个故事的人说，这不是一般的传说，而是他从马尔多纳塔那里听来的，讲这个故事的雷穆斯大叔实际上就是鲁伊·迪亚斯·德·古斯曼。他写拉普拉塔区域的历史，是有一套笑话的。他希望它曾发生过，就把它写进历史中去。他

的故事中有一些类似这个妇女和牝狮的故事，不能加以忽视。但是，鲁伊·迪亚斯是这样一个文学上的杜撰者，使人难以知道，在他写的历史里，什么是可以相信的。

阿约拉斯探险回来，带回圣斯皮里图堡垒已放弃的传闻，但是他带回的食物重新燃起了门多萨的希望。门多萨溯河而上，调查阿约拉斯带回的传闻的真实性。8月里，门多萨在圣斯皮里图旧址附近，建筑了第二个堡垒，叫努埃斯特拉—塞尼奥拉—德—布埃纳—埃斯佩兰萨。阿约拉斯带领五十人，其中有多明戈·马丁内斯·德·伊拉拉，从这个新堡垒启航，作新的探险，门多萨则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阿约拉斯的三艘船停泊在后来建立亚松森的那个河湾，他用一些小玩意儿换取瓜拉尼人的食物。在巴拉圭河的东岸，向背面伸展，横过连绵的低矮山脉到巴西，或许有五万瓜拉尼人住在那里。许多年后，西班牙人统计在亚松森易于达到的地区内共有二万七千瓜拉尼人。阿约拉斯经过三天的围攻，幸运地攻占了瓜拉尼的要塞兰巴雷。在1536年8月15日，瓜拉尼人派遣使者到西班牙人的兵营，给阿约拉斯带来了“六个妇女，其中


巴拉圭
仿照塞西略·巴埃斯:《巴拉圭》
(巴黎1927年版)
巴西
阿根廷
比例尺

年龄最大的仅十八岁”作为和解的礼物。从此以后，卡里奥人和西班牙人成为朋友和联盟者。后来，由于瓜拉尼人内讧引起的暴动，这个联盟遭到了严重的损害。但是，这个联盟毕竟使西班牙人有了向南美洲中心地区进行探险和征服的可能。

阿约拉斯探问去秘鲁的途径，他在卡里奥人中间找到了曾随同阿来霍·加西亚去过秘鲁的人。这些人告诉他，向上游航行，先到一个河湾，再西行横过查科。出外探险本来是不应该选择恶劣的季节。在巴拉圭，暮春是暴风雨和困恼人的时节，这时“好似恶魔在风中咆哮”。夏季又有害虫成群地孳生。但是，这种困难没有阻拦住阿约拉斯。他循巴拉圭河北上，到内格腊湾，再沿着东边的河汊，在错综复杂的水道中摸索前进。大约在1537年2月2日，他发现一个小河湾，取名努埃斯特拉—塞尼奥拉—德拉—坎德拉里亚，后来叫阿约拉斯港。他从帕亚瓜人那里听到更多关于阿来霍·加西亚旅行到印加帝国的事情，他决定继续前进，寻找那个传说中的地方。2月12日阿约拉斯怕自己万一回不来，就把全权委托给多明戈·马丁内斯·德·伊拉拉，任命他为队长，给他留下船只和三

十个人，他自己则勇敢地向西进发，深入查科，最后他死在那里。

门多萨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不耐烦地等候阿约拉斯的消息。最后，他不能再等待下去，于是派了贡萨洛·德·门多萨和胡安·德·萨拉萨尔·德·埃斯皮诺萨去调查。这位远征队司令病倒了，希望死在西班牙，因而把权力交给阿约拉斯，并指定弗朗西斯科·鲁伊斯·加兰作为阿约拉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助手，然后就启航回国。暴风雨损坏了他的给养，供应品没有了。这位皇上的好朝臣不得不破格去吃有孕的母狗肉。据传说，门多萨为此而发狂，还没有来得及诅咒那使他追逐拉普拉塔幻影的命运，就死去了。

贡萨洛·德·门多萨和萨拉萨尔并不知道他们的司令已离开，他们前去和伊拉拉会合一起，寻找阿约拉斯。过了一个时期后，他们对于这种无成果的探寻工作厌倦了，而伊拉拉又需要修理他的船只。这三个人循巴拉圭河下驶，直到找到了一个伊拉拉可以修理船的地方。伊拉拉回到坎德拉里亚；门多萨和萨拉萨尔则继续向下游航行，后来在巴拉圭河东岸一个小半岛形成的河湾上了岸。

1537年，或许是8月15日，他们建造了一个木寨，为了纪念圣母玛丽亚，取名努埃斯特拉—塞尼奥拉—德拉—亚松森[1]。这些事迹的另一种说法是，伊拉拉协助建造了这个木寨后，就回到坎德拉里亚。

夏季和秋季过去了。伊拉拉把船只收拾得整整齐齐，他手下的人整装待发，但没有听到关于他的失踪的指挥官的消息。他对指挥官的命运日益绝望。大雨使在坎德拉里亚不好呆下去，这就更加深了他的绝望。伊拉拉决定向下游驶去，想在亚松森获得一艘更能抗风浪的船只，但陷入了困境。粗陋的堡垒建成后不久，高贵的、使人畏惧的弗朗西斯科·鲁伊斯·加兰队长同一些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埃斯佩兰萨来的人，可能还有从其他堡垒来的人到达了。加兰这个出生于瓜迪斯的人，作为布宜诺斯艾利斯港的副总督和阿约拉斯的副司令官来到这里，也许要给伊拉拉带来困难。加兰随意改变自己的任命状，对这个欺诈，伊拉拉势必要产生疑心。这个半骗子自信有力量，他来到亚松森是

---

① 亚松森(Asunción)：原意圣母升天。——译者

要巩固自己的权力。有一个时期，鲁伊斯·加兰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那时，伊拉拉带了自己仅有的三十个人到亚松森来找一艘较好的船。伊拉拉是一个重实际的人，既能判断情况，又能精明地估测时机，因而试图避免同加兰发生冲突，甚至在这位自高自大的队长拒绝出示他的委任状后，还是这样。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伊拉拉逐渐变得难以忍受，随即越来越顽强地拒绝向对手的威胁低头。加兰对这场斗争感到厌倦了，命令他的执行官胡安·帕奉逮捕伊拉拉。萨拉萨尔保释了伊拉拉，其他西班牙人提醒那个骗子，说伊拉拉在印第安人中很得人心。最后，伊拉拉得到了他所要寻找的双桅船，在1538年8月23日驶往坎德拉里亚，但是为时过迟，已经救不了阿约拉斯的生命。有人经常而反复地责难伊拉拉玩忽了自己的职守，这在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在亚松森的耽搁不是由他自己选择的。在伊拉拉离开后，加兰启航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

佩德罗·德·门多萨离开拉普拉塔前，答应从西班牙给以支援。王室了解到门多萨的死亡将会导致指挥权的争执，因而派遣阿隆索·卡夫雷

拉作为视察官带领一支由三艘船和二百人组成的救援远征队。1537年9月12日王室给卡夫雷拉的指令，是命令他在门多萨未能指定一个继承人或征服者还没有选出一位继承人的情况下，由他主持选举一个总督。1539 年 1 月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听到了关于加兰的情况，决定让殖民者自己去决定他们愿意支持那一个候选人。六个月后，卡夫雷拉和鲁伊斯·加兰都在亚松森，在那里通过公众投票，伊拉拉的职权没有遇到很大的反对而得到了批准。亚松森的共同奠基人胡安·德·萨拉萨尔队长两次脱帽，表示服从。这时，伊拉拉是巴拉圭代理的指挥官兼总督。巴拉圭是王室领土，包括今日的巴拉圭、阿根廷、乌拉圭、智利的大部分，以及巴西和玻利维亚的一部分。即使阿约拉斯不曾把权力委任给他，也没有在王室命令下举行的选举，伊拉拉也一定会在公众的要求下出来当领袖的。象到巴拉圭去的那样一些远征队，常常受公众意志的支配。西班牙冒险家们既是个人主义者，同时又是非常推崇权威的人，他们热衷于民主。他们能够而且曾经废黜过和选举过领袖：在巴拿马地峡的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

阿[1]，在亚马孙河流域的弗朗西斯科·奥雷利亚纳[2]，在委拉克路斯的埃尔南·科尔特斯[3]，这些人的权力都来自他们的伙伴，而后来才由王室批准的。1539年6月25日伊拉拉公布他的权力证明文件时，没有人出来反抗。胡安·德·萨拉萨尔要求并取得了作为伊拉拉副手的地位——他作为第二司令官，也没有人反对他。这时，政府已组成，出征可以继续进行。就这样，指挥权由门多萨转到阿约拉斯，又转到了伊拉拉手中。

多明戈·马丁内斯·伊拉拉忠于他的职责，准备返回坎德拉里亚，他希望在那里能找到阿约

---

① 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阿（Vasco Núñez de Bolboa, 1475—1517）：西班牙探险家、殖民者，于1513年最先越过巴拿马地峡发现太平洋。——译者

② 弗朗西斯科·奥雷利亚纳（Francisco Orellana, 1490—1546）：西班牙探险家，1541年曾参加皮萨罗征服秘鲁的远征队，次年离队由纳波（Napo）河直到亚马孙河口，最先发现亚马孙河流域。——译者

③ 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 1485—1547）：著名西班牙探险家、侵略者，原是西班牙贵族，圣多明各和古巴的种植园主。1518年率远征队出征墨西哥，1519年在今墨西哥的韦腊克鲁斯登陆到墨西哥首城铁诺第兰，以诡计抓住阿斯特克人的皇帝，血腥屠杀后于1521年征服了墨西哥。——译者

拉斯。伊拉拉留下贡萨洛·德·门多萨队长指挥亚松森的堡垒，他自己带领二百八十名基督徒从这儿启航。在1540年1月16日到达坎德拉里亚。在那里他从印第安人中获知，阿约拉斯一伙已回到巴拉圭。伊拉拉向下游航行，抵达坎德拉里亚以南约八里格的圣塞瓦斯蒂安。在邻近地方的帕亚瓜人报告说，阿约拉斯在内地。伊拉拉留下胡安·德·奥尔特加和七十人守护航船后，于2月14日出发，寻找他的首领。这个救援小队穿越被洪水淹没而水深齐腰的地方，凄凉地走了三个星期。供应品日益减少，洪水加深。伊拉拉召集会议征求他的官员们的意见，一致意见是返回。当然，伊拉拉受不成文的法律和强有力的习惯的约束，必须服从。他的人愿意跟着他到任何地方去——到他们希望去的任何地方去！伊拉拉回到圣塞瓦斯蒂安。一个查科少年走进伊拉拉的营里说，阿约拉斯已被帕亚瓜人杀死，他一伙人中有些在查科被抓去当俘虏了。现在，没有理由呆在北方。阿约拉斯死了，伊拉拉是总督。王死了，王不朽！(Rey muerto, rey puesto!)

在伊拉拉更牢固地建立巴拉圭的基础的时候，他享受了几个月的安乐。从西班牙获得援助

后，总督派遣两个印第安人去巴西海岸给法兰西斯教派修道士贝尔纳多·德·阿尔门塔送信。这些印第安人后来见到了阿尔瓦尔·努涅斯·卡维萨·德·巴卡，并领着他到亚松森。但是，伊拉拉正忙于解决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在那里由胡安·罗梅罗队长指挥的小驻防队的问题，他全然不知道卡维萨·德·巴卡的突然到达。有好几个理由建议放弃在拉普拉塔河口建立一个殖民地的努力：这堡垒不好，印第安人敌视，草原荒芜，同亚松森通信缓慢，不服从指挥的机会大。只有三百五十人，要征服半个大陆，力量分散是不明智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必须放弃。

伊拉拉对待胡安·德·奥尔特加队长亲如兄弟，把劝导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到上游来的任务交给了他。他于1540年8月带领两艘装满必需品的双桅船离开亚松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同那些幸存的人和仍想呆下去的人辩论，没有收到效果。1541年1月，伊拉拉亲自带领三艘双桅船和视察官阿隆索·卡夫雷拉启航，去要他们搬迁。这些人居住在旧木寨内，而官员们则睡在一艘搁浅在海滩上的“特里尼达德号”船里。既然没有从那个方

向开辟航道到秘鲁的打算，为什么要把那些人留守在那边呢？西班牙人所注目的是秘鲁，不是拉普拉塔河流域。1541年6月，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抛弃。在圣加布列尔有一供应品贮藏所可以供应从西班牙来的、尚未到达的船队的需要。伊拉拉并没有强迫这些人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他的到来无疑增强了卡夫雷拉的说服力。把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亚松森合并后，这一个殖民地就能约有六百男人，少数几个妇女和几个儿童。在这些人中有几个意大利人，他们是在满载货物去秘鲁的途中，航船在拉普拉塔失事而留下的。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在亚松森都有它们的代表。在他们中有些或许是非法的，但仍然是代表。印第安人和白人结合而出生的梅斯蒂索人，迅速出现。伊拉拉自身就有几个瓜拉尼小老婆，他手下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在这个殖民地欧洲妇女太少，同时瓜拉尼妇女又很愿意嫁给欧洲人。在萨拉萨尔的女人揭露了一个毁灭亚松森的阴谋后，瓜拉尼酋长们就用为白人供应女伴的办法与白人合作。巴拉圭在最初的年代里还具有国际的特色，但逐渐成为一个梅斯蒂索人殖民地，即使后来的移

民也未能改变这个种族上的特点。

1541年9月2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帮人到达亚松森后，显然需要比营房更多的东西了。亚松森不仅仅是一个协助遇难船只或者储藏供应品的地方，而且将成为征服的中心。伊拉拉按照1541年9月16日的条例，把亚松森建成一个市。胡安·德·奥尔特加任首席警官；佩罗·迪亚斯·德尔·巴列任市长；胡安·德·萨拉萨尔被提名为市政会第一常任主席；阿隆索·卡夫雷拉、加西亚·贝内加斯同其他三个人担任市政会参政员。伊拉拉显然曾把这名单提交给公众通过。旧木寨被拆毁，棕榈树被砍倒，使市镇扩大。哨兵夜间站岗，警戒印第安人袭击。政府规定货币的价值；增派两个牧师帮助照顾教堂；拨款五万马拉维迪[1]给布拉斯·特斯塔诺瓦（一个热那亚人），作为他医务方面的薪水。这些杂项活动表明了伊拉拉在治理方面的魄力。

伊拉拉坚定地解决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问题并有效地控制了亚松森的事务后，下令造船和聚

[1] 马拉维迪（maravedi）：当时西班牙的一种金币名称。——译者

集供应品，准备实现他的主要任务，即探寻去秘鲁的途径。这次远征的出发日期已经决定，而国王的一个倏忽之念，就把一切事情改变了。1542年2月24日，圣马太日，在亚松森是不会立即被忘记的，因为就在那一天，一个印第安人带着信息到达。阿尔瓦尔·努涅斯·卡维萨·德·巴卡宣布他正在途中，他已被国王任命为巴拉圭的远征队司令和总督，要求派人援助在巴拉那河下游航行的兵士。伊拉拉立即服从命令，把自己的征服计划放在一边。他派遣阿尔瓦罗·德·查维斯告知新总督：在市政会参政员加西亚·贝内加斯率领下三艘双桅船已在途中。于是，伊拉拉召集队长奥尔特加、萨拉萨尔和卡夫雷拉组成一个欢迎委员会，迎接和护卫卡维萨·德·巴卡到亚松森。盛大的欢迎仪式自然是少不了的。伊拉拉第一次作为总督的时期宣告终了，征服巴拉圭的第一章也到此结束。

第 四 章

著名徒步探险家 卡维萨·德·巴卡

阿尔瓦尔·努涅斯是安达卢西亚[1]赫雷斯—德拉—弗朗特拉地方人。他的姓来自他母亲唐尼亚·特雷莎·卡维萨·德·巴卡。斐迪南和伊萨白拉[2]在位时，唐·佩德罗·德·贝拉向人借钱作为他征服卡内里群岛的费用，并把他的两个儿子作为借款的担保，其中一个就是阿尔瓦尔·努涅斯的父亲。唐·佩德罗的孙子虽然属于早期征服者家庭的血统，但很难说他会非常喜爱贝拉这个姓。

努涅斯这位赫雷斯地方的君子，不是一个平

① 安达卢西亚（Andalucía）：西班牙南部的一个地区。——译者

② 斐迪南(Ferdinand)和伊萨白拉(Isabella)：1479年西班牙形成统一王国时的国王和女王。——译者

庸的骑士。他在抗击摩尔人的战争中，在意大利，在潘菲洛·德·纳瓦埃斯[①]征服佛罗里达的不幸尝试中以及在墨西哥探险的后期，都曾显过身手。当唐·佩德罗·德·门多萨死于海上的消息传来时，他在西班牙，身边有八千备用的杜卡特[②]。这是一个赢得名誉和财富的机会，是花用这八千杜卡特的机会。当阿尔瓦尔·努涅斯要求任命他为拉普拉塔远征队司令时，印度事务部[③]就同意发出委任令：如果阿约拉斯还活着，努涅斯将任副总督；如果门多萨的副手已死，努涅斯将是他所能发现、征服和殖民的地域的总督、总指挥官和远征队司令。印度事务部特别命令他占有圣维森特以南的海岸，拓殖圣卡塔林纳岛，这个岛可以作为他

① 潘菲洛·德·纳瓦埃斯（Pánfilo de Narváez，1480—1528）：西班牙探险家、殖民者，1528年率远征队征服佛罗里达，在沿海航行中失事遇难。当时，卡维萨·德·巴卡是远征队副手，他和三个幸存者在印第安人中流浪、被俘，过了八年，终于经得克萨斯（Texas）到达墨西哥城。——译者

② 杜卡特（ducat）：当时流通欧洲各国的金币名。——译者

③ 印度事务部（Council of the Indies）：西班牙国王统治美洲殖民地的机构。当时西班牙把美洲，特别是把它在美洲的各殖民地通称为印度（Indies），或译作西印度。——译者

自己的地盘十二年，并不准律师进入这个殖民地。

阿尔瓦尔·努涅斯配备了五艘航船，四百个武装完备的人员和四十六匹牡马和牝马，于1540年11月2日从西班牙启航。他相信，曾使他平安地横过得克萨斯的好运气，也会在汹涌的海洋中保护他。航行五个月后（这大概是通常需要的时间），他在1541年3月29日到达圣卡塔林纳岛。这位总督让他的人员带着二十六匹幸存的马在这里上岸。他占领了这个岛，用和善的态度对待印第安人，或许还学到了一些瓜拉尼语。两个法兰西斯教派的教士，贝尔纳多·德·阿尔门塔和阿隆索·莱夫隆（他们是同卡夫雷拉于1538年一起来的，曾在土人中进行传教工作），向新来的人所作的简略介绍对卡维萨·德·巴卡有很大帮助。他们向他报告了关于阿来霍·加西亚和“白王”的事情，以及关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亚松森的种种谣言。在5月里费利佩·德·卡塞雷斯乘一只帆船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作调查，但是暴风雨使他未能到达那个已被放弃的殖民地。九个曾拒绝去亚松森的流亡者，乘小船从拉普拉塔来到圣卡塔林纳岛，苦诉在门多萨离开后的种种遭遇。卡维萨·德·巴卡

从他们那里听到的是一个有偏见的报道，这使他对伊拉拉长期抱有成见。这些不满的人，虽然不知实情，但是他们叫嚷阿约拉斯丧失生命是伊拉拉的过错。虽然他们从没有到过亚松森，但是却说在卡里奥人中建立起来的亚松森所以沸腾着猜疑和不信任，也是伊拉拉的过失。

这位远征队司令认为有必要自己坐镇巴拉圭，因而派遣佩德罗·多兰特斯探寻穿过内陆的途径。在多兰特斯回来后，努涅斯派遣佩罗·埃斯托皮南·卡维萨·德·巴卡队长带领航船和一百四十人走水路，而他自己则率领其他人走印第安人很熟悉的一条陆路。所以把力量这样分开，主要理由或许是因为总督担心马经过水路旅行活不下来。阿来霍·加西亚都曾走过陆路，为什么这个著名徒步探险家就不走陆路呢？阿尔瓦尔·努涅斯带领二百五十人于1541年11月2日出发。二十七天后，正当夏日炎炎似火烧的季节，远征队到达伊瓜苏河上游。他们渡河后遇到一个叫米格尔的印第安人，他提出愿引导他们去亚松森。

显然，卡维萨·德·巴卡对他的手下人管得很好，所以一个部落接着一个部落都乐意供应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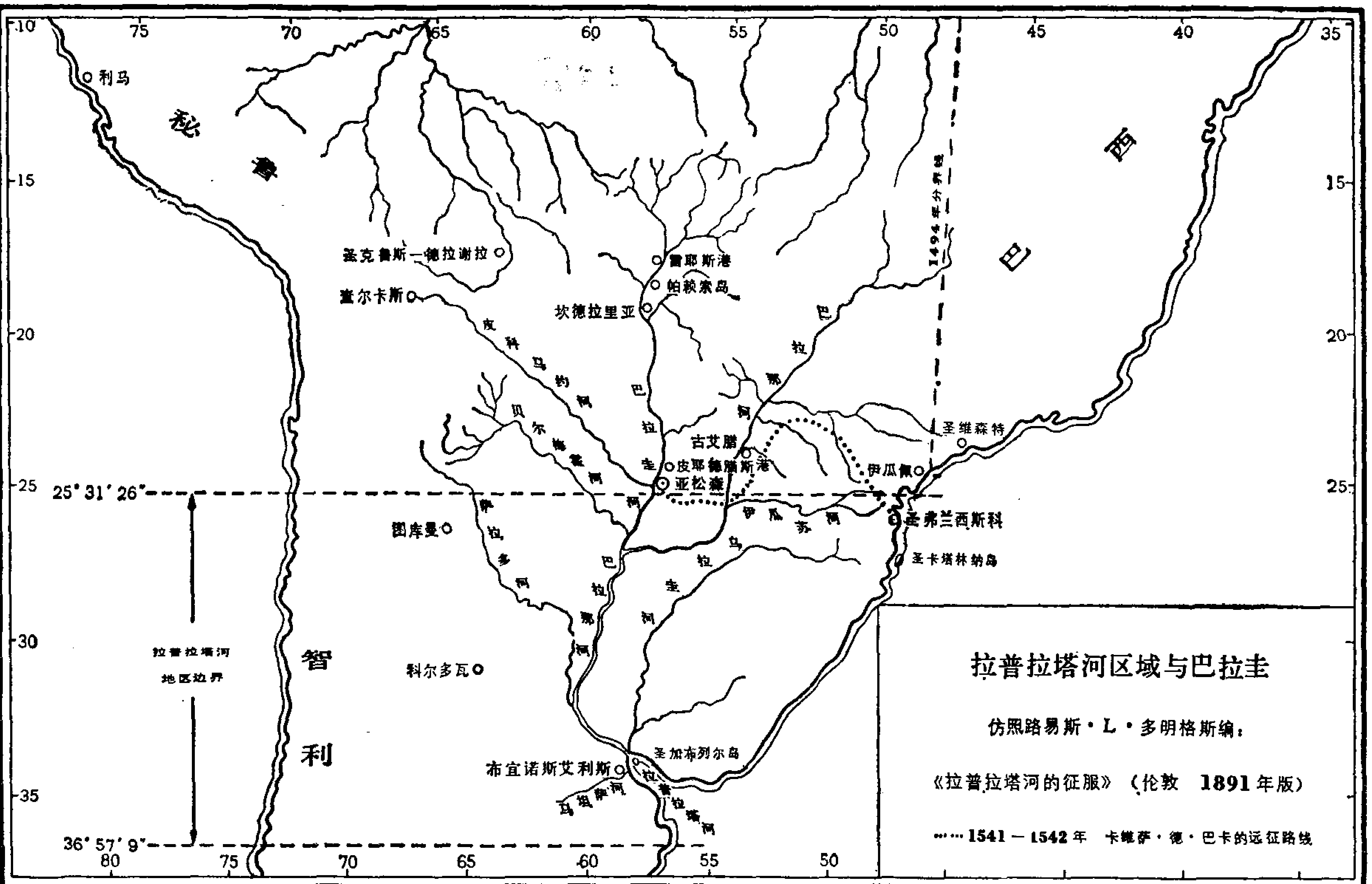
们食物。他和未开化土人相处很成功，主要依靠他对土人的特点有深刻的了解以及他坚持西班牙人必须言行一致。凡是他走过的印第安人土地，他都把它作为西班牙皇帝占领的地方，但是他从未把这件事告诉过印第安人。1542年1月，一路上他越过重重的山岭，穿过密密的芦苇。没有印第安人前来送食物，但是"在这些芦苇的空节里有些手指那样大小的白色虫。有人把它炸后当食物，这些虫有足够的脂肪，可以把它炸得很好；大家都吃它，并认为这是美餐"。但这些多浆汁的小食物很难引起卡维萨·德·巴卡的秘书佩罗·埃尔南德斯的高度赞赏。他是卡维萨·德·巴卡《传记》的著名作者，也是在文字上诽谤伊拉拉的主要人物。他一次又一次地描写许多部落如何供应他们水果、鱼、肉、玉米、家禽、蜂蜜、薯类、土豆和"松树粉"。这种粉是由生长在一种松树上的果实制成的，这种树大到"四个人手拉手都不能合围"。

大概在1542年1月中旬，卡维萨·德·巴卡叫他的人员在南纬25度处的巴拉那河畔一个瓜拉尼村庄休息，那是一个富裕的地方："他们饲养许多鸡、鹅和其他家禽；他们有丰富的猎物，例如野

猪、鹿、貘、鹧鸪、鹌鹑和野鸡；他们的渔业也很发达。他们种植大量的玉米、土豆、木薯、花生和各种水果；他们还从树上采集大量的蜂蜜。”远征队司令从这个乐园写信给伊拉拉，然后顺着伊瓜苏河继续前进，经过大瀑布，到达巴拉那河的汇流处。在巴拉那河岸，成群结队身涂战斗色彩的有敌意的瓜拉尼人阻止他们通过，但是经过交涉和赠礼，情况有了缓和。远征队乘木筏过河，只损失了一个人。对于一些病号和脚走坏的人，卡维萨·德·巴卡建造木筏载运他们和行李，顺流而下，同时写信叫伊拉拉派人在巴拉圭河接应他们。象在得克萨斯一样，他作为一个医生的名声总是先他而行，一直到旅途的最后阶段，还有瓜拉尼人的欢迎代表热切地等候着他走过。确实，在所有关于西班牙殖民地征服史所记述的人物中，没有几个象阿尔瓦尔·努涅斯·卡维萨·德·巴卡那样的人。

一位新任总督对于较老一辈殖民者给予他的欢迎很可能会有种种疑虑。然而，当卡维萨·德·巴卡在 3 月 9 日到达亚松森时，没有人抱怨说伊拉拉和他的一伙人是无礼的，他们“对新总督的到达表示极大的喜悦”。有些人可能感觉到，这有点

象庆祝会，但没有人知道什么东西在等待着他。富内斯教长写道："高职位的西班牙人用胜于喜悦的一种礼仪接待了亚松森的总督。"没有人反对查理一世陛下的这个代表，当然那些王室官吏是不会反对的，他们是："审计员阿隆索·卡夫雷拉，洛哈人；会计员费利佩·德·卡塞雷斯，马德里人；财产管理员佩德罗·多兰特斯，贝哈尔人。"这些人都没有问题，拥护这位远征队司令。费利佩·德·卡塞雷斯和佩德罗·多兰特斯是同卡维萨·德·巴卡一起来的，可以预料这两个人会忠于卡维萨·德·巴卡，至少开始时是这样。拉弗恩特·马查因在他关于伊拉拉的权威著作中写道："1542年3月9日，在伊拉拉将军、王室官员和其他人的面前公布了王室命令，每一个人把命令举在头上宣誓：他们愿意并一定将它作为国王和上帝的手谕和命令来服从；接着公证人迭戈·德·奥拉瓦雷塔宣读命令。"卡维萨·德·巴卡在市政会参政员前宣誓就职，3月13日的就职仪式宣告结束。埃尔南多·德·里维拉、阿隆索·德·巴伦苏埃拉、洛佩·德·乌加特和佩德罗·贝尼特斯·德·卢戈注视着他们的新领袖"用他的右手放在伊拉拉


拉普拉塔河区域与巴拉圭
仿照路易斯·L·多明格斯编：
《拉普拉塔河的征服》（伦敦 1891年版）
……1541—1542年 卡维萨·德·巴卡的远征路线
利马
秘鲁
巴西
智利
1494年分界线
圣克鲁斯—德拉谢拉
查尔卡斯
雷耶斯港
帕赖索岛
坎德拉里亚
皮科马约河
贝尔梅霍河
巴拉圭河
巴拉那河
古艾腊
皮耶德腊斯港
亚松森
圣维森特
伊瓜佩
圣弗兰西斯科
圣卡塔林纳岛
伊瓜苏河
乌拉圭河
图库曼
萨拉多河
科尔多瓦
圣加布列尔岛
布宜诺斯艾利斯
马坦萨河
拉普拉塔河
拉普拉塔河地区边界
25°31′26″
36°57′9″

将军和阿隆索·卡夫雷拉的手里”进行宣誓。

伊拉拉的朋友找不到什么可以赞扬他们的新总督，而伊拉拉的敌人却决心把伊拉拉的一举一动作为有意降低卡维萨·德·巴卡的威信来解释。不幸，无判断力的历史学家曾把《传记》一书中所写的卡维萨·德·巴卡的故事，当作是在巴拉圭发生的事情的全面而真实的记载。别的征服者所处的境遇，远比卡维萨·德·巴卡所遇到的要困难得多，而且都被他们克服了。譬如，大概在同一时期弗朗西斯科·奥雷利亚纳正追逐着他的“虚荣的灵魂”向亚马孙河下游驶去，而这位巴拉圭的总督不管他同印第安人打交道是多么熟练，却缺乏作领袖的重要品质。由于他厚于“新”来的人而薄于早来的人，在巴拉圭八百个白人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裂痕。在他的更不可饶恕的行动中，有一桩事就是他和他的跟随者把砍伐下来供建筑用的三千根棕榈木侵吞了。卡维萨·德·巴卡在未到达亚松森前就疑神疑鬼，现在他把每一个交头接耳的交谈，都看作是策划反对他的新阴谋。

卡维萨·德·巴卡企图把布宜诺斯艾利斯重建成为一个港口。1542年4月16日，他派遣两艘双

桅船(主要用橹划行的河船)到下游，去援救一艘旗舰和它的一百四十名水手，他们是在圣卡塔林纳岛时离开总督的。以后，为了同样的目的，他命令再造两艘这样的船。但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在以后的许多年中都没有成为一个永久性的殖民地。

在伊拉拉短短的统治时期，印第安人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通过武力和谈判，和阿加塞人商得了一个暂时的和平。卡里奥人同西班牙人结成同盟后，寻求西班牙人的援助，试图给瓜伊库鲁人以严厉惩罚。在《传记》一书里可以看到对这些查科游牧民的描写，远比在其他材料中写得更美好：他们“敏捷、强壮，步伐疾速，他们除了用箭杀死许多鹿以及老虎(美洲虎)和其他凶猛的野兽外，能一口气把鹿追乏，用两手把它捉住。他们对自己的妻子是和善的……对妇女一般也是这样。因此，如果有妇女在战争中落到他们的手中，他们会把她释放，不加伤害”。所有这些情况，可能是真实的，但略有不当之处，因为妇女在巴拉圭和查科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高度的尊重。

卡里奥人的许多酋长抱怨瓜伊库鲁人给他们

制造苦难，劫掠他们的村庄，毁坏他们的农作物，掳走他们的妇女。酋长洛伦索·莫基亚拉塞是这些抱怨者当中的一个。他是加西亚·贝内加斯的岳父。作为卡里奥人的朋友和同盟者，西班牙人必须做一些工作。“按照风俗和法律”，卡维萨·德·巴卡同他手下的队长们和四个传教士进行商议，他们提出开战。这样，在1542年7月13日或14日，这位司令用船运送二百名步兵，十四名骑兵和一万名瓜拉尼武士，渡过巴拉圭河，征讨劫掠成性的瓜伊库鲁人。7月16日，星期天晚上，一只美洲虎闯入瓜拉尼前锋队，引起了一场混乱，吓得西班牙人以为发生了叛乱。两粒子弹在混战中掠过卡维萨·德·巴卡的脸。佩罗·埃尔南德斯从来不放过损害伊拉拉的机会，在《传记》一书中写着：“打这几枪，一定有杀害他的恶毒用心，以讨好多明戈·德·伊拉拉，因为他剥夺了伊拉拉在这个殖民地的指挥权。”黎明后，瓜伊库鲁人迎击敌人，擂鼓喧天，狂呼乱叫，自夸勇猛，而他们的射技又如此准确，使瓜拉尼的射手直到佩德罗·德·巴尔瓦用部署得很好的炮火前来支援后才停止后退。胡安·德·萨拉萨尔指挥他的步兵队，使用了“圣地亚哥！”这

个古老的喊杀声。这个喊声，秘鲁卡哈马卡[①]的阿塔华尔帕[②]的侍从们曾听见过，它也曾激励科尔特斯的手下人在墨西哥的特拉斯卡拉和乔卢拉获得胜利。四千瓜伊库鲁人逃出战场，卡维萨·德·巴卡亲自领着人乘胜追击。但乘讨伐军返回巴拉圭之机，瓜伊库鲁人重新集结，取得了杀死一千名溃散的瓜拉尼人的战绩。

卡维萨·德·巴卡回到亚松森后不久，瓜伊库鲁人的一些酋长乞求讲和。有几个月双方处于休战状态。但为时不久，西班牙的马在查科出现，瓜伊库鲁人成了出色的骑手。他们继续进行无休止的战争，经常袭击西班牙人。当他们遇到追击时就逃进查科的深处。即使耐心的耶稣会神甫也不能在他们身上留下持久的感化痕迹。

亚松森南面的阿加塞印第安人的酋长阿瓦科特，为了表示友谊，曾把他的一个女儿和其他七、

---

① 卡哈马卡(Caxamarca)：秘鲁最古老的城镇，为西班牙征服者最后击败印加帝国的战场。——译者

② 阿塔华尔帕（Atahualpa)：印加帝国最后一个皇帝。皮萨罗征服秘鲁时将他拘捕，勒索巨额金银赎金后，于1533年仍背信把他处死。——译者

八个姑娘送给远征队司令,以满足他的一切需要。但他们利用了这次卡维萨·德·巴卡征伐瓜伊库鲁人而不在亚松森的机会。阿瓦科特知道贡萨洛·德·门多萨只有二百五十人守护这个殖民地,就试图烧毁它。后来,这个企图失败了,于是,他们捣毁边境地区的住户,到处抢劫,并在撤退时带走几个卡里奥人作为俘虏。当阿瓦科特被召来解释这种背叛行为时,他派他的儿子和几个武士前来控诉卡里奥人。总督把这些使节送进监狱,有的处决,有的交给卡里奥人,尽管伊拉拉成功地把其中两三个人藏在自己家里,救了他们,但阿瓦科特却为此永远怀恨在心。

在关于阿来霍·加西亚的许多故事中,有一个说,他有一个同名的儿子,在攻打印加帝国回来的途中,其他葡萄牙人都丧失了生命,而他没有被杀害。卡维萨·德·巴卡听说加西亚这个儿子仍在亚松森北面的瓜拉尼人中当囚犯。他派遣使者去见杀害阿来霍·加西亚的部落酋长塔维雷。塔维雷除了送回一个使者要他警告总督以后不要再派人来之外,其余全都加以杀害。这就需要教训塔维雷一下。总督派遣他的外甥阿隆索·利克尔梅带

领三百个西班牙人和一千个瓜拉尼同盟者去教训塔维雷应该怎样做人。塔维雷和他的同盟者进行抵抗，结果三千人被杀，四千人被俘，而西班牙人只死了五十个。印第安人的损失数字恐怕没有那样大，但在给皇帝的报告里，成千的数字总要比成百的数字印象深刻些。关于小阿来霍·加西亚，没有再听到什么，这很可能是因为从来就不曾有过这样一个人。

卡维萨·德·巴卡组成一个大远征队，探索去秘鲁的途径。那些“老”征服者呆着感到很烦闷，迫不及待地要出发，而总督却把自己纠缠在印第安人的困扰中。伊拉拉的三个人，罗德里戈·戈麦斯、胡安·德·富斯特斯和阿尔瓦罗·德·查维斯提出到查科去作一次侦察。在一次会议上同意在为主要的远征进行准备工作的同时，可以由伊拉拉带领这些人和九十名其他人员乘三艘双桅船作三个半月的侦察。他们必须在1543年1月返回。多明戈·马丁内斯·德·伊拉拉三次宣誓，忠于王，忠于卡维萨·德·巴卡，于是在10月下旬启航。他在亚松森北二百一十哩的皮耶德腊斯港留下戈麦斯、富斯特斯和查维斯。这些人由酋长阿拉

卡雷和大约一千名武士陪同一起向西，穿越姆巴亚人的区域。四天后，他们发现阿拉卡雷在搞阴谋，从而返回到皮耶德腊斯港，找到了可靠的印第安人，重新出发。在三十天中他们穿越荒无人烟的地方，完全迷失了方向，但最后，他们还是设法找到了道路，穿过密密层层、高而多刺的丛林，回到了河边。

伊拉拉向巴拉圭河上游航行，到1543年1月的第一周，他发现在南纬16度30分的地方有一个小湾，就取名雷耶斯港。这时他在阿约拉斯港以北五百多公里处，这是先前能活着写出他的发现报告的白人所从未见过的地方。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象这样"美好而肥沃的土地"。那里的人居住在自己的住宅里，占有印第安奴隶，耕种土地，饲养鸡鸭。伊拉拉留下看守的人员和三艘双桅船，向西经过山岭和沼泽地，在瓜耶尼部落占有的土地上旅行了三天。伊拉拉回到雷耶斯港，遵照卡维萨·德·巴卡的命令，逮捕阿拉卡雷并把他处死，然后动身返回，于1543年2月16日抵达亚松森。

在重建布宜诺斯艾利斯失败后，所有总督的人员聚集在亚松森，这时亚松森发生了问题。新旧

征服者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王室官员要挽回他们受到损害的尊严。会计员费利佩·德·卡塞雷斯曾申请要一艘船，载运书信文件到西班牙。据说，卡维萨·德·巴卡曾对他说："你要同我讲话，就得把你的帽子放在手里，屈膝跪下。"虽然阿隆索·利克尔梅用手指摸着短剑站在总督旁边，但卡塞雷斯不是个下跪的人。这位王室官员怒气冲冲地跨步走出时听到卡维萨·德·巴卡咕噜着什么"贪得无厌的犹太人"。总督跟另一个王室官员阿隆索·卡夫雷拉也争吵起来，这使事情搞得更糟。卡夫雷拉和卡塞雷斯这两个人决不会忘记这些的。

还有更多的麻烦延缓了同秘鲁交往的尝试（在秘鲁的唐·克里斯托瓦尔·巴卡·德·卡斯特罗后来试图使争吵双方恢复常态）。2月3—4日晚上，一个印第安妇女意外地放火烧毁了二百多幢茅舍，占全镇茅舍的五分之四，大火持续了四天。教堂、修道院、谷仓和畜栏都被烧毁。这时，酋长阿拉卡雷被处死的事给西班牙人带来了麻烦。贡萨洛·德·门多萨征集粮秣是最成功的一个人。一次他外出征集粮食时，发现阿拉卡雷的兄弟塔维雷又在准备战斗。伊拉拉刚从北方回来，就带领四

百名西班牙人，二千名卡里奥人和四艘双桅船攻打塔维雷。他的桅船升的不是王室的旗而是卡维萨·德·巴卡的旗。塔维雷打了一个漂亮仗，杀死了四名、打伤了四十名西班牙人，包括伊拉拉在内。队长努夫里奥·德·查维斯结束了这次战争，收集了供应品并把塔维雷带到亚松森，在那里他同意和平相处。

不满情绪继续增长，征服者越来越不耐烦地要出征。伊拉拉关于哈拉耶斯印第安人、乐园岛和他曾见到的金银饰物一类的故事，只能起着刺激贪婪和淫荡欲望的作用。当总督和市政会为大火后怎样重建亚松森的问题发生争执时，出征又推延了。由于参政员多明戈·德·佩拉尔塔的建议遭到蔑视，市政会集体辞职。卡维萨·德·巴卡在分配捕鱼区时一意孤行，不照惯例行事。司库加西亚·贝内加斯提出抗议："总督阁下占有一个场所，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你下面的队长和朋友也享受同样的特权，这是毫无理由的。"对卡维萨·德·巴卡的这些埋怨是够多的了。他是总督，这帮无赖应该懂得这一点。卡维萨·德·巴卡就把队长胡安·德·萨拉萨尔、贡萨洛·德·门多萨、阿

古斯丁·德·坎波斯、佩罗·埃斯托皮南和佩罗·埃尔南德斯召来，提出由他们把检查官卡夫雷拉关押起来，派遣一名教士叫他认罪，然后把他的头割下。萨拉萨尔和门多萨拒绝担当这一阴谋的任何角色。

总督由于经常受到新老殖民者的压力，就转念寻找一条通向"黄金国"的道路。1543年5月24日他召集会议，听取意见。每一个人都主张去雷耶斯港探险，这样，就以最大的热心开始进行准备。在总督离开期间谁来治理亚松森？伊拉拉和门多萨建议由萨拉萨尔负责；但是萨拉萨尔提出由王室掌旗官弗朗西斯科·德·贝尔加拉负责。如果找到了黄金的话，这些谦逊的队长们就都会要求占有一份！通过投票，萨拉萨尔以二比一的票数接受守卫亚松森的职务。

一场大火，印第安人的困扰，同下属的争吵，这些都没有使卡维萨·德·巴卡的苦恼到此结束。他曾在圣卡塔林纳收容了两个传教修道士，阿尔门塔和莱夫隆。他们要回到巴西的亲戚那里休养。他们没有请得旅行证，就决定私自出走，由几个半基督教化的姑娘作伴，这些姑娘除了负责做饭，照

顾宿营外，没有别的。当这两位修道士在6月10日溜出亚松森时，许多西班牙人托他们带信件。或许因为这些姑娘不见了，有人发出了警报，这样，一个武装队就及时把逃亡者抓回亚松森。卡维萨·德·巴卡掌握了这些控告信件，就有了他所认为不忠诚的证据，足以用来反对马丁·德·奥鲁埃（他已失去作为佩罗·埃尔南德斯抄写员的职位）以及阿隆索·卡夫雷拉、加西亚·贝内加斯、佩德罗·多兰特斯和费利佩·德·卡塞雷斯。卡维萨·德·巴卡可以关押这些人，但还不敢以图谋同西班牙通消息的罪名对这些人进行拷打或杀害，来发泄自己的怒气。

卡维萨·德·巴卡长期推迟的远征，大概是在1543年9月8日出发的。走水路的有二百人，分乘十艘粗笨的桅船，在后面跟着一百二十只独木船队，每一只独木船载有十名瓜拉尼武士。走陆路的，另有二百名西班牙人，其中十名是骑马的，还有更多的土人随同前进。随同这个队伍去的有佩德罗·多兰特斯和费利佩·德·卡塞雷斯，这两人留在后方是危险的。在旗船上飘扬的旗又是总督的旗，而不是王室的旗。帕亚瓜人答应在坎德拉里亚（靠近

现在的科仑巴)地方，交付相当于六十六个人负荷的“盘子、金币和斧子”和从阿约拉斯那里偷来的金银小器皿。帕亚瓜人当然是在撒谎，他们是否得到过这些财物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一件财物也没有从他们那里收回过。贡萨洛·德·门多萨常被列为能担负重任的人，他率领六艘船和水手尾随领先的船只作为后卫。大概在10月中旬，先头部队到达一个急流处，在那里捕获许多大金鱼。如果有人喝一个月这种鱼汤，可以消除皮肤病和麻疯病。

伊拉拉熟悉这个地方。远征队依照他所指示的方向前进。经过两个月的航行，在11月8日到达雷耶斯港。卡维萨·德·巴卡无视这是伊拉拉的发现，在棕榈树下搭起十字架，把它作为王室占有的一块新发现的土地。但是他也给伊拉拉一个面子，任命伊拉拉作他的行营主任，立即建造用栅栏围起来的临时营舍。9月15日①，贡萨洛·德·门多萨带领他的一伙人到达该港。在途中他同敌对的印第安人有过一些小战斗，但只丧失了六个人。

雷耶斯港的土人拥有丰富的食物，长着大耳

① 恐原文有误。日期应在11月8日之后，不在9月。——译者

朵。这些奥雷洪人象非洲人和亚洲人一样，喜爱耳饰。他们扎耳眼，在耳眼里嵌入直径逐渐增大的葫芦或圆盘物，结果使他们的耳朵垂到了肩膀上。“战斗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嵌在耳眼里的东西取下，把耳朵卷起来，或者把他们的耳朵扎在头的后面”。妇女不会手工纺织，身上一丝不挂，使西班牙人看了感到有趣。

总督派遣埃克托尔·德·阿库尼亚和安东尼奥·科雷亚从雷耶斯港出发，到北面进行勘察。他们旅行了三天，很困难地穿越沼泽地带。第四天傍晚时，到达哈拉耶斯印第安人居住的区域。印第安人热情地欢迎客人。他们“幽雅地用鹦鹉的羽毛装饰自己，用白色念珠编成围裙遮着赤裸裸的身子”。他们的酋长卡米雷听说过基督教徒，可能曾和阿来霍·加西亚相处过，至少他知道葡萄牙探险者。在哈拉耶斯人中有个瓜拉尼人，在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或许在1515年左右，曾参加远征队攻打印加帝国，获得金银饰物。虽然这些入侵者开始时取得了胜利，但后来遭到惨败，其中有二百人逃入森林，只有他一人得以返回巴拉圭。这个小孩被哈拉耶斯人收养，后来娶了一位哈拉耶斯妇女。

这时他提出只要他能找到的话，他愿意带领西班牙人从雷耶斯港重返那条去印加帝国的路。这个故事对阿库尼亚和科雷亚来说是够有意思的了。他们在一路上是如此疲乏，因而谢绝了按照习俗礼节奉献给他们的夜间女伴。

最后，"黄金国"似已在望。为了必须在1543年11月前走完这一路程，卡维萨·德·巴卡和伊拉拉带领三百多人向西进发。他们穿过到处是野猪、貘和鹿的密林丛藤，低矮的山岗和泥泞的沼地。走了五天，遇到了曾参加过那次大远征的瓜拉尼人，他们中间年龄最大的约三十五岁，已记不清怎样到秘鲁的，在他们的父亲被杀害时，他们还很年幼。过了九天开始下雨了，预告洪水不可避免的就要到来。只要再向前走几里格，他们就可以抵达塔普阿—瓜苏。据说这是一座多岩的山，从山上可以望见一个富有贵金属的地方。他们该不该向前进呢？按照征服者的惯例，卡维萨·德·巴卡召集他手下的队长们，听取意见。他们的答复是决然否定的。但是，弗朗西斯科·德·里维拉可以带领六个人继续前进，尽力找到塔普阿—瓜苏；其余的人返回。

许多印第安人为队长胡安·罗梅罗守护的外来船只所吸引，聚集在雷耶斯港。在卡维萨·德·巴卡一伙人返回时，食物供应已很少，实际上已吃光。于是，他再一次打发能说会道的贡萨洛·德·门多萨到土人村庄征集食物。那时是12月16日。谣传在上游某些地方可以找到许多金银。总督派遣队长埃尔南多·德·里维拉带领五十二人和一艘双桅船，在12月20日启航，对这个传说进行调查。在这一伙人中有乌尔里克·施米特，他的简单的但不真实的回忆录几年后在欧洲印出。从这位德国商人的评论来判断，他非常爱好旅行。大概在12月21日，埃尔南多·德·里维拉到达乐园岛；一星期后，他遇到哈拉耶斯人，他们愿意领他再向前进。在1月上旬，里维拉在哈拉耶斯人的中心村庄里受到热情的欢迎。施米特从吸引欧洲读者兴趣的角度来描绘他的主人："现在我们来到这些施罗埃斯人（哈拉耶斯人）中，他们留着小胡子，耳朵尖里有个木环，耳朵以一种奇怪的样子包着木环。男人还在他们的嘴唇上嵌一大块蓝色的象一只棋子形状和大小的水晶。他们从头部到膝盖涂上蓝颜色，使人看上去好象穿着裤子。但妇女涂得不一

样，从胸部到阴部涂着蓝色；她们涂得那样艺术，使人一时很难找到一个画家能画得这样美好。她们是完全赤裸裸的，依照她们的样子是美丽的，但也在黑夜中犯罪。”

里维拉还没有来得及考查这些犯罪行为，就去拜访哈拉耶斯王，一个备有许多乐师和丰富筵席的盛大欢迎仪式等着他。施米特总是留心观察那些妇女，他记载她们会做精巧的棉罩衣，绣着动物的形象。他写道：“从我看来，这些妇女似乎非常美好而风骚，非常可亲而多情。”当施米特陶醉于女色中时，里维拉却从哈拉耶斯王那里接受了黄金礼物。哈拉耶斯王说，这黄金是他和传说中的亚马孙人作战时获得的。里维拉随即西行，寻找更多的黄金。但是艰苦和洪水迫使他返回哈拉耶斯村庄，然后回到下游去，与他的愤怒的司令会合。卡维萨·德·巴卡没收了里维拉一伙的战利品，要不是受到一次兵变的威胁，他会把里维拉绞死。当然，在《传记》一书中没记载故事的这一部分。

弗朗西斯科·德·里维拉于1544年1月12日重新和大队会合，这显然是在埃尔南多·德·里维拉回来的前几天。他西行七十里格，仅离塔普

阿—瓜苏三里格，当时许多印第安人袭击他，迫使他后退。他穿过有丰富野果、鸟、野猪、貘和充满蜜汁的树木的地方，最后来到一个村庄，在那里陈列许多精制的金银物品。那里的人听说过印加帝国、大山那边的海以及在海上航行的房屋[①]。他们讲述了一个在印第安人中广泛传播的关于亚马孙村庄的故事。在这些村庄中有一个是小人国，他们一年一次被邀请去满足亚马孙人生育儿女的欲望。这些亚马孙人把如此结合出生的女孩留下来，而把男孩送回给他们的不知名的父亲。弗朗西斯科·德·里维拉发誓，所有这些事情据印第安人讲都是真实无疑的。

贡萨洛·德·门多萨只弄到少量的食物送回到雷耶斯港。1544年2月港口周围的部落对西班牙人非常敌视，西班牙人不带武器不敢走出自己的船只和栅栏。饥饿和热病减弱了卡斯提人寻求贵金属的欲望，印第安人的夜间袭击磨灭了征服者的意志。卡维萨·德·巴卡派遣代表到每一个村庄。安东·伊格拉从一个叫格兰德的村庄送出了

① 指海船。——译者

一个暴乱迫在眉睫的消息。卡维萨·德·巴卡派遣武装力量支援伊格拉。格兰德村庄的印第安人聚集起来欢迎他们所认为的朋友，但总督却下令袭击，对印第安人进行了一次大屠杀，这就促使部落之间结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队长阿古斯丁·德·坎波斯采用同样的阴险手段对待其他的村庄，杀害了好几百人，掳掠去三千名奴隶。无怪乎贡萨洛·德·门多萨到哪里去征集供应品，就在哪里遇到抵抗。西班牙人行动愚蠢，卡维萨·德·巴卡是其中最糟糕的一个人。他在这场对他的领导才能的最大考验中已经完全失败了。印第安人弗朗西斯科和其他任何人比，同样可算是亚松森的一位重要创建人，并受到伊拉拉的高度评价。他对总督进行规劝，总督却在他的头上野蛮地猛击一拳，不久因伤而死。卡维萨·德·巴卡为他的死受到责备。就是这个弗朗西斯科——贡萨洛·德·阿科斯塔的奴隶，在巴拉那河上曾经营救过卡维萨·德·巴卡的木筏。

远征队的人，以少有的一致意见，由费利佩·德·卡塞雷斯带头要求回到亚松森，免得每个人都要完蛋。3月下旬远征队启航，于1544年4月18日

抵达首都。在这一伙人里，仅二十人身体良好，其余全是半饥饿的，失望的，怒气冲天的。卡维萨·德·巴卡向本来可以做朋友的人开战，结果疏远了印第安人。他强迫卡里奥人作搬运夫，破坏了同卡里奥人的同盟。他显出了没有当领袖的才能。他丧失了拓殖一个潜在的富裕地区的机会，以后这地区落到了巴西人手里。

巴拉圭第一次革命发生于圣马可日，1544年4月25日，在远征队回到亚松森后仅一个星期。征服者行使他们废黜总督的权利，抛弃了阿尔瓦尔·努涅斯·卡维萨·德·巴卡。这时，伊拉拉在患病，但他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恐怕不会不知道；或如格瓦拉神甫所指出的，伊拉拉假装生病。不满是这样的普遍，无需去谴责伊拉拉在阴谋反对总督；那些王室官员们每人都有怨恨，他们能够并实际策划了这个阴谋。一大帮重要人物伴同他们强行闯入总督的房子，他正有病躺着。这位不被信任的领袖把剑交给弗朗西斯科·德·门多萨；叛乱者喊着："要自由！要自由！国王万岁！"就这样，把卡维萨·德·巴卡投入了监狱，他们确信总督的朋友们帮助不了他。胡安·德·萨拉萨尔，住在亚松森

的郊外，被监视着，新殖民者的其他领袖们也是这样。佩罗·埃斯托皮南·卡维萨·德·巴卡——总督的堂弟，谨慎行事。4月26日在伊拉拉的屋前举行了群众大会。卡维萨·德·巴卡被扣上镣铐，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倾听巴托洛梅·冈萨雷斯宣读他的罪状和让伊拉拉担任指挥的要求。在巴拉圭的征服者中没有人反对。把这次行动报告伊拉拉后，他同意重任总督，他划着十字，向上帝、圣母玛丽亚、福音书宣誓，愿忠诚他的职务。

卡维萨·德·巴卡的朋友们时时密谋释放他们的领袖，但是每一次策划都被揭露。由于叛乱者没有胆量杀害总督，或者受到伊拉拉的智谋的制止，于是他们修造一艘帆船准备把那个被废黜的总督送回西班牙。卡维萨·德·巴卡经过将近一年的监禁后由两个与他有深仇的敌人卡夫雷拉和贝内加斯以及伊拉拉的代表伴同，于1545年3月8日启航。这艘巴拉圭制造的帆船经过一个多风暴的航程后，到达西班牙。显然，卡维萨·德·巴卡在他被指控的问题未查清之前，曾在奥兰关押了一个短时期，后来他被免罪释放，但没有得到损害赔偿。

在这些事情上，那些偏袒卡维萨·德·巴卡的人大都忽视了这一点：甚至在《传记》一书里也把叛乱的主要罪责归诸于王室官员而不是伊拉拉。它假设卡塞雷斯和贝内加斯希望控制伊拉拉，这是要否定伊拉拉作为一个独立领袖的功绩。没有疑问，叛乱之后，出现了骚动，但是，难以相信伊拉拉和王室官员会“公开地允许所有他们的朋友和同党，到印第安人的村庄和茅舍去用武力抢夺他们的妻子、女儿、吊床和其他物件”。这些东西本来一经要求就可以得到的，为什么要诉诸于武力？伊拉拉在巴拉圭的时间很长，不至于采用这种政策与瓜拉尼人为敌，特别当许多重大的事情摆在他前面要做的时候。根据塞西略·巴埃斯博士的说法，在卡维萨·德·巴卡关押时期形成的派别，就成为延续将近二百年之久的抗争的基础，并由此产生十八世纪的公社派叛乱。巴拉圭的历史是长的，但那种对抗的历史并不长！

第 五 章

巴拉圭国父伊拉拉

多明戈·马丁内斯·德·伊拉拉的世系可以一直追溯到巴斯克族① 吉普斯科阿省贝尔加拉村镇里的一个富裕家庭。十五世纪末叶，马丁·佩雷斯·德·伊拉拉在那里享有受人尊敬的王室公证人的职位。这是一个闲职，仅能由第一等公民承担。马丁·佩雷斯和他的妻子唐尼亚·马林纳·德·阿尔维苏阿·托莱多生了六个孩子。第二个儿子，多明戈·马丁内斯约于1509年出生，人们亲昵地称他为乔穆斯。1529年，马丁·佩雷斯和唐尼亚·马林纳按照1521年2月17日的王室法令，把本应由长子继承的财产授给多明戈·马丁内斯，因为他们的长子佩德罗已去世。但王室公证人的生活并不投合多明戈的心意，他充满着当时风行

① 巴斯克族（Basque）：居住在西班牙比利牛斯山近旁的一个民族。——译者

于查理一世国土的那种青年人不安定的活力和冒险精神。1534年8月，多明戈把那份继承的财产转让给他的妹夫。不管怎样，他已和有名望的勋爵唐·佩德罗·德·门多萨相识。就在这一年的7月19日，门多萨被提名为拉普拉塔的总督。多明戈还得到胡安·德·阿约拉斯的信任。多明戈·马丁内斯·德·伊拉拉受到崇高的评价，他的同事都按他家乡的地名称呼他为贝尔加拉队长。

门多萨的远征队自称要进行一些可与科尔特斯和皮萨罗的追随者相匹敌的探险。每人都谈论着：在新大陆，一文莫名的人可以借武力变成财主。门多萨无意于开拓一个农业殖民地——这种事情只对那些寻求崇高探险事业的人是有吸引力的。而门多萨带去的不是种子、牲畜、工具和农民，而是刀、剑、盔甲、枪炮和武士。他的目的地是秘鲁——“白王”的领土。伊拉拉在这样一种远征中是可以做出成绩来的。

门多萨的失败和阿约拉斯的死亡曾给伊拉拉一个表现他领导才能的机会——这个短暂的机会当时被卡维萨·德·巴卡夺去了。但是1544年的叛乱恢复了他的权力。伊拉拉在历史学家的笔下

(其中费利克斯·德·阿萨拉是一个例外)，遭受到不公正的评价。这些历史学家的主要根据是那本偏激的《传记》。路易斯·L·多明格斯在黑克卢伊特协会出版的《拉普拉塔河的征服》一书的引言中写道："伊拉拉受个人野心所驱使，破坏门多萨的计划；放弃布宜诺斯艾利斯；把他的第二个上司遗弃在查科，致使他和所有随他穿越大荒原到达秘鲁边境的人丧命；而在第二个总督——阿尔瓦尔·努涅斯到达后，伊拉拉又采用阴谋诡计反对他，一直到以狡诈和中伤的手法指控他犯了各种罪行，把他戴上镣铐送回西班牙。"对伊拉拉的这些指责，里卡多·德·拉弗恩特·马查因在他的《总督多明戈·马丁内斯·德·伊拉拉》一书中曾有说服力地加以驳斥，本章所述的内容主要根据这本书。仅仅举出八年后印度事务部开释阿尔瓦尔·努涅斯这个事实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这个事务部对于征服者是从不容情的，它却看到指派伊拉拉担任总督是合适的，这已足够为伊拉拉这个巴拉圭国父辩护的了。从1535到1552年乌尔里克·施米特在巴拉圭，他支持伊拉拉，拉弗恩特·马查因引证的文件也是这样。施米特是一个德国

人、老征服者，人们可以料想他是反对卡维萨·德·巴卡的，而卡维萨·德·巴卡对门多萨的人又是很敌视的。但是拉弗恩特·马查因是一个有学力的、客观的历史学家，他除了把他所找到的事实真相写出来外，没有任何理由去写别的东西。

在卡维萨·德·巴卡失去权力后，在巴拉圭有许多事情要做。下台的总督和萨拉萨尔都没有实现与阿加塞人之间的和平。在没有和平的情况下，亚松森人就必须武装起来，时刻保卫同盟者和他们自己。在伊拉拉召集的王室官员、头目和传教士会议上，提出派遣帕德雷·胡安·加夫列尔·德·拉斯卡诺和语言学家胡安·德·富斯特斯于1545年6月同阿瓦科特酋长进行谈判。谈判拖延而无成果，同阿加塞人作战成了习以为常的事情。一直到1558年伊拉拉死后两年，阿隆索·利克尔梅·德·古斯曼和鲁伊·加西亚·莫斯克拉才把这场战斗结束。

寻找一块宝地的梦，不会从贪得无厌的头脑里消逝。伊拉拉也不会忘记他的老司令的命令，去寻找一条通向秘鲁的道路。每一个人，包括卡里奥人在内，都想实现这一命令。但是，伊拉拉召开的

会议，对于到底应留下多少人来保卫亚松森以建立基地和这种航行到底是否应该进行的问题，意见不完全一致。1545年7月29日，伊拉拉决定摒弃所有的反对意见，逮捕了卡维萨·德·巴卡的朋友中那些领头反抗的人，从而制止了一场刚开始的叛乱。由于受到印第安人袭击的干扰，伊拉拉的出发日期不得不推迟好几个月。这时，友好的印第安人告诉帕德雷·拉斯卡诺说，他们知道去秘鲁的路，愿意告诉他怎样到达目的地。于是伊拉拉指定队长努夫里奥·德·查维斯和加西亚·罗德里格斯·德·贝尔加拉带领六十名西班牙人和三千名印第安人探路。1545年10月到12月之间，查维斯和罗德里格斯穿越圣费尔南多港即查维斯港西面的姆巴亚人地区，未获成功。这些失望的探险者回来后，谣言四起，说什么整个事情是一个引诱西班牙人离开巴拉圭的诡计。卡维萨·德·巴卡的人可能要遭到逮捕，但是他们仍然继续讲闲话。

1546年早些时候局势比较平稳，伊拉拉决定于2月开始他的大远征，留下佩德罗·多兰特斯统辖亚松森。队伍才走没有多远，费利佩·德·卡塞雷斯就出来捣乱，指责伊拉拉仅仅为了自己的

目的派遣拉斯卡诺、查维斯和罗德里格斯作绝望的探险。这个诽谤把远征队伍分成了两派，西班牙人好容易才防止了内战。帕德雷·冈萨雷斯·帕尼亚瓜平息了双方的争执，但伊拉拉考虑最好还是转回去。再有两三个月反抗他的情况说不定就可以消失。他需要把这个殖民地所能集中的每一份兵力都集中起来。

总督在等待另一个有利时机的同时，派出了一些小探险队，其中一个由卡塞雷斯率领向下游航行，探查有没有从西班牙开出的船只到达，并调查关于在巴拉圭已出现从秘鲁来的西班牙人的谣传。卡塞雷斯了解到没有从西班牙来的船只，而那些西班牙人是属于迭戈·德·罗哈斯一伙的，他们已返回秘鲁。有人会惊讶：卡塞雷斯以前是反对伊拉拉的，为什么伊拉拉还信任他，由他执行这样一个任务。给卡塞雷斯一些事情做，把他放在一个负责的职位上，这是一种对忠诚的考验。伊拉拉按照远征队头目会议的意见，在 1547 年3月派遣努夫里奥·德·查维斯队长向皮科马约河，那时叫阿拉圭河探险。查维斯仅带了三十个人，向皮科马约河上游走了四十里格，这已足够使他了解到这

条河并不能通航。

以往的失败只能增强伊拉拉穿过北查科的欲望，虽然那里有许多沼泽地和怀有敌意的印第安人。1547年7月，他开始组织一个包括二百五十名西班牙人——差不多占那时巴拉圭欧洲人的三分之一以上——和二千名友好的印第安人的队伍。这时，他已认识到无视他下面的主要头目的危险性，因而召开了一个会议，建议成立一个临时政府。弗朗西斯科·德·门多萨是原来门多萨远征队的一个成员，尽管在西班牙犯了罪，良心上受到谴责，但已表现得很好。那时他才三十二岁，但他的智慧被认为超越了他的年龄，有能力在伊拉拉离职时期治理亚松森。11月末，伊拉拉的远征队向圣费尔南多港出发，一路上如此顺利，至1548年1月这位著名的指挥官就准备穿越查科了。

关于这个欧洲人第一次横越北查科的远征（如果我们不算阿来霍·加西亚的劫掠的话），除了乌尔里克·施米特的模模糊糊的记述外，我们所知道的细节是很少的。但是有一些事迹是可以站得住的，不至于引起很大的诘难。由抓来的印第安人作向导，伊拉拉穿过一个个村庄，一直到达安第

斯山麓的小山群。1548年9月22日，伊拉拉派遣努夫里奥·德·查维斯、佩德罗·德·奥尼亚特和其他两个人作为使者去见秘鲁的官员。伊拉拉现在是在外国土地上，他很懂得那里的总督是不大欢迎闯入者的，不论他们是不是同胞。伊拉拉在信件里，要求能让查维斯带些铜、油、药品、酒和面粉回亚松森，因为这个殖民地同西班牙已好久没有联系了。这种要求表明伊拉拉试图同秘鲁开展贸易，这是佩德罗·德·门多萨和卡维萨·德·巴卡所没有实现的目的之一。这也表明，在远征中有一种长远的目的，而这一点由于人们偏爱拉普拉塔征服的更为壮观的一面而被忽视了。

使者们步行到达波科那，这是拉普拉塔管辖区(即现在的丘基萨卡)的一个村镇。查维斯写信告诉不耐烦地等候着消息的伊拉拉说，他们确已在秘鲁副王的管辖区，并将继续前进，但从亚松森出来的队伍必须等候四个月，而不是先前所约定的一个月。使者们在波科那找到了佩德罗·德·格瓦拉，他是查尔卡斯总督迭戈·森特尼奥的家臣。努夫里奥·德·查维斯出卖了伊拉拉，他写信告诉森特尼奥，他是来求援的，并请求任命一个比伊拉

拉更强的人统治亚松森！查维斯和奥尼亚特带了约五十名印第安人的护卫队向利马前进。这时，在伊拉拉的队伍里出现意见分歧。有些人想立即返回亚松森，避免雨季的到来；其他人则提出等候使者回来；没有人知道查维斯在策划剥夺伊拉拉的领导权。这种意见分歧，在11月初以决定再派三个使者去秘鲁而得到解决，当时远征队等候了五十五天不见使者回来。1548年12月7日，查维斯和奥尼亚特经过一个最艰苦的旅程后到达利马。他们两人把证件交给特使佩德罗·德拉·加斯卡，他是为结束秘鲁的骚乱而来的。其他使者带着伊拉拉深入查科的消息也到了利马。佩德罗·德拉·加斯卡召集会议，考虑查维斯请求换一位新总督的问题。会议劝告他不要干预巴拉圭的政府，因为王室可能已指派新总督，那样做有使情况复杂化的危险。但是，佩德罗·德拉·加斯卡仍然指派迭戈·森特尼奥做巴拉圭的新总督，还同时指派一批新官员。他也划定了巴拉圭的边界线，从西面的库斯科和查尔卡斯到东面的大西洋，北面到14度，南面到23度33分。有些作者说，迭戈·森特尼奥对于他的新职位不感兴趣，他把这事报告了他的上级；别

人说，森特尼奥自己要求这职位。但无论是那一种说法，他于1549年7月死去，这使加斯卡得以从一个狼狈的处境中解脱出来。

等候在上秘鲁(玻利维亚)的伊拉拉同他的远征队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他手下的人由于看到在秘鲁没有发财的机会，绝大多数希望回到亚松森，不愿再等候使者回来。这个问题在征服者中引起了严重的争吵。他们等候在财富的门口，但是那些财富已被另一部分想望而善于劫夺它们的西班牙人所控制。会计员费利佩·德·卡塞雷斯聚集了那些愿意回去的人，给伊拉拉三天时间等候他的使者。西班牙人的民主活动进展得很迅速。1548年11月10日这些人废黜了伊拉拉，推选贡萨洛·德·门多萨做他们的领导，并准备返回。就这样，不管那些使者遭到什么命运，远征队回到了圣费尔南多港。

在圣费尔南多港，这位首领陷于困境。迭戈·德·阿夫雷乌队长又从弗朗西斯科·德·门多萨手中夺取了亚松森的政权，宣告：伊拉拉已死，他的副手弗朗西斯科不再有权了，必须举行新的选举。在阿夫雷乌的追随者中有些人想要趁弗朗西

斯科出来参加弥撒的机会把他杀害，但是阿夫雷乌制止了他们，赞成采用更多的法律手续。当然，阿夫雷乌在选举中获胜，但是引起了弗朗西斯科的朋友们的大骚动。这些骚动促使他逮捕了那个被解职的领袖。阿夫雷乌的人在一个闹剧式的法庭上宣判弗朗西斯科死刑后，就把他绞死在公共广场。查科的暴动，亚松森的叛乱和谋杀，圣费尔南多的不稳定——再多一点的话巴拉圭就会遭到同秘鲁相似的纷乱局面。驻扎在圣费尔南多港的人，通过1549年3月选举伊拉拉为代理总督和总指挥官解决了这个问题，或者说至少指明了出路。伊拉拉接受对他的委托，率领忠诚的追随者向亚松森进发。阿夫雷乌派遣代表告诉伊拉拉他自己是怎样当上总督的，但是这位贝尔加拉的坚强的儿子总是正确行事。3月下旬，迭戈·阿夫雷乌和他最亲密的朋友被投入监狱，等候审判。在征服者的一个集会上，公布伊拉拉为巴拉圭总督，粉碎了费利佩·德·卡塞雷斯、阿夫雷乌和卡维萨·德·巴卡同党的阴谋。

伊拉拉必须使征服者有事可做，这在1549年不是件太难做的事情。从巴拉那河上游来的图皮

印第安人袭击瓜伊拉的瓜拉尼村庄，这就使伊拉拉进行征讨有了充分理由。他向东北进攻，打到巴拉那瀑布，图皮人遭到失败，不得不同意讲和。比这件事更重要的是同圣维森特的葡萄牙殖民者开展了正式贸易。葡萄牙殖民者可为亚松森提供牲畜、纺织品、铁制品和其他货物，同时又同西班牙建立了一条较短的交通路线。伊拉拉回到亚松森，发现队长胡安·德·卡马戈和米格尔·德·乌鲁蒂亚在对他的权力进行挑战。据说，这两个队长是由佩德罗·德拉·加斯卡派遣来的五十名士兵中的人。他们同努夫里奥·德·查维斯一起从秘鲁来的。虽然卡马戈和乌鲁蒂亚申辩他们无罪，但伊拉拉对于这些经常的挑战和无休止的推翻他的阴谋感到厌烦。绞死乌鲁蒂亚是如此困难，绞绳断了三次，绞刑手才把他勒死。

如何在未来的监护人[①] 中间分配土地和印第安人，成为一个严重问题。西班牙征服者通常以

---

① 西班牙殖民者征服中南美洲后，在各殖民地实行所谓监护制(encomiendas)，即把印第安人（或连同土地）授予征服者为奴，那些领有印第安人（或连同土地）的征服者，称监护人（encomenderos）。详见本书第 9 章。——译者

"托管"形式,取得或接受印第安人为他们劳动。印第安人用劳动所能换得的报酬，就是他们可以得到主人(监护人)的所谓保护、开导和教化。伊拉拉不愿意把这种准奴隶制，即新大陆的农奴制强加在他的朋友和亲戚——卡里奥人身上。但是压力越来越大,在1551年2月一次会议上,同意指定几个城镇作为基督徒镇，并在西班牙人中分配印第安人。这些措施并没有实行,但西班牙人还是把自己的不满情绪控制到了合理的最低限度，一直到8月15日克里斯托瓦尔·德·萨维德拉队长和五个同伴到来,才转移了西班牙人的视线。萨维德拉来自巴西海岸，他宣称远征队司令迭戈·德·萨纳弗里亚的船只已到达圣卡塔林纳。

西班牙的印度事务部在审阅了从巴拉圭来的许多报告后，担心拉普拉塔的全部征服事业处于危险境地。但让卡维萨·德·巴卡返回亚松森是不合适的，因此国王于1547年7月22日把这个省授予梅德林地方的胡安·德·萨纳弗里亚，他是埃尔南·科尔特斯的表兄弟。这位新远征军司令在全力组织他的远征队时死去，国王指派他的儿子迭戈执行任务，并负责对伊拉拉作九十天的官

方审查。1550年4月10日迭戈从圣卢卡—德—巴拉梅达驶出三艘航船。司令的母亲唐尼亚·门西亚·卡尔德隆，她的三个女儿和队长胡安·德·萨拉萨尔·德·埃斯皮诺萨随同远征队航行。这三艘航船载了二百五十到三百人，而且第一次力图带一批相当数量的白人妇女去巴拉圭。在旅途上只有一艘船即“圣米格尔号”幸存下来，但在离开圣卡塔林纳海岸后，这艘航船也沉没了。唐尼亚·门西亚和其他人(或许有六十名)得救。唐尼亚·门西亚叫萨维德拉队长到亚松森求援。显然，她相信她的儿子一定已经前往巴拉圭。由于亚松森没有建造能在大海航行的船，伊拉拉只能派遣努夫里奥·德·查维斯到拉普拉塔河湾探寻唐尼亚·门西亚。查维斯是在1549年早些时候从利马回来的。究竟他怎样等候她到达那里的，是一个谜。但查维斯还是在圣加布列尔留下一窖食物。1552年2月，查维斯再一次往圣加布列尔，但又没有找到一个人。而他所要寻找的那一伙人，为了把萨纳弗里亚的权利保持下来，在唐尼亚·门西亚领导下已在海岸上建立了圣弗兰西斯科殖民地。当伊拉拉确实知道唐尼亚·门西亚没有前往拉普拉塔后，又派

人去救援，这次是走陆路。几个月后，这位失踪的远征队司令的母亲放弃了圣弗兰西斯科，和她的女婿埃尔南多·德·特雷霍前往亚松森。她的外孙费尔南多·德·特雷霍后来是科尔多瓦大学的创办人。

即使没有唐尼亚·门西亚在那里把事情搞复杂，伊拉拉在亚松森遇到的困难也是很多的。推翻他的许多小阴谋被揭发出来；一起重大的阴谋，由于两个首谋者同伊拉拉的两个混血女儿结了婚而告结束。处理完这件事情后，伊拉拉试图再一次向北探险；但是迭戈·德·阿夫雷乌几乎立即发动了一次叛乱，迫使总督放弃了他的努力。伊拉拉对这种干扰十分恼火，把阴谋者中的三个人处决后，又出发北进。几个月后，因无成就返回亚松森。而迭戈·德·阿夫雷乌正在那里搞他的老阴谋。在伊拉拉外出期间，费利佩·德·卡塞雷斯负责领导，他在无可奈何时曾发布命令：任何人如同顽固的叛乱者交往就砍掉他的脚，任何人如给顽固的叛乱者以食物，就砍掉他的手。最后，一队由忠顺的队长率领的士兵把迭戈·德·阿夫雷乌铲除了。

大约在1554年左右，巴拉圭征服者基本上完

成了从武士到地主这个困难的过渡。那些在最初几次远征中幸存下来的人，经过二十年的时间失去了他们鲁莽的热情。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了瓜拉尼妻子或妾，都生了孩子，都关心为自己孩子安排合适的婚姻。当然，这个殖民地建立不久，还不至于对进一步开发缺乏兴趣。伊拉拉四十五岁，精力充沛，而且认识到巴西扩张的危险性。他早期的兴趣是寻找一条去秘鲁的路和开拓巴拉圭河上游。1554年他转向东部边疆，派遣加西亚·罗德里格斯·德·贝尔加拉队长到大西洋岸建立一个村镇。结果，贝尔加拉没有这样做，而在伊瓜苏瀑布北面一里格的皮基里河边的翁蒂维罗斯建立一个村镇。另一次出征是在佩德罗·多兰特斯领导下勘探巴拉那河上游、伊瓜苏和瓜伊拉的广大地区，但没有建立新殖民地。多兰特斯是在寻找金银。巴拉圭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有丰富矿藏的。在伊拉拉时期巴拉圭地下有丰富的金刚石、黄金和半贵重金属矿石，但蕴藏有这些矿物的土地落到了贪婪的、肆无忌惮的、野心勃勃的葡萄牙人手中。

伊拉拉不愿放弃他的北征美梦，在1554年10月，派遣队长查维斯和埃尔南多·德·萨拉萨尔

寻找一条穿越查科的伊塔廷人地区的道路。他们走后，一位使者带了一个重要消息到亚松森：国王任命伊拉拉为总督！查维斯和萨拉萨尔服从总督的召令返回亚松森，听取新的指示。伊拉拉获悉王室使者巴托洛梅·胡斯蒂尼亚诺被葡萄牙人扣留在圣维森特时，派遣平时忠实的查维斯队长前往，使胡斯蒂尼亚诺获释；并抗议葡萄牙人到瓜伊拉地区搜捕奴隶，征讨图皮人；同时调查西班牙叛徒、已故迭戈·德·阿夫雷乌同党的所作所为。

1555年查维斯走后，伊拉拉不等接到授权给他的原始证件，就组织政府。王室官员费利佩·德·卡塞雷斯、佩德罗·多兰特斯和代理司库罗马人安德列斯·费尔南德斯依次手拿王室命令，吻它并把它放在头上，宣誓忠于巴拉圭总督伊拉拉。这个令人崇敬的文件说明，迭戈·德·萨纳弗里亚已失踪，伊拉拉作为王室的一个臣仆应任拉普拉塔总督，执行城市、村镇和已建立或将建立的地方有关民事和刑事的权力。伊拉拉的年俸为二千金比索。代表查理一世监理西印度的腓力亲王命令伊拉拉，给予有巴拉圭第二主教称号的佩德罗·德拉·托

雷神甫在教会工作和帮助印第安人工作方面以各种协助。以后不许劫掠土人的村庄。这一条命令有效地结束了长途的征伐。

查维斯胜利地完成了任务，1555年9月，王室使者胡斯蒂尼亚诺到达亚松森。10月王室司库胡安·德·萨拉萨尔·德·埃斯皮诺萨到达。同他一起来的有萨纳弗里亚远征队里的几个妇女，十二个西班牙人和六个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带来了为数不多的牛，这对巴拉圭比白人妇女更为重要。巴拉圭的巨大养牛业就是从那条公牛和四、五条母牛开始的。

在王室官员的支持下，对实行监护制（把印第安人永久授予西班牙征服者）的要求迅速增加。1556年伊拉拉屈服于压力，把大约二万名印第安人分配给三百二十名对征服有功的人，不论他们的国籍和在巴拉圭服务的年限如何。在这些征服者中有西班牙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法兰德人、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正如给印度事务部的抗议信中所表明的那样，不满情绪立即产生了，在信中这些不满者申诉了他们的理由。一个聪明的总督总是有敌人的。怨言是这样的广泛，伊拉拉

不得不用罚款十万马拉维迪或抽打一百鞭子来威胁抱怨者。这种印第安人监护制可能是在1556年3月14日开始实行的，这时伊拉拉公布了一项关于调节监护人和受监护人之间的关系的法令。

查维斯队长在瓜伊拉地区讨伐图皮人获得成功，并在该地区建立十三个瓜拉尼人村镇，这是他的功劳。但是，由于加西亚·罗德里格斯·德·贝尔加拉队长拒绝查维斯进入他的翁蒂维罗斯村镇把俘虏们带走，查维斯与贝尔加拉产生了不和。当查维斯获悉唐尼亚·门西亚已把她的人迁入翁蒂维罗斯后，他就返回亚松森，提醒伊拉拉：葡萄牙人得到叛乱的西班牙人的帮助经常进入瓜伊拉。1556年早些时候，伊拉拉派遣鲁伊·迪亚斯·德·梅尔加雷霍队长在翁蒂维罗斯北面三里格的地方建立雷亚尔镇以加强对瓜伊拉的控制。

1556年4月2日，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德拉·托雷神甫到达他的主教管区的首都。那一天可以作为正式建立巴拉主教会的标志。由修道士率领的队伍前往欢迎主教，他在教堂里举行谢恩祭礼。4月5日伊拉拉亲切地接待了主教，但是后来他们相处的时间不长。

托雷主教乘的那艘船在巴拉圭河口等待供应品、旅客和邮件开往西班牙。来自亚松森的两艘或三艘双桅船把有思乡病的征服者驳运到那条船上。他们带来的文件中有伊拉拉一些至急公文，其中一件是他抗议禁止对印第安人进行新的侵犯的王室命令，并要求准予继续进行原来委托给门多萨的工作。

伊拉拉看着双桅船启航，接着就外出检查为建造大教堂砍伐木料的工作。伊拉拉就是这样地忙于工作，后来得了重病，不得不用吊床把他抬回家。多明戈·马丁内斯·德·伊拉拉于1556年10月3日逝世，享年四十七岁。费尔南德斯·德拉·托雷主教为他主持了罗马天主教的临终葬礼。

巴拉圭失去了它仅有的一个伟大的殖民地总督。在他死后，将近四个世纪中，巴拉圭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他。他留下了一个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的殖民地。这里，方圆三平方哩的一个城市，居住有一千五百个西班牙人和他们的家属；一所大教堂，两所区教堂，三所修道院和两所学校，还有纺织业和刚开始的畜牧业。他曾勘探过北查科，征服了有敌意的印第安人；抗击了入侵的葡

萄牙人；使征服者成为殖民者；同许多瓜拉尼部落建立了友好关系；总是寻求“把这块土地的门户打开”，而使巴拉圭不致陷于孤立。科尔特斯和皮萨罗可以被看作比伊拉拉更伟大的人。伊拉拉没有什么辉煌的成就，没有找到“黄金国”；但是在他所选择的舞台上，伊拉拉扮演了任何一个西班牙征服者所扮演过的英雄角色。在美洲，没有一个欧洲人的征服事业象对巴拉圭的征服那样合乎人道。

1556年3月13日在笔录者胡安·德·巴尔德拉斯面前，伊拉拉“以全能的上帝、荣耀的圣母玛丽亚和天国所有圣者的名义”在自己的最后遗嘱和处理遗产的遗书上签了字。伊拉拉把自己的灵魂交给基督，“来自泥土的肉体复归于泥土”，请求把他埋葬于亚松森的中心教堂。将他财产中的一部分用于在巴拉圭和西班牙的教堂和大教堂里为他的灵魂、他的父母和他的亲属而举行的弥撒。犹如伊拉拉手足的努夫里奥·德·查维斯和胡安·德·奥特加被提名作为他的子女的保护人。伊拉拉在遗嘱上写着：“条款。我说，我宣告，我自认，我在这个地方有上帝赐给我的若干儿女：迭戈·马丁内斯·德·伊拉拉、安东尼奥·德·伊拉拉和唐

尼亚·希内夫拉·马丁内斯·德·伊拉拉，他们是我和我的仆人马丽亚——这地方主要的（瓜拉尼）酋长佩德罗·德·门多萨的女儿——所生的孩子；唐尼亚·伊萨维尔·德·伊拉拉是我的仆人阿格达的女儿；唐尼亚·乌尔苏拉·德·伊拉拉是我的仆人莱昂诺尔的女儿；马丁·佩雷斯·德·伊拉拉是我的仆人斯科腊斯蒂卡的儿子；安娜·德·伊拉拉是我的仆人马丽纳的女儿；马丽亚是迭戈·德·比利亚尔潘多的仆人贝亚特里斯的女儿，因此，我承认和宣告他们是我的子女……”他们分享他的财产。马丽纳[①]、伊萨维尔、希内夫拉和乌尔苏拉都嫁给一些队长。伊萨维尔的儿子鲁伊·古斯曼后来成了巴拉圭的第一个本地编年史家。

当巴莱侯爵埃尔南·科尔特斯和墨西哥永别时，没有几个人流泪。弗朗西斯科和贡萨洛·皮萨罗暴死时，也很少有人为他们的死亡而哀悼。而亚松森的市政会在1602年确认：“即使在今日，他们还在这块土地上为多明戈·马丁内斯·德·伊拉拉而哀泣。”

① 原文如此，恐系马丽亚之误。——译者

第 六 章

福 音 之 剑

伊拉拉去世时，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德拉·托雷主教到亚松森还不到一年时间。这个殖民地有这样一个有才能的人，使那些不驯服的征服者受到约束，这是件好事，因为那时正是巴拉圭多事之秋。

1560到1561年瓜拉尼人的一次叛乱，使巴拉那河流域的殖民地受到毁灭的威胁，并引起亚松森人焦急不安。里克尔梅代理胡安·贝尔加拉总督镇压了这次暴乱，绞死了一些酋长，击毙了他们的许多追随者。然后，贝尔加拉要求利马的当权者批准对里克尔梅的选任。犹如在他之前的伊拉拉一样，他带领一大帮印第安人和西班牙随员，包括主教和亚松森的其他高级官员，出发西行。贝尔加拉到达利马，但里克尔梅的职位没有被确认，而由胡安·奥尔蒂斯·德·萨拉特接替。这位新总督

于1566年去西班牙谒见腓力二世，同时派一位副手到亚松森。这位副手和他的同行者在穿越查科的归途中遭到印第安人袭击，经受了一场充满悲剧和绝望的可怕遭遇，一直到1569年1月1日才狼狈抵达亚松森。

这位代理总督费利佩·德·卡塞雷斯一到亚松森便立即同托雷主教发生了争吵。卡塞雷斯把他的敌人送入监狱，主教就把卡塞雷斯逐出教会。他们各自都害怕在每一个阴暗处藏有暗杀者。1570年的一天，正当卡塞雷斯进入大教堂时，主教的人便把他抓了起来，上了手铐和脚镣。一年后，主教亲自把他押送到西班牙，巴拉圭失去了两个有才能而倔强的人。

由精力充沛的胡安·德·加赖担任总督，这使亚松森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加赖是比斯开[①]地方人，他于1573年建立了阿根廷的圣非城，于1576年担任总督；四年后，他重建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近代南美洲的骄傲女皇。但是，加赖所进行的强有力的殖民地开拓事业，也没有把巴拉圭西班

① 比斯开（Biscay）：西班牙北部一个州。——译者

牙人的所有精力使用起来。这些西班牙人追逐瓜拉尼姑娘，增加梅斯蒂索人口，彼此争吵，策划反对总督的阴谋，普遍地玩忽作为虔诚的基督徒的本分。亚松森的多米尼克教派主教阿隆索·格拉，由于对他的教民感到失望和对不信教的瓜拉尼人感到烦恼，于是向阿根廷的科尔多瓦城请求派遣耶稣会教士来巴拉圭。

西班牙派往新大陆的每一个远征队，都有穿教服的人随同。因为西班牙统治者很注意在地上传布天国的福音。这些人，有好、有坏，都是世俗的和教团的教士①。圣法兰西斯、圣奥古斯廷、圣伊格纳修斯·洛约拉、圣多米尼克各个教派和上帝的神甫们，在哪里可以找到皈依者，他们就往哪里去。他们到边疆去把未开化的土人归化为文明的人，调停争吵，反对贪婪的监护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和他们所爱的主，共享殉道的荣耀。西班牙人走到那里，传教士也走到那里；那里有传教士作先锋，那里总有西班牙人随后获取传教工作的经济

① 世俗教士(secular clergy)，指不受教规约束，不属某个教团的教士。教团教士（regular clergy），指受教规约束，属某个教团的教士。教团或译教派。——译者

成果。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传教士渗入到敌人中去，是为世俗的征服作准备。但是他们的目的是要夺取灵魂，而不是为蹂躏贫苦土人铺平道路。

在所有的教派中，最大的一个教派是1539年由圣伊格纳修斯·洛约拉在罗马创立的耶稣会。十二年后，在巴西的耶稣会教士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便把他们的势力扩展到一个广大地区。大概在同一个时间，在西查科也有耶稣会教士进行工作。在他们之前去的有圣弗朗西斯·索拉诺——查科的使徒和路易斯·德·博拉尼奥斯神甫等人，他们在瓜拉尼人中工作。

1588年，三名耶稣会教士，在主教的号召下，到达亚松森。胡安·萨隆尼奥神甫，是西班牙人；曼努埃尔·德·奥尔特加神甫，是葡萄牙人；托马斯·菲尔兹神甫，是苏格兰人或者是爱尔兰人。他们在亚松森呆了几个星期后，就转到东巴拉圭和在巴拉那河上游的瓜拉尼人中去。瓜拉尼人虽然有许多原始的特征，但还是易于接受基督教义的。或许他们在智慧上最大的成就是承认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即有个不具人格的上帝，这就给神甫们宣讲他们的信仰的要旨时，提供了媒介。

萨隆尼奥神甫，留在亚松森帮助做教会工作。而他的两个同伴，则去巴拉那河上游的雷亚尔镇去建立他们的立足点，并到瓜拉尼人中去进行工作。在瓜伊拉工作几个月后，他们向萨隆尼奥保证有二十万名印第安人就要开始信基督教了。或许这个数目的十分之一更接近于实情。1589年亚松森发生了连续九个月的瘟疫，萨隆尼奥要奥尔特加和菲尔兹留在那里。据说，每月有一千名印第安人死亡。奥尔特加前往圣埃斯皮里图—里卡镇和镇外地区时，瘟疫造成的死亡还在继续。奥尔特加去那里是为了给在瓜伊拉游荡的印第安人施行洗礼。这些新入教的印第安人接受他的宗教仪式，而报答的却是阴谋杀害他。奥尔特加回到里卡镇与神甫菲尔兹会合，里卡镇比瓜伊拉的荒野地区要稍稍开化些。在同一时期，神甫阿尔方索·巴尔塞纳和马尔塞利奥·洛伦萨纳（也叫马西亚尔·德·洛伦萨纳）正在亚松森以北地区拚死地工作。这五位耶稣会教士取得的光辉成就，导致亚松森人在市里建筑一所神学院的院舍，这个计划在1596年萨隆尼奥神甫去世时，实际上已经完成。

奥尔特加神甫，经受过洪水、毒蛇、阴谋和腿

部可怕的刺伤等种种灾难而生存下来。但在1596年却成了一个恶毒诬告的牺牲品。他在里卡镇的一个敌人向利马宗教裁判所告发他，说他违犯了他的忏悔书。年迈的奥尔特加不知道对他的告发，他服从来自宗教裁判所的召令，启程赴利马。他在那里被监禁了几个月，最后由耶稣会弟兄保释。但是，一直等到控诉人承认自己是谎告，才恢复了他的圣职的权利和特权。

在许多年中，秘鲁的耶稣会教士，东奔西走，穿越北阿根廷和巴拉圭，访问了许多部落，进行传道，施行洗礼，但未能获得显著的永久性的成果。这种情况，使一位耶稣会的视察员失去了信心，他于1602年下令把巴拉圭河和巴拉那河以东地区让给巴西传教士。大约在同一时期亚松森需要更多的传教士，因为萨隆尼奥神甫死后还没有派人来接替他，而其他的耶稣会教士又从外地召回西班牙去了。这是马丁·伊格纳修斯·德·洛约拉主教要求他们回去的。后来巴拉圭人经常想驱逐耶稣会教士，但在1767年以前他们还不得不忍耐着。1604年，洛伦萨纳神甫和何塞·卡塔尔迪诺神甫，到达亚松森。他们号召反对压迫印第安人，这样

就立即成了不受殖民者欢迎的人。

巴拉圭和其他殖民地的西班牙殖民者同耶稣会传教士之间发生争吵的根源，在于他们的目的根本不同。殖民者要剥削廉价劳动力，达到发财致富的目的，而耶稣会传教士要驯服印第安人。耶稣会教士所注意的不是一个雷亚耳[①]，甚至也不是一个马拉维迪这样一些低贱的目的。他们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使天国富裕，但从不愿意败坏基督教，使它成为奴隶制度的前奏。西班牙的帝王屡次发布命令，要使印第安人基督教化，要开化他们，保护他们。殖民者采取口头服从，而实际上不执行的态度；可是耶稣会教士，不但口头服从而且实际上也履行命令。当巴拉圭的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区建立时，殖民者和传教士之间的冲突还只是处于萌芽时期。

在巴拉那河和乌拉圭河之间的阿根廷的米西奥内斯省，和在南巴拉圭一些地上天国的遗址，很快就要被人忘记了。在这些曾花费过巨大劳动、有着灿烂成就而遭到突然灾难的地上天国的纪念物

---

① 雷亚耳(real)：西班牙的小银币。——译者

上，人们可以读到耶稣会传教区的历史。在这里，圣伊格纳修斯·洛约拉的门徒把一个很现实的天国带给了瓜拉尼人。他们战胜了印第安人根深蒂固的野蛮本性；他们用主的救世圣恩复活了濒死的灵魂；他们创造了一个奇迹。但是，即使这样的工作，也未能压倒西班牙殖民者由贪心而滋生的妒嫉。

在十七世纪早期，1609年欧洲正酝酿“三十年战争”① 时，亚松森迎来了另一个耶稣会教士。埃尔南多·阿里亚斯·德·萨维德拉总督和主教高兴地接见了他。因为在这年以前，腓力三世曾下令说，必须把巴拉圭的印第安人驯服，但只能用“福音之剑”。印第安人应该成为他的臣民，应该使他们幸福——这是国王的圣旨。总督是这样开始进行这项工作的：让圣法兰西斯教派神甫路易斯·德·博拉尼奥斯在亚松森周围的瓜拉尼人中间进行基督教化工作，把他们集中在“归化区”，以便得

①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十七世纪初在欧洲进行的一次国际战争，最初发生于德国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由奥国对捷克的侵略引起，后来西欧各主要国家都卷入。战争的结果奠定了近代欧洲的国际局面。——译者

到保护和教育。但由于博拉尼奥斯年迈力衰，该退休了，因而就把耶稣会的巴拉圭—智利教区的主教迭戈·德·托雷斯神甫派到首都来。

托雷斯神甫同传教士何塞·卡塔尔迪诺、西蒙·马塞塔、安东尼奥·鲁伊斯·德·蒙托亚以及其他人商议，坚决实现主教和总督向他们许下的诺言：耶稣会对于自己建立的任何殖民区或归化区握有全权。在他们管理的地区内禁止实行“监护制”、“派工制”和奴隶制。卡塔尔迪诺和马塞塔取得这些广泛的权力后，在1610年带着他们准备好的周密计划，来到圣埃斯皮里图—里卡镇。当边境村镇的西班牙人完全了解到这些传教士来干什么时，就反对得更激烈了。耶稣会教士解释说，印第安人有自己的权利，殖民者会从保护这些权利中得到利益。但是，西班牙人却把印第安人看作是合法的劳动力和小老婆的来源。

在瓜伊拉的巴拉那河上游的支流一带，特别是在巴拉那—帕内马地区，巨大的松柏覆盖着山谷和起伏的丘岗。1610年，卡塔尔迪诺和马塞塔在那里集合二百户印第安人，成立了他们的第一个传教区，名叫洛雷托。不久，洛伦萨纳神甫，在巴

拉那河和特维夸里河之间的迪亚吉特人中间，建立了另一个传教区，叫圣伊格纳西奥一瓜苏。以后又有两个传教区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继建立。罗克·冈萨雷斯·德·圣克鲁斯神甫在瓜伊库鲁人中进行工作失败后，转到南巴拉圭与洛伦萨纳神甫一起工作。瓜拉尼人信任穿黑长袍的神甫，他们成了国王的奴仆和基督教的皈依者，而且他们还可以成为阻止巴西向西扩张的有力的屏障。

马塞塔和卡塔尔迪诺发现，在他们到来之前，有一个传说中的派·卢马。派·卢马或称派·阿瓦拉，是一个圣洁的人，在巴西和巴拉圭被发现前的许多个世纪，他就在那里的印第安人当中传布福音。他曾教给他们文明生活的技艺，他每走到一个地方，成群的皈依者就拜倒在他带来的十字架下。在亚松森的北边有一块石头，过去曾作过派·卢马的讲道坛。犹如墨西哥的克特萨尔科阿特尔[1]一样，派·卢马消失在黑暗岁月里，却留下了一个永不磨灭的记忆和一个预言：即带着十字架的人

[1] 克特萨尔科阿特尔(Quetzalcoatl)：墨西哥传说中的自然神，转为民族之神和教职的缔造者。——译者

还会到巴拉圭的印第安人中来。

在瓜伊拉的传教区注定要出现风暴时期，1613年腓力三世派遣视察员唐·弗朗西斯科·阿尔法罗到亚松森传达国王命令，要保护印第安人不受压迫。这使西班牙人感到沮丧。他证实了如下的国王命令：从今以后免除所有瓜伊库鲁人和瓜拉尼人对西班牙人的服役，而且只有耶稣会教士可以在印第安人中间进行工作。这一下，激怒了西班牙人。这些传教士和在边境地区的殖民者处得很不融洽，殖民者袭击传教区，最后使耶稣会教士不得不把他们的归化区移到瓜伊拉境内离边境较远的地方。但是这个约在1618年实行的决定，使这些村镇处在圣保罗地方的马梅卢科人所能达到的距离内。马梅卢科人是葡萄牙或其他白人父亲和印第安妇女所生的混血儿，他们袭击内地，掳捕印第安人售给庄园主。

耶稣会教士，尽管要同无动于衷的土人和叛教者的袭击进行斗争，而且处在经常遭受马梅卢科人袭击的危险境地，但他们还在1629年前后开始建立了许多传教区。有些传教区，只是初具规模；在其他一些传教区里，印第安人所接受到的还

只是一点文明的皮毛。第二年，一位叫唐·路易斯·德·塞斯佩德斯的新总督，在去亚松森的途中经过传教区，一路上留下了漫长的苦难的足迹。那时，巴西还是西班牙的一个殖民地。因为从1580到1640年葡萄牙和西班牙是联合在一起的，这一事实说明，为什么新总督前往亚松森还能够取道圣保罗。在洛雷托的耶稣会教士隆重地接待了他，但未能得到他协助抵抗马梅卢科人的诺言。

从1532年以来，葡萄牙政府就试图保护印第安人，免受贪得无厌的殖民者的压迫。1537年，教皇保罗三世承认土人也是人。十二年后，第一批耶稣会教士到达巴伊亚，决定不论遇到多大的反抗，也要取消印第安人奴隶制。国王塞瓦斯蒂安1570年敕令：只有在战争中被俘的印第安人或以吃人著称的印第安人才可以迫使其作奴隶。腓力二世对印第安人的地位所作的改变很少；腓力三世则命令废止奴隶制。可是由于这个新法令激起了殖民者的暴怒，后来又恢复了旧的“战争中被俘条例”。但规定这种俘虏只能迫使当十年奴隶，并留在村镇里。而马梅卢科人却仍然继续他们的劫掠勾当，捕捉更多的印第安人。结果，他们同在瓜伊

拉的耶稣会归化区发生了冲突。

1629年，这些可怕的袭击者，九百名马梅卢科人和二千名印第安人同盟者，在安东尼奥·拉波索指挥下，攻打圣安东尼奥传教区，使它成了废墟。传教士佩德罗·德·莫拉神甫流着眼泪，为他的上了脚镣手铐的人求情。当证明眼泪不能起作用时，莫拉神甫以上帝的惩罚威胁马梅卢科人。但这些目无法纪的奴隶搜捕者却蔑视他的威胁。什么话！如果上帝自己试图把他们逐出天国，那么他们就要强行进入！马梅卢科人在传教区域里，迅速袭击那些防护最差的归化区。马塞塔神甫把许多难民集中到在他保护下的耶稣—玛丽亚传教区，因为凶猛的酋长古拉·贝拉在这个传教区。但是，马梅卢科大匪帮的首领马诺埃尔·莫拉托要比这个印第安酋长力量强得多。莫拉托的人在耶稣—玛丽亚传教区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并把古拉·贝拉上了脚镣手铐带到圣保罗。

酋长古拉·贝拉曾反对耶稣会力图推行的一夫一妻制，宣称这种可笑的外国说教，会阻碍人口增长，竭力诉诸旧传统以击败基督教的宣传。耶稣会教士真诚地相信贝拉同恶魔有来往，在他的指

挥下有四名恶棍。贝拉对耶稣会吸收的一些新入教者说，神甫身上的肉能作美肴，他一想到西蒙·马塞塔胖乎乎的腿肚子时，就要流口水。马塞塔听到这个吃人的图谋后，建筑一所木寨保卫自己，没有一个坚强卫队，他决不冒险外出。贝拉驳斥基督教的每一个教义。安东尼奥·鲁伊斯·德·蒙托亚神甫写道，贝拉的傲慢比起卢西弗[①]有过之而无不及。好奇心最后战胜了这位顽固的瓜拉尼人，他同意去访问在圣巴夫洛传教区的马塞塔和蒙托亚。这两个神甫见缝插针，就在1630年1月把耶稣—玛丽亚传教区迁到古拉·贝拉所在的城镇。但这位酋长仍然对传教士的事业毫不妥协，密谋杀害他的敌人，他利用一些已归化的酋长的傲慢和恐惧心，把他们吸引到自己一边来。如果没有马梅卢科人的袭击把他掳去，他策划的阴谋是可以成功的。

马塞塔和另一位耶稣会教士仅由三名印第安人作伴跟随莫拉托到圣保罗，在那里他们发现没

① 《圣经》故事中，卢西弗（Lucifer）即撒旦（魔王），曾为天使长，因抗命被逐出天堂。——译者

有一个人有权为他们申冤雪恨。于是他们赶到里约热内卢，然后去首都巴伊亚。这里的总指挥官唐·迭戈·路易斯·奥利维伊拉听取了他们的申诉，答应给予援助，但是他腾不出手来。当时，荷兰人入侵巴西北部，没有多余的军队，而且从瓜伊拉传教区掳到的一千五百名印第安人已被出售。由于对外战争正在进行，奥利维伊拉不能为释放所有这些战俘而触犯显要人物，但他确实为释放古拉·贝拉和其他少数几个人而进行了干预。马塞塔再一次回到传教区，他发现印第安人已确信整个归化制度不过是把他们集中到几个地点，便于马梅卢科人前来掳掠的一种诡计而已。

瓜伊拉有几个月处于和平状态。1631年，马梅卢科人又来攻打。有一个传教区，一千五百户人家，仅有五百名印第安人得救。里卡镇和亚松森拒绝支援耶稣会教士，最后耶稣会教士采取了果断措施：他们集中了所能找到的所有新入教者，同他们一起永远离开瓜伊拉。耶稣会把洛雷托和圣伊格纳西奥这两个仅有的未受触动的传教区放弃后，出走了。成群的优良黑牛、盛产农作物的田园、房舍、装潢精致的教堂——所有这些都放弃了。1631

年，二千五百户可能有三万印第安人，向巴拉那河下游和它的支流大迁移，马梅卢科人紧跟在后面追赶。这些逃亡者在巴拉那瀑布损失了所有的独木船和类似的物件。有些人在伊瓜苏地方停留了几个月，其他人继续向河下游前进，寻找一个避难的地方。据说，瓜伊拉传教区十万印第安人，到1632年剩下的不超过一万二千人。

巴拉圭的传教区屏障——虽然它不起什么作用——被拆除后，远在亚松森东面的巴拉圭边疆就成了更具有毁灭性的袭击的场所。在里卡镇和雷亚尔镇，曾讥诮过耶稣会教士的西班牙监护人，害怕马梅卢科人甚至比敬畏上帝更真实。雷亚尔镇完全消失了；里卡镇也只是它的名称还在几个不同的地点被采用着。小的村镇全被毁灭。这些袭击继续了好几年，似乎地狱的灾祸降临到了巴拉圭。很多时候，传教区印第安人和马梅卢科人是势均力敌的，只是印第安人没有枪炮。1638年左右，甚至在巴拉那下游的传教区也奄奄一息了。那时的巴拉圭总督唐·马丁·德·莱德斯马对传教区没有同情心。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总督也拒绝保护乌拉圭河流域的归化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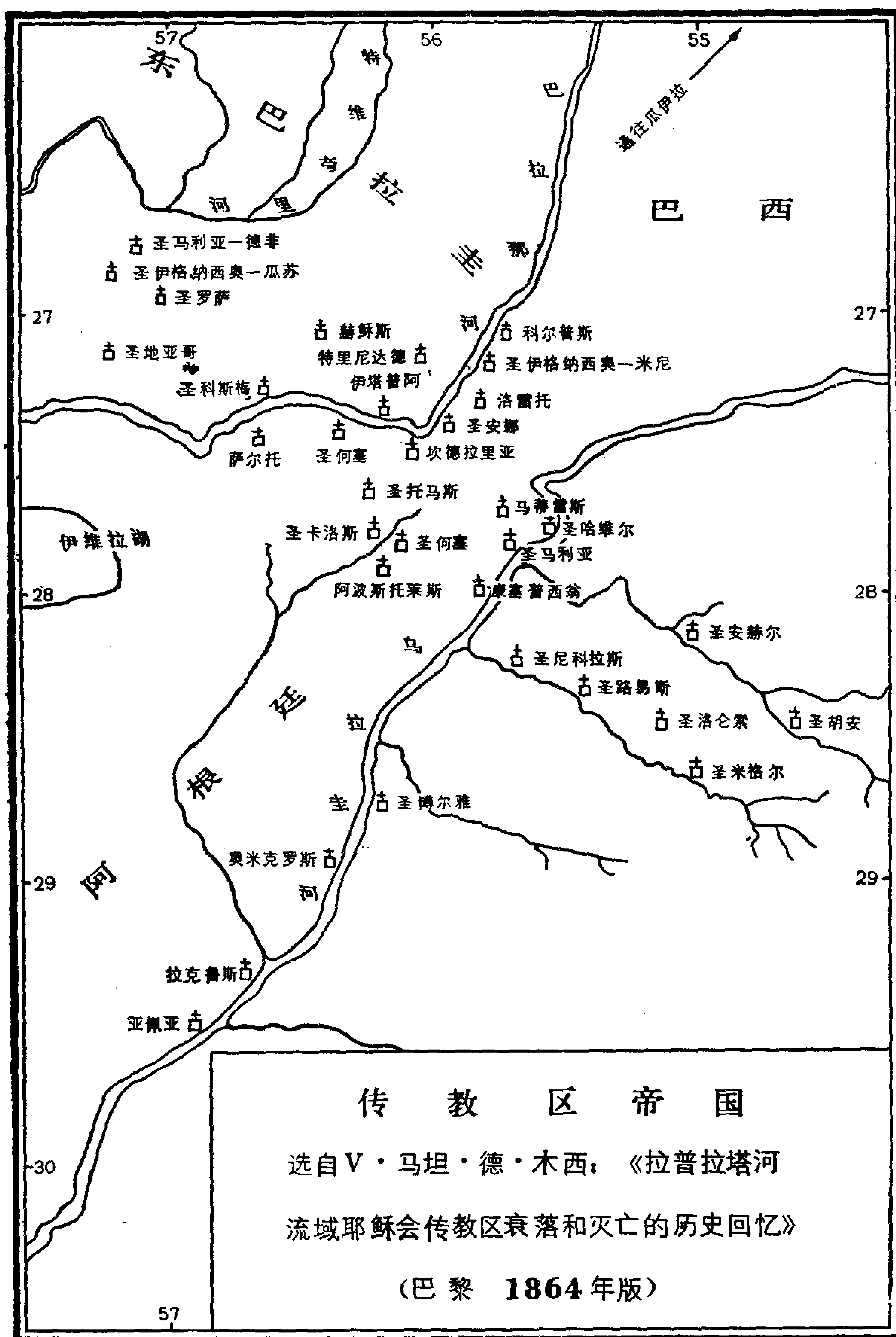
但耶稣会教士仍不灰心。他们一方面向教皇、耶稣会总会和国王申诉、呼吁，另一方面继续他们的工作，逐渐把他们的新入教者集中在巴拉那河两岸的巴拉圭东南部。这条河在距离乌拉圭河不到五十哩的地方出现一个大湾，耶稣会教士决定，就在那里建立一些能自卫的传教城镇。坎德拉里亚成为这些新城镇的首都，它离现在阿根廷的波萨达斯城不远。

耶稣会教士安东尼奥·鲁伊斯·德·蒙托亚去西班牙，说服印度事务部准许把传教区的印第安人武装起来。但应采取一切预防措施防止利用武装起来的印第安人反对西班牙人。从此以后，马梅卢科人的袭击大量减少，1642年左右，传教区已完全独处而不受骚扰了。巴拉圭的新总督唐·佩德罗·德·卢戈亲自率领四千名武装的新教徒拦截和击溃了一股马梅卢科人。在战俘中有些是图皮印第安人——瓜拉尼的亲族，他们被转交给了传教区，由耶稣会教士看怎样合适就怎样处理。这些战俘不但没有被处死刑——这本是他们罪有应得的命运，相反地神甫把他们归化了。

十七世纪末，在耶稣会传教区共和体境内，约

有三十个繁盛的归化区，人口可能超过十万人。费利克斯·德·阿萨拉认为，除两个外，所有这些传教区都是耶稣会教士建立的。他们用“福音之剑”征服了瓜拉尼人，保存了一大块土地没有被葡萄牙人占去。但在教皇所定的分界线[1] 以西的瓜伊拉地方，则永远不再是西班牙王室的土地了。并不是所有瓜拉尼人都自愿进入传教区的。阿萨拉描述耶稣会教士怎样采用一些策略和两面三刀的手法，建立了他们的最后三个传教区：圣华金(1746年)、圣埃斯塔尼斯劳(1740年)和贝兰(1760年)。一个耶稣会教士由于采用传道的方法不能赢得不驯服的印第安人，就派遣新入教者带上礼物到印第安人那里，向他们讲，神甫将为他们提供牲畜，这样他们不劳动也可以生活。接连几个月设宴招待未开化的土人，用音乐和节日安抚他们，使他们产生一种安全感。最后，在集合起来的人当中皈依的印第安人比不驯服的印第安人愈来愈多。这时，

① 1493年5月4日，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颁发了关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分割新大陆的敕谕。分界线是沿着通过亚速尔群岛以西一百里格处的经线划定的。1494年分界线被移到佛得角群岛以西三百七十里格处(格林威治西经47°32′56″)。——译者


巴西
通往瓜伊拉
巴拉圭河
乌拉圭河
阿根廷
伊维拉湖
圣马利亚—德非
圣伊格纳西奥—瓜苏
圣罗萨
圣地亚哥
圣科斯梅
赫稣斯
特里尼达德
伊塔普阿
科尔普斯
圣伊格纳西奥—米尼
洛雷托
圣安娜
坎德拉里亚
萨尔托
圣何塞
圣托马斯
圣卡洛斯
圣何塞
阿波斯托莱斯
马蒂雷斯
圣哈维尔
圣马利亚
康塞普西翁
圣安赫尔
圣尼科拉斯
圣路易斯
圣洛仑索
圣胡安
圣米格尔
圣博尔雅
奥米克罗斯
拉克鲁斯
亚佩亚
传教区帝国
选自V·马坦·德·木西：《拉普拉塔河流域耶稣会传教区衰落和灭亡的历史回忆》
（巴黎 1864年版）

另一位耶稣会教士露面了，把那些解除了怀疑的客人集中起来，分配到各个村镇中去。

传教区的村镇或归化区，是按照类似棋盘式的图样建造的。直线的街道两旁，按同一样式修造的房子排列成行，这些街道通向一个四周由教堂、武库、传教士住宅、工场和仓库围成的一个方场。每一个传教区大约有三千五百名左右的印第安人，通常有一名高级传教士和一名初级传教士。神甫是特别忙的人。因为他们除了担任正常的宗教职务外，也是学校教员、农业顾问、监察员、检查员、审判官和医生。

每一个传教区的目标是自给自足，不从外面进口食物。肉类来自成群的牛。每日宰几头，供一般的食用。偶然有这种情况：在田间劳动的瓜拉尼人还没到吃饭的时候肚子饿了，就把耕地的牛宰杀吃了。土地通常是集体耕种，出产各种能获利的作物。可以看到的马黛茶、糖、烟草、玉米、谷子、水果、蔬菜、棉花、蜂蜜、蜡和畜产品，一般都是丰富的。在巴拉圭、阿根廷、智利和秘鲁饮用最好的马黛茶来自传教区。这种茶的产量很大，它的多余部分在圣非和亚松森出售，所得的收入用来购买

传教区所不生产的物品。

工场可以使工匠学习技艺，并抵制无处不在的地狱魔王的各种诱惑。新入教者在专门派去的凡俗弟兄的指导下，为教堂制造美丽的地毯、器皿和装饰品，还制造器具、乐器、工具、锭子、手车等日用品和皮革制品。几乎所有的普通行业，那里都有，不论是技术高的或是技术低的。什么人从这种工作和生产中得到好处呢？根据这种制度的敌人的说法，只有耶稣会教士得到好处。

瓜拉尼人通常是不怎么负责任的，可是他们对于纪律适应得如此令人惊奇，经过一代左右的时间，传教区的生活就成了生存的正常方式。随着时光年复一年的过去，老年人讲述传教区建立前的土人生活故事，似乎开始属于幻想之国里的事情了。瓜拉尼人几乎感觉不到失去了随意游荡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已为免于匮乏、恐惧和压迫的自由所代替了。他们学到了多少教义，这是一件属于人们臆测的事情。两个耶稣会教士在一个人口众多的传教区里即使有助手，也很少能做一些真正的传教工作。绝大多数的印第安人，不懂西班牙语；许多神甫，不懂瓜拉尼语。每人受洗礼，听布

道，共进圣餐，学习简明教理问答的章节。这些姿态，都不过是形式，不明白它的道理就没有任何意义，当然也不能使人成为基督徒。

耶稣会教士管理男女老幼的生活。早、中、晚的宗教仪式，打断了日常工作，同时提供了约束新入教者的行为和巩固对教会有利的习惯的机会。儿童入校学习，学瓜拉尼文，有时也学西班牙文和拉丁文，访问者猜测这种拉丁文的知识，只是能读出字音，而并不理解字义。他们在店铺和田间里劳动，每人有指定的工作。妇女除参加田间工作外，还纺毛线和棉纱，供织机用。另外，她们的家务劳动不繁重，因为他们的住所很简陋，通风很差，除了吊床外没有其他家具。后来，建造了少数讲究外观的石砌房子，在屋里有了一些简单而坚固的家具。

种植制度，大致上象在秘鲁印加帝国统治下的公社耕作制。每户分有一块田地，生产必需的食物；孤儿、寡妇、宗教工作人员和其他不能参加田间劳动的人员的食物，都由公共仓库提供。公共仓库储存集体土地上的产品，余粮备作荒年之用。

道德风尚是耶稣会教士经常注意的一个根本问题。他们竭力使男女不致过分自由地混合在一

起，即使是在教堂里，也是男女分座，由不同的门进出。在这样的神圣环境内，为什么对于这件事情这样大加注意，使人难以理解。但是，在晚上宗教仪式结束后，即使那些小心谨慎的传教士也不能处处去监视。艰苦的劳动，紧张的生活，适当的娱乐，偶然过节日也不喝酒，以及经常的布道——这些因素造成教区里绝大多数的出生者都是合法的。但是，阿萨拉在十八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参观传教区，却发现道德松弛，淫风炽盛："恐怕没有一个满十岁以上的印第安女孩对任何一个诱惑者会说个'不'字，无论他是老年人或年轻人，自由人或奴隶，黑人或白人。"性正是另一种生理机能，可以象睡眠或吃饭一样随便。在十九世纪仍然有一些作家能重复这样的旧故事："神甫被迫在劳动之前去喊醒他的手下人，并要他们不要只爱睡神而不爱爱神，从而忽视生育儿女的责任。"这是故意毁谤。没有一个瓜拉尼人，无论男的或女的，曾犯过忽视生育的罪。

在传教区的早期生活中，出现一个严重问题。印第安酋长，随心所欲地讨许多个老婆，又随意把她们出借给自己的朋友，或者因为一时的厌恶

遗弃她们。有一个时期神甫轻率地想出这样一个主意：要求那些酋长，只能娶他们第一个私通的妇女。但事实证明，那些瓜拉尼酋长是健忘的，而且这也是容易撒谎的。这一问题，曾通过各种渠道，提到耶稣会的省会、总会，最后提到教皇本人那里。就是所罗门[①]也不能比教皇做得更好，教皇教导耶稣会教士去使用他们自己的判断力。这些酋长继续用一只眼睛盯着野美人。

在传教区的生活中，不是没有比较愉快的景象。教堂的豪华的装饰，明显地为了投合人们对闪光的稚气的喜爱。亚松森或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主教的访问，是人们热切盼望的事情。武装的印第安人部队，沿着大路站岗，在途中保护主教。当他来到归化区的视线之内时，骑兵队驰上前去迎接主教并组成一个护卫队，后面跟着印第安人的官员和传教士，然后是步兵"按作战的行列排开，彩旗飘扬，锣鼓喧天，笛子和号角声齐鸣"。妇女守候在教堂里，风琴奏出欢迎的乐曲，伴随着铿锵的钟

① 所罗门（Solomon）：古代以色列国王，以聪明著称。见《圣经》。——译者

声。圣徒日是盛大、壮观的节日。节日的仪式，由人们列队向教堂游行开始。然后，儿童在公共广场跳舞，祝火照亮大街，一片节日欢乐的气象。在第二天的中午，举行庆祝的村镇，款待来自邻近传教区的客人，他们留下来一直到看完最后一个仪式——圣餐礼。用花彩装饰的巨大拱门，横跨大街；有着华丽羽毛的鸟，用链条锁着的豹，一盆盆的鱼，点缀在道路旁；一丛丛的鲜花和芳香的植物，覆盖在场地上；为感恩而陈列的田间产品，显示出上帝的仁慈。村镇官员打着华盖，后面跟着王旗和村镇民团的庄严行列。晚间的焰火，宣告辉煌的节日结束。

每一个传教区的村镇，都有那种通常在西班牙城镇所常见的官员，虽然他们的职务和白人官员的职务稍有不同。酋长和镇长占有最显著的地位。以下是镇政会主席、掌旗官和次要的官员。每一个传教区有自己的武装部队，由凡俗弟兄训练，由镇长指挥。传教区在瓜伊拉同巴西马梅卢科人的冲突以及后来同敌对的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冲突中，都有一段惨痛的经验。这些惨痛经验，不能重复。每一归化区，都有用枪、剑、矛、弓、箭、小

型武器和火炮武装起来的骑兵队和步兵队。当印第安人军队集合起来保卫整个传教区共和体免遭危险时，他们受到敬畏和尊重。晚上有值夜的，保护村镇免遭突袭，并防止村镇里的人在宵禁后外出冒险。

在三国同盟战争时期，曾在巴拉圭作过两次短期访问的、比较可以信赖而又沾沾自喜的英国人中，有个理查德·弗·伯顿舰长在他的《巴拉圭战地通讯》一书中，错误地把传教区制度从未发生的一种影响，归诸于这个制度。他写道："看一看我们怎样在那些早期的组织里，发现了十九世纪中叶巴拉圭制度的雏形，是有趣的。巴拉圭的闭关自守，是从那时开始的；而不是一般人所设想的，是从弗朗西亚博士开始的。这种闭关自守，后来给巴拉圭加上了日本和'美洲的中国'的称号。也是在那时，开始了无生气的、奢靡的神权专制主义。它使这个种族，成为一架动作犹如农民和士兵的自动机，而且到现在还是这样；它使这个种族，不是成为一个民族，而只是成为一群奴隶，不知道什么原则，只知道他们上司的统治。他们的历史，可以概括为绝对的驯服、宗教狂、盲目服从、

对统治他们的暴君壮烈而野蛮的献身，与之相联系的是对外国人的愚蠢无知、仇恨和蔑视。也是在那时，开始出现寡头政治，对群众的奴隶制，迄今还存在的频繁的徭役，军事组织化的劳动，甚至储藏武器和弹药。”

这种评论只能表明一个著名旅行家无知的深度和反耶稣会教义的遗习未除。如果耶稣会传教区控制了巴拉圭的绝大部分，这个判断也许会有较大的分量。隔离比神权更能产生孤立主义。使巴拉圭容易成为无情的独裁者的牺牲品的，是印第安人和混血儿性格上固有的缺点，而不是家长制。如果说传教区制度不是巴拉圭所曾遇到的最好的事情，无疑，它也不是殖民地生活中的最坏的方面。而且，由于绝大多数传教区甚至并不处在现代巴拉圭的疆界内，它们的影响可能大大地被夸大了。至少在教会的目光中，传教区拯救了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的灵魂。它们为那些本来会命定当仆役或奴隶的人带来满足、照顾和文明；它们开拓了旷野，把草木丛生的“荒原”变成了园田，从灭亡中拯救了那些痛苦无比的人。不管所有这些成就如何，如果说这种制度在它曾经兴盛过的国家里，对

生活留下过什么永久性的影响的话，那也是很少的。现代的村庄和城镇占据了许多传教区先前的所在地；但是那耶稣会神甫的高尚的品格、社会事业、仁慈的家长制，早已化为乌有。

十七世纪中叶，西班牙在巴拉圭和阿根廷的殖民地遭到了各种势力的威胁。亚松森、图库曼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是西班牙控制的三个中心点。这三个城市都有受到外国侵犯或印第安人袭击的危险。亚松森东南有集中在特维夸里河和乌拉圭河之间的耶稣会传教区及其民团作保护。但是，在巴拉圭西边的查科及其以北还未被征服的地区，则有野蛮部落，他们对文明的抵抗构成相当大的威胁。在最南部，即乌拉圭河和巴拉那河之间的传教区，仍旧有遭到来自巴西的马梅卢科人袭击的危险。图库曼经常受到查科印第安人的袭击，它没有传教区作保护。当这个城市在1558年第一次建立时，印第安人立即把它毁灭了。1565年重建图库曼，但当它实行监护制，把讨厌这个制度的印第安人分配给殖民者时，又失去了保护自己的一个良好机会。布宜诺斯艾利斯，直到1664年还是一个简陋的村镇，只有二百一十一户，约一千人。由于

拉普拉塔各城市同秘鲁和智利的交通往来缓慢而不定，在它们取得相互支援之前，印第安人的反叛就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为有传教区，巴拉圭是安第斯山脉以东最安全的西班牙殖民地，甚至比智利更安全。

巴西对西班牙殖民地的蚕食，为拉普拉塔流域的传教区制度带来严重的后果；同时也表明，它试图破坏那些对重商主义的西班牙非常重要的独占政策。这些努力之一，导致葡萄牙人在拉普拉塔河北岸、乌拉圭河口下面几哩的科洛尼亚—德耳—萨克腊门托，建立了一个短命殖民地。由四艘航船组成的一个葡萄牙舰队于1679年启航，在科洛尼亚建立了港口，这一尝试非常成功，到1680年科洛尼亚已是一个相当可观的堡垒，威胁着相当大的一个地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总督何塞·德·加罗集合拉普拉塔的军事力量，派遣一支军队前往摧毁科洛尼亚。来自乌拉圭耶稣会传教区的约三千名印第安士兵猛攻这个堡垒，杀死了至少二百个守卫兵，俘虏了其余的人。这支印第安军队获得了秘鲁副王梅尔契奥尔·德·利尼昂—西斯内罗斯的赞扬，因为它行军数百哩，打败了敌军，而

没有花王室政府一分钱。

西班牙官员立即开始考虑把传教区制度扩大到南乌拉圭。但是，正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时，葡萄牙统治者威胁西班牙，如果不把科洛尼亚退还的话，就要诉诸战争。查理二世订约交出，到1683年科洛尼亚甚至比在印第安军队摧毁它时更坚固。在这个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耶稣会教士在查科的奇基托人部落中建立了传教区，并击退了马梅卢科人的袭击，这些活动引起了亚松森、图库曼和其他城市很大的注意。至于拉普拉塔的科洛尼亚直到1705年秘鲁副王下令再度攻打之前，没有人注意过。阿尔方索·胡安·德·巴尔德斯总督在围攻科洛尼亚时，要求传教区派遣四千名新入教者前往支援。1705年11月传教区军队到达，增强了在巴尔塔萨尔·加西亚·罗斯统率下的部队，他成功地指挥了这次进攻。印第安人在第二年3月离开科洛尼亚时，再一次拒绝接受他们的服务报酬。每次科洛尼亚被西班牙殖民者攻占后，就由西班牙王室归还给葡萄牙。乌德勒支条约[1]签订

① 乌德勒支条约(Treaty of Utrecht, 1713—1714)：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所签订的和约。这个条约的签订以法国为一方，以英、葡、荷、普鲁士等为另一方。——译者

后，葡萄牙人于1715年回到科洛尼亚，并使它成了一个繁盛的走私中心。1723年，葡萄牙人还在蒙得维的亚附近进行殖民，企图夺占乌拉圭。虽然巴拉圭的一次叛乱困扰着布宜诺斯艾利斯总督布鲁诺·毛里西奥·德·萨瓦拉，但他还是召集传教区军队协助把葡萄牙人驱逐了出去，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堡垒。

根据1750年的条约，葡萄牙同意把科洛尼亚割让给西班牙，以换取乌拉圭河以东有七个传教区的地区。这个交换消息，引起了“七归化区之战”，这次战争或许是耶稣会教士煽动的。传教区印第安人虽在战争中未获全胜，但制止了这次交换。1761年查理三世把科洛尼亚归还葡萄牙，1762年佩德罗·德·塞瓦略斯副王又为西班牙夺了过来。但1763年巴黎条约又一次把它交给了葡萄牙。这场独特的竞技在1777年宣告结束，这一年签订的圣伊尔德方索条约，明确地规定科洛尼亚是西班牙“东岸”① 的一部分。

黑袍神甫② 在他们的“七归化区之战”中做得

① “东岸”(Banda Oriental)：即乌拉圭。——译者

② 黑袍神甫(Black Robes)：指耶稣会教士。——译者

过分了。这使西班牙王室认识到这个帝国中的帝国必须加以推翻。而这一点过去是从来没有考虑过的。1767年3月1日主张改革的国王查理三世颁布命令，把所有耶稣会教士从西班牙领地上驱逐出去。他的议会批准了这一行动。6月，战船“普林西佩号”带着同时捉拿和驱逐耶稣会教士的命令，停泊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布宜诺斯艾利斯行政长官弗朗西斯科·布卡雷利指定7月22日为执行这一命令的日子。

1767年传教区的一份财产清查目录，显示出耶稣会是何等的富裕。仅在阿根廷和在巴拉圭的归化区里就有二万一千零三十六户。大群的牲畜包括七十二万四千九百零三头牛，二十三万零三百八十四只羊，九万九千零七十八匹牡马和牝马，四万六千九百三十六头阉牛，一万三千九百零五头骡和七千五百零五头驴。如果有人把每一个印第安劳动者作价二百美元，再给牲畜、建筑物、土地、教堂的装饰品和金银器皿估个表面价值，按照英国商人J·P·罗伯逊的计算，可以说三十个传教区总计约值二千八百万美元。这个数字，再加上他们在拉丁美洲其他地方的财产，珠宝、贵金属、

大教堂、教堂和土地，那么耶稣会教士所握有的财产总价值，定能引起任何一个政府的贪心。

不论耶稣会教士对印第安人来说是好还是坏，他们的传教区落在别人手里后迅速地衰落，一直到只留下一些屠宰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黑袍神甫作为一个团体来讲，是富裕的；但作为个人来讲，他们是诚实而贫穷的。在传教区里那些跟随他们的人立即开始抢劫任何有点价值的东西。甚至教堂的饰物也逃不脱他们贪婪的手爪。管理不当导致成千的印第安人逃亡；盗窃使美好的畜群减少到仅供作纪念的数量。在1772年的牲畜清单上表明只剩了十五万八千六百五十九头牛，九万三千七百三十九只羊和八千一百四十五头骡。阉牛、马和驴在五年中大概减少了一半。

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派出管理传教区的教团教士和世俗教士以及行政人员，投入了一场唯利是图的争斗，使印第安人遭到了最大的损失。俗人和教士激烈地争夺印第安人对他们的忠诚，把单纯的新入教者完全搅糊涂了。“结果是：教士下令说，服从行政管理人员的印第安人要受鞭打；而行政管理人员，则对服从教士的印第安人，报之以鞭

打”。即使土著人，也不能永远忍受这种待遇。至今，反对耶稣会教士的人，还责备神甫没有把他们所管理的人，提高到自己依靠自己的状态。他们在每一个灾难中，找耶稣会教士自私和压迫的新证据，却忘记了殖民地的其他各处发生了些什么。是否西班牙主人把秘鲁和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提到了这样高的文明水准？是否在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①] 和他的同伙指导下，危地马拉的马亚人成了强有力的、聪明的公民？传教区的批评家为新教徒[②] 的偏见所狃，或为那些对无拘无束的私人企业顶礼膜拜的狺狺之徒所迷惑，拒绝去看耶稣会教士的任何优点。

1814年，经过特维夸里河和巴拉那河以南曾一度繁荣的传教区旅行的人，所见到的只是废墟的荒凉景象。传教区系统的首都坎德拉里亚原有三千零六十四人，减少到仅有七百人。教堂濒于

① 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Pedro de Alvarado,1495—1541）：西班牙探险家、殖民者，1519年随科尔特斯远征墨西哥，1524 年率队征服了住在今危地马拉的马亚人。——译者

② 新教徒（Protestant）：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后，脱离罗马公教而陆续产生的基督教各教派的教徒的统称。——译者

倒塌，屋顶百孔千疮，饰物不翼而飞，“甚至祭坛也是光秃秃的，没有用布遮盖”。那里曾一度供应全区水果的繁茂的果园，除了树桩外什么也看不到了。那些一度修缮得很好的整洁的土茅屋，无疑地正在缓慢地倒塌下去。田园荒芜，灌木与杂草丛生，很快就要完全毁灭了。西班牙国王大笔一挥，把二百年的英雄业绩毁于一旦，整整一个时代，就在1767年结束了。

第 七 章

唐·贝纳尔迪诺主教

巴拉圭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根据1617年的命令分治后（分治于三年后实现），唐·曼努埃尔·德·弗里亚斯担任亚松森总督。弗里亚斯同他的妻子分居，主教托马斯·德·托雷斯试图迫使双方言归于好，无效。于是亚松森出现了偏袒曼努埃尔和偏袒莱昂诺尔两派。但弗里亚斯不顾自己家庭的困难状况，关切自己的公职。他向帕亚瓜人开战，在几次战斗中把他们击溃，甚至迫使瓜伊库鲁人暂时停止反抗。后来，查尔卡斯王室法庭受理主教对他的控诉，传令弗里亚斯前去听审。他去的时间很长，亚松森的市政会为他的离职深为抱怨。他在无罪开释后不久，于1617年死去。当时，许多人哀悼他的去世。

巴拉圭人同1628年任职的总督路易斯·德·塞斯佩德斯·赫赖结为同盟，妒嫉耶稣会传教士

的成就，仇视耶稣会的事业。总督顽固迫害耶稣会教士，教长富内斯称他“比野兽更残忍”。这位新总督的新娘是里约热内卢的一位葡萄牙贵妇，由马梅卢科人护送到亚松森。这些奴隶掳掠者得到塞斯佩德斯总督的特许，从1628年到1630年在里约热内卢市场上出售了六万个印第安人。为此，查尔卡斯王室法庭撤了塞斯佩德斯的职，并罚款一万二千比索；而他对印第安人和耶稣会教士犯下的背信弃义的罪行，却使西班牙和巴拉圭丧失了一个可贵的地区①。

1636年，唐·马丁·德·莱德斯马·巴尔德拉马担任总督。他继续残酷打击耶稣会传教区势力。五年后，他的继任者，唐·格雷戈里奥·德·伊内斯特罗萨（出生于智利，以攻打阿劳卡尼亚人而闻名，曾为阿劳卡尼亚人俘虏十四年），多少是由于一个法兰西斯教派主教对他的态度，使他成了耶稣会的同盟者。他的最初两个行动，就是把葡萄牙人驱出亚松森；征召六百名传教区的瓜拉尼武士，攻打瓜伊库鲁人。但后来他遇到了较为严重的

① 指巴拉那河以东的瓜伊拉地区，丧失给巴西葡萄牙人。——译者

困难。

使巴拉圭殖民地成为欢乐的喜剧和低沉的悲剧舞台的所有奇妙事件中，唐·贝纳尔迪诺·德·卡尔德纳斯的活动是无与伦比的。唐·贝纳尔迪诺是一位有才气的法兰西斯教派教士，出生于拉普拉塔（丘基萨卡），好轻举妄动，这使他经常陷于困境。富内斯教长描述他“秉性易怒，有生动的想象力，极好的记性和非凡的才能”。他的上司没有办法使这个反常的教士就范，就送他到亚松森担任巴拉圭主教。腓力四世批准了这个任命。

唐·贝纳尔迪诺，还没有动手接管他的教区之前，就已开始表演了。大主教最后要求他一面等候教皇授任的训谕，一面着手执行他的职务。而唐·贝纳尔迪诺等不及教皇的授任，就跑到萨尔塔。那里的耶稣会教士没有十分可靠的根据，就决定可以为他举行仪式。图库曼的唐·梅尔奇奥·马尔多纳多主教主持了这个授任仪式。紧接着，贝纳尔迪诺·卡尔德纳斯主教就启程去亚松森。1642年这一年，是巴拉圭十年纷扰的开始。

主教受到的欢迎，正是一个圣徒所能期望受到的一切。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在巴拉圭河岸列

队迎接这位非凡的主教来到亚松森，他们同声慷慨地赞扬了这个仅知其名声的人。他的名声很快增高起来。他对教仪的虔诚专注博得了人们的赞赏，但他迟迟不任命空缺教区的副教士，引起了流言蜚语。伊内斯特罗萨总督，温和、谦逊、诚挚，十分愿意和主教合作，甚至放弃了他在秘鲁副王统辖下执掌的一些民政权。主教是一个有权势的教职。他可以把教士和俗人一样开除出教，征敛苛重的罚金，并以同样的惩罚威胁敢于同开除出教者相交往的任何人；他可以对城市下禁令，以停止宗教活动。这些都是教会的圣灵武器，但使用时有节制，以免滥用了反遭人们的轻视。没有一个人，甚至巴拉圭的总督，愿意招惹这样一个有权势的主教的仇视。

第一次考验很快出现了。宗教裁判所的一个小官员因和总督手下的一个人争吵，由伊内斯特罗萨下令被捕入狱。主教听到了这件事，就面质狱卒，要他释放这个犯人。狱卒嘲笑了主教，主教企图以教规威吓他，没有得到理睬。可是，耶稣会神学院院长说服伊内斯特罗萨释放了这个犯人。于是，卡尔德纳斯把教士职位授给这个出狱的人，向

他索取了他被没收的财产，并且愚蠢地夸耀了自己的胜利。后来，他走得更远。他看见伊内斯特罗萨屋里有银盘，就表示希望把它送给教堂。总督完全从教会着眼，派人把东西送去了。唐·贝纳尔迪诺却让这些人回去要伊内斯特罗萨更多地送他一些财物。总督又答应了，告诉主教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

没有一个知趣的西班牙人，会把这样一句话从字面上来理解的；但是唐·贝纳尔迪诺不是一个知趣的人。不久，他要求总督送他一些总督力不能及的东西。后来，经过双方一系列的相互诋毁，主教就把唐·格雷戈里奥和其他官员开除出教，另外每人处以五十克朗[①]的罚金。可是，这个事件过去了，伊内斯特罗萨得了赦免。

主教对待别人象他对待总督一样，凡是别人在他想来是有财产的，他就如法炮制。可以用罚金敲一笔竹杠。最终，这套开除出教、赦罪、征敛罚金的把戏，使首都骚动起来。1643年在纷乱的高潮中，卡尔德纳斯暂时离开亚松森，临走前为预防起

① 克朗：一种铸有皇冠的银币。——译者

见,他再一次把伊内斯特罗萨开除出教。总督对这种争吵感到厌烦,就上诉到查尔卡斯王室法庭,这个司法机关也收到了主教的一个起诉状。既然把纠纷提到民事法庭了，亚松森的代理主教就取消了开除出教令和禁令。这一行动促使主教急忙赶回首都附近的亚瓜隆，他本想去视察一些传教区的,也不去了。他再一次宣布全城禁令,再一次把几乎所有他能记得名字的人都开除出教。当伊内斯特罗萨请求赦罪时,唐·贝纳尔迪诺仍然傲慢、刚愎,只给以有条件的赦罪,并处以十万磅马黛茶的罚金。

卡尔德纳斯主教，在亚瓜隆时征敛了许多笔罚金。如果这些罚金全部得到满足的话，他拥有的马黛茶储存量在巴拉圭将是最大的一个人。用这种方式征收马黛茶是够坏的了，但当主教开始用同样方式征收印第安人时，伊内斯特罗萨就又一次甘冒使徒的惩罚，把这些印第安人交还给他们的监护人。于是,唐·贝纳尔迪诺再一次开除总督出教。后来,秘鲁副王在1644年下令伊内斯特罗萨结束这场纠纷,使主教只管圣灵职务内的事,但副王没有向总督指示应该采取什么手段。虽是这

样，伊内斯特罗萨还是召集了一支武装护卫前去看望主教。使他十分惊讶的是，唐·贝纳尔迪诺给他赦罪了，还邀他共进了午餐。

耶稣会编年史家，责难这个法兰西斯教派的主教，曾与多米尼克教派教士达成默契要把耶稣会逐出巴拉圭。这种性质的阴谋是很可能存在的，因为巴拉圭不是法兰西斯教派教士和耶稣会教士有争执的唯一殖民地，而且卡尔德纳斯很想把耶稣会在他管区内的影响的每个形迹消灭掉。他取消耶稣会教士举行公共宗教仪式的权利，诘难耶稣会在传教中使用的教义问答，直接、间接地试图嗾使伊内斯特罗萨反对他们，让所有圣职候补人发誓，甚至以死效忠主教。他把每一个他能想到的罪状强加给耶稣会教士，说他们是强盗、窝囊废、叛教徒、暴徒怂恿者、卖国贼、反主教权威的叛逆、印第安妇女的诱奸犯、国王的奸佞。他公开宣称他要驱逐耶稣会教士，没收他们的财产，夺取他们的传教区，把他们的收入转进自己的金库。许多西班牙人赞同主教的图谋，能有成千个“归化”的印第安人给他们干活、陪他们睡觉的那种前景，鼓舞着他们的贪婪本性。唐·贝纳尔迪诺实际上为实现

他的计划早已有所准备，甚至准备好了船只待命，以便运走耶稣会教士，并要求法兰西斯教派、梅塞达尔教派、多米尼克教派的教士准备执行任务。

1644年10月，当主教期望夺取亚松森的耶稣会神学院时，大的打击来临了。但总督伊内斯特罗萨知道了这个密谋，预先告知耶稣会教士，然后他到首都外面去见主教。主教知道自己的计划已泄露，但是他还不知道伊内斯特罗萨的态度，下一步怎么走还拿不定主意。伊内斯特罗萨为了把他弄走，就建议他先从传教区开始，然后再夺取亚松森的耶稣会。卡尔德纳斯采取了这个主意，准备要到巴拉那河流域去。这时从利马王室法庭来了个使者，传令取消所有的开除出教令和禁令。这些直接来自副王的指令，使主教大怒。他抑住了自己的怒气，但他控制不了自己的嘴，结果伊内斯特罗萨立即知道主教在策划搞掉他的官职。

现在是这位陛下的总督行动的时候了。伊内斯特罗萨答应给主教一百三十个士兵跟他去袭击传教区，同时，他秘密下紧急令征召六百个瓜拉尼武装民团来援助自己。卡尔德纳斯并没有被王室法庭吓住，相反地他把巴拉圭所有的耶稣会教士

开除出教，回到亚瓜隆准备他的出征。他对伊内斯特罗萨变得如此猜疑，竟计划在去袭击传教区之前夺取亚松森，虽然总督的士兵按时到了亚瓜隆。最后传教区的部队到达了，伊内斯特罗萨带着这支部队去亚瓜隆，和主教在教堂里对阵。这个重大事件的消息很快传遍村镇，每个人都急忙跑去看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主教问："你要我做什么？"

伊内斯特罗萨回答："没有什么，主教阁下，就是要把你逐出巴拉圭。"

"你根据什么搞这个可恶的行动，你这个被开除出教的家伙？"

"奉副王的命令！你妄图叛乱，冒犯国王！再见，主教阁下！"伊内斯特罗萨阔步跨出教堂，尽管他仍是一个被开除教籍的人。

卡尔德纳斯举行弥撒，然后领着礼拜行列亲自捧着圣餐到市场。伊内斯特罗萨默默地看着这套表演。他赢得了这个回合，他知道这点；但他依然在接近失去已赢得的一切。主教答应取消他的开除教籍令，答应离开巴拉圭，说服伊内斯特罗萨把传教区印第安人遣走。然后，他去亚松森，隐藏

在法兰西斯修道院里，竭力挑动教民反对总督。但是伊内斯特罗萨重新征召他的传教区部队，宣布主教职位空缺，说服唐·克里斯托瓦尔·桑切斯担任代理主教，并召集正规士兵和民团，布防在公共广场的王旗周围。当钟声响起宣告卡尔德纳斯主教的统治结束时，他决定不降低自己身份再住在一个属于被开除教籍者的教区里。他举行两个弥撒，向他的追随者告别，然后前往河边启程。他离开时，重又开除了他仇人的教籍，向亚松森下了一道禁令。当卡尔德纳斯主教向下游科连特斯驶去时，法兰西斯修道院的钟声齐鸣，但这钟声在人们为矢忠总督而高唱的赞歌声中消失了。

在主教所散布的谎言里，有一项是说耶稣会教士发现过富饶的金矿脉，但在什么地方，他们保守秘密。这个传说传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时，人们正在探究一个相似的故事：有个被称为“好运气”的印第安人，声称他在那些矿上劳动过，但法庭审讯判定他是一个谎骗犯。以后，卡尔德纳斯对耶稣会教士的告发使这个故事复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总督为了平息这个谣传，亲自到各传教区查看，在那里连一粒黄金都没有找到。但是“巴拉主金矿”

始终存留在西班牙人的幻想中，那个故事一直流传着。

1644年的晚些时候，卡尔德纳斯到了科连特斯。这位被放逐的主教似乎没有吸取到什么教训。他所在的地方是个战略要地，靠近布宜诺斯艾利斯、图库曼、亚松森和传教区。他仍然是一个好开除人出教、下禁令、咒诅人的主教，他可以公然对抗王室法庭的赦免令。1645年1月，他写信给图库曼的主教，说他要剥唐·格雷戈里奥·伊内斯特罗萨的皮。他请求召开一次宗教会议，结束巴拉圭的教派分立，惩罚那些叛离国王、诱惑印第安人、传布可恶的邪教、同恶魔结盟的耶稣会异教徒。图库曼主教唐·梅尔奇奥·德·马尔多纳多回了一封严厉的信说：有罪的不是耶稣会教士而是别人。他们的金矿是“魔鬼的捏造”；他们的昌盛是建立在血汗和自我牺牲上的；他们的邪教不过是一些耳朵灵的人听到的风言风语而已。至于宗教会议，只有他和卡尔德纳斯有资格参加，而他们俩是决不能一致的。

伊内斯特罗萨总督向印度事务部提出他的控诉，并申述他怎样不得不用传教区印第安人维护

他的职守，免遭主教的密谋之害。此外，1646年他曾征召瓜拉尼民团击败了一伙旨在毁灭亚松森的瓜伊库鲁人。要是听任主教自行其事，亚松森就会化为灰烬。然而，卡尔德纳斯在避居科连特斯期间继续搞阴谋。到1646年末，他试图返回亚松森，但伊内斯特罗萨把他挡在离亚松森约二十五哩之外。查尔卡斯王室法庭要把卡尔德纳斯送到新格拉纳达[①]的波帕延去，但主教拒绝前往。

最后，在1647年，唐·迭戈·埃斯科瓦尔·奥索里奥接任巴拉圭总督，奉有不许卡尔德纳斯干扰耶稣会教士的严格命令。但主教得到总督之妻代为求情的帮助，回到了亚松森。他还是决定摧毁他的仇敌，实行他的关于传教区印第安人的计划。新总督怕行刺，是由一千个武装的印第安人护卫进入亚松森的。主教削弱耶稣会教士力量，并获准把远处亚松森北面的伊塔廷人中的两个传教区的耶稣会传教士赶走。在1649年早些时候总督奥索里奥北去时，一群暴徒就宣告卡尔德纳斯主教担任代理总督。既然是巴拉圭的最高统治者了，这个

① 新格拉纳达(New Granada)：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副王管区之一，包括现在的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译者

教会害虫就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达到他的目的。亚松森的西班牙人依然梦想得到金矿并奴役传教区的两万印第安人，因此他们支持他。1649年3月16日，胡安・德・比列戈・比利亚桑蒂带领士兵进入耶稣会神学院，鞭挞院内人，把病人拖下床，并把其中不少人抛进独木船，听其漂浮在巴拉圭河上。一群暴徒抢劫了这个学院，捣毁了华丽的圣坛，劈坏了门，把讲道坛和忏悔室砸得破烂不堪，并放火焚烧这所毁坏了的建筑。

耶稣会教士在科连特斯避难，得到梅塞达尔教派的佩德罗・诺拉斯科神甫的支持，他成了他们的法律监护人。正义之轮缓缓向前转动，查尔卡斯王室法庭派出自己的一个法官唐・安德列斯・德・莱昂・加拉维托——他是圣地亚哥军事教团中枢的成员——到亚松森去担任审查官、总指挥官和总督。正当唐・安德列斯在途中时，王室法庭断然传令卡尔德纳斯到庭，秘鲁副王还签署了这个命令。主教不理睬这个召令，征集一支军队，等着第二步行动。唐・塞瓦斯蒂安・德・莱昂—萨拉特代理总督率领西班牙军队和三千忠于耶稣会的印第安人进军亚松森。

主教的军队从亚松森开出来和莱昂—萨拉特对阵。在双方对峙的部队靠近时，莱昂—萨拉特宣读命令。回答他的却是一阵毛瑟枪的射击。于是唐·塞瓦斯蒂安下令进攻，迫使主教军队向亚松森溃退。他随即入城，到主教的大礼拜堂去，吻了一下主教手上的戒指，就命令他滚出去。可是卡尔德纳斯仍然在亚松森呆了几个月，显然盼望会有什么机会恢复他的权力。最终，在1651年早些时候，他离开巴拉圭，回到他的出生地丘基萨卡。

在以后的两三年里，唐·安德列斯在攻打帕亚瓜人和瓜伊库鲁人时，发觉传教区印第安人是一支可贵的联军，那时帕亚瓜人和瓜伊库鲁人曾利用1652年马梅卢科人前来袭击的时机，企图摧毁亚松森。1654和1655年，亚松森受到一次严重的瘟疫侵袭，同时遭到印第安人的多次攻击。当时的总督克里斯托瓦尔·德·加赖再一次求助于传教区印第安人，他们再一次出来援救。总督胡安·布拉斯克斯·德·巴尔维德(1656—59年)显出的软弱，促使印第安人在瓜拉尼酋长、阿雷卡亚村庄首领罗德里戈·亚瓜里圭的领导下起来叛乱。这个西班牙人的狡黠敌手在非传教区印第安人中组成

了一个联盟，这些印第安人对自己作为监护人的奴隶的命运都心怀不满。总督阿隆索·萨米恩托—菲格罗阿在一次视察阿雷卡亚和亚松森东北的其他村镇中，听到了这个刚要起来叛乱的消息，但他犯了罢黜罗德里戈的错误。这一行动促成了1659—1660年的叛乱。镇压这次叛乱，又得到了传教区印第安人的援助。如果贝纳尔迪诺·德·卡尔德纳斯主教扑灭耶稣会教士的图谋得逞，巴拉圭的命运就会大不相同，它的历史就更加是一连串的悲剧。

第 八 章

安特克拉与公社派

巴拉圭是试图独立的第一批西班牙殖民地之一，或许也是最早的一个殖民地发生具有摆脱宗主国束缚的确定意图的严重叛乱。它孤处南美中心，被看作是抵御葡萄牙人的边境前哨，它不是王室重要收入的来源地。因此，一些玩弄强权政治魔术的西班牙国王，对这个省份是不感兴趣的。甚至王室对印第安人的关注，也决不是完全无私的。在卡尔德纳斯主教花费多年时间试图摧毁巴拉圭中一支仅有的真正开化的力量时，王室官员也没有什么强烈的反应。这就不禁使人惊讶，为什么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之前，不曾发生过一次强大的叛乱运动。

对王室统治的不满不是太深的。国王毕竟离得很远，而秘鲁副王又太忙，没有工夫为强加些小麻烦给巴拉圭而操心。但是那些耶稣会教士呢！巴

拉圭的西班牙人每当想到那些繁盛的传教区，想到他们的免税权，想到成千的印第安人在他们的土地上和家庭里不受强迫劳动，他们就忘掉了一切仁慈念头，长久地激烈地咒诅耶稣会。唐·贝纳尔迪诺的阴谋，曾被一个带着一支传教区军队执行其命令的总督所挫败。也正是这些传教区，在1680年和1705年为布宜诺斯艾利斯总督提供军队夺取了科洛尼亚；而且，他们不是作为雇佣军而是作为国王的臣民来作战的，他们没有为他们的功劳接受过一分钱。这种力量和侠义行为的表现，使巴拉圭的西班牙人更加恶毒地排斥耶稣会教士。现在，这些骄横的教士有了一支可供自己支配的军队，它可以在任何时候把巴拉圭的一切毁掉。巴拉圭西班牙人的这种仇恨，终于体现为反叛国王，并使巴拉圭陷于紊乱达十五年之久。

1717年，任命唐·安东尼奥·维多利亚为巴拉圭新总督。为了某种原因，维多利亚谢绝了这个任命，而赞成由亚松森市长唐·迭戈·德洛斯·雷耶斯·巴尔马塞达来担任。在国王批准这个换任时，国王也就破坏了法律和传统。雷耶斯是安达卢西亚人，性情暴躁，出身平庸，略有财产。他品德很

高，别的就没有什么了。他被任命为总督的消息，在亚松森引起了一阵嗡嗡的街谈巷议。许多在血统上可以追溯为贵族后裔的人，为雷耶斯的提升所激怒。谣传耶稣会教士勾引维多利亚，造成了这个任命的改变。

唐·何塞·德·阿瓦洛斯—门多萨是亚松森的商界巨头，历任总督对他都是言听计从，许多年来他是这个省的政局的幕后权力人物。雷耶斯试图用"高级副官"的职位笼络他，这是雷耶斯所能安置的最高职位。阿瓦洛斯宁愿不要这个职位，因为他深知这位正直的总督是轻蔑象他这一类型的人的。阿瓦洛斯已经是一个市参政员，这个职位足以使他有充分的机会在商人和庄园主中间建立一个追随自己的队伍。阿瓦洛斯着手毁灭雷耶斯，由此引起了一个连锁反应，反应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利马，反应到加的斯和马德里。

阿瓦洛斯这样开始他的活动：先派一个朋友恳求一个他明知总督不能给予的恩惠，然后发表一个匿名的攻击书，充满刻毒的斥责。他求得唐·何塞·德·乌鲁纳加的帮助。乌鲁纳加是个富有的移民，也是一个市参政员，由于总督干涉过他强

占一个可怜的寡妇的财产的计划而怀恨在心。阿瓦洛斯和乌鲁纳加一起去见雷耶斯，挖空心思向他痛骂一顿。最后，受到再三攻击的总督，于1719年决定逮捕他的诽谤者以粉碎一场可能在策划的阴谋。但是，阿瓦洛斯和乌鲁纳加从他们分别关押的地方，设法派阿瓦洛斯的女婿作使者，向查尔卡斯王室法庭提出控诉。在他们告发的罪状中，有一条声称雷耶斯敌视和残杀印第安人。雷耶斯的前任总督曾允许帕亚瓜人在亚松森下游约五哩的沿河地区定居。这些安居在首都视线之内的背信弃义的野蛮人，同瓜伊库鲁人密谋消灭西班牙人。帕亚瓜人夜袭一些孤零的住家，抢劫，烧杀，没有遇到抵抗。可是帕亚瓜人一直把所有这些罪责归诸于瓜伊库鲁人。雷耶斯怀疑帕亚瓜人的活动，派一支小部队把他们迁移到乌拉圭传教区，派去的士兵为他们的抵抗所激怒，屠杀了帕亚瓜人。

对雷耶斯的控告，后来使唐·何塞·德·安特克拉—卡斯特罗受到耻辱。安特克拉是阿尔坎塔拉的爵士，王室法庭法官，1722年被提名为接替雷耶斯的总督。安特克拉曾有过计划希望自己成为巴拉圭的主人和财主。他等不及听候赴任命令，

就要求王室法庭派他为调查雷耶斯罪状的检查官(judge-inquisitor)，这是一个违法的任命，因为他已经被提名作为下任总督。安特克拉于1721年7月30日到达巴拉圭。何塞·德·阿瓦洛斯在亚松森的南面会见他，告诉他雷耶斯正在那些可怕的邪恶和商业繁盛的中心地——耶稣会传教区视察。这个市参政员曾安排在一个女亲戚的庄园里接待安特克拉，但届时这位贵妇已经不是女主人，而成了一具死尸。第二天欢迎安特克拉到达亚松森的，是那向人们和上帝宣告这一阴郁死讯的钟声，人们把这个杀风景的事看作是一种不祥之兆。

阿瓦洛斯和安特克拉不失时机地进行他们的勾当。在雷耶斯还未能结束传教区之行返回亚松森时，安特克拉已经搞了一捆有署名的控诉状送到王室法庭，停了总督的职，并严密监视他的一切行动。安特克拉说服许多以前拥护总督的人，使他们相信总督是不称职的，然后就在9月里召开市政会来批准他的措施。随着这个阴谋的发展，事情变得明显了，只要可能，雷耶斯定将被施计打入地牢。他们对证词、复审、延审、会审等法律形式的各

个方面都注意到了，就象倒过来猛力抖落一只可鄙的法律魔术袋一样。这个工作做得如此周到，使利马王室法庭（这个案件是由查尔卡斯王室法庭转去的）为了揭露安特克拉的状卷，准备为雷耶斯雪冤，竟花了十年时间。

现在，安特克拉用以前卡尔德纳斯主教采取过的方式，大显身手：他阴谋攫取马黛茶贸易的垄断权，未经他的许可，连一磅马黛茶都不能运出巴拉圭，他还压低收价。同时，只有一个市场，就是安特克拉总督的市场。这套巧计正在进行的时候，雷耶斯乔装成奴隶，逃出亚松森，最后避难到传教区。从这个避难处他又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企图由此去西班牙。在亚松森，安特克拉没收雷耶斯及其朋友的财产以泄愤，并把耶稣会教士从他们的神学院里撵出去。

下一步是秘鲁副王采取行动了。1722年2月他恢复了雷耶斯的职务，下令安特克拉滚出巴拉圭，对他所做的一切宣告无效，申斥查尔卡斯王室法庭不应听信这样一个人的谰言。可是这个王室法庭继续听信这些谰言。雷耶斯带着崇高的信念出发，返回亚松森，认为副王的命令足以把确实陷于

困境的安特克拉清除出省。但要对安特克拉的马黛茶生意和他对私人财产的明目张胆的盗窃进行调查，却不是那么顺利的。安特克拉扬言新命令是伪造的，并派一个亲信率领二百人去逮捕雷耶斯。亚瓜隆的教士及时告知这位被废黜的总督，使他得以逃往传教区避难。安特克拉的声望尽管下降了，但有两三个月他还是成功地闯过了险境。亚松森有个好品德的高贵夫人，曾公开表示赞成雷耶斯，安特克拉先是威胁她，要使她落得个可悲下场，后来又企图勾引这位漂亮的夫人。但是，她的轻蔑的断然拒绝，使安特克拉成了亚松森的笑柄。

不管他怎样虚张声势，安特克拉还没有准备好公开叛乱。雷耶斯派密探到首都散发他的最近委任状的复制本，这一个间接攻击为他的事业赢得了一些信徒而没有引起那个篡权者公开抵制。但是，安特克拉不能让这个挑战连一点反抗的姿态都不做就放过去。于是，他召开了市政会。

他问："你们愿意承认雷耶斯这个你们一度把他撤掉的人吗？副王对这里的情况知道个啥？""与其让一个软弱的耶稣会教士的工具做你们的总

督，不如要一个你们信得过的人去做。”

唐·迪奥尼西奥·德·奥塔苏——王室掌旗官抗议道：“唐·何塞，副王的命令是清楚的。唐·迭戈·德·雷耶斯的委任状是真的，这上有副王的印鉴。拒绝接受唐·迭戈，是对国王陛下的反叛！”

市参政员胡安·卡瓦列罗·德·阿尼亚斯科也支持这个观点，市政会里一片嗡嗡的附和声。在这紧要关头，何塞·德·阿瓦洛斯，平静地、委婉地请求准予发言。

他说：“先生们，我们对副王和国王陛下负有效忠和服从的义务。但是，如果我们拒绝履行我们的职责，我们不就出卖了他们在这个省里的利益了吗？耶稣会教士和雷耶斯联合起来从我们手里夺走我们的印第安人，他们独占马黛茶贸易。你们有多少人能够买到一级马黛茶去圣菲出售呢？让雷耶斯回来，国王的敌人就要胜利。唐·何塞·安特克拉承诺保护我们。我们拒绝支持一个王室法庭的法官，难道我们都是懦夫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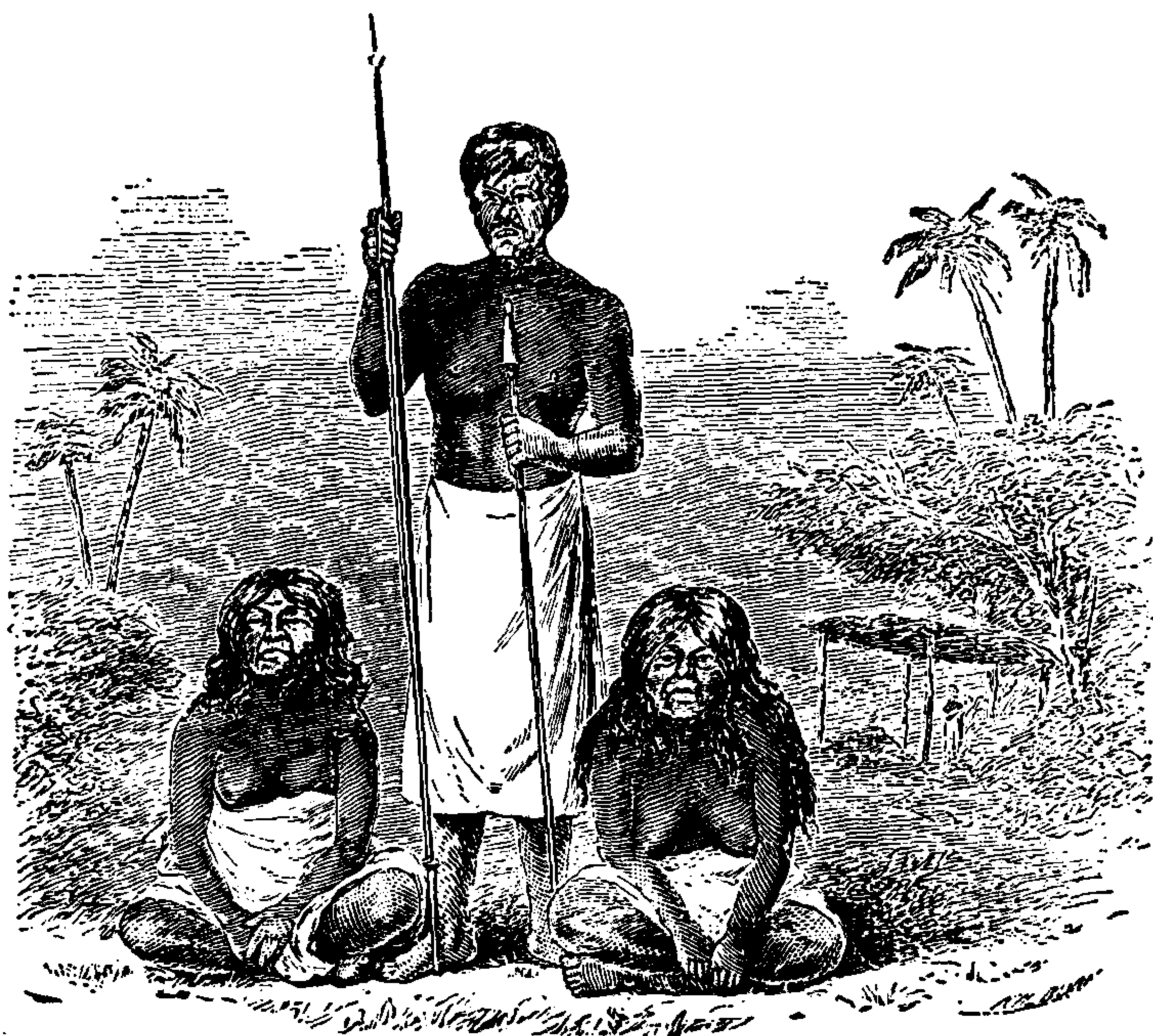
虽然没有被完全说服，市政会还是投票赞成安特克拉看守政府，直至能向利马副王作出进一

步的建议为止。于是，安特克拉变得如此大胆，甚至阿瓦洛斯也惊讶，该在什么地方让他的小暴君刹车。可是，他还是伴随这位总督和一小支军队去特维夸里河边(对岸就是最近的传教区)，在那里安特克拉威胁耶稣会教士说，如果他们起来反对他，就消灭他们。在返回亚松森途中，阿瓦洛斯得了中风死去。这样使安特克拉失去了唯一可以约束他暴行的人，特别是当他的秘密议会怂恿他走得更远的时候。查尔卡斯王室法庭收到一些令人回想起卡尔德纳斯主教的请愿书。作为对这些请愿书的回答，这个法庭在1723年3月下令所有人都不准采取反对现政府的行动。秘鲁副王唐·何塞·德·阿门达里斯，即卡斯特尔·弗埃尔特侯爵，再一次命令安特克拉离开亚松森，通知查尔卡斯王室法庭说，那些对耶稣会教士的控告是没有根据的，并命令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唐·巴尔塔萨尔·加西亚·罗斯去执行他的命令。安特克拉在亚松森暴跳如雷。他宣称：不管副王如何，他要保住他的政府，使巴拉圭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加西亚·罗斯有权使用拉普拉塔河地区一切民政和军事的力量来执行副王的命令，但是他首

先试用和平的办法。雷耶斯离开他避难的传教区去科连特斯，他在那里试图与亚松森通消息。于是，安特克拉派他的副手，市政会主席唐·拉蒙·德拉斯·列亚纳斯去绑架雷耶斯。这个阴谋成功了，雷耶斯上了镣铐，穿着寝衣被带进巴拉圭首都。然后，安特克拉向所有居民发表一个市政会给国王的请愿书，建议驱逐耶稣会教士，把印第安人分配给西班牙人。这样一个建议，在巴拉圭是取得支持的可靠途径。

1723年11月，是加西亚·罗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他赶到科连特斯，号召市政会醒悟过来。而安特克拉则提醒市政会说雷耶斯与罗斯是朋友，以此抵制罗斯。安特克拉为了取得全城性会议的支持，于12月13日召集世俗的和宗教界的主要人物举行市政大会(cabildo abierto)。只有迪奥尼西奥·德·奥塔苏发言反对这个篡权者，没有人公开发言反对国王。为了使加西亚·罗斯不至于了解到真情，安特克拉派一百个武装人员勒令他离开巴拉圭。这个行动无疑地把安特克拉用来掩盖自己行动的最后一捆合法稻草扒开了。加西亚·罗斯召集二千名传教区印第安人和少量的西班牙



遗留下来的帕亚瓜人
（选自查尔斯·艾·沃什伯恩：《巴拉圭史》）

民团，在特维夸里河与他对阵。1724年8月5日晚间，加西亚·罗斯率领军队渡过特维夸里河。安特克拉的前线哨所，在指挥官派通讯员快马加鞭驰回亚松森等候下一步行动时，就败退了。这个叛乱总督，在首都打信号枪召集他的党羽仓皇赶到大广场。他告诉他们，加西亚·罗斯正带着一支印第安军队向这个城市进军，决意进行劫掠掳夺。他警

告他们："你们的女人就要变成这批禽兽的奴隶了！"这些人就参加了他的军队。他的下一步就是把耶稣会教士逐出城去。同一天，即8月7日，他带了一支由西班牙人、印第安人、黑人以及这三个种族的各种混血儿组成的杂色军队出发到特维夸里河去。他允许他们可以抢劫，可以占有印第安人任意为他们服役。

在两军靠拢到彼此可以看见时，安特克拉开炮了，加西亚也开炮，双方都没有损伤。传教区的部队由于没有白人军官约束他们，就随便离开他们的岗位去河里游泳，和敌人亲善起来。安特克拉等待时机，8月25日时机到了。他用答应过节日的办法引诱一些印第安人到他的阵地上来，等他们接近时就派出骑兵队把他们砍倒。加西亚·罗斯无法恢复秩序，就逃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安特克拉立即变得更狂暴了。他向离亚松森最近的四个传教区进军，企图摧毁那里的村镇，把印第安人变成奴隶。但是，他的计划还未实行，那些新入教者就逃走了。这位疯狂的总督，因屠杀徒手的印第安人而在亚松森受到人们对一个征服者的欢迎。副王适时得知这些事件后，就发布命令，必须逮捕安

特克拉，把他解到利马。就在这个时候，前不久到达亚松森的何塞·德·帕洛斯主教，成功地使安特克拉的地位受到严重削弱，不得不答应归顺布宜诺斯艾利斯总督唐·布鲁诺·毛里西奥·德·萨瓦拉。

1725年1月，萨瓦拉启程去亚松森执行副王的命令，他事先采取预防措施，要求六千名传教区印第安人维持秩序。当他快到亚松森时，安特克拉力图鼓动人们站在自己一边；但是帕洛斯威胁说，谁拒绝服从萨瓦拉，就开除他出教。安特克拉知道这场赌博算完了。经过这四年叛乱后，1725年3月5日，他离开了亚松森。4月，萨瓦拉进入首都，他看到人民平静、驯服，而且明显是悔罪的。他力所能及地取消了安特克拉所做的事情，指定了一个临时总督，就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主教写了一封长信递呈国王陛下，在信里他给安特克拉加了个叛君之罪，并忠告王室断然结束对耶稣会教士的诬告，正是这些诬告使这个省纷扰了达百年之久。

安特克拉逃到科尔多瓦，在一个修道院里避难，最后到了丘基萨卡。就在那里，王室法庭把他戴上镣铐，取道大矿区中心波托西解往利马。这个

囚徒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辱骂耶稣会教士。1726年4月，他到达利马时，一大群人围拢过来看这个“巴拉圭的约瑟夫王”[①]。卡斯特尔·弗埃尔特侯爵把他拘留了几年，在这期间，西班牙法官在巴拉圭慢慢地搜集证据。在利马监狱里，安特克拉遇见一个人，叫费尔南多·莫波斯—萨亚斯，安特克拉把他写给亚松森同党的信交给莫波斯。莫波斯逃到巴拉圭，冒充是个律师，而一直和安特克拉进行着一项长远的阴谋。总督马丁·德·巴鲁阿(或称巴鲁)对巴拉圭耶稣会教士并不友好，但他装作不介入纠纷而伺机消灭他们。1726年11月6日，国王下令把巴拉圭的十五个传教区划给布宜诺斯艾利斯管辖，这道法令扑灭了巴拉圭人劫掠传教区的希望，但是反对耶稣会的阴谋并没有因此结束。

1730年9月15日，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插曲。六十只独木船载着帕亚瓜印第安人和他们从库亚巴附近的葡萄牙人矿山劫掠得来的物品，从上游驶来。葡萄牙人曾在西班牙人的占领区发现黄金

① 约瑟夫王，指约瑟夫一世（Joseph I, 1678—1711）：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期间1705—1711），以反对耶稣会教士著称。——译者

和水银，为了开采这些矿山，曾向印第安人进行过多次征伐，猎捕奴隶。帕亚瓜人恨透这些袭击，以牙还牙地给以回击。1722年他们曾抢劫过库亚巴，八年后他们拦截驶往圣保罗去的三十五只载着黄金和葡萄牙人的独木船。五只独木船逃跑了，其余三十只给他们带来了丰富的战利品。帕亚瓜人对黄金没有什么欲望，开始把这东西扔出船外。在不几个俘虏中有一个人告诉他们：在亚松森可以拿黄金换银手饰，在那里还可以出售被俘的奴隶。印第安人做了这样一笔好生意，愿意把藏在窖里的黄金多拿一些回来出售。但是这些事件激怒了马梅卢科人，他们宣布向帕亚瓜人决一死战。到1734年，他们把帕亚瓜人中绝大多数的男人杀了，而把妇女和儿童卖作奴隶。

1730年晚些时候，当1726年的命令付诸实施时，传来的消息说，另一个总督名叫伊格纳西奥·索罗埃塔的，要来接替巴鲁阿。莫波斯散布公社(commune)，即人民，甚至无需向国王屈从的思想。所以，公社就无需接受一个新总督，而且只要大家一致行动，谁也不能来担任这个职务。这个民主思想使亚松森分裂成两个阵营：公社派(Comuneros)

和反公社派（Contrabandos）。很明显，巴鲁阿也吃过瓜维拉树果的——吃了这种树的果可以使人乐意呆在巴拉圭；而且人们一定出了什么事故，才会被一个越狱犯的谗言分裂成两派。当然，从根本上说，公社派是在寻找机会消灭耶稣会教士和他们的传教区，不管采取什么手段都行。公社派网罗安特克拉以前的党羽，并渲染这样一个说法：安特克拉计划在利马澄清自己之后要回到巴拉圭。

公社派的密谋迅速展开。巴鲁阿的人四出募集民团反对索罗埃塔。他们在市里游行，要求巴鲁阿而且只能由巴鲁阿来当总督。巴鲁阿羞答答的，试图辞职，伪善地表示他希望大家接受索罗埃塔。后来，他对前途感到惊恐，真的辞职了。巴鲁阿辞职后，公社派接管了政府，开始“走遍大街小巷叫骂耶稣会教士”。暴乱爆发，如火如荼，弄得没有人敢出门。

正当骚乱期间，1731年1月索罗埃塔渡过特维夸里河前往亚松森。由四千名公社派组成的警卫队到市外去见他。政府依然牢牢地掌握在公社派手里，使索罗埃塔只得接受这样的暗示：说他有紧急事务去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时，甚至巴鲁阿也

不愿拣起这总督职权，虽然公社派对任何一项重要事情采取行动之前都要同莫波斯和他商议。叛乱者选出一个“洪达”(junta)，即委员会；“洪达”任命唐·阿隆索·雷耶斯为巴拉圭省省长。但是雷耶斯很快就辞职了，让位于唐·何塞·路易斯·巴雷伊罗。这个新官员暗中效忠腓力五世，逮捕了莫波斯，把他送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禁锢起来。后来，这个囚徒在解往利马途中被公社派救了出来，把他送往巴西；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喜欢他，而是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了。不久，巴雷伊罗自己也被迫逃往传教区，急进的公社派取得了完全统治。

索罗埃塔走进卡斯特尔·弗埃尔特侯爵的办公室时，在利马没有人比侯爵更为惊讶的了。

副王问：“你怎么没有在亚松森？”

索罗埃塔向他解释：“大人，没有一个珍惜自己生命的人能够住在那个叛乱的省里。不是我不愿意履行我的职责，但是当这个所谓公社——”

“公社！”副王喊道。“公社！这是什么玩意儿？”

“是啊，大人阁下，这些叛乱者现在称他们自己是个公社，甚至比国王还要高超！”

“那么，谁掌握这个所谓公社？”

“费尔南多·莫波斯一萨亚斯是领袖之一，他一度是您的监犯。但是我听说他已经被转移走了。唐·马丁·德·巴鲁阿伪装忠顺，拒绝公开担任总督职务，但实际上全部事情都是他指挥的。”

“那么耶稣会呢？你知道他们在这个事件中的地位吗？”副王问道。

“神甫们是忠顺的，唯有他们是全巴拉圭真正忠实的人，如果我可以冒昧提个意见的话，大人阁下，这是安特克拉插手唆使这批暴徒。”

“安特克拉？是啊，他现在关在监狱里！但是让我们等着瞧。”

副王召见利马王室法庭庭长卡萨孔切斯侯爵，要他搜查安特克拉的牢房。这次搜查，在把这个监犯的衣兜翻空以前并没有发现什么。据说，后来就在那里副王找到了他需要的证据。王室法庭审理安特克拉案件进展很快，1731年7月5日就押着他穿过利马街道送往断头台。他骑着一匹素色披挂的马，头上蒙着一块黑巾。一个传令官在前面开道，大声念着：巴拉圭叛乱者唐·何塞·德·安特克拉一卡斯特罗必须“在断头台上斩首”。群众拥挤在利马的大广场上，叫喊要仁慈和正义。副

王怕发生骚乱，骑马向前率领卫队。当他看来有人正在试图劫救安特克拉时，就命令卫队向安特克拉开枪。这个叛乱者受了致命的伤倒下了，但是副王为防万一，下令把他的头砍下。

公社派得知安特克拉的命运后，惊惶失措，因为所有的叛乱首领可以预料，他们一旦落到副王手里，定会得到同样下场。可是，他们决心进行另一次争取独立的尝试，给耶稣会教士再一次打击。1732年2月19日，一支由两千名公社派组成的军队洗劫耶稣会神学院，把院内人全部逐出城外，并把主教关押起来。布宜诺斯艾利斯总督，为恢复巴拉圭的秩序煞费苦心。他征召传教区印第安人到特维夸里河等待曼努埃尔·阿古斯丁·德·鲁伊洛瓦的到来——鲁伊洛瓦被任命为巴拉圭总督，这是他的不幸。他们等了很久，因为唐·曼努埃尔直到1733年7月27日才到达。这些印第安人离开了田地，使传教区系统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

鲁伊洛瓦总督发现时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盟友。公社内部的分歧，印第安军队的不断威胁，以及何塞·德·帕洛斯主教的巧妙工作，这些都涣散了叛乱者的士气。鲁伊洛瓦总督在亚松森感恩上

帝使他能如意地安全到达，他在大教堂的台阶上告诫人民：他们的公社是公开叛乱。公社的那个多头政府，起初不能重整旗鼓反抗这个果断的总督，总督大胆地把心怀不满的人清除出官府。但由于人们对耶稣会的憎恨如此之深，鲁伊洛瓦仍然不敢恢复耶稣会教士在首都的财产。最后，被去职的官员鼓足勇气于1733年 9 月发动进攻。鲁伊洛瓦集合三百人去攻打集结在亚松森附近的公社派军队。但是，鲁伊洛瓦的人，除了少数为支持他而牺牲的官员外，其余都投到公社派一边去了。鲁伊洛瓦自己在投降后被杀害。1733年 9 月15日这一天，是这个省叛乱的高潮。

在这场暴乱的悲剧中，另一个奇特的曲折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主教胡安·德·阿雷吉带进了这场混战。这位主教是耶稣会教士的仇敌，曾去亚松森接受帕洛斯主教的任命。他留下来和公社派搞阴谋。公社派宣布他是他们的总督。这一举动迫使帕洛斯逃出他管辖的首都教区。公社派组成一个大“洪达”(general junta)，由守护者唐·胡安·奥尔蒂斯·德·贝尔加拉任指挥，着手没收每个有效忠国王嫌疑的人的财产，包括耶稣会教士在内。12

月，阿雷吉主教精力衰竭，逃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此之前，他不过是“洪达”用来签署暴戾法令的傀儡。

1734年1月，萨瓦拉总督又命令传教区印第安人由熟路去特维夸里河。萨瓦拉本来可以带一万二千个新入教者去平定公社派，但他只要了三千。印第安人又是那样驻在边境上啥也不干。公社派则因内部宗派纠纷而分裂。这一年末，贝尔加拉死去，但叛乱还在进行。萨瓦拉不再信赖他的部下，最后于1735年1月到达特维夸里河，警告对方这次他决不容忍任何反抗了。4月，那支公社派的小部队遭到马丁·何塞·德·埃乔里队长的攻击，全部覆灭。除了两个漏网外，所有的首领被俘。由于埃乔里总督采用严厉的惩罚和偶然的宽大相结合，其中有几个人是在断头台上伏罪的。经过十五年的纷扰，巴拉圭的叛乱结束了。

在参与这场斗争的所有各方人士中，也许只有耶稣会教士和帕洛斯主教除了遭到敌人的诽谤外，显出了他们的自尊和坚贞无瑕。在那困难的年代里，传教士一直和他们的皈依者在一起继续工作。1730年，三十个归化区拥有十三万三千一百一

十七个印第安人。七年后，主要由于服军役而造成的饥荒和疾病，使人口减到十万左右。传教区印第安人在为国王服役时，遭到惨重的损失。他们的教士对西班牙王室是完全忠顺的。但是，1767年敌人战胜了他们，耶稣会教士从所有的西班牙殖民地上被赶了出去。对耶稣会教士的长期压制，公社派的叛乱以及人民本身的性格，这些或许说明为什么巴拉圭与厄瓜多尔和墨西哥不同，得以在下个世纪避免了破坏性的内战。另外，在这个现代共和国的疆域内尽管还有一打以上的传教区，但是教会始终没有在巴拉圭变成一个占支配地位的政治、社会、经济团体。

在公社派叛乱期间，巴拉圭的纷争鼓舞了查科野蛮人，竟“把他们的破坏带到了亚松森的大门口”。1735年，传教区军队应埃乔里总督的要求，把这些劫掠者赶回去了。五年后，另一个总督，拉斐尔·德拉·莫内达，力图保卫亚松森免遭从北边下来的姆巴亚印第安人的劫掠。当时在巴拉圭有六千六百六十七个穆拉托人[1]和自由黑人。这些有

---

① 穆拉托人(mulattoes)：白人和黑人的混血种。——译者

色人种中的一部分被劝说定居在亚松森北面几哩的恩博斯卡达殖民地。莫内达设置了许多边境哨所，在1747年粉碎了一次可能使公社派之乱死灰复燃的阴谋，从而才能把一个相当平安的省区移交给他的继任者。

对反抗的印第安人的长期作战，内战以及愚蠢的帝国经济政策，使巴拉圭在十八世纪未能取得任何显著的物质进步。新的城镇建立了，新的边境哨所出现了，但是人口增长缓慢。1790年前后，亚松森是唯一的城市，拥有七千居民，也可能不超过五千五百人。三个村镇，三十三个传教区，二十七个印第安人村庄，两个帕尔多人[①] 村庄，加起来总数不到十万人。在所有国王的殖民地中，巴拉圭本应该是最容易统治的，但是经济、社会、宗教和政治情况使它成为最难治理的一个。

① 帕尔多人(pardos)：白人与黑人的混血种，即穆拉托人。——译者

第 九 章

殖民地社会状况

巴拉圭的经济与社会是自然环境及种族混杂的产物。人们可以容易地看到既有那些由西班牙人和瓜拉尼人混血而来的特征，又有那些纯欧洲人或纯印第安人所独有的特征。这两大支系间的矛盾、对抗、调整的过程，进行了四个世纪，可能在缓慢下来，但是并未结束。胡安·纳塔利西奥·冈萨雷斯写道："这部征服和殖民地的历史是由这种默默的、严酷的斗争所支配的，这种斗争是日常大小事件的根源。"

征服者由于技术上的优越，即由于一种比瓜拉尼人所知的、更为发达的文化，而取得了霸权地位。但是，这些征服者在对瓜拉尼人显示出新价值的同时，由于与欧洲相隔离，又多少被新居地所征服。他们用当地木料造双桅船，用西沙尔麻（野生菠萝）的纤维做绳索，用棉布制造船帆，用伊斯伊

(yzy)作船的腻料。这些东西对瓜拉尼人立即变得比他们“以前作为财宝的彩色羽毛堆”要更有价值。西班牙人教给印第安人经商，后又教给梅斯蒂索人经商。木匠指点他们如何制造货车，从而增进了货物的交换；绳索匠利用土产纤维；农夫改进土产物，引进了新作物；木工乐于用巴拉圭的世上无比的硬木制作家具；织布工改进并增加了棉布生产。至于瓜拉尼人，在经济进展、社会习惯和民间传说方面，也有所贡献，这些都被吸收进伊比利亚[①]一瓜拉尼文化。

征服者的首领的业绩，无论大小都被垂留史册，小人物则极容易被人遗忘。得到过多荣誉的人，是下命令的人而不是执行命令的人。谁建造了巴拉圭赖以发展的双桅船？谁建造了房屋和教堂？我们知道其中一些人。门多萨招募来的巴斯蒂安·阿尔方索既能造船又能建教堂；造船木匠佩德罗·金特罗用当地许多木头制成条板；葡萄牙出生的西蒙·路易斯和费尔南多·佩雷斯都是技工；阿隆索·罗德里格斯·德·阿苏亚加是一个锯工。

① 伊比利亚：西班牙与葡萄牙两国所在的半岛，此处指西班牙。——译者

和卡维萨·德·巴卡同来的有木工师傅米格尔·戈塞拉斯、锯工佩德罗·迪亚斯和木匠佩德罗·洛佩斯·德·阿维加。洛佩斯为卡维萨·德·巴卡建造房屋和双桅船，无酬劳动了两个月。锯工、木雕刻匠、制门匠和安装工——就是这些人建造了亚松森城。箍桶匠，如克里斯托瓦尔·德·贝索和马科·森索帮助造船。1542年，亚松森下游的工场建造了十艘双桅船和一只帆船投入航行，这些船对探险工作是十分宝贵的。“卡穆尼罗号”帆船还载着卡维萨·德·巴卡这个戴镣铐的乘客航行到西班牙。这种对造船业的推动力持续了二百多年，直至1800年，航行在拉普拉塔水系河上的大多数船只，都是在巴拉圭的工场中建造出来的。

每次新的远征都带来一定数量的工匠，使曾经和门多萨同来的那些人的数目增加了。绳索匠胡安·梅迪纳有许多能干的徒弟。1580年，年老的克里斯托瓦尔·阿隆索在做马笼头绳、马套包、马勒和马具时，还给年轻人讲述伊拉拉和阿约拉斯的故事。甚至编筐匠克里斯托瓦尔·洛佩斯·佩克尼奥和费利佩·德·莫利内斯也能诱导本地工人取得更大成就。当然，鞋匠对巴拉圭是完全新鲜

的事。葡萄牙人弗朗西斯科·罗梅罗在门多萨带来的人中间有许多活计要做，而不用愁瓜拉尼人不穿鞋。1542年，卡维萨·德·巴卡，一个出色徒步旅行家，带来了三名鞋匠。织布匠、制革匠、制帽匠和裁缝找到他们做不完的活计。1549年或1550年，努夫里奥·德·查维斯从秘鲁回来时，带来一个名叫阿隆索·德·埃斯科瓦尔的裁缝，十六年后又有三名裁缝来到亚松森。

由于巴拉圭在贸易上是对外隔绝的，殖民地有这样一些工匠，就特别使它得到好处。第一批殖民者带来的棉布是用不了多久的，于是引进了欧洲的织布机，使许多男人和一些妇女不至于赤身露体。1539年 8 月，在织布机上织出的最初四个巴拉(一巴拉合三十四吋)的棉布，是奉献给圣坛的。其成本为四个法内格(约合六蒲式耳①)的玉米。印第安妇女和姑娘很快成为主要的织布工，她们的手艺成了一种主要家庭工业。但她们并不能满足需要。衣著的缺乏使穷苦的姑娘，即使是征服者的女儿出外也都半裸体。甚至一直到1725年，和王室

① 一蒲式耳合三十六公升。——译者

军队作战的巴拉圭的公社派，还穿着原始的皮革服。在1800年时，小量的外地纺织品进口补充了本地产品。种植棉花、纺纱和织布，本来是古老的产业部门，纺织品的缺乏只能由需要量增长来说明。

金属工匠，有广泛的机会去开展业务。伊拉拉自己就爱制作钓鱼钩、针、匕首和其他物品。在征服者中，至少有三个铁匠。即：随门多萨的远征队来的胡安·阿尔瓦雷斯，随同卡维萨·德·巴卡来巴拉圭的弗朗西斯科·德尔加多，以及轮换做铁匠和当兽医的胡安·佩雷斯。殖民地的第一个制锁匠安东尼奥·德·皮内多和制剑匠加利亚诺·德·马伊拉一样，是伊拉拉的伙伴。佩德罗·莫雷尔能铸造大炮和钟，他是1555年来的。巴拉圭冶铁业的起源，归功于门多萨的远征队。从普利茅斯来的理查德·林肯用"一个熔铁炉、一个铁砧、三把铁锤和两副铁钳"进行工作；到1543年，这一工业虽然缺乏原料，但已初具规模了。到亚松森来的每一只船，都带有新供应的铁。没有铁，其他工业甚至连征服者自己都必然要失败。铁是西班牙优越于印第安人的重要因素，也是西班牙人征服殖民地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火药也同样重要。和

门多萨同船到来的另一个英国人胡安·鲁特（约翰·罗特），是个火药制造者。硝石矿藏在巴拉圭大约是在1544年发现的，这使鲁特和胡安·克里斯蒂亚诺可以供应炸药了。梅斯蒂索人制造武器的手艺是高超的，到1573年，亚松森仅有的拉绳火枪，就是他们手工造成的。

本应属于巴拉圭的贵重矿产财富，却落入葡萄牙人之手，这是历史的讽刺。在伊拉拉和查维斯进入过的马托格罗索南部地区的黄金和钻石，是垂手可得的，就差这些东西没有自己跳出来碰西班牙人的胡子。这些财宝其实就暴露在地面上，只是征服者没有发现。或许失去这些财宝，是理所当然的，但在西班牙殖民地中，金银矿不论存在什么地方，它们都活跃了整个经济。在巴拉圭探寻矿石得到的仅仅是令人沮丧的结果，如在瓜伊拉发现的毫无价值的紫石晶就是那样。伊拉拉曾用许多木炭和铅对不同的矿石作了实验，也没有找到殖民者梦寐以求的贵重金属。

由于西班牙人接手种植瓜拉尼的庄稼并引进新作物，农业慢慢繁荣了起来。鸡鸭是由印第安人养来吃昆虫的，反过来鸡鸭又供人食用。三种巴拉

圭特有的淡褐色的禽鸟，在殖民征服前就已经驯养了起来。巴拉圭有本地猪，但仅在西班牙人来到以后，养猪业才显著发展起来。欧洲猪，显然是由门多萨带来的。1541年猪被带到巴拉圭后，猪肉已成为餐中一菜。1535年，马匹和门多萨一起来到拉普拉塔河，航海之后还活着的七十二匹，后来繁殖了许许多多匹。门多萨的马，没有一匹溯流而上带到亚松森的。1542年3月，卡维萨·德·巴卡进入亚松森时，带了二十匹牡马和牝马；到1564年，马匹已增加得如此之多，弗朗西斯科·奥尔蒂斯·德·贝尔加拉总督竟带了八百多匹马到秘鲁去，而且就是带走两千匹也不致引起缺乏。值得注意的是，马匹对于墨西哥和秘鲁的第一批征服者非常重要，而西班牙人在巴拉圭建立统治时却没有马。直到1547年，马匹才被带进内地；然而不到五十年，它们已成为每次出征的重要部分，而且要求各户都要养一匹马，作为随时御敌之用。马匹头数增长如此之快，从1582年到1588年的各次远征中，巴拉圭就提供了约四千匹马。关于能耐苦的小驴，缺乏专门的历史记录，但在殖民经济中它们也发挥了作用。绵羊和山羊，是查维斯从秘鲁带来的，

繁殖的速度极快，到1560年就对羊毛课税了。

有了牛，巴拉圭就不再受饥饿的威胁了。当胡安·德·萨拉萨尔·德·埃斯皮诺萨背弃唐尼亚·门西亚·德·卡尔德隆投向伊拉拉时，他领着到亚松森的一帮人中有两个葡萄牙人。这两个人就是西皮翁和维森特·德·戈埃斯，他们以一头母牛作为工资，雇了一个名叫盖特的牧工赶了一头公牛和七头母牛从巴西海岸到巴拉圭。从这件事就产生了下面一句常用语："比盖特的牛还贵。"1569年，费利佩·德·卡塞雷斯运了一船牛羊到亚松森。不久巴拉圭就输送牛到其他殖民地，如圣非、科连特斯、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贝尔梅霍河畔的康塞普西翁。牛变成了主要收入来源，然而最好的牧场却在耶稣会教士控制下的传教区内，这是"黑长袍"在亚松森遭人怀恨的另一个理由。

玉米、豆子和木薯，是这个殖民地的主要农产品。1538年12月，西班牙人第一次收获时，其主要产品有四百二十法内格玉米和四十五法内格的豆子。收成很好，阿隆索·卡夫雷拉在1539年就开始征收实物税了。甘蔗也许是查维斯从秘鲁引进的，或者是葡萄牙人在1555年左右从巴西带来的。后

一种情况更真实些。糖坊建立起来了，这在拉普拉塔地区是第一所。1575年第一个制糖工匠到达时，这一工业已牢固地建立起来。158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重建后，巴拉圭就为它提供了蔗糖进口的一部分。柑子、小麦、大麦和葡萄是在1550年以后，从西班牙进口的。酸柑是巴拉圭的土产，但是甜柑也很容易地适应了。家家户户为柑树所环绕，空气充满芳香，它成了好客的象征。“在漫长的殖民地时期，柑子从未成为商业剥削的对象”。

耶尔巴，即巴拉圭茶，不仅成了好客的象征，而且也是剥削的象征。成千的印第安人死于耶尔巴园，即耶尔巴树林或灌木丛中。为制止奴役被称为“米内罗”的耶尔巴采集工所进行的种种努力，在永不满足的贪心面前都失败了。耶尔巴在南美洲的需要量如此巨大，致使人道主义的种种冲动，在对受害者未能有所帮助之前，就被窒息了。即使如此，赚钱多的不是最初的剥削者，而是商贩和投机家。1620年，在圣非每二十五磅耶尔巴值八到十比索，在图库曼则高达二十比索。生产增加后，价格有些下降。到1776年，一个阿罗瓦（合二十五磅重）耶尔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卖不到一个比索。亚

松森从耶尔巴贸易中赚到的钱是极少的。

如果土著居民能从小麦种植中得到什么东西的话，它也许早已发展起来了。1600年，一家面粉厂在亚松森南面的兰巴雷开业。但是小块土地上种植的木薯和玉米仍然保持主食地位。酿酒业同样没有发展起来。耶稣会传教区的竞争、植物病害、商贩的牟利活动，都是造成这一行业衰落的原因。烟草，曾使许多欧洲的殖民地免于破产，但在巴拉圭的早期经济中只起微小的作用。商业性的烟草生产大约开始于1750年，曾行时了一阵；但是到1800年，各地尤其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出口税，把这一行业搞垮了。

殖民地的巴拉圭，本可以成为西班牙海外殖民地繁荣、兴旺的一个中心。只要西班牙官员们有一点预见，有一点政治家才能，对总督的报告注意一下，并采取大胆的补救措施，可能早已使巴拉圭成为波旁[①] 王冠上闪闪发光的宝珠了。这个殖民

① 波旁(Bourbon)王朝：波旁家族是法国中部的贵族，先后曾在法国（1589—1792年，1814—1830年）、西班牙（1700—1868年，1874—1931年）和那不勒斯（1735—1806年，1814—1860年）建立波旁王朝，这个王朝的著名国王是路易十四，他在1700年使他的一个孙子德昂儒公爵加冕为西班牙国王，称腓力五世。——译者

地一开始就被忽视，以后又缺乏欧洲人的制造业，商业受到无远见的贸易政策的窒息，以及由于开拓其他地区而引起的这一殖民地的衰弱，这些都使它继续受到损害。

每次远征，无论北至哈拉耶斯，西至秘鲁，东至瓜伊拉，或向南沿河而下，耗尽了亚松森的宝贵的、几乎无可补充的物资。因为铁、钢、铅、火药，武器和货物经常被取用，1539年卡夫雷拉从西班牙带着两只船到达时，门多萨的给养几乎已消耗殆尽。在此前不久，纯粹因偶然事故，“圣玛丽亚号”船在前往秘鲁途中，避难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领航员和主要货主唐·莱昂·潘卡尔多管理价值二万七千六百五十四杜卡特的一船货物：“六桶洋李脯，十二袋榛子，四磅番红花，二十一箱和一百四十一匣榅桲肉，七十罐和三匣腌菜，六桶马利奥卡奶酪，一百一十阿罗瓦（五百五十加仑）的油……一桶腌续随子芽，十大桶面粉，一百六十四大桶酒，二十五桶香料，三桶糖和大量的西班牙甘椒、丁香、肉豆蔻（一种调味香料）、肉桂以及许多其他物品。”这一船货解救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饥荒，而那些狼狈的征服者是用“他们想象的梦中黄金”来

购买的。鞋、衣服、干货、武器、铅、刀、火炮、玻璃、工具、笔、梳子、肥皂、香水、牙刷、镜子——“圣玛丽亚号”的货单读来活象十六世纪欧洲产品的清单。这么多的装饰品随即打扮了巴拉圭的可爱的瓜拉尼姑娘们。

从“圣玛丽亚号”降临了潘卡尔多的甘露之后，接着而来的是对巴拉圭人的一个商业上的干旱时期。“寂静的、湮没无闻的广阔边界，把他们和西班牙隔开了，如果在巴拉圭不知道欧洲大事的话，那么，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对那些失踪于不知名的瓜拉尼森林中的白人的命运就知道的更少了。多多少少他们被想象在一个富饶的金银国里过着自在的生活”。无怪乎在1542年卡维萨·德·巴卡受到欢迎！但是隔离的状况依然是持久的，与此同时，瓜拉尼人和西班牙人学会了在一起生活，并用土产和欧洲的骗钱货进行物物交换。1556年，两只双桅船，“托多斯·劳斯·桑托斯号”和“圣马科斯号”，带来了更加需要的供应品。当这两只小船在5月里顺流而下的时候，带了很多巴拉圭产品转运到西班牙去，这是这一殖民地的第一次对外出口。路程远，航运成本高以及海上风险，使这种贸易未

能发展起来。1579年，这个殖民地取得许可证和从加的斯和塞维利亚来的船只直接进行钢、铁，衣服和其他产品的贸易；1580年胡安·德·加赖重建布宜诺斯艾利斯也多少促进了这一贸易。一个新纪元似乎开始了。

西班牙所犯的愚蠢的错误和美洲各殖民地之间的妒嫉，破坏了巴拉圭的贸易。苛捐杂税挫伤了发展贸易的努力；指定以圣非为巴拉圭的唯一出口点，绞杀了亚松森的出口行业。一个抗议接着一个抗议，甚至在领航员们指出只有沿巴拉那河的一条浅水支流上行数里格才能到达圣非的情况后，这些抗议都没有得到理睬。有时西班牙也放宽禁令，如在1621年准许有两只船每年各自和巴西进行一百吨货物的交易。甚至当时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会和总督，也对河运贸易加以种种摧残性的限制。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商人，非常抱怨西班牙加给他们的种种障碍；同时，却尽一切可能反转来去阻止其他任何城市繁荣起来。结果，巴拉圭只能和科连特斯、圣非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贸易。从耶尔巴和烟草得到的收益流入巴拉圭的极为有限，大量利润却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其他城市。

这个殖民地运出生皮、棉花、棉布、蜂蜜、糖、蜡、淀粉和木料也未能变得稍稍繁荣一些。1788年到1792年的出口总值估计为三十九万五千一百零八比索，进口总值约为十五万五千九百零三比索，即使扣除了税收和运费后还有贸易顺差。但是这个数目仍然不过是它本应达到的收入的一个小小部分。无怪乎当拿破仑向伊比利亚半岛冒险进军促成西班牙殖民帝国崩溃的危机时，巴拉圭已充分准备好要独立了。

内地贸易利用大河系统，即巴拉圭河、特维夸里河、赫胡伊河及其支流。古老的瓜拉尼的道路也为商业的目的服务。被瓜拉尼人称为塔佩—阿维罗的王家大道，从大西洋岸经过巴西的圣维森特，横过瓜伊拉，进入巴拉圭。这条路有二百多里格长，五呎半宽而且覆盖着耐火草，把这条路标得很清楚。用车运货终于把这条路的大部分给毁坏了。另一条道路，从亚松森横过特维夸里河通到南部。这两条道路，到十八世纪时还利用得很好，当时，车辆和驮子已使巴拉圭的运输有了很大变革。但不管是车辆和驴，从来没有完全取代印第安的搬运工。仍然可以看到，经济上较贫困阶级的赤脚妇

女，头上顶着各式各样的东西，小至瓶子大至箩筐，赤脚的男人则弯着腰，在肩上负着重担。

缺乏纸币或硬币妨碍了经济生活。税收用谷物、豆类、木薯、猪、家禽、棉布和其他产物来交付。为了建立一个物物交换和支付的标准，伊拉拉和王室官员为一些通常的物品规定了任意的价值：钓鱼钩一至五个马拉维迪（一个马拉维迪约等于一美分），一个錾子为十六个马拉维迪，一个楔子为五十个马拉维迪，一个铁砧楔为一百个马拉维迪。铁楔有多种用途，重三个半盎司；铁砧楔重七盎司。为了得到找零头的辅币，把一个楔子分成重半盎司的小块，每块大约值七个马拉维迪。这样，铁就起了金银货币的作用。它的价值随着市场供应而变动，致使投机活动变得非常猖獗。市政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固定一些重要产品的价值作为交易的标准。当巴拉圭人谈到比索时，他们指的是想象中的比索；但是，象真实的比索一样，他们把每一个比索分为八个地方性的小银币雷亚耳。当兑换成白银时，这种想象中的比索仅值两个雷亚耳了。把真实的货币引进巴拉圭来的种种努力都失败了，而每一次请求规定一种较好的通货，都

遭到了西班牙政府的拒绝。在共和国时代的早期，硬币真的进入了这一国家，但却大量地变为首饰之类了。人们习惯于物物交换，而不去磨损那贵重的小玩意儿。

如果不首先知道这个有生气的、友好的、有才能的民族是如何出现的，就不能理解巴拉圭人民。这个民族的基本起源实在很简单。殖民征服者娶印第安女人，不受一夫一妻制标准的妨碍。一个西班牙人满足于有四个印第安女人，仅仅因为他养不了八个，有八个因为他养不了十六个，有十六个——但这已足够了。几乎每一个欧洲人都有五个或六个，许多人有十五个，有些人夸说有二、三十个姘头。

梅斯蒂索人——白人和印第安人所生的子女，从其混血出身中并未失去什么东西。可以举伊拉拉的九个子女为例，可以看出混血对第一或第二代梅斯蒂索人起什么影响。迭戈生于1543年，是马丽亚的儿子。马丽亚是个名叫佩德罗·德·门多萨的一个印第安人酋长的女儿。迭戈是科连特斯的创立者，任副总督和首席法官。希内夫拉是迭戈的妹妹，和佩德罗·德·塞古拉·萨瓦拉结婚。

他们的一个儿子叫胡安·德·伊拉拉，是个队长，当过鲁伊·迪亚斯·德·古斯曼的副官和市长，并且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伊萨维尔是伊拉拉和阿格达生的女儿，曾两次结婚。贡萨洛·德·门多萨是她的第一个丈夫，他们生了埃尔南多·德·门多萨队长，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创建者。伊萨维尔又和她的后一个丈夫——佩德罗·德拉·弗恩特生了佩德罗·乌尔塔多，乌尔塔多成为一个勇敢的队长、探险家、巴拉圭的副总督和拉普拉塔河诸省的总检察官。乌尔苏拉·伊拉拉和阿隆索·里克尔梅·德·古斯曼—庞塞·德·莱昂结婚，荣幸地生了鲁伊·迪亚斯·德·古斯曼。伊拉拉的这位孙子，有着作为殖民者、武士和官员的著名经历，后来约在1612年完成了他的名著《阿根廷》。

这一混血化的过程发展得很快，到1785年，巴拉圭人口的大部分都成为混血种人了。西班牙人定出各种名称以指明混血的不同程度。克里奥尔人（criollo，creole），不是混血种，而是出生在"新大陆"的纯欧洲血统的人。在种族间有三种基本的混血方式：白人和印第安人生出的叫做梅斯蒂索

人（mestizo）；白人和黑人生出的叫做穆拉托人（mulatto）；印第安人和黑人生出的叫做桑博人（zambo）。此后，又可能变成无数的混血种。卡斯蒂索人(castizo)是白人父亲和梅斯蒂索母亲的子女；奥克塔冯人(octavón)是白人父亲和卡斯蒂索母亲的子女；帕丘埃拉人(pachuela)是白人父亲和奥克塔冯母亲的子女。这样，帕丘埃拉就几乎是完全的白人了。对待婚姻关系的确是很淡薄的，淡薄得使有良心的教士简直为普遍的纳妾和乱婚而战栗。一个明显的结果，就是产生伊比利亚—瓜拉尼人，或简言之，巴拉圭人。

梅斯蒂索人，享受一些印第安人所没有的权利。他们不纳贡品，可以做军队的指挥官，创立殖民地，持有监护权，做地方政府的官吏。某些禁令，如不准进入军界等，在巴拉圭没有执行。西班牙立法试图运用授予农民和未成年人的权利，把驯服的印第安人作为臣民加以保护。他们可以经商、立遗嘱、就教士之职、和白种女人结婚；他们必须在公共工程中出劳工，但不能被奴役——在理论上如此。黑人在巴拉圭一直不很多。也许在1600年以前，他们取道巴西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而来。据阿萨

拉报道说，1790年左右，白人和黑人（或穆拉托人）是五与一之比，黑人奴隶与自由黑人之比是一百与一百七十四。虽然黑人奴隶制存在整个殖民地时代，但一直不是一个严重问题。黑种巴拉圭人，除了那些原来就属于经济底层的人以外，只遭受到较少的社会歧视。

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人，被人轻蔑地称为加丘宾人（gachupines）。他们自以为比克里奥尔人和梅斯蒂索人优秀得多。加丘宾人，无论是世俗人或者是教士，在巴拉圭以外的西班牙殖民地里，一般都到处寻求并得到尊敬荣华的职位。他们也在这个殖民地寻求特权。但总的看来，这个殖民地是太民主了，不买他们的账。根据一些作者的看法，克里奥尔人和梅斯蒂索人完全控制了社会、商业和政府；但是我们发现仍有另一些作者认为巴拉圭的出口贸易完全控制在加丘宾人之手。介乎这两种看法之间的判断也许更合乎事实。

除奴隶制外，一般有两种形式的强迫劳动，这对所有的西班牙殖民地都是共同的。“监护制”，即授予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印第安人，或者授予印第安人而土地在外。这种制度，为监护人，即监护权

持有者，提供一批也交纳贡税的劳动者。在巴拉圭这不是一种有利的制度，1803年5月17日敕令取消所有殖民地的监护制后，它就不存在了。“派工制”(repartimiento) 是巴拉圭的一种以六十天为期把印第安人分派给需要劳工的人的制度。这些印第安人只得很少的工资，但不能要求他们到离家二里格以外的地方去劳动。这种形式的“派工制”称为“米达”(mita)，这个克丘亚人用的词，意思是“轮班”，因为这些印第安人是轮班去劳动的。他们来自十一个印第安村镇。“派工制”的另一种形式是“亚纳科纳”或“奥里希纳里奥” (yanacona or originario)，意思是无固定工资的不定期的个人劳役。“亚纳科纳”在巴拉圭于1611年被禁止了。

殖民地的统治集中在西班牙，在君主之下有两个机构行使统治权。印度事务部作为政府的一个机构，尽管有它的一切缺点，但必须把它列为历史上这类机构中的最大的一个。它在1511年正式开始建立时，是一个“洪达”，1524年8月1日被改组为印度最高事务部。它对殖民地的所有军事、政治、民事和刑事方面都拥有几乎绝对的权力。商务部建立于1503年，虽然成立日期较印度事务部还

早，但在理论上却是附属于印度事务部的。在“新大陆”，各个副王是国王的最有权力的代表，但是对于象巴拉圭这样的地区，仅仅是一种名义上的统治。巴拉圭开始受秘鲁副王统辖，1776年后受拉普拉塔副王统辖。远征队司令，如佩德罗·德·门多萨和卡维萨·德·巴卡，在和君主缔约的条件下，成为他们所在地区的事实上的独裁者。巴拉圭后来的总督缺少象过去远征队司令那样的权力，行动自由少了，而且在理论上是隶属于一个副王的。根据1537年9月12日的法令，巴拉圭的殖民者在其总督空缺的情形下，可以选举他们自己的总督。这个特许使这个殖民地实际上成为自治体，这也说明为什么许多作者把它作为一个共和国来看待。后来由于公社派起义，这一特权被取消。

作为地方政府的机构，市政会居第一级。从术语来说，它应该叫做“市政会—市法院—市治安局”(Cabildo, Justicia y Regimiento)。作为市政会，这个市自治体是审议的、执行的和立法的机关；作为市法院，它在初级的司法管辖权中受理和判决民事和刑事案件；作为市治安局，它负责维持公共秩序。当市民各界领袖认定他们的市政会没

有适当地发挥作用时，他们可以召集市政大会(Cabildo abierto)——一个公开的集会，由他们亲自处理问题。这样的集会，总督也可以召集，以决定特别重大的事件，这个惯例使人想起过去一个征服者所召集的战争会议。可是，这样的会议与其说起源于美洲，不如说起源于西班牙。市政会成员的人数变动很大，而且有些官员经常兼职。市政会包括两个常任主席(alcaldes ordinarios)，有点类似于保安官。一个是第一常任主席，在市政会会议上有首先发表意见之权，但是他的权力并不大于他的同僚——第二常任主席。还有几个法官(alcaldes de la hermandad)，他们是掌握刑事案件初审的法官，有时又做警官。王室掌旗官(alférez real)，他做的事不止是在仪仗行列中打打旗帜而已。他保护寡妇和孤儿，帮助监督和计划军事活动，而且参加市政会的表决。各区选出的参政员(regidores)任期二年，没有薪俸，掌管一些上告案件的审理工作。市政会的官员中还包括有一名检察官，一名财产管理员，一名审计员，一名度量衡监督员和一名秘书。

亚松森市政会始于1541年9月，并选出五名参

政员。伊拉拉本可以指定他们，但是他选择了民主的方法。这个机构经过了掌权时期和衰落时期。及至1625年，不到二十人控制了市政会选举，后来拉普拉塔王室法庭命令恢复自由选举。在这一年，迪亚斯·德·古斯曼成为市政会第一常任主席。在以后的年代中，市政会是巴拉圭的积极的保卫者，是与西班牙官僚主义的殖民制度作斗争而失败的勇士，王室官员——司库、征税官和会计员积极维护王室的利益，特别是强征许多税收，害苦了商业、制造业和农业。

决不要为政府的组织形式和种族问题或者经济问题，而使我们看不到巴拉圭全部历史的最伟大的进程——一个混血文化的出现。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许多是以胡安·纳塔利西奥·冈萨雷斯的辉煌著作《巴拉圭文化》为基础的。他写道："当地习俗的优势给殖民地社会的风尚定下了基调。在开始，这种土著习俗的优势，尤其是在私生活方面，几乎是绝对的。随着血统的混杂而来的是习惯和性格的混杂……。衣著、经济结构和工业技术都欧化了；但是大众的信仰、烹饪、农业、家庭、许多药典和医学上的实践依然是瓜拉尼的。"

当第一批梅斯蒂索人成长起来的时候，正处于一个令人惊恐的时代。如果我们相信某个著作家所写的，那么，领着处女到野外过三天是当时人们一种喜爱的娱乐。梅斯蒂索人对谁也不怕。无论是升天国的希望还是下地狱的恐吓，都不能制止他们男女乱交的行为。其理由就在于在一种放荡的母系制下，欧洲的伦理道德是行不通的。当殖民者自己放荡无羁而瓜拉尼的伦理又不认为一个未婚姑娘因爱情而私生孩子是耻辱的情况下，欧洲的伦理怎能制胜呢？十八世纪的作者们赞赏过巴拉圭妇女在家务方面的长处。她们的日子都是在家务劳动中度过，缝纫、织布、莳弄园子、还照看鸭子和孩子。费利克斯·德·阿萨拉认为巴拉圭的社会在拉普拉塔河区域内是最好的，那里很少谋杀和抢劫，很少酗酒和赌博去扰乱勤恳的劳动人民。那里很少有被窃的危险，因而绝大多数的农家都没有门。群众很少参加作礼拜；而是在午睡以后，去串门谈家常、爱情、气候、庄稼、奇事以及对亲人的牢骚，喝仆人送上的马黛茶。亚松森的社会生活要紧张一些，虽然它的样式和在村镇与家庭的差不多。

瓜拉尼人的传说在一个异教成分比基督教成分更多的民族中间依然保持其生命力。混血种人围在林中的营火旁或家庭的炉边，重复着他们的脍炙人口的神话。“亚西·亚特雷管理炎热的中午，庞贝罗管理无星的黑夜，卡阿圭·波拉管理喧闹的森林，而库鲁皮则协助管理不断创造宇宙万物的事务。”庞贝罗是一个小妖精——一个在黑夜里出行的精灵。在萤火虫发出的朦胧的光亮中，人们可以看到他矮小结实的身体。他的手掌和脚掌上的绒毛使它来去无声。不论是四肢着地还是立着，他都能跑得同样轻松，而且跑得比风还快。他同癞蛤蟆、青蛙和蛇很友好，但能使野兽心惊胆战。庞贝罗常从窗台上伸进头来不知羞地偷看人，还爱发出使人听了毛骨悚然的声音吓唬孤独的人。没有人能发现庞贝罗。他是一个腹语者，他的声音来自四面八方，而且能够隐身。激起他的愤怒时，庞贝罗会解开你的马缰，打开畜圈的门，恶作剧没个完。你放一点黑烟草于树洞中，就能博得庞贝罗的欢心，他的鬼把戏也就结束了。保持他愉快，他就会保证你的睡眠或在你夜间出行时保护你。啊！庞贝罗嗜喝烈酒，甚至在今天还可以时时

看到他愉快地醉倒在甘蔗酒桶旁边！

亚西一亚特雷在夜间睡觉，但在万籁俱寂的午睡时间漫步而来。中午最炎热时，辗转反侧不能安睡的人会听到一种神秘的口哨声——那就是亚西一亚特雷，而不是象一些自作聪明的人所断定的一种隐身鸟。这个精灵是太阳热力即瓜拉尼的爱神伊罗斯的人格化，他有一根金魔棒使人看不见他。亚西一亚特雷喜爱漂亮的姑娘。他会诱惑她们到森林中去，和她们一起嬉游，赠给礼物，使她们心满意足。但是常常有这种时候，他情不自禁地去吻他的游伴，而这种亲吻是致命的。

卡阿圭·波拉保护自然界免受人类无限制的破坏。任何人滥用了自然界赐予的物，就会遭到卡阿圭·波拉愤怒的惩罚。这个森林、河流、鸟兽的保护者，真是个女性的精灵，能装作任何模样。只有那些真正热爱大自然的人曾见过这个森林女神的全部妖娆与裸露之美。以杀害或破坏取乐的人会招来她的震怒。纳塔利西奥·冈萨雷斯用诗意的文字描写她道："纵然她的惩罚难饶，卡阿圭·波拉确是一个可爱的精灵，纯洁美丽宛如迪安娜，她和五色缤纷的飞蝶嬉游于林间开垦地上。她拯救

由于一些粗暴的猎人的行为而失去母亲的小动物不致死亡。她保护鸟巢在暴风雨怒涛中不致损坏。她保持哺育着小河的溪流不致干枯。她奔跑，她的长发随风飘扬，散发着睡莲的清香，她的裸露的、飘逸的身躯，就象奇异地物化的灿烂日晖，她奔过时宛如一道白光。多谢她，森林才得以永生，河流才能在创造出来后不断更新它们易逝的财富之水而川流不息。”

这些小神灵一直被传诵于整个殖民地时期，这是瓜拉尼人所认识的自然界力量的人格化。在库鲁苏·耶瓜收获节里，可以看到感恩的人们对库鲁皮的敬意，他是庄稼和丰收的守护神。当然，在节日里有一些特别是起源于欧洲人的群众性的运动比赛和精彩表演，是与瓜拉尼的神话无关的。所有的社会阶级都参加宗教仪式，观看斗牛（一直到后来由于缺乏这种好斗的动物时，这种表演才停止），或者看穿环奔马。这种运动在殖民地很普遍，它是由一个骑士乘马全速飞奔，用他的长矛尖头穿过吊挂在木架上的一个小环。那里也有“摩尔人和基督徒”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敌对双方骑在马上用长矛比武。摩尔人总是失利。在传教区，这一

娱乐性游戏中，敌对的双方是马梅卢科人和瓜拉尼人。

巴拉圭人，无论是加丘宾人、克里奥尔人、梅斯蒂索人或者是印第安人，都有受初级教育的权利。伊拉拉创建了第一批学校，虽然是不完备的，缺少教职员，但他们仍然力图教给学生读写算三种基本技能。任何一种制度无论称它什么，能够培育出象鲁伊·迪亚斯·德·古斯曼这样的作家，就值得几分尊重。亚松森市政会不时地鼓励教育的发展，还通过授予公共土地的办法使耶稣会神学院得以在1610年开办起来。在此之前，也有世俗的或教会的私人教师。弗朗西斯科·德·萨尔迪瓦尔神甫曾于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在这里教过书。1603年，主教马丁·伊格纳西奥·德·洛约拉开办一所修道院和孤儿院，收容被遗弃的或无父母的女孩子，入院者在从事其他指定的工作外，学习保育和看护。耶稣会为男孩子办的学校对殖民地巴拉圭贡献很多。市政会鼓励有文化的公民做教师。1630年，胡安·多明格斯·德拉·科斯塔曾教学生读书写字，每个学生收四个比索的学费，用实物交纳。亚松森的卡罗利诺学院，于1776年批

准创办，1780 年开学时定名为圣卡洛斯王家学院与神学院，由安东尼奥·巴埃斯任院长。有些作者认为，到1800年很难找出一个不识字的巴拉圭人。这种说法严肃有余，真实不足。

殖民地巴拉圭人写出了有永久价值的散文和诗篇，然而他们的许多作品甚少被人知道。许多歌曲和民歌，其中有一些类似墨西哥的“科里多”①，是由一些将永远不知他们姓名的作者作的。自然，第一批文学家是殖民者。佩罗·埃尔南德斯是《卡维萨·德·巴卡传记》的作者，他为抬高其首领的身价而写出的这篇散文，很简洁有力。乌尔里克·施米特，出生于施特劳宾，1554年之前就写成了《拉普拉塔河旅行记》，这是在巴拉圭写成的第一本书，至少施米特自已是这样声称的，虽然全书象是他离开巴拉圭后在德国写的。路易斯·德·博拉尼奥斯神甫是圣徒式的法兰西斯教派传教士，用瓜拉尼语写了第一本教义问答。马丁·德尔·巴尔科·森特内拉神甫在不同的时期写出了《阿根

① 科里多(corrido)：墨西哥人用吉他琴伴奏的一种民歌。——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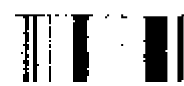
廷》一书，于1602年在里斯本出版。这首诗结构混乱已极，象一个来回乱窜的水虱一样，但是不管这些明显的错误，它还是有趣的、使人增加知识的。鲁伊·迪亚斯·德·古斯曼是伊拉拉的最著名的后裔，于1612年完成了他的著作《阿根廷》，这是一部获得高度评价的叙事诗。它由佩德罗·德·安赫利斯在1835年首次出版，后来一共出了五版。费利克斯·德·阿萨拉，不幸他不能算作巴拉圭人，但是这个西班牙军人、地理学家、博物学家和历史学家完成一项伟大的工作，写了六部重要书籍。他的《巴拉圭与拉普拉塔河历史记述》是学习巴拉圭历史必不可少的读物。

两个巴拉圭本地人出国后，由于他们的博学，在海外赢得了名声。有这样成就的人决不止他们两个。但是卡涅特和塔拉维拉的经历值得一提。佩德罗·维森特·卡涅特，1749年生于亚松森，早期到科尔多瓦受教育，在智利完成他的大学教育。他学习了法律、政治和历史，1781年返回亚松森前，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任过官职。三年后，他曾在波托西做过行政区的一位主要官员。他关于政府和帝国组织的观点使他同情极端保守主义者，他在

保守主义者排他性的社会圈子里得心应手。1803年，卡涅特转到丘基萨卡，曾在王室法庭中主持政务工作。因为他的伟大才能奉献给了王室事业，他在历史、法律和政治方面的广博著作未曾得到恰当的承认；但是卡涅特是殖民地巴拉圭一个最有才华的人。另一个效忠于王室事业的巴拉圭人是曼努埃尔·安东尼奥·塔拉维拉，他的父亲是加丘宾人，母亲是克里奥尔人。1761年，曼努埃尔生于维利亚里卡，在科尔多瓦的圣母玛丽亚·德·蒙塞拉特学院学习，象卡涅特一样结业于智利。除了在早期革命运动中被流放一个短时期外，塔拉维拉一直住在智利到1814年去世。他作为一个作家，主要由于《智利的革命》一书，为人们铭记于心。

巴拉圭没有出现过能够与修女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相比的诗人，也未出现过象胡安·鲁伊斯·德·阿拉尔孔那样的剧作家。经过近三个世纪的殖民地生活，很难找到几个伟大的文学家，这是因为除了极个别的以外，梅斯蒂索人没有将其才能致力于文化活动。利马、墨西哥、圣地亚哥和其他城市吸引了很多的欧洲人，他们把

西班牙的丰富的文化带到"新大陆"。巴拉圭仍是遥远的前哨，这种文化只是偶然地闪耀到那里，正如远处暴风雨云层中反射出的微弱闪电一样。



第十章

共和国万岁!

在西方世界的旧秩序正遭自由主义和拿破仑破坏的时代，西班牙帝国却因殖民地效忠王室和缺乏统一的革命力量，而得以维系在一起。但当法国皇帝强迫西班牙可鄙的王室向约瑟夫·波拿巴特交出它从古以来的权力时[①]，提供了一个条件，使西属印度成了起义和内战的伟大舞台。早在这时以前，亚松森就曾发出过这样的警告。

巴拉圭的一般情况，已由阿古斯丁·费尔南多·德·皮内多总督于1777年1月给国王的报告中叙述过了。他写道，监护人一度表现得很好，但

---

① 1808年法国皇帝拿破仑侵入西班牙，西班牙国内又爆发起义，国王查理四世被迫让位给他的儿子斐迪南。拿破仑攻入马德里后囚禁了西班牙王室全家，并宣布其兄约瑟夫·波拿巴特为西班牙国王。同年，爆发西班牙人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普遍起义，在殖民地也造成一种纷纷起义的新政治局面。——译者

他们的后继者为贪婪心所驱使，已变成不服王命的霸主了。他们把保卫巴拉圭抵御印第安人袭击的义务推给他人。在亚松森有市民五千七百五十人，其中二千七百五十人从事农业、航运业或耶尔巴的生产。每一农民每月必须从事八天的军事义务，战时还须自己装备起来去服兵役。这种负担使巴拉圭持续贫困。河运贸易、农业和耶尔巴加工是主要行业，而农业占可怜的第三位。货币的缺乏妨碍了贸易，商业凋敝，农民没有生产工具。玉米、木薯和水果是为国内消费而生产的；烟叶、蜂蜜和糖则向外出口。耶尔巴贸易每年需要一百万阿罗瓦，但仅仅能生产出这一需要量的五分之一。从亚松森到最后的消费者，到处都要征税，赚取利润。一个阿罗瓦的耶尔巴在亚松森仅值两个雷亚耳[①]，到利马就卖三十个比索。改革是必需的，如建立常备的国民军、废除“监护制”、准许恢复烟叶加工业以及加强对葡萄牙入侵者的抵抗力量。皮内多的请求无人听取，随着帝国的崩溃而被忘却了。也许查理三世相信，1776年8月部分地为阻挡葡萄牙

① 一雷亚耳等于零点二八比索。——译者

进一步侵略而建立起来的拉普拉塔新副王管区，能使巴拉圭复兴。此后，不到四十年，这一副王管区中的起义，解除了西班牙对这一地区的全部责任，这个地区在潜力上比整个伊比利西半岛任何时候要富饶得多。

在西班牙王室还来得及采取一些措施的时候，却对海外拉普拉塔副王管区内的独立精神，不是忽视了，就是一无所知。巴拉圭人在亚松森市政会的领导下多次显露过锋芒。他们曾对坏总督造反过，也对耶稣会教士造反过。他们曾为西班牙国王赢得和保卫了一片广大的地区。他们在周围环境的适当配合下，可以拒绝匍伏在几次三番踢开他们的君主的脚下。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克里奥尔人的领袖，曾两次抗击英国军队取得了胜利，他们不愿接受假托斐迪南七世的名义进行统治的西班牙摄政者的指令。1810年5月25日，市政会推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副王，但是外边的省份，如巴拉圭、玻利维亚、乌拉圭、甚至阿根廷的一些地方城市都拒绝由布港人，即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来掌握他们的命运。科尔多瓦派遣曾在1806年打败过英国人的圣地亚

哥·林尼尔斯将军，去抵抗来讨伐这个城市的一支布港人军队。林尼尔斯遭到惨败，胜利的布港人把他和其他几个罪犯一道枪决了。这些行动为阿根廷保住了科尔多瓦，但其他省份，如巴拉圭、乌拉圭和玻利维亚则永远丢失了。

在阿根廷著名的"五月二十五日"①的六年前，预示暴风雨的雷声在巴拉圭已有所闻。总督的宠臣们变得如此贪婪，而他们的掠夺又如此公开，终使心怀不满的克里奥尔人策划叛乱。一位地方上有名望的律师何塞·加斯帕尔·罗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亚没有这样做，而给副王提出备忘录，结果，米西奥内斯的总督唐·贝尔纳多·德·贝拉斯科被提升到亚松森作全权总督。次年，即1807年，副王林尼尔斯任命佩德罗·索梅列拉博士为临时顾问。索梅列拉是科尔多瓦大学法律系毕业生，这位年轻的秘书和弗朗西亚结下了友谊，把他带入政界，从1807到1809年，经过一系列任命，担

① 1810年5月25日，当法国拿破仑的军队席卷西班牙不久，布宜诺斯艾利斯人集会要求市政会任命由土生白人成立的临时"洪达"（指挥起义的委员会），自此时起开始独立斗争，至1816年7月9日，阿根廷宣布独立。——译者

任过各种官职。1809年，他的经历达到最高点，亚松森市政会选举弗朗西亚代表巴拉圭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时，那里正要抽签选送参加新成立的西班牙议会的代表。由于弗朗西亚为取得委任书谎报了有关其父母的材料，一个政敌揭发了他。弗朗西亚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之行未成。

王室军队旅长、传教区印第安部队总司令贝尔纳多·德·贝拉斯科—维多夫罗将军是巴拉圭的第六十任即最后一任总督。1806年他就职时，那种使西班牙在南美洲权力的最后痕迹终于在二十年后消除的形势，已开始发展。1807年贝拉斯科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抵抗过英国人，他是林尼尔斯的朋友，而不是革命的布港暴民和急进派的朋友。

要不是由于贝拉斯科总督的前任的秘书，一个叫何塞·埃斯皮诺拉—培尼亚的人搞政治诈骗，巴拉圭本来可以在1810年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合并，阿根廷可能就成为一个更大的国家，而三国同盟之战也可能就不会发生了。1810年6月，布宜诺斯艾利斯“洪达”派遣埃斯皮诺拉和唐·路易斯·马凯斯到亚松森，敦促巴拉圭接受这个港口城市的领导。据说埃斯皮诺拉也带有要推翻贝拉斯

科的指令。索梅列拉这个布港人，赞成这一计划，而弗朗西亚反对这一计划，隐退到他的田园——省城附近的一个简陋的茅屋中。然而，埃斯皮诺拉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在报告中说巴拉圭愿意行动，愿意一致行动反对保皇派。这一报告只有部分的真实性，即亚松森的克里奥尔人确是想要行动，但是他们并不想要由可恨的布港人来控制的那种行动。

贝拉斯科十分懂得，无论他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结果都可能要掉脑袋，因此，就和市政会进行商议。那个可尊敬的机构，立即以漂亮的民主姿态把问题交给市政大会讨论，这是一个各界领袖参加的会议。这个至少有二百人的团体于1810年7月24日开会决定，仍然忠于西班牙摄政者，和起义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保持友好联系，但不承认它的权威，同时设立一军事委员会以保卫本省。贝拉斯科愉快地接受了军事委员会的建议，他为六千人的军队筹集军火，封锁港口，切断了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交通，在巴拉圭河口驻了战舰，并派遣民团去保卫巴拉那河边疆。布宜诺斯艾利斯接受了这一挑战，但未能正确估量到巴拉圭人的情绪。布港

人的“洪达”宣布某些坏人曾阴谋在巴拉圭撒下祸害的种子。于是在1810年9月27日，派唐·胡安·弗朗西斯科·阿圭罗这个侨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亚松森人，作为代表通知巴拉圭人应该知道这个港口城市的局势，并且警告他们不要再寻求独立的道路。即使阿圭罗到达巴拉圭的话，他也不会成功。布宜诺斯艾利斯后来试图武力解决。

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将军很快发现，爱好安逸的巴拉圭人会为保卫自己的土地而战。在干练的领导下，一支七千人的军队本来可以占领巴拉圭的；但是贝尔格拉诺不是一个专门的军人，何况他于1810年晚些时候从陆路经过传教区进军到坎德拉里亚时，仅有七百名士兵。他跨过巴拉那河进军到离亚松森仅有四十五哩的巴拉瓜里，在那里大约不下五千名巴拉圭人于1811年1月狠狠地打败了他。贝尔格拉诺于是撤过特维夸里河，在3月9日又被打败，就请求停战了。在实现停战时，这位阿根廷将军“得到机会在巴拉圭人中播下某种独立自由思想的种子，它不久就发芽了”。他是得到了机会，但是否需要他去播下这些思想种子，却是值得怀疑的。走向独立的意识形态方面的

动力，来自法国的让·雅克·卢梭[1]以及他的法兰西自由主义的同仁，而不是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远在贝尔格拉诺出现以前，弗朗西亚已经吸收了革命的思想，同时，别的许多人也赞同独立，而当时布港人正为斐迪南七世把嗓子都喊哑了。是贝尔格拉诺的侵略，而不是他的思想，促进了在巴拉圭的公开起义。

1811年3月28日，亚松森的最显赫的“市政会—市法院—市治安局”的先生们召开会议，研究形势。这次会议决定派一位特使到蒙得维的亚，去向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埃利奥副王汇报巴拉圭的情况。5月13日，市政会又召集会议考虑巴西人提出愿意帮助贝拉斯科总督击退阿根廷侵略的问题。5月9日，何塞·德·阿夫雷乌中尉作为迭戈·德·索萨总指挥官的特使到达。弗朗西亚博士和其他人怀疑贝拉斯科将军和阿夫雷乌在进行密谋。不管事实怎样，这是使总督开始失去权力

① 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72—1778）：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著有《社会契约说》（或译《民约论》）等政治哲学著作。——译者

的一个好借口。由弗朗西亚策划，佩德罗·胡安·卡瓦列罗上尉在5月14日“发表宣告”；第二天他又送一份最后通牒给贝拉斯科，指责他阴谋使巴拉圭投降葡萄牙人。贝拉斯科立即回答道：“我希望守卫部队会有机会自己打消关于我曾梦想将这一省份送给一个外国政府的想法。”由于没有效忠的军队可以倚靠，这位总督不得不接受两个“副手”和他一起供职组成临时政府，这两个人就是弗朗西亚和胡安·巴列里亚诺·塞瓦略斯上尉。

在保证这次起义上，贝拉斯科做了什么呢？他曾经欢迎过阿夫雷乌。这座城市也欢迎过。在这位巴西使者到达雷科雷塔河后，至少有三千名男女列队来到贝拉斯科住所。经过两小时谈判，贝拉斯科向阿夫雷乌保证，他承认只有唐尼亚·卡尔洛塔这个葡萄牙摄政华奥的妻子是这些西班牙殖民地的统治者。确实，这是背叛，因为市政会承认的是斐迪南七世的统治。5月10日，贝拉斯科曾建议应以二百名葡萄牙骑兵驻扎在巴拉那河以南保护巴拉圭；5月11日他召集了市政会和加西亚·帕内斯主教，使他的要求合法化。甚至，在伊塔普阿的富尔亨西奥·耶格罗斯中校也须在迭戈·德·

索萨的统率之下。市政会、主教和总督忙了三天的时间，准备送交巴西的公文；而阿夫雷乌则忙于“各界领袖人物所安排的殷勤招待和数不清的拜访，事先给他的赠礼和盛大舞会……以庆贺葡萄牙人和巴拉圭人的联盟”。就是这些行为促使了弗朗西亚策划5月14日起义。

既然贝拉斯科有了两个副手，给索萨的回答就和他原来计划的回答很不相同了。巴拉圭要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保持良好的关系，也欣然接受巴西给予的尽可能快的军事供应的援助。索萨答复他愿意送来这些供应品，但是必须王室批准才行；同时，如果巴拉圭人恢复贝拉斯科的权力和承认卡尔洛塔作为西班牙领地的最终继承人的话，将会有更多的帮助。但起义者建立的临时“洪达”没有让贝拉斯科复位，而于5月16日永远废黜了他。

弗朗西亚的革命已经成功了，但是他自己的权力依然有待于进一步巩固。1811年6月18日在亚松森召开省议会（provincial congress）或称大“洪达”(general junta)，由弗朗西亚和塞瓦略斯主持。弗朗西亚起草并发表了重要演说。他说，没有必要详述我们的苦难。我们曾经“被傲慢和专制的

统治者所侮辱、压迫、贬低，还被作为蔑视的对象。这种暴政现已达到这种程度，它要勒紧我们身上的锁链，出卖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命运甚至于我们的人身，就象人们卖掉一群牲口、一块庄田、一件家具那样，既不顾这一伟大人民的尊严和权利，也不顾人们的迫切的呼声：悲惨的巴拉圭人遭受了三个世纪左右的苦难，已经忍无可忍了……这些压迫和专制的不幸时期终于结束了。我们曾生活过的黑夜已经过去了，一个光辉的黎明开始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出现。巴拉圭省从奴役的昏睡中抬起头来，已经认识并要求它的权利，现已完全自由了……这是我们的爱国部队和参加了5月14日可喜的革命的英勇的公民的唯一目标。5月14日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它将标志着我们省历史上最有意义的新纪元……上帝明显地爱护我们事业的正义"。弗朗西亚在讲述了一些法国自由主义之后继续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组成一个政府，确定我们的对外关系，决定我们以前的统治者的命运。

议会行动迅速而且协调一致，这在巴拉圭是再也找不到的了。6月19日，马里亚诺·安东尼

奥·莫拉斯提出几个议案：贝拉斯科被废黜；代替他的是五人“洪达”，辅以一名秘书。富尔亨西奥·耶格罗斯中校被提名为洪达的主席和总司令，他的副手是：弗朗西亚、佩德罗·胡安·卡瓦列罗、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博加林和费尔南多·德拉·莫拉。至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那个殖民地在巴拉圭是没有它的权威的。商业上的种种禁令一扫而光。弗朗西亚作为巴拉圭的代表参加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总议会。政府所有成员宣誓，除了斐迪南七世以外不承认任何君王。这些决议和其他议案在 6 月22日变成了巴拉圭的临时宪法。新政府在 6 月23日开始行使职权。一个由两名市政会主席和七名市参政员组成的新市政会统治了这座城市。

唐·富尔亨西奥·耶格罗斯，“洪达”的主席，摆出很华贵的样子，当他骑在他的英国座鞍之上经过亚松森时，华丽的肩章加宽了他的双肩。但这种扮相并不能掩饰他那根深蒂固、无可救药的无知，只是由于他的勇敢、灵活、好心眼才得到补救。唐·佩德罗·胡安·卡瓦列罗象耶格罗斯一样也是打败贝尔格拉诺的一个英雄，但没有什么更多

可取之处。唐·费尔南多·德拉·莫拉和弗朗西亚挑起了担子,组织政府,同时对狡猾的布港人周旋得很成功。

"洪达"希望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立友好关系或者最终联盟,1811年7月20日送了一个紧急公文到这个过去的副王辖区的首府。巴拉圭要派一个代表到总议会去,但是,同时又要保持独立。布宜诺斯艾利斯派贝尔格拉诺将军和维森特·安纳斯塔西奥·埃切维里亚博士作为特使和巴拉圭进行某些实际工作的安排。当这些布港人在途中时,亚松森的军队方面的势力使"洪达"在9月2日放逐了博加林博士。弗朗西亚以辞职抗议这一行动。留下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打交道,于是卡瓦列罗请求弗朗西亚从他在伊维赖的茅屋返回"洪达"。这位不可缺少的博士慨然接受了这一要求。三天后,9月9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特使从科连特斯写信来要求准予继续前来。弗朗西亚答复说,倘若布宜诺斯艾利斯承认巴拉圭的独立,他们会受到欢迎。当贝尔格拉诺和埃切维里亚在途中时,欧洲出生的西班牙人由佩德罗·索梅列拉和佩德罗·维森特·坎德维利亚领导,试图发

动一次反革命。9月16日，这次图谋的政变失败了。这并非象有些作者所断言的，是弗朗西亚策划的“马基雅弗利”[1] 诡计，以便作为开始恐怖统治的一个借口。扑灭了这次图谋，同布港人的会谈进行得很顺利。1811年10月 12 日，巴拉圭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签订了一项条约，排除了商业上的许多旧障碍，并在口头上支持联邦和联盟的理想。12月，弗朗西亚又退出“洪达”，在野到1812年11月再次被请出来接待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特使。

J·P·罗伯逊是一个想发财致富的年轻苏格兰人，1812年在弗朗西亚向“洪达”辞职后不久来到巴拉圭。他是很干练的，这从他和费尔南多·德拉·莫拉的友好关系中，以及后来同样和弗朗西亚的友好关系中可以看出来。为什么一个人竟然愿意在那动乱、搞阴谋和不安全的年代去访问巴拉圭，这个谜只有把这鲁莽行动归诸于冒险精神才能得到解释。1806年，罗伯逊曾到过蒙得维的亚，在那里看到英国人以突然袭击占据了这座城市。他不是到南美洲寻找好运气的第一个十九

① 马基雅弗利 (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意大利十六世纪的政治家和著述家，主张搞权术。——译者

世纪的英国人，但是或许他是生活在巴拉圭的第一个英国人。

罗伯逊乘马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亚松森的经历，使人相信巴拉圭从国内不和而来的危险比从国外征服而来的危险大得多。人们可以循河上溯，经过一个大约三个月的长期艰苦旅行后到达这个城市。旅行者也可以骑马顺着小道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西跨平原，然后沿着巴拉那河的右岸到圣非，在那里横跨巴拉那河再继续沿着左岸到达科连特斯，这一静静的阿根廷城市正好在巴拉那河和巴拉圭河汇流处的下面。这个旅程甚至跃马飞奔（罗伯逊保持每小时至少走十二哩的速度）也是缓慢而不舒畅的。离开潘帕斯草原上的驿站以后，来到人烟稀少的乡村，那里有大群的马、牛、羊放牧在开阔的牧场上，这时旅行者就完全靠那里的善良居民的接待了。驿站，照实说不很舒适；人们可以吃肉——带皮的肉，喝马黛茶，吸雪茄烟，在这些落脚站换马。但是那简陋的茅草屋顶、篱笆墙小屋远远不及客店了。如不急于赶路的话，旅行中可以乘坐大轮子的、用皮带吊起高棚的马车。这种车子可以用作卧车、旅店和餐室。

通过草原、沼泽和森林只有小道而没有大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圣非之间的小道上有深的泥坑，马匹和驾车人要费极大的力气才不至于使沉重的车辆深陷泥淖之中。在巴拉圭共和国第一年，西班牙海军舰只巡逻在巴拉那河上，力图切断航运。1812年和1813年，这些海军巡弋在圣非附近，截捕企图在这里过河的任何船只，威胁河流一带居留地，一直到何塞·德·圣马丁[1]上校带领一百名骑兵，在罗萨里奥上面三十哩左右的圣卡洛斯修道院战役中打败这支人数比他多两倍的海军时才终止。

离开科连特斯的单调的平原，平安地跨过巴拉那河时，旅行者就进入一个新的、富庶的国家。沿着小道有棕榈林、柠檬与柑子园以及无花果树。松鼠在缠挂着芳香的花草的树枝上嗑牙，到处是羽毛绚丽、歌声婉转的小鸟，水鸟漂浮在一个个小

① 何塞·德·圣马丁(Jose de San Martín,1778—1850)：阿根廷军人，曾在西班牙参加过反拿破仑的战争。后在南美组织过安第斯部队，1817年越过安第斯山攻入智利，1820年又从海路攻入秘鲁，打败了西班牙人，被称为“南方解放者”。1821年曾任秘鲁“护国公”。1822年辞职，1850年死于法国。——译者

湖上。在恩特雷里奥斯省是小土屋，到这里是低矮散居的农舍。农舍座落在烟草、棉花、木薯、甜瓜的小块园田里，他们的白色粉墙和一片碧绿的草木相映成辉。

居住在这样一些小村庄的人们，对少数闯入这地方的旅行者来说是慷慨的主人。这地方的人大都是梅斯蒂索人，讲起西班牙语来有些结结巴巴，而爱用瓜拉尼语。这种能讲两种语言的素养使巴拉圭人相互谈话时，可以不让任何在场的外国人听懂他们的意思。在乡村地区，有高十五呎的平台用作卧室的台子。由于一些特殊的理由，那些到处都有的、什么都咬的蚊虫很少打扰睡在这么高处的人。

通亚松森有几条陆道要穿过高坝形成的狭路，那些堤坝是为了防御印第安人的袭击而筑起来的。顺着这些狭路，乡下人一大早就带着他们的货物来到市场。罗伯逊在1812年看到在这些路上拥挤着瓜拉尼人和梅斯蒂索人的商贩，有步行的，有骑着或牵着小驴的，也有偶尔坐在两轮车上费劲地挤着前进。“那些窈窕轻装的妇女，有着丰满的胸部，圆匀的双臂，小巧的手，纤小的脚，穿着短

裙、绣花衬衫。梳成辫子的头发，一双黑色的眼睛，勤劳地干她自己的活，头上或者顶着一壶水、一捆烟叶、一包食盐或者是一包丝兰根，看起来胜过一幅图画”。大概过了一个世纪，这种景象也变化不大。道路宽了点，脚也许大了点，小驴更多了些，可能还有鸣着喇叭的卡车夺路而来。在妇女们的头上顶着五加仑的方桶，但是她们依然赤着脚，而极受这位英国商人赞美的黑发，现在却缭绕着短黑雪茄喷出的烟雾了。

1811年贝拉斯科被推翻时，全巴拉圭的首府亚松森还不是个堂皇的大都会。总督府是一所零乱的平房建筑，可以称得上坚实的私人住房还不到十二家。许多房屋都是用长条的砖抹上褐色的粗泥灰砌起来的，外面涂以白色或橙红色。这个城市的一万居民中的大多数都住在茅屋或他们的店铺的下房里。大广场中的市场是商业中心。在这里，农民们，大部分是妇女，一大早就来卖烟叶、蜂蜜、木薯、棉花、谷物、鲜花、糖果、盐、甜瓜、柑子、小鸡、鸡蛋、大蒜、甘蔗酒、牛肉、干草、鱼以及少量的装饰品。苍蝇嗡嗡地麇集在嗡嗡地讨价还价的妇女周围。年迈的派·姆巴图这个神圣权力的觋

觎者，使卖主减价卖给他日用必需品，完全忘却了亚松森的政治。

读巴拉圭从1810到1840年的历史，“你会看到独裁者弗朗西亚摧残了世界上一个最美好的国家的活力。你会看到他的专制的意志变更、废除和破坏了所有的有益的法律；你会看到他冷酷地眉头一皱，就把他那些给恐怖吓得瘫软的同胞的牢骚话怔住，不仅是牢骚话，连思想也给怔住了”。罗伯逊的判断也许有些苛刻，但是它基本上是真实的。弗朗西亚在服装和表情方面都是严肃的。在寒冷季节里，他的黑色衣服配一顶深红色帽子。他的“面容黝暗，一双黑眼炯炯有神，漆黑的头发从凸出的前额向后梳，自然地卷曲下垂，一直披到双肩，使他有一种令人敬畏的样子”。他和耶格罗斯争吵后，在亚松森附近自己的乡下房子里隐居，同时策划一个能使他成为国家主宰者的政变。他的私人图书室收藏了二百五十到三百卷关于几何学、法律学、科学和文学的著作，足以使他赢得学识精深的声望。

在建立任何政府时所不可避免的一些错误，给弗朗西亚以反对“洪达”的论据。他的最尖锐的

武器之一，就是谴责费尔南多·德拉·莫拉和格雷戈里奥·德拉·塞尔达在计划把国家出卖给布港人。他能利用巴拉圭人对公社派起义的记忆，利用他们击败贝尔格拉诺的业绩，绘出一幅未来的巴拉圭作为独立国家的生动画面。用这些手段，他制造了许多不满，使这两个卖国嫌疑者只得辞去职务。

1812年晚些时候，弗朗西亚回到"洪达"时，这个国家到处接近于无政府状态。成帮的带枪的人和单个的为非作歹之徒使和平的市民生活极为痛苦。J·R·朗惹博士于1819年到达巴拉圭，他认为耶格罗斯及其同僚要对下述情况负责："在他们的实践中，下狱就是统治，定罪或释放依个人好恶而定，这就是他们审判的方式。他们既不尊重旧法律，也不补充新法律。在公共事务中允许女人起最大的影响，除了通过她们的干预外，什么也得不到，这就使国家陷入全面的混乱状态。在爱国心的名义下，所有这类暴行因不受惩罚而加深。军队，由社会的渣滓所组成，他们窃取了侮辱其他居民的权利，当市民胆敢对一个士兵不脱帽致敬时，就会遭到不可免的毒打。军官们甚至去干预民事纠

纷，并自充审判官；由于他们都是当权者的亲戚，可以犯最可恶的罪行而逍遥法外。”

弗朗西亚改组了政府，更换了许多不称职的官员。并且以非凡的魄力惩办了不法之徒。在他返回“洪达”后的当月，一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特使唐·尼古拉斯·埃雷拉，前来修订商业和友好条约。埃雷拉和“洪达”商谈，但很快认识到他是不受欢迎的人。于是他的使命，正象西班牙人所说的“塞弗拉卡索”，即自我失败了。弗朗西亚在看到耶格罗斯和卡瓦列罗对付本国人和外国人的态度后，对他们只有蔑视。他们简单而糊涂的头脑不能如实抓住事情的实质，而且对政府管理一无所知。他认定巴拉圭必须有一个铁腕人物引着它摇摇晃晃的步子前进。1813年9月，“洪达”召开议会，在代表们将要到达时，弗朗西亚在军官和平民中赢得了拥护者。当三个界限不明的集团争辩他们的观点时，有过一场轻微的政治风波。在亚松森，弗朗西亚虽然只有不多的追随者，但许多有势力的市民都认识到，他不取得全部权力是不会罢休的。

10月，杂乱的议会最后在全体出席开会时，包括了所有阶级的代表，其中有印第安人市镇的首

脑穿着奇装异服出现——卷边帽和系丝带的假发、带银钮扣的天鹅绒马裤、绣花衬裤和红腰带。这次会期不长。否决一项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条约有两三天就足够了。10月15日在弗朗西亚的指示下，代表们选举了由弗朗西亚和耶格罗斯组成的执政府。每一执政官每次供职四个月。这里用得着重复一个古老的故事：说有两把为执政官而设的交椅，一把标着"庞贝"，另一把标着"恺撒"[①]。弗朗西亚坐的是后一把椅子。

耶格罗斯和杰出的、果断的弗朗西亚在一起就显得黯然失色，他在执政府中实际上是没有权力的。他的对手无视他或瞒住他，建立了一支禁卫队，并用权力竭力煽起平民对耶格罗斯所代表的少数上层阶级的敌对情绪。在执政府成立伊始，耶格罗斯曾提出一个方案，规定每一执政官都应是军队的准将，每人都应完全一样地分掌一半军队、一半武器和军用品。弗朗西亚拒绝签署这一方案，但是愿意让人们称耶格罗斯为将军。还有在挑选国务秘书时，弗朗西亚下令任命唐·塞瓦斯蒂安·

① 庞贝和恺撒都是古罗马的将军，后者成为罗马的独裁者、皇帝。——译者

萨恩斯，他是弗朗西亚的一个亲信。是弗朗西亚改组了军队，是弗朗西亚改革了财政制度。也是弗朗西亚设立了边疆哨所，他可以把对他有不忠之嫌的军官派到那里去。在一个问题上，两个执政官是完全一致的，即不参与巴西人扑灭何塞·赫瓦西奥·阿提加斯的计划，这个乌拉圭的高卓人威胁着巴西南部的南里约格朗德省。这一决定不过是弗朗西亚所珍视的闭关自守政策的继续而已。

弗朗西亚对谣传他偏袒加丘宾人的问题处之泰然。1814年3月，耶格罗斯同意他宣告加丘宾人不准与白人结婚。弗朗西亚憎恨“高尚的无赖”——耶稣会教士，这也是无可怀疑的。他认为他们的传教区不过是由吃不饱的印第安奴隶为耶稣会的利益而劳动的大种植园。虽然把耶稣会教士赶走，给传教区地方带来灾难，但他相信对整个巴拉圭是有利的。在这方面，他流露了典型的克里奥尔人对“黑袍神甫”的态度，而且他的责难是相当公正的。耶稣会教士的确独占地控制很大数量的印第安人近一百五十年之久，但是在其统治结束时，皈依者却很少或者没有向自治方面进展一步。在耶稣会教士的眼中，他们总是孩子们，或者是精神

上的奴隶。弗朗西亚要证明，就是自由白人也不能把自己管理得好些。

作为弗朗西亚统治后期特征的特务系统，早在执政官任期期满以前就已经出现。没有人知道谁是弗朗西亚的特务，但敏锐的公民注意那些讲话特别偏袒他的人，可以很好地猜出来。马黛茶的检查员奥雷戈，是一家酒馆的老板，从事于这一活动。他的快活的、天真的友好表情，他对所有抱怨执政官的人的同情，都能使他很好为主子服务。奥雷戈及其不知名的同伙特务，在弗朗西亚成为元首前，忠实地为这个主要执政官效劳。

依照1813年的授权，执政府必须于来年召集议会决定政府的未来施政方针。结果，一群无知的、恭顺的代表一千人于1814年10月拥入亚松森。他们大多数狂醉地效忠于弗朗西亚，他已变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弗朗西亚提出代表名单，市政委员会仅仅是通过而已。召集来的代表，或者必须赞成主子的议案，或者由于触怒他而受害。在代表中间也有敌对者。但是，大多数代表是贫苦人民，对他们来说，弗朗西亚的形象几乎就是上帝，而且比上帝要真实得多。议会开会后，争吵了不几个小时，

就决定给一个人以三年的绝对权力。当然，这个人就是弗朗西亚。人们也许设想这和代表们开会所在的圣弗兰西斯科教堂前出现弗朗西亚的禁卫队是纯然的巧合。会议完成了任务，代表们各自回家。两年后，弗朗西亚成为终生独裁者，这一任期到1840年才结束。公社派精神消亡了。巴拉圭民主制的上空一个漫长的黑夜降临了。塞西略·巴埃斯博士解释道："授予弗朗西亚博士的独裁权并不包括公共权力的全部；它象在古罗马一样，仅仅意味着共和国的政治和军事的指挥权，用以防止敌人的侵犯。"在理论上，巴拉圭有学问的历史学家是正确的，但是连他也不能对弗朗西亚使自己成为绝对权威的做法视而不见。

第 十 一 章

最 高 元 首

在巴拉圭四百年的全部历史中，没有比“最高元首”这个名字令人更畏惧的了。过去有些人胆敢诅咒“最高的一个人”，愤怒地喃喃反对他的专制和他的大大小小暴政，现在他们都沉默了。“最高元首”知道他们；他的秘密警察和非职业侦探使他的消息很灵通。据传说，“最高元首”惯于化装混在他的臣民之间。河岸前沿崎岖不平的码头上，烛光晃动投下长长阴影的室内，赤脚的人们早晚寒暄的街头巷尾，“最高元首”都去留心倾听。于是他查明了种种细微的罪过，听到了亚松森人最喜爱的闲聊天。

弗朗西亚始终把教会作为政治机构而与之为敌，他对世俗教士和教团教士过于轻视。但无论他承认不承认这个事实，耶稣会的神甫对他本人的存在，还稍稍负过责任的。鉴于巴拉圭人缺乏烟草

栽培和加工技术，“黑袍神甫”于1750年力劝总督从巴西邀请一些专家来传授他们所掌握的这些技术。应邀前来者中间有个人叫唐·加西亚·罗德里格斯·弗朗西亚（或者叫格拉西亚诺·罗德里格斯·弗朗萨），他也许是法国人、葡萄牙人或者是马梅卢科人。唐·加西亚住在亚松森附近，1756年娶唐尼亚·马丽亚·何塞法·德·贝拉斯科为妻，把她带到了他的小农场。唐尼亚·马丽亚是1764—1766年的巴拉圭总督富尔亨西奥·德·耶格罗斯—莱德斯马的后代。这对夫妇总共生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们的智力都不正常，也许是癫痫症。五个孩子中第一个是男孩，生于1766年1月6日，象他一生中的许多问题一样，他的生日仍然是个争论中的问题。

他十二岁时，教士开始对他进行教育。三年后，这一家搬到亚瓜隆。据说唐·加西亚把何塞托付给亚松森法兰西斯教派的圣卡洛斯学院与神学院去学习做传教士。这本来是1781年的事，但这所修道院直到1783年还未建立。不要为这种编年史的年代差异考虑过多，我们可以接受这个说法，即弗朗西亚曾毕业于科尔多瓦大学的蒙塞拉特学

院。他在那里是一个有才华的、阴郁的和好斗的学生，坚持自己的名字是弗朗西亚，而不是弗朗萨。1863—1864年恩里克·维斯内尔曾为他的著作《巴拉圭的独裁者》积极地收集材料，他认为这个未来的“最高元首”是在1785年成为神学博士离开大学的。另外一些人则说神学不合弗朗西亚的心意，他后来改学了法律。

唐尼亚·马丽亚·何塞法死的时候，她的儿子不在身边。这个失去妻子的丈夫在一个情妇的怀抱中找到了安慰。何塞·加斯帕尔回到亚瓜隆时，谴责他父亲这种姘居行为，拒绝继续从事教会事业，拒绝在他父亲的屋檐下生活，要求继承他母亲的遗产。他带着由此得到的一笔钱，迁到亚松森附近的茅屋中埋头读书，全然忘记了他的家庭。1790年，也许是1786年，他被任命担任圣卡洛斯学院的拉丁文和神学讲座；但是两年后法兰西斯教士对这位弟子的反教会观点感到厌倦了，弗朗西亚就离开了这所学校。

约在1792年，弗朗西亚成为律师。究竟他自己怎样为从事律师职业作准备的，是个难于说明的问题，除非他确实在科尔多瓦学过民法。从事这个

职业的，没有人比他有更大的廉洁声誉和更强的正义观念的了，但弗朗西亚决不是有名气的。在关心生活享受的人看来，他是一个内向的、超然的、骄傲的、好学的人。在他的法律界生涯的早期发生的一个偶然事件，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一个自认为是弗朗西亚朋友的人来请求这位年轻的律师去帮助了结一桩特别不名誉的交易。这个案件的受害者埃斯塔尼斯劳·马查因，是弗朗西亚的情敌，是两人争向佩特罗纳·萨瓦拉求婚的胜利者。弗朗西亚不念宿怨，到马查因那里提出愿为他的案件辩护。诉讼提到法庭后，法官告诉弗朗西亚对方的律师说一定要贿赂弗朗西亚才行，但是把礼物送去时，据说弗朗西亚曾怒斥道："带走你的卑鄙的申诉书和肮脏的黄金，给我滚出去！"然后，他戴上帽子去拜访法官，告诉他说："先生，你是法律的耻辱，正义的害虫。你现在在我掌握之中，如果明天你对我的辩护委托人不作有利的宣判，我就要让你死在你的职位上，你的司法官职的标章就要成为你耻辱的象征！"马查因胜诉了，而弗朗西亚继续憎恨他，正如他憎恨那些来亚松森做官发财的西班牙人一样。

从来没有人知道，在“最高元首”的心里什么时候曾有过一点怜悯心和一丝人情的温暖，只有他对佩特罗纳·萨瓦拉的单相思可能是例外。也许传说失真，但是巴拉圭人相信，远在弗朗西亚成为政界人物以前，当他的父亲请求他到临终的床前，最后一次为父亲作祈祷时，他拒绝和他父亲和解。“告诉我父亲，我不在乎他的灵魂下不下地狱”，大家设想弗朗西亚是这样说的。他的毁谤者坚决认为，他对于一个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错误都不加宽恕，他的性格是那样冷酷、有计谋、有报复心。而爱国的巴拉圭作者们，要我们相信“最高元首”和圣保罗① 一样的纯洁，却不理会相反的论据。女伴和他同睡，但他不爱任何女人，也从未结过婚。和他私通生下的孩子从他们的父亲那里得到的只有轻蔑。胡斯托·帕斯托尔·贝尼特斯——一位见识和能力都很卓越的巴拉圭的学者，谈到弗朗西亚时说：“在他的二十六年的独裁统治中，他的生活象山巅的白雪一样洁白而冷峻。它象一个基督祈祷者那样始终如一、纯洁和自安

① 圣保罗（St. Paul）：《圣经》中基督的使徒。——译者

自慰。”同时代的朗惹曾写道，当弗朗西亚成为独裁者时，这种严峻和贞洁就显现出来了。

弗朗西亚刚取得最高统治权，就在总督府里安顿了寓所。他和四个仆人住在那里。据他的敌人说，他遵守一种生活制度，不让时间纵情于自己的两大情欲——女人和赌博，或与他所十分蔑视的亚松森社交界同流合污。在吃饭有的象是一种艺术、有的象填猪食的国度里，这个独裁者却以饮食朴素著称。他的工作时间很长，因为事无巨细他都过问；大量的公文上必须有他的签字，但这些文件很少留传下来。“最高元首”蔑视爱情和友谊，他对赞扬和毁谤同样无动于衷。他就职时是个穷人，但对奉承他的议会所定的年俸他只拿三分之一，死时财产约为三万五千比索。弗朗西亚的诚实是有口皆碑的，他拒绝接受任何礼物，说明他具有受贿的免疫力。

弗朗西亚了解巴拉圭人，懂得如何统治他们。他知道，在高压之下他们不能同仇敌忾，在冷酷无情的权威面前他们易于卑躬屈节，失去可以领导他们叛乱的少数克里奥尔人时，他们就一筹莫展。政治的组织形式、美国和法国革命的思想以及政

治权术对于人民群众都是无所谓的，他们没有文化，无大志，只满足于粗茶淡饭的生活。只要人民惧怕他，他们是否轻视他，弗朗西亚是不在意的。反过来，他对人民，作为一个个人来看，他轻视他们；而作为巴拉圭整体来看他又爱他们，同时他对谁也不畏惧。他惯常说巴拉圭人的颈上有一根特殊的骨头，因为他从来未见过一个人是昂着头的。果真他要碰到这样一个大胆的人，他的骑马卫兵早就用剑一下把他打得低下头了。

对弗朗西亚来说，独裁者就意味着他的每个愿望不论如何不合理，都须立即服从。有一个故事说，他在亚松森的一次日常巡行中，他骑的马在一位西班牙老人的房前一块砌得不结实的砖头上绊了一下。弗朗西亚命令户主何塞·卡里西莫将它修好；但是第二天这块砖还没有换下来，“最高元首”就将这个冒犯者投入狱中，戴上镣铐，罚款一万比索。这个西班牙人很胖，镣铐深嵌肉中。他的妻子泣求弗朗西亚免除对她丈夫的刑罚。他说：“很好，你为他买副更大一点的镣铐来，如果做不到，你也要入狱。”结果，她戴上了和卡里西莫同样的手铐，直到朋友们为他付了罚款为止。还有一

次，大致是在1817年，“最高元首”看到一所房屋的墙壁上贴着一首侮辱性的讽刺诗，就勃然大怒。当然，设想这个房主阿根廷人帕斯库亚尔·埃查圭敢于自己贴传单那是荒谬的，可是他还是入了狱。他的妻子哀求弗朗西亚释放她的丈夫，但“最高元首”却命令给犯人再加上一副镣铐，他戴着这些镣铐一直到死。这个牺牲者死前，他的一个远亲设法营救他，营救的结果他自己也被监禁而死于狱中。许多其他有贴讽刺诗画嫌疑的人，都被监禁或判处劳役。侮辱弗朗西亚就是侮辱巴拉圭。

弗朗西亚的批评者过分地夸大了这个独裁者的残酷行为，人们最初是从怀有敌意的阿根廷和英国的一些作者那里得知这些事的。象罗伯逊兄弟这样一些人，力图与巴拉圭经商致富而遭失败，本来不会喜欢这位独裁者的。他们描述他的专制统治尽可能用最严酷的字眼，称他的即决惩罚是穷凶极恶的罪行，用刚够他们据以责难的事实阻止人们进行合理的判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罗伯逊兄弟写道：“监狱里囚徒呻吟着；商业瘫痪了；河边的船只在毁坏，货栈里的产品在腐烂；一种最善于搜索的侦探系统在得势；上层阶级全被压制，

底层的则被监视；独裁者的反复无常是统治的唯一准则；有意地鼓励士兵横行霸道，是使屈膝受辱的市民胆战心惊的最好手段。不信任和恐怖笼罩着每家住户；近亲和密友看来都互相害怕；每张脸上都多多少少清楚地显出沮丧或绝望。”可以开列一张有关细节的清单有力地来支持这些谴责。

象一切独裁者一样，恐怖是弗朗西亚用来维持他的地位和保证巴拉圭独立的一种武器。谁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会被投入监狱，而“最高元首”的监狱并非安乐窝。关押普通罪犯的监狱，还不是太可恶的，是一所约有一百平方呎面积的平房。国事犯监狱位于军营之中，由军队守卫。普通监狱的八间牢房里，每间牢房可以挤上四十个囚犯。在巴拉圭热带气候的夏天，平板房顶和当作窗子的板缝，足以保证最大限度的闷热烦躁。男人和女人一起被投进污秽、恶臭的炉灶式的房子里，只有当他们被铁链和铁条拴着带出去劳动时，才能指望呼吸新鲜空气。但和国事犯监狱相比，这些住处就舒适多了。兵营下面的狭窄的地下单人号子是监禁危险囚犯的地牢。这些埋葬活人的地窖里，没有卫生设备，也没有通风装置。贝拉斯科总督和

埃斯塔尼斯劳·马查因仅仅是死在国事犯监狱的许多牺牲者之中的两个人而已。

成百的弗朗西亚的受害者被枪决、绞死和拷打致死。比较幸运的，被流放到亚松森北面大约三百哩的特维戈充军地——现在的奥林波要塞。J·P·罗伯逊写道："那是一个空气中布满瘴气又热得闷死人的地方，周围是连绵不断的沼泽，充满着有毒液的昆虫和爬虫，凶猛的尚未被征服的印第安人部落还在继续进犯。"尽管通常有人责难说在二十年时间里有几千人死在特维戈，但在那里呆一辈子也比在独裁者的"审讯室"里呆几小时强。无疑地，许多流放者在特维戈结束了他们的生命，但是肯定不是几千人。

没有一个独裁者能够保证不发生给他带来措手不及的突然丧命的阴谋事件；每个独裁者都必须提防那些想要在最后一道栅门前挤进请愿人群中间的人，不让他得逞。弗朗西亚活着总是害怕他的雪茄或食品中有毒药，害怕有刺客可能突破他的警卫。武器经常在手边，来访者在引入谒见前要搜身，并且不允许他们中任何人靠近。当"最高元首"骑马去圣弗朗西斯科兵营经过大街时，所有

的巴拉圭人必须回避，这个独裁者就是这样的害怕行刺。马斯特曼在他的《巴拉圭动乱的七年》一书中曾写道，有一次“一个送葬队伍正经过一条街，当弗朗西亚走近时，轿夫立刻放下棺架，同教士和送葬人一起躲在道边的一个篱笆后面，直至他走过去为止”。爱德华·路卡斯·怀特在他的引人入胜的小说《最高元首》中，一再重复下面的故事：弗朗西亚从来不在同一房间里连续睡两宿。罗伯逊兄弟则说他经常变换住处。他最怕的不是单个人的愤怒，而是他敌人中间的阴谋。一个最大的阴谋显然在1817年就已开始，而一直到1821年还未完全被粉碎。

胡安·马丁·德·普埃雷东——阿根廷联邦最高执政官，不能腾出一支军队去压服巴拉圭；但是他可以而且派遣了一个间谍前往，这是在1817年1月颁发禁止巴拉圭烟草进口的命令后的事。胡安·巴尔塔萨·巴尔加斯上校——一个巴拉圭人，带着指令到亚松森去找弗朗西亚的敌人，以便和他们结成同盟，推翻这个独裁者。这个城市许多有身分的公民，有理由恨“最高元首”。他剥夺了他们的官职和荣誉，把他们的亲戚投入监狱，而且查

抄了他们的财产。巴尔加斯带着一种不善于隐蔽的热情开始工作，这使他在1818年丢掉了生命，但是他的同谋者一直到1820年才败露。这些勇敢的人包括胡安·阿罗斯特吉、何塞·阿科斯塔、胡安·德洛斯·里奥斯、莱昂纳多·格瓦拉、马科斯·巴尔多维诺斯博士、佩德罗·蒙铁尔以及其他许多人。胡安·博加林——一个死了怕下地狱的共谋者，将秘密泄露给听了他忏悔的安纳斯塔西奥·古铁雷斯神甫。这个可鄙的修道士命令忏悔者向“最高元首”揭发阴谋者，“最高元首”迅速地打击了他们。五十名亚松森显贵的公民被捕入狱；所有还在世的老“洪达”成员及其亲友都尝到了弗朗西亚的厉害。至少一百七十五名嫌疑犯进入监狱。但是由于惧怕自发的叛乱，独裁者未敢一下子处决这些阴谋参加者，而是在审判过程中，让他们饿死在自己的粪尿堆里。

面对1821年1月正式的公诉，囚犯中许多人否认同伙加给他们的犯罪事实，“于是报之以鞭刑”。维斯内尔说鞭刑是在和监狱隔一条街的原耶稣会修道院的一个房间中进行的。“上述房间叫做‘审讯室’，那里有一个窄木床，将受刑者放在上

面，脸朝下，绑着手脚，两个指定行刑的瓜伊库鲁印第安人手拿牛皮条编的大鞭子，对准他们的肩膀抽打；鞭打的数目从未超过一百五十到二百下，因为绝大部分受刑者在未到这么多鞭数以前已经丧胆了”。接着就是忏悔认罪，这是当然的事。“最高元首”对可能参加阴谋的西班牙人主要的一次打击是在1821年6月9日。他们之中三百人，约占亚松森全部西班牙人的一半，被集合到独裁者官邸前的广场上，被迫站了好几小时，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弗朗西亚把他们塞进普通监狱，他们在那里被折磨了十八个月。贝拉斯科就在其中。经过长期的监禁以后，独裁者对富裕的残存者罚款十五万比索，然后流放了所有穷一点的人。

当另一位阿根廷的考迪罗① ——恩特雷里奥斯省的弗朗西斯科·拉米雷斯力图策动巴拉圭叛乱时，政治犯依然塞满监狱。拉米雷斯在1820年明显地企图以四千人的军队侵略这个国家，然后再

① 考迪罗（caudillo）：西班牙语原义是领袖，在拉丁美洲各国西班牙语地区，此字用来指通过暴力夺取政权，利用暴力维持统治的独裁者。在拉丁美洲国家实行的军阀独裁制度称为考迪罗主义。——译者

去对抗占领了乌拉圭的巴西人。当时，他已迫使大乌拉圭的考迪罗何塞·赫瓦西奥·阿提加斯到巴拉圭避难。另一个阿根廷的考迪罗，圣非省总督埃斯塔尼斯劳·洛佩斯结束了和拉米雷斯的临时联盟，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展谈判。拉米雷斯不知道从这口政治大锅中翻腾的新水泡里能得到什么，因而大约在1821年的早些时候就停止入侵巴拉圭。但当时有许多巴拉圭人被牵连进这个案件。拉米雷斯曾送过一个信件给佩德罗·胡安·卡瓦列罗，后者还要把这一信件送给贝拉斯科倒台后最初的"洪达"主席富尔亨西奥·耶格罗斯。1821年7月，弗朗西亚查获了这一信件。他在耶格罗斯周围增哨加岗，监禁了卡瓦列罗，而且训诫各区司令官注意警戒。然后他在"审讯室"里进行审问，逼迫囚犯供出其他同谋者。行刑队忙了一阵。耶格罗斯被枪毙于7月17日，卡瓦列罗自杀于监狱。费尔南多·德拉·莫拉、拉里奥斯·加尔凡和埃斯塔尼斯劳·马查因也都在清洗的牺牲者之列。这次清洗持续了三个月之久，当时每天要处决四至八人。暴尸于日光下，直至夜幕降临才准亲属收尸。很少冒失的人敢于抗议这种审判。唐·米格尔·伊瓦涅斯是弗

朗西亚的有力支持者，他是康塞普西翁镇司令官，私下有怨言，被人听见，结果死于狱中。唐·伊格纳西奥·诺塞达——弗朗西亚另一个早期的部下，在“审讯室”里被打了不下一百鞭。让偏袒弗朗西亚的人说他在1823年以后缓和了他的政策吧，那时候他大多数的敌人都已死去或被粉碎了。

朗惹写道，在那些恐怖的日子里，“可以看到哥哥揭发兄弟，父亲告发自己的子女……怕被认为是同谋犯，没有人敢为邻居保守秘密……朋友们相遇时，只是冷淡地互相致意，但不交谈，多种社交集会没有了——妇女们甚至抛弃了说话的特权，吉他琴这个巴拉圭每个居民的亲密不可分的伴侣寂然无声了”。“最高元首”是严厉的，甚至是残暴的，但是他并非不听宽恕的请求，也不失君子之风。1839年1月6日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为庆祝他的七十三岁寿辰，释放了至少一百名囚犯。但是还有六、七百个不幸者依然在狱中。在这些人中，很难说有多少真正的罪犯，有多少是由于纯粹的政治上的原因而被关押的。

1821年那些恐怖的日子似乎显示了弗朗西亚所谓巴拉圭还没有实行民主的条件这个见解的真

谛：即卑躬屈膝匍伏在弗朗西亚脚下，愿意顺从这样一种清洗的任何人，都是奴隶成性或为虎作伥的人。这个判断可能太刻薄了。弗朗西亚所统治的主要是一个印欧混血种民族，他们曾经被一小撮人所统治。由于粉碎了这个统治阶级，由于在惯于接受温和压迫的群众之中灌输恐怖的结果，弗朗西亚就能够在人民中间未能涌现出领袖之前，捷足先登地完成他的统治。

弗朗西亚的政权主要依靠一支小而精干的军队，它可以镇压国内叛乱，也能抵御强横的阿根廷人和贪婪的巴西人的侵略。如在文职机构方面那样，“最高元首”无情地除掉了所有疑为不忠的或者社会关系过于复杂的军官。属于这类的人如此之多，结果大部分能干的军人都被一些平庸的人所代替，而这些人的主要特点是对独裁者的盲目的效忠。弗朗西亚设计军服，训练和检阅部队，并为部队取得装备。他特许木材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口，以换取武器和军需品，同时鼓励本国制造。在军队中有独裁者的个人卫队，即禁卫队，由挑选的可靠的人组成，它也作为一支政治警察部队来使用。常备军从未超过六千人，这是从大约三十万

总人口中抽出来的。如召集民团入伍，这支兵力可增至二万六千人。1816年后，防卫边疆的任务变得非常重要，当时弗朗西亚惧怕阿根廷人有征服巴拉圭的新企图，而且当时来自阿提加斯、埃斯塔尼斯劳·洛佩斯或者弗朗西斯科·拉米雷斯的袭击都是十分可能的。这些敌人的联合本来可以颠覆巴拉圭的，正如巴西人的一次坚决袭击，十分肯定地也会成功一样。对巴拉圭来说，幸运的是，阿根廷和乌拉圭的考迪罗没有联合入侵，巴西也太忙于和阿根廷在“东岸”的势力挑战，而未能骚扰这个孤独的国家。

在独裁者统治下，政府是一个很简单的事体。“最高元首”的主要心腹似乎是他的理发师，这个人的剃刀对弗朗西亚的一生也许留下过深刻的影响。任何人要想得宠，必先给这个为暴君剃胡子的人一点好处，虽然这位仆人是否有任何真正的影响，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个财政部长管账，一个可说是警察厅长的人维持公共秩序，还有一个秘书兼任外交部长和司法部长。理论上说来，殖民地时代的法律是有效的，但弗朗西亚的愿望就是最后的法律。为了厉行政府的命令，全国分成二十个

省，每一个省又包括若干区。省长辅以各该区的警察总管。两个隶属于亚松森市政会的法官，担任国家的最高法官。不管这些粗疏的机构如何，所有政府机关和法院都得靠弗朗西亚发号施令。他的部长们是傀儡，而他的省长们没有“最高元首”发布的命令，什么也不敢做。根据1814年10月的授权，弗朗西亚作为独裁者的任期三年后即期满。1816年6月6日，一次大会使他成了终身独裁者。这个机构什么时候独裁者认为适当，就什么时候开会，没有什么稍为类似民主制的规定，没有一个要弗朗西亚的行动对它负责的立法机构。巴拉圭的命运和一个不对任何人负责的随心所欲的人紧紧联在一起，虽然这个人证明他自己是一个从未有过的最廉洁的为国家效劳的爱国者之一。

巴拉圭暂时地避免了政治上的混乱，而相邻的一些国家正是在这种混乱中动荡不堪。弗朗西亚面对着：国内的阴谋反叛，欧洲人的第五纵队，贵族派和阿根廷间谍；布宜诺斯艾利斯力图置巴拉圭于其统治之下，而巴西则企图窃取它的领土；阿根廷的考迪罗计划入侵这个共和国，并严格限制和封锁它的主要货物的出口。独裁者明智地采

取了实际上结束和其他国家来往，并在农业和工业方面不得不实行多样化的政策。这种闭关自守政策激怒了外国商人和政府，招致了严厉的指责，激起了一大堆恶意中伤的谣言，以至使实际上对巴拉圭一无所知的托马斯·卡莱尔[①]也出版了一本为"最高元首"辩护的书。人们可以随意批评弗朗西亚的"中国政策"[②]，而事实依然是这种政策保持了巴拉圭的独立。他把这个国家变成闭关自守状态的政策，和其他南美国家成了一个显明的对照，在这些国家中，冲突、混乱与内战普遍存在，而高喊自由和秩序的政客们所寻求的只是权力和掠夺。在巴拉圭也许有一种自暴自弃的奴隶性，有一种受胁迫的民族的易驭性，但那里也有和平与秩序。

"最高元首"需要对外贸易，他曾寻求与英国通商，英国的海军可以制止阿根廷对科连特斯下游的巴拉那河的控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向

①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主张英雄崇拜。——译者

② 指鸦片战争前我国清代王朝的闭关自守政策。——译者

曾在巴拉圭有相当经验的英国商人提出建议。1814年，他建议J·P·罗伯逊把棉花、烟草、耶尔巴、糖和巴拉圭的其他产品带到英国下议院，并作为"最高元首"的代表要求建立两国政府间的正式关系。在写到这一偶然事件时，罗伯逊变得富有讽刺意味。他想象到出现"在下议院的栅门前，和六个搬运工人一起压服看门的'黑棒子'，不顾劝告和抵抗，立刻投送了我的兽皮包装的巴拉圭商品，并逐字发表第一位领事的演说"。他本来还可以描绘自己赤着脚摇摇摆摆地经过伦敦街头，叫卖雪茄和马黛茶。确实，罗伯逊似乎曾认为这一计划是好的，而且同意担任这一任务。但是，当他在1814年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时，由于一系列不是他所能控制的情况，中止了这一使命。

布宜诺斯艾利斯需要新兵补充军队，希望从巴拉圭吸收一些。此时"最高执政官"卡洛斯·M·德·阿尔维尔，劝使罗伯逊在他正发往亚松森的船上带封信给"最高元首"，提议进行一笔以武器和军需品交换新兵的交易。J·P·罗伯逊决定不继续前往欧洲，而亲自经营这船买卖。1815年，在上溯途中，这只船及其船主被一伙阿提格尼奥

斯(何塞·赫瓦西奥·阿提加斯匪帮)劫走，预定送给弗朗西亚的船货损失了。这位倒霉的商人靠指挥皇家“霍特斯帕尔号”军舰的约西林·帕尔西舰长的力量，最后被释放，转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动身去乌拉圭找阿提加斯要求赔偿。这位生来逍遥法外的英雄那时在“护民官”的头衔下，控制了乌拉圭和阿根廷的大部，甚而威胁着要推翻傲慢的、自负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罗伯逊发现这位乌拉圭考迪罗“坐在他茅屋泥地上的火堆旁一块阉牛的头盖骨上，正吃完一铁叉烤牛肉，喝着用牛角杯盛的杜松子烧酒！”阿提加斯没有钱满足六千比索的赔偿要求，但是他可以而且给了这英国人一张去巴拉圭的护照。

与此同时，W·P·罗伯逊在亚松森听到了他兄弟的不幸，后来弗朗西亚也听到了。独裁者下令阿提加斯的部下释放这船货和货主，但是由于受到英国的影响，部分地改变了计策。弗朗西亚因为英国政府不能对他保证“军火的自由贸易”，盛怒之下命令把罗伯逊逐出巴拉圭。当他听到阿提加斯根据阿尔维尔的信，散布谣言说，弗朗西亚在出卖巴拉圭人替布宜诺斯艾利斯打仗时，他的愤

怒更不能平息了。五年后，阿提加斯亡命巴拉圭，处于弗朗西亚权力之下时，“最高元首”也不象是忘记了上述事件。

尽管他早先要求贸易，但弗朗西亚有充足的理由害怕和外国自由交往。他对巴西的布拉甘萨帝国①不抱幻想；拉普拉塔河区域的联邦不会忘记巴拉圭一度曾是旧副王管辖区的一部分；而且没有一个邻邦共和国的征服精神已经绝灭。1825年，伟大的西蒙·玻利瓦尔②亲自敦促弗朗西亚和新建立的共和国开展友好关系，但是“最高元

① 布拉甘萨帝国（Bragança empire）：即巴西王国（1822—1889）。布拉甘萨家族1640年以来即统治葡萄牙，1808年拿破仑侵入葡萄牙，摄政王约翰在英国支持下逃到里约热内卢，开始直接统治巴西。1821年约翰返国时，把他的儿子佩德罗留在巴西。1822年巴西独立，佩德罗宣布脱离葡萄牙，成为巴西王国的统治者。——译者

② 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1783—1830）：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1810年参加委内瑞拉独立革命，多次打败西班牙军队，1814年建立大哥伦比亚（包括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并任总统。1822年解放秘鲁全境后，于1825年在上秘鲁以他的姓氏命名为玻利维亚。玻利瓦尔倡议拉美各国建立联盟，并在1826年召开巴拿马会议，但未成功。他在拉丁美洲曾被称为“北方的解放者”。——译者

首”答复说巴拉圭要继续走自己所选择的道路。1838年12月，乌拉圭的临时总统弗鲁克托索·里维拉将军派遣特使，带着也许是建立反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联盟的某种建议，来到弗朗西亚这里。“最高元首”不让使者越过国界。他决心避免与外国牵连，竟达到这样的程度。

巴拉圭的军队本身也许不足以抵抗外国的袭击，但是这种危险由于严格的旅行管制而减轻了。外国人也许会带进对独裁制危险的思想，而且他们肯定会带来有损于“最高元首”的思想。弗朗西亚禁止对外移民，这一步骤结束了向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迁移，而迫使人民在国内从事农业和其他事业。结果增加了下述人员的数字，即“织布工、铁匠、锁匠、造枪匠、鞋匠、马具师、泥水匠、银匠和金匠”。巴拉圭如要富强，就必须以自己的人力和资本开发本国的资源。外国人会剥削这个国家，损害巴拉圭人，而巴拉圭人要向其他较有利的地方移民。因此，对外贸易限于一两个港口，只有那些极为丰足的产品才应当出口以交换必需品。

在弗朗西亚实施闭关自守政策前，对外贸易掌握在大约五百个家族手中。耶尔巴、烟草、木材

产品和各种各样加工产品的价值每年约达一百一十二万五千比索。当然，这是一笔很小的数目，但是它供养了精明的西班牙商人和大群的工人。有一百只以上的帆船从事于这种贸易。由于除了特许外，停止了这种商业，独裁者消除了可能反对他的统治的最重要的根源。朗惹写道："阿萨姆普欣港真象有一百只船在那里搁浅的海岸。河水初次来潮时，有几条船浮动起来，但却被船主抛弃了。"他通过强制捐款、重罚金、重税、没收教会收入和外国侨民的所有财产，并通过其他零杂税捐来弥补岁入方面的损失。

罗伯逊弟兄，这两个尽管偶尔亏损但却赚得了巨额利润的狡猾的商人，早在1820年派遣了一个叫亨利·奥克斯的代理人进入虎穴。经过三个月溯流而上的航程后，奥克斯带着包括科学器械在内的船货到达亚松森，这些科学器械对驳运拉帕乔木十分有价值，成了"最高元首"的心爱之物。这一礼物使弗朗西亚很高兴，接受后，显然打破了在其他情况下是不通融的规定，准许奥克斯用三个月的时间采办一船货回去。当时还没有发觉这个英国人和罗伯逊的联系，甚至力劝他呆下来。奥

克斯装货上船，但是不得不留下三万七千比索的现金和货物。这笔财产委托给一个西班牙人。当弗朗西亚听到奥克斯1821年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时，便将它没收了。另一个敢于冒犯弗朗西亚的人是西班牙人唐·何塞·德·马里亚，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商人，与圣马丁的贵族女婿唐·安东尼奥·埃斯卡拉达的一个女儿结了婚。罗伯逊弟兄在1818年派马里亚作为一个合伙人到亚松森去，压舱货是值二百比索的盐，后来在亚松森卖得了四千比索。这次航行使这些英国商人净赚了六万比索。马里亚停在亚松森，集积货物，设法离开这个国家。最后于1825年，请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国总领事伍德拜因·帕里什爵士帮助，马里亚和其他外国人才获准离开。

阿根廷联邦对傲慢的独裁政权，使用了经济制裁。1817年1月8日，它禁止巴拉圭烟草进口；但弗朗西亚未为所动，虽然他自己的出口禁令造成了巴西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耶尔巴贸易的蓬勃发展。“最高元首”不怕巴西。也许他不了解事实，阿根廷如进攻巴拉圭，就会立即引来巴西的援助。但是巴西和阿根廷对乌拉圭的争夺，使布港人

未能实现他们可能有过的为贝尔格拉诺战败[1] 报仇的任何想法。1823年 4 月 5 日，弗朗西亚和巴西签订了一项条约，对巴西开放了两个入口港，即巴拉那河上的伊塔普阿和巴拉圭河上亚松森北面的科英布拉。贸易没有兴盛起来，因为每次通常的货运都必须得到特许， 这一协定充其量不过是对弗朗西亚的闭关自守制度的一种暂时的突破。如果巴拉圭卖主也是生产者，并能得到特许的话，他可以出售耶尔巴和烟叶给巴西人。只有无可指责的忠于弗朗西亚的白人有申请出售特许证的需要，而且只有得宠者才能得到令人垂涎的批准。巴西商人带着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买进的船货， 在伊塔普阿拿出货单和特许证一并交给弗朗西亚。"最高元首"从货单中选出他所需要的，按他所决定的货价付款，然后才准许商人出卖其余的货物。在亚松

---

① 1810年5月25日，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会推翻了西班牙副王的统治，但是巴拉圭、玻利维亚、乌拉圭等省不接受布港人的控制。布港人派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将军去远征巴拉圭，但在1811年1月至3月他两次被巴拉圭人所打败（详情见第10章）。此处系指布港人可能有为贝尔格拉诺报仇，攻打巴拉圭的想法。——译者

森，弗朗西亚有一个由一位政府雇员照料的商店，在那里幸运的人可以买到那些商品。

进入巴拉圭的人是冒着风险来的，没有特别的批准谁也不能离开。未经弗朗西亚批准的外国人进来后，就会被强制驱逐、投入监狱或者流放到这个国家的某些偏僻的乡村去。许多外国流放者和亡命者在这里得到了安全的避难所；其他的外国人则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客人。后一类人中有瑞士人若昂·吕多尔夫·朗慈和他的同事马塞兰·朗夏穆普斯。这些旅行者在1819年7月进入巴拉圭，逗留了六年。1827年，他们在巴黎出版了一本《巴拉圭革命的历史评论》，这一著作实际上是推崇弗朗西亚的，但在1830年他却对作者大发雷霆，说他们是和西班牙人合谋反对这一共和国的间谍，是害死病人的庸医，是编造有关巴拉圭的虚构事物的造谣家。他们所假想的和弗朗西亚的谈话完全是一派胡言。如果“最高元首”想不让他们离开这个国家的话，他本来可以把这两个撒旦[1]的后裔扣住的。

---

[1] 撒旦（Satan）：《圣经》故事中的魔鬼。——译者

阿提加斯，这个反击巴西和阿根廷入侵而失败的人，是弗朗西亚的囚徒中最有名的一个。这个高卓人，一度曾是一片广大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对巴拉圭不甚友好。他曾准许他的“准法外人”拦截弗朗西亚的船只，抢走弗朗西亚的船货。1817年，阿提加斯需要朋友，曾向巴拉圭提出开展友好关系。弗朗西亚实际上回答：“送还你们劫走的东西，然后再谈友谊。”阿提加斯的一个部下在巴拉圭东南部的印第安人中煽动叛乱，骚扰结束时，十二个传教区的城镇化为废墟。恩里克·维斯内尔叙述的这一故事，除了他断言那些城镇是兴旺的这一点以外，还是令人信服的。弗朗西亚本应该派遣军队进行报复；但相反的，他只是加强了在边防的军事力量。阿提加斯为这场袭击道歉，而且惩办了对过去不法行为负有责任的官员。1820年9月，阿提加斯以及从恩特雷里奥斯省的弗朗西斯科·拉米雷斯处撤出的五百名同伙向弗朗西亚请求允许在巴拉圭避难，被接受了。阿提加斯干过不少使拉普拉塔地区陷于混乱的事，“最高元首”对他有怀疑，机警地揣测这一乌拉圭人会策划政治阴谋来反对他；果真如此，还有什么能比得上把他置于严密监

视之下更好的呢？他把阿提加斯送到接近东北边境的圣伊斯德罗—拉夫拉多尔的农村去居住，有一个时期还给他每月三十二比索的津贴。阿提加斯从没有再打扰他的主人，也未曾受到迫害。这位老考迪罗一直居住到1845年，弗朗西亚的继承者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将他迁至亚松森附近。度过三十年的流放生活后，阿提加斯在九十二岁时死去。

一位英国医生，医术高明，酗酒也颇出众，于1815年7月来到亚松森。这位开业医生帕莱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自己把一个有出息的职业前途给毁了。弗朗西亚对西班牙医生合适地给以低评价，而对这位英国人却请他放手施展才能。“最高元首”需要一位胜任的医生为他的卫队和军队治病，对一般群众来说庸医也就够好的了。帕莱特不慌不忙地在巴拉圭人中间完成了一些在医药上似乎是神奇的事情。感恩的患者付给他很高的报酬，还有慷慨的礼物。一位吝啬的商人名叫唐·安东尼奥·雷卡尔德，因为帕莱特从他的女儿眼中发现和取出一个沙蚤虫，而自愿付给大约一百美元的报酬。弗朗西亚的卫兵每去看一次病，弗朗西亚就

付给他二十五美分。帕莱特本来可以安顿一个舒适的生活;但是他变得不安稳起来,恢复了他酗酒的旧恶习,最后于1825年死于亚松森,其时正是弗朗西亚决定释放他所扣留的外国人之前不久。

几乎每个外国人都能在讲不完的“我在巴拉圭的遭遇”的故事中叙述动人的篇章。唐·曼努埃尔·门德斯·卡尔德伊拉是一个乌拉圭商人,约在1814年到达亚松森,1815年正在生意兴隆时被一道命令流放到库鲁瓜蒂,中断了营业。十一年后,当“最高元首”准许大多数的外国人离开时,门德斯带着家属逃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在这十多年里他天天不知道还会有什么不幸在等着他。法国的一位博物学家厄默·雅克·阿勒克桑德雷·蓬普朗和他的妻子于1817年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两年后他在科连特斯省前耶稣会传教区的都城坎德拉里亚附近安顿了下来,为阿根廷市场种植耶尔巴。直到1821年,蓬普朗在这块位于巴拉圭的伊塔普阿镇对面的垦殖地上经营得很顺利。后来,弗朗西亚借口建立这一块垦殖地会成为拉米雷斯(已死)侵略的跳板,派兵侵占了科连特斯,摧毁了这块垦殖地,杀了几个人并把蓬普朗监禁

了起来。这一事件立即变成一个巴西、法国和英国的知名之士都来呼吁释放这位法国人的著名案件。其实，蓬普朗在巴拉圭还是很安心的。

对于教会及其一切活动，“最高元首”只有轻蔑而已。在他揽权的初期，命令过在一个兵营中做弥撒，在盛大节日他也到大礼拜堂去；但是到1820年他认为这些仪式都是白痴的象征。各派教团教士，特别是耶稣会教士，他认为都是地上的蝗虫。据说弗朗西亚曾哼着鼻子说，如果罗马教皇来到巴拉圭，他要使他成为神坛旁的小侍。人们有理由要问，“最高元首”是否还承认全能的上帝比自己更有力量。巴拉圭的教士以他们行为放荡而出名。无知、龌龊、懒惰，“他们公开地搞女人，每天要以无数件丑事亵渎教堂的圣殿”。多米尼克修道院的院长吹嘘说，“他是不同母亲的二十二个孩子的父亲”。1815年7月2日，弗朗西亚用一个法令将教士完全置于他的权力之下，这个法令规定，无论那一派的教团教士都不能听命于任何居住在外国的上司。只有亚松森的主教能对他们行使权力，教团的官员由教友全体在会议上选出，每隔三年或四年选举一次，所有这些官员必须经政府批准，而且

不经弗朗西亚的允许不能召开教友会。这一法令彻底地宣告，罗马教皇把教会管理权授予西班牙统治者的训谕，已经由这个共和国继承下来了。亚松森主教佩德罗·贝尼托·G·德·帕内斯阁下是一个头脑不太正常的人。在一个教士祈求圣母玛丽亚恢复主教的精神健康之后，弗朗西亚决定撤掉这个主教。1819年10月16日，他剥夺了这位主教对教团教士的一切权力，给他以年金，而提名一个亲信作为代理主教。帕内斯郁郁不乐，一直到1838年7月“最高元首”才恢复了他的职务；但是他已九十岁，三个月后即死去。

对于人民——上层阶级或群众的教育，在巴拉圭从未昌盛过。每一个耶稣会传教区都有它的学校，但是在亚松森直到十八世纪都快完了还没有一所公立小学。1783年，由王室许可，建立圣卡洛斯王家学院与神学院。1805年，唐·何塞·加夫列尔·特列斯力争使亚松森的一所公立初级学校维持下去；六年后，特列斯因为无校舍，又得不到自己一百比索的年俸而辞职。这一辞职使“洪达”在1811年11月25日作出了关于临时校舍的规定。弗朗西亚对改善这一状况并没有很大兴趣。何塞·塞

贡多·德科德有一次曾说，弗朗西亚的最大罪行在于保持和继续保持这一国家的无知状态。私立学校使富人子女能读、能写、能算，但是正式教育不是为群众办的。弗朗西亚惧怕巴拉圭仅有的中等学校——神学院可能窝藏敌人，1822年把它封闭了。独裁者允许开办私立学校，然而他并不鼓励。在弗朗西亚统治下，没有报纸，甚至也没有新闻通讯[①]。

弗朗西亚的辩护士，总是不厌其烦地赞扬在强制的闭关自守时代，巴拉圭的惊人的自给自足。1826年强行查验所有土地领有者的权利认定书，结果把巴拉圭河以东共和国的地区的一半宣布为公有。过去一度闲置的地区进行了耕种，新作物替代了过去须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进口的粮食；棉花变成了一种重要的原料，带来了相当大的工业发展；同时牛马饲养业第一次取得了主要产业的地位。1826年，一次蝗灾从查科蔓延到巴拉圭时，弗朗西亚号召所有从十四岁到六十岁的男子进行抗灾。但蝗虫胜利了。"最高元首"没有气馁，命令农

① "新闻通讯"：十七世纪时，欧洲出的周刊书信报纸，是现代报纸的雏形。——译者

民立即重新播种。1827年3月和4月获得的秋季大丰收，使一年两熟制开始建立起来。根据朗惹的材料，他将这一事件放在1819—20年。实在说，这个经验也没有新东西，因为西班牙人在1540年以前已经一年收获两次了。

在1840年的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最高元首”可以满意地回顾走过的漫长历程。没有外国敌人曾对他的国家独立进行挑战，没有公然的国内敌人曾经颠覆成功过。遗留下未完成的事情是多得惊人的，正如在一切时期和一切国家那样。丰产的土地渴望人们去耕种它，多产的人民却无法把自己提高到显然由神秘的命运所预定的水平之上。弗朗西亚曾怀有崇高的事业理想；他曾威吓、压制和驱使人民。如果说他在海上划出的航迹迅速地消失了的话，至少他在海滩上留下的脚印是深而持久的。

“最高元首”不可能知道以后的事，但他知道自己的末日要迅速来到。当他从骑兵营出发骑马作短途出行时，七十四岁高龄的他，越来越感到体力不支了。1840年6月，他开始焚毁他的文件，这一破坏行动使人永远得不到一部关于他的准确的传

记，也使历史学家不能从故纸堆中有所收获。亚松森的阴冷潮湿的冬季使老独裁者太不能忍受了。8月30日，他最后一次出骑；9月20日，“最高元首”逝世。

在“显灵教堂”的高高的神坛旁，安葬了“最高元首”的遗体。唐·曼努埃尔·安东尼奥·佩雷斯神甫用赞美词为他祈祷。愿灵魂安息！但是他不能安息。文物的破坏者打开了石墓，将他的尸体抛入了巴拉圭河。有这样的传说，帕亚瓜人“把暴君的尸体从坟墓中掘出，抛进现在通称之为查卡里塔河附近流出的一条泥泞小河中”。他，人是死了，坟墓也给挖了；但“最高元首”的精神将永远和巴拉圭的心贴在一起。

象塞西略·巴埃斯在他的《关于弗朗西亚博士文集》中所陈述的，独裁者是性格复杂的人物。对奥利维尔·克伦威尔① 的研究显示了独裁者性

---

① 奥利维尔·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独立派的领袖。1653年建立军事独裁统治，自任终身职“护国公”，独揽军政大权。恩格斯曾说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克伦威尔兼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于一身”。——译者

格的复杂性。弗朗西亚也是一个复杂性格的人，一个热衷于党派性的人，一个共和政体的拥护者。他的政治思想是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得来的。他相信人通过契约为社会安全而放弃其天赋的独立性。他相信所有的政治机构，是建立在通过民主程序来行使的人民主权的基础上的；相信所有的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有权通过一个自由建立的政府来增进福利。这些原则对于巴拉圭人民群众来说过于先进，不易使人接受；或者应该说，巴拉圭人还没有准备好担负由于行使权利或特权所带来的责任。也许如巴埃斯所主张的，伟大的理想是经过伟大的人物传播给人民的。弗朗西亚就是这样一个对法国革命原则的伟大传播者。他向巴拉圭讲解革命，成为革命胜利的领袖，并成功地坚持了国家的独立。他的闭关自守政策，是由环境强加于他的，并非宁愿采取的。巴拉圭丢掉了可以从通商中得到的物质财富；但这个国家却得到了更加多样化的经济，一种不可估价的自立和国内的协调一致，而它的邻国却因内外战争而陷于混乱之中。“最高元首”不需要更伟大的颂词。

第 十 二 章

弗朗西亚的继承者 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

事实本身渐渐使巴拉圭人意识到:“最高元首”已死,而他没有为他的统治留下继承者。也许是因为他曾确信这个国家没有人能取代他的位置;也许是他不关心这件事。人们预测,在那里自由地表达意见和自治受到这样长期的压制,可能会发生可怕的社会爆炸;可是使这种民众意志迸发出来所必需的内部压力却一点也不存在。没有民众意志,而且从来没有过。巴拉圭的“王冠”弃置于红土堆里,等待着一位骁勇的英雄去拣起。

英雄是羞于锋芒毕露的。弗朗西亚的秘书说服四位引退的军团司令组成了临时“洪达”,他自己担任秘书。后来,“洪达”怀疑他的野心,将他投入监狱,在这种威胁下,他在狱中自杀。政府事务陷于混乱状态达六个月之久。后来,在1841年3月

12日，有五百个巴拉圭人集会于亚松森。他们这种深思熟虑的行动是在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劝诱下干的。议会设置了任期三年的两个执政官，其中洛佩斯起领导作用，马里亚诺·罗克·阿隆索上校，这个虚有其位的无足轻重的人作为他默不作声的合作者。

在这个临时议会的第一批法案中，有宣告结束弗朗西亚的贸易封锁并和阿根廷难以控制的科连特斯省签订一项通商条约的决议。这一条约激怒了胡安·曼努埃尔·罗萨斯——他依然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独裁者，这是阿根廷的不幸。1842年12月，执政官建议和阿根廷签订条约，但罗萨斯却以封锁拉普拉塔河对巴拉圭的航运作为回答。并声称只有在科连特斯有所检点时，他才会重新开放。1844年，巴拉圭通过了一项宪法，结束执政官职位，设置一个总统。但这远不是要建立一个在真实意义上的民主政体以至共和国政体——虽然安德列斯·赫莱[1] 对此提出了全然不同的看法。总

① 当时巴拉圭政府的官员，后于1853年作为小洛佩斯的秘书访问欧洲。——译者

统控制了政府的一切职权，也控制了议会。他拥有国王的一切权力，只是没有国王的名称。

弗朗西亚的继承者大约生于1787年，其父是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母亲是印欧混血种人，据说她有瓜伊库鲁人血统；也许西里洛·洛佩斯是印欧混血种人，而其妻是黑白混血种人。他的父亲是个鞋匠，住在亚松森郊外，生活贫困，无力送他的八个儿子中这个长得较丑但还聪明的孩子去上学。他家的一个朋友给了一小笔钱才使卡洛斯·安东尼奥能在亚松森的圣卡洛斯学院读书，他在那里学到的知识足以使他成为一个教员或律师。唐·卡洛斯很聪明，对"最高元首"总是闭口不议论。他对婚姻也很如意。唐尼亚·胡安娜·保拉·卡里略并不美，她爱好安逸和美好的食品，她的父亲是富裕的。据谣传，这位姑娘是卡里略妻子的前夫之女，继父和她私通有了一个小孩。查尔斯·艾姆斯·沃什伯恩在他的《巴拉圭史》一书中，带着惊疑的口吻津津有味地再三叙述了这一故事：要是卡洛斯·安东尼奥把这个私生子收作他自己的孩子的话，他就可以得到胡安娜·保拉和她陪嫁的庄园。不管怎么样，这所离亚松森约一百二十哩的庄园，

在弗朗西亚统治的末期作了洛佩斯流放的 地 方。唐·卡洛斯和他的妻子生了几个孩子。如果我们不听信关于弗朗西斯科·索拉诺出生的丑事，那他就是长子。第二个儿子贝南西奥和第四个儿子安赫尔·贝尼尼奥，后来都成了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恐怖统治的牺牲者。他们的两个女儿伊诺森西亚和拉斐拉也是在同样情况下失去了丈夫。

从容貌上看洛佩斯决不是美男子。当时外国人对他的容貌说法各不相同。一位作者讲到“腮帮垂在领巾上”，一脸猪相。另一作者却说他是一个结实的、长相体面的汉子。一条腿稍稍比另一条腿先着地，这使总统阁下总是坐着接见来宾。不知为什么，他无论在室内室外都戴帽子。生来多疑，特别是怀疑外国人。虽然他邀请他们到巴拉圭来，用他们为自己服务，也常听取他们的忠告，但他们从来没有取得过他的完全信任。

既然他们的父亲是独裁者，尊荣的职位就自然地落到洛佩斯的儿子身上。经商是条易于致富之道；牛群和广阔的牧场，说要，就是他们的了。他的所有子女都是纵容坏了的小家伙，但是没有人，甚至他们的父亲都不敢叫他们安分守己。弗朗西

斯科·索拉诺生于1826年7月24日。当弗朗西亚死时，他仅十四岁，几乎没有受什么正式教育。马科·安东尼奥·迈斯，米格尔·阿尔沃诺斯和他的父亲似乎当过他的主要家庭教师。1845年后，他已没有教师，但据说他曾是个孜孜不倦的好学者。十八岁时，他是一个准将，二十三岁时，他吹嘘对于军事科学无所不晓。这个自负而善于吹牛的人成为他父亲的宠儿，而且可能是这位独裁者的主要参谋。其他两个儿子，贝南西奥和贝尼尼奥和弗朗西斯科一样有能耐，而且一样地好色，特别是贝南西奥，他把每个漂亮的姑娘都视为劫美的对象，而漂亮的姑娘在巴拉圭到处都是。

长得不美的洛佩斯家的太太小姐也显示出十分精通生意经。乔治·汤普森——巴拉圭军队中的官员、弗朗西斯科·索拉诺的副官、巴拉圭的勋爵，很了解这个家族。他在《巴拉圭战争》一书中说，这家妇女"建立了一种交易所，在那里把不能再流通的破损的纸币(比索)按一个比索打六辨士的折扣买下来，再通过她们的联系拿到国库兑换成足值的新纸币。她们还贷款给珠宝商获得大量利润，而且她们不管店主愿不愿意，她们喜爱什么

就拿走什么”。她们做得还比不上一个世纪后中国的“豪门”[①]，但是考虑到巴拉圭的贫穷，她们巧取豪夺的钱财就不算少了。

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接管了一个人口急剧增长的国家。通常所发表的不太可靠的估计数字如下：1795年为九万七千四百八十人，1818年为三十万人，1825年为二十万人，1838年为三十万人，1840年为二十二万人，1848年为六十万人，1857年为一百三十三万七千四百四十九人，1865年为四十万人。人们可以合理地、有把握地下结论，巴拉圭有几十万人。1840年的数字来自弗朗西亚下令进行的一次普查，可以认为接近于准确。塞西略·巴埃斯在《巴拉圭》一书中，认为五十二万五千人作为1864年的数字大约是正确的。

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舰长在他的《巴拉圭战地通讯》中断言，弗朗西亚的独裁仅留下了废墟，而洛佩斯是巴拉圭的组织者。从弗朗西亚的公共工程计划、自给自足的主张、军队的组织和谨慎廉洁的财政管理来看，这一断言是很难站得住

① 指国民党统治后期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译者

脚的。但是尽管弗朗西亚有他的伟大计划，但他在死前未能大大改进巴拉圭的交通系统。而洛佩斯修筑了三条不长的公路和一条铁路，多少弥补了这个缺陷。这条铁路是南美最早的铁路之一，1858年，由一位英国工程师开创，修筑到巴拉瓜里，按预定计划1861年通到维利亚里卡。在三国同盟之战中，这条铁路对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具有很大的价值。

卡洛斯·安东尼奥统治下的政府比过去将近三十年巴拉圭所熟知的政府要温和得多。新总统阁下坚决主张，他仅仅是最高政府的代表，而不是政府本身。可是，这对于习惯于弗朗西亚苛政的巴拉圭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宪法依然是一纸具文；议会完全屈从于总统阁下，延长他的任期也好，通过他的法律也好，都很少提出异议。然而，如果合理仿效的一种民主制能在这个国家存在的话，这也正是巴拉圭需要的一种进步。

卡洛斯·安东尼奥是个独裁者，他的统治和弗朗西亚一样都是绝对的，但是他缺乏并需要得到较多人的支持。这位执政官上任时，在“最高元首”的监狱里仍然有大约六百名囚犯。这些受难

者很快被释放了，其中有马科·安东尼奥·迈斯神甫，洛佩斯授予他拉丁文和哲学教授学衔。纵然国家警务效率较差，但特务系统和过去一样继续存在。政府各部及其傀儡部长使卡洛斯·安东尼奥摆脱了许多行政琐事，同时审判案件的司法制度已初步建立起来。颁布了种种法律和法令，其中必须指出的是，1842年废除拷问、奴隶制和查抄财物的法令。可是，二十年后，人民依然被拷问，他们的财物依然被查抄，而奴隶制一直存在到1870年。同样，在1842年，议会激奋地（如果还不是确信地）宣告："巴拉圭共和国将永远不是某个人或某一家族的世袭财产了。"可是，洛佩斯家族直到1869年还把巴拉圭作为私有产业来占有和管理。

一旦人们注视到在卡洛斯·安东尼奥的恩宠下神甫们大腹便便无所事事时，就会觉得"最高元首"对教士的所有蔑视是有根据的，对他们的粗暴待遇也是温和的了。马斯特曼发现，巴拉圭人在一位相信科恩和亚比勒是诺亚的儿子① 的主教管理

① 在《圣经》中科恩（Cain）和亚比勒（Abel）是亚当和夏娃的长子和次子，而这位主教竟对《圣经》无知，错以为是希伯来人族长诺亚的儿子。——译者

下，对宗教处于无知状态，而对偶象崇拜却愈陷愈深。马斯特曼宣称，教士们是“无知的和不道德的，是斗鸡迷和大赌棍，对于妇女有极大的权威，他们把这一权力用于最卑劣的目的”。卡洛斯·安东尼奥曾任命他的一个兄弟——法兰西斯教派教士莱昂·巴西略，担任主教职务，这对上述情况并没有很大改进，但是他为亚松森建造了一所新的大教堂，代替二百八十五年前，即1557年建造的那所旧教堂。残存的传教区制度，在1767年耶稣会教士被逐出后，曾经历了多次盛衰变化。1848年，洛佩斯发现在巴拉圭的巴拉那河北面十一个原来的传教区中，有六千左右的瓜拉尼人墨守原有的归化生活。这位独裁者便直接下令把印第安人拆散，这是对一个著名时代的古老遗迹最后致命的一击。

人们注意到：“我是巴拉圭人，我能读书！”这句夸口之言重复得如此频繁，以致使人没有很多的事实根据就相信他在教育上取得的成就。卡洛斯·安东尼奥确是扩充了小学教育，到1860年，大约有五百所学校，两万名左右小学生；1861年还命令每个治安官“将没有理由不上学的九至十岁的儿童一律送进学校”。教师们在狭窄的房子里或四

面无墙的棚下进行教学。他们只拿到一点象征性的薪水，大多数都是无知的教士，其他的人也很少受过什么专门训练，他们的工作自然不会有很显著的成果。有人说：连政府的官员也搞不懂简单的算术。如果把学文化理解为不过是读和写的机械能力，那么，在洛佩斯统治下约有两三千巴拉圭人能称得上半有文化；可是1862年的文盲却比1840年还多。尽管当局在这方面不太热心地作出了某些姿态，教育还是衰退了。1841年左右，议会从弗朗西亚未领的薪俸中拨款一万二千比索给马科·安东尼奥·迈斯主持的文学院。1858年前后，洛佩斯送十六名青年到欧洲去留学，但他没有下更大的力量去改进中等或高等教育。弗朗西亚很少干涉私立学校，而洛佩斯却以种种规定阻碍私立学校的发展。巴埃斯博士指责洛佩斯，由于他害怕巴拉圭人不安于继续当专制者的驯服臣民，所以不让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在任何职业中不可能找到一个有学位的本地人。为了还击阿根廷的诽谤，于1845年4月，政府为能阅读书报的巴拉圭人创办了一种周刊——《独立的巴拉圭人》。1852年8月，这一周刊改称《周报》，在小洛佩斯统治下继续

出版。有这两个政府机关报合订本加上战时杂志《兰巴雷》和《哨兵》,该算是一笔小财产了。

唐·卡洛斯爱巴拉圭，可是爱得把巴拉圭一半左右的土地都化为己有了。政府——独裁者的同义语,拥有对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土地的所得和国家的收入混在一起没有任何区分。作为一个庄园主,洛佩斯拥有三十万头牛和成千匹马。商业也集中到总统家族之手，它制定了有极大利润可图的价格。1846年,宣布耶尔巴由政府垄断，它以每磅一美分的价格买来，又以六到二十五美分的价格卖出,从而获得了惊人的利润。虽然这种收入和其他的收入他可以任意取出私用，但洛佩斯没有使巴拉圭负国债。他就是国家,国家就是他的。耶尔巴专卖收入、什一税、印花税、土地税、关税以及从弗朗西亚继承下来的财物，给他提供了充足的基金。国内强制的和平、对外国人比较公平的待遇以及农业产量的增加,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以致使对外贸易量从1850年到1860年增长了两倍。洛佩斯的贸易垄断使走私者十分困难。沿巴拉圭河东岸,独裁者建立了一条有八个警卫队的防线,每队都有四十到六十呎高的了望塔，卫队从上面警惕

地监视河面和地上的边防线。用栅栏围住玉米、柑树、木薯的小块地。在警卫队与警卫队之间，设有两个较小的纠察站，由小分队士兵负责地上和水上的巡逻。

1845年，卡洛斯·安东尼奥结束了弗朗西亚统治时期巴拉圭的闭关自守状态。他不顾人们对外国人的天生憎恶，邀请甚至敦促外国人到巴拉圭工作。许多英国人(他们的结局都很狼狈)接受了这一邀请，如工程师、外科医生和机械师等，他们都对巴拉圭的繁荣有极大贡献。乌迈塔要塞主要是由两个英国人和一个奥地利人设计的，虽然华奥·卡洛赫拉斯认为是巴西人设计的。无论如何，英国人、爱尔兰人、法国人和德国人都提供了很多的才智和劳动，使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有可能打那场1864—1870年的毁灭性战争。一家英国的J·A·布莱思商行，许下各种虚假的诺言，为巴拉圭招募技工。其中有一个石匠阿隆索·泰勒，在1850年他与该商行订立了为期四年的合同。泰勒干了各种各样的活，如兵工厂、火车站、弗朗西斯科·索拉诺的官邸、卢克肥皂工厂以及其他工程等。他是小洛佩斯的受害者，好容易保

住性命逃了出来。亚松森的兵工厂工程几乎全部是英国人干的。

进入巴拉圭的外国人，在旅行、享受治外法权、与巴拉圭女人通婚以及财产权等方面都受到严格限制。但这些障碍都不足以妨碍个人和群众性的移民。1853年到1854年间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在法国的波尔多签订了一个条约，结果在现在的皮科马约河畔的阿耶斯镇附近出现了一个法国移民的垦殖地。象1855年开创的新布尔德奥斯一样，这个垦殖地一开始就失败了。它的位置不适当，其成员都是要求有一块亚热带土地的贫穷拓荒者，而且洛佩斯除了使它成为能结束印第安人祸害的一系列查科垦殖地中的一个以外，也没有兴趣或机会去管它。的确，卡洛斯·安东尼奥使法国移民过着不幸的生活，而且尽一切可能使之失败。

事实证明，开展正式的对外关系，特别是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独裁者罗萨斯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困难的、有时也是令人烦恼的过程。1845年，这位拉普拉塔河流域的暴君在巴拉那河上封锁驶往巴拉圭的船只。在前一年，洛佩斯曾要求罗萨斯承

认巴拉圭的独立，罗萨斯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洛佩斯又和科连特斯重订了条约。罗萨斯就加紧河上封锁。巴西人开始参与这一争执，希望与巴拉圭结成联盟以对抗罗萨斯，并结束和阿根廷争取乌拉圭的竞争。1845年12月4日，洛佩斯对罗萨斯宣战。他派遣一个军团，由十九岁的才华外露的准将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指挥，并且和科连特斯的军队合作。这个军团由一支科连特斯部队作先导，横渡巴拉那河。1846年1月，胡斯托·何塞·乌尔基萨将军打败了科连特斯人。洛佩斯将军未发一枪便仓皇后退，撤过巴拉那河。根据这一教训，卡洛斯·安东尼奥于9月决定，在阿根廷内战中保持中立，并接受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美国代表威廉·A·哈立斯的调停。时间和乌尔基萨帮了他的忙，因为六年后罗萨斯终于失败，并被流放。

在这值得庆幸的事件发生之前，洛佩斯便和巴西有了纠纷。他的特使胡安·安德列斯·赫莱未能与巴西缔结一个满意的边界条约。在1849年，正式关系中断了几个月，洛佩斯甚至把巴西的守卫部队从巴拉圭所要求的领土上驱逐了出去。洛

佩斯确定不了巴西是敌是友，于是扩大军队，增设边防堡垒，并迫使英国工匠把新兵工厂投入生产。1850年，巴西决定同巴拉圭重新和好，12月25日两国签订一项联盟条约，使大象和蚊蚋联合起来对抗罗萨斯；1852年罗萨斯被乌尔基萨赶下了台，但洛佩斯对此并没有出什么力。

罗萨斯的倒台，结束了巴拉圭在国际上的孤立。阿根廷、大不列颠、法国、撒丁王国、普鲁士和美国都在 1852 年与 1860 年之间和洛佩斯签订了条约。1852年和阿根廷的条约，巴拉圭放弃了对米西奥内斯省的要求，确定以巴拉那河作为边界。和欧洲与美国也开始了正式外交关系，拉普拉塔水系的大河对外国船只开放。不久，指挥“水妖号”的一位美国海军军官使他的船在巴美关系上出了名，虽然使它出名的事件本身很小。二十五年后，拉瑟福德·伯·海斯总统① 在巴拉圭和阿根廷关于皮科马约河以北的查科部分地区的争议中，作出了有利于巴拉圭的仲裁。在这两次事件中间的一

① 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 (Rutherford Bischard Hayes)：美国第十九任总统(1877—1881年)。——译者

段时间内，紧跟着第一次事件，有一位美国公使被指控为行刺小洛佩斯阴谋的罪魁祸首。这些事件发生在以后；而现在，1853年的事件则为巴拉圭带来了一个新时代。

洛佩斯希望巴拉圭为欧洲所了解，这是他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他选派弗朗西斯科·索拉诺去完成这一任务并委托他购买战舰，招聘外国工匠来巴拉圭工作。陪同前往的有他的弟弟安赫尔·贝尼尼奥和他的秘书胡安·安德列斯·赫莱，以及其他四位官员。洛佩斯于1853年 6 月12日乘“巴拉圭独立号”离开亚松森，于9月抵达南安普敦，后又去伦敦和巴黎，拿破仑三世接见了他们。根据奥莱亚里所述，有一次，洛佩斯试了一下法国部队的本事，使拿破仑大为惊异。1854年，这个巴拉圭代表团离开巴黎到达马德里，企图签订一项条约未成。洛佩斯在伦敦所购买的小战舰“塔库阿里号”于1854年11月11日在法国波尔多市搭载这个代表团，次年 1 月21日到达亚松森。卡洛斯·佩雷伊拉说，这次欧洲航行，“增强了他的热烈的爱国主义觉悟”。

这位当然继承人返回亚松森后，发现他父亲

和巴西正进行一场严重的争执，并正从事解决北部边界问题。巴西为了通航到马托格罗索，要求在巴拉圭河自由航行。巴西要求南至阿帕河；巴拉圭有同样充分的理由，如果不是更充分的话，要求北至布兰科河。1855年2月20日，一位巴西的海军上将唐·佩德罗·费雷拉·德·奥利维伊拉带着一支威慑性的部队——载着一百三十门炮，二千零六十一名海军陆战队和三千名步兵的二十只炮艇，出现在乌迈塔要塞下游。洛佩斯得悉这支军队正在途中的消息后，便派其子集结六千人的兵力，很快在乌迈塔设防，然后通知巴西海军上将切勿靠近。

洛佩斯力图结束和巴西的北部边界争端，派他的亲信外交部长何塞·贝尔格斯去和诡计多端的何塞·马里亚·德·西尔瓦·帕兰奥斯进行谈判。这一次，巴西人也遇到一个几乎同样狡猾的人。1856年4月签订了条约，规定六年内讨论巴拉圭河和巴拉那河自由航行问题并裁决两国边界。洛佩斯本来不愿批准这个危及清楚地属于巴拉圭领土的协定，但是当时克里米亚战争已结束，他害怕法国会强烈抗议他对新布尔德奥斯法国移民

的待遇。所以，他批准了这个条约，但正如他对英国领事所说的，他完全料到战争不可避免。洛佩斯发布命令阻止巴西人在巴拉圭河上航行，唐·佩德罗二世和他的大臣十分恼怒，便派遣西尔瓦·帕兰奥斯去亚松森交涉。这个特使先拜访阿根廷的乌尔基萨，签订了拉普拉塔河流对各国开放的条约，并叫嚷"巴西帝国和阿根廷联邦之间结成最紧密的联盟"，以此威胁洛佩斯。1858年1月西尔瓦·帕兰奥斯到达亚松森时，洛佩斯知道自己孤立了，派他的儿子弗朗西斯科与这个巴西人谈判，签订了同意自由航行的协定。巴西用巧妙而狡猾的外交手腕以智取胜了洛佩斯，这件事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是永远不会忘记的。1859年，巴西轮船举行从里约热内卢到马托格罗索的库亚巴定期航行的通航典礼。1856年条约六年期满后也没有对边界进行裁定。洛佩斯不愿履行这个条约，巴西代办气冲冲地离开了亚松森。争执搁置了下来。1862年9月10日，狡黠的独裁者临死时，嘱咐他的儿子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要处理，但是不要试图用剑，而要用笔去解决它们，这首先是对巴西。"这是卡洛斯·安东尼奥的遗

训。根据沃什伯恩的记载，当时他的儿子问帕德雷·菲德尔·迈斯道："他死了没有?"他确知他父亲已死时，就赶快到内室占有他父亲的文件，而当时他兄弟贝尼尼奥·洛佩斯正把老独裁者抱在怀里。

巴西和巴拉圭的六年条约只不过是对时间的赌博，在此期间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然而无论如何，巴西是不愿输掉这一局的。与此同时，洛佩斯一再扩充他的军队，而巴西也在布兰科河北面的马托格罗索加强其防卫。一场和巴西有关边界问题的军事冲突在酝酿着，但它在何时何地爆发，还不能预料。卡洛斯·安东尼奥和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本来就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当然，如果一个合乎巴拉圭要求的和平解决方案能达成的话，他们谁也不愿挑起冲突。当战争真的爆发时，弗朗西斯科·索拉诺却由于在乌拉圭两派斗争中将赌注押在错误一边，和他唯一可能的盟友阿根廷敌对起来，而可悲地犯了大错。

巴拉圭和英国的关系经过几年勉强的来往后，达到了僵持的阶段。1853年的条约还有两年到期，性急的英国特使 W·D· 克里斯蒂就于1858年

前来谈判重订新约。他预计二十天可以完成任务，但在一个仅仅考虑怎样准备好一件事就至少需要很多时间的国家里，二十天是做不成什么的。这位特使未能签订新约而离去。随后发生了坎斯泰特事件。

卡洛斯·安东尼奥喜爱到剧院，那怕是巴拉圭的剧院。也许有一帮土著人计划给总统阁下一枪，作为余兴使演出更为精彩。至少这是独裁者在1859年2月18日所宣称的事。被指控卷入这桩谋杀计划的许多人当中有圣地亚哥(詹姆斯)·坎斯泰特。他是一个商人、冒险家、领航员和纨袴子弟。据推测他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巴拉圭的一伙流亡者的特务，从其不肯定的血统看，还可能是个半英国人，他在1852年带着一张乌拉圭护照来到巴拉圭。在这个捏造的阴谋后面，实际上是一件盗用公款案。德科德四兄弟之一曾经是洛佩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售马黛茶的一个代理人。经过若干年，这一代理人已从他的主人那里盗窃了大量款项。当所有引诱这个盗款人回亚松森的努力都失败后，就策划了这个阴谋，其目的在于没收德科德的财产。不幸的是，卡洛斯·德科德也是弗朗西斯

科·索拉诺争夺卡梅里塔的情敌。洛佩斯关押了坎斯泰特、德科德家的两兄弟及其他六、七个人。英国领事C·A·亨德森出面为这个自称是英国公民的坎斯泰特交涉，独裁者耍两面派，拒绝释放他。爱德华·桑顿是英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代办，搞了一个巧妙的计谋。弗朗西斯科·索拉诺在阿根廷首都成功地调解了恩特雷里奥斯的“考迪罗”乌尔基萨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间的争执后准备返国，桑顿劝说英国海军舰队司令用两艘战舰“巴扎德号”和“格雷珀拉尔号”扣留巴拉圭的以佩德罗·伊格纳西奥·梅萨为舰长的“塔库阿里号”军舰，当时卡洛斯·安东尼奥的儿子正在此舰上，将于1859年11月29日溯流上驶。弗朗西斯科·索拉诺在断定难以保证英国水兵不进行战斗之后，就上了岸，从陆路到巴拉那河再乘船返回亚松森，这更增加了他父亲对英国人的愤怒。坎斯泰特获得了自由和一笔损失赔偿；而德科德弟兄则被枪决了。

巴拉圭和美国的关系在1845年开始时还是真诚的，但不久便起了剧烈的变化，这主要是因为发生了与热心的霍浦金斯的争执以及关于“水妖号”的争执。1845年，爱德华·奥古斯塔斯·霍浦

金斯作为美国特别代表第一次出现于巴拉圭。他来得正是好时机，洛佩斯正在扭转弗朗西亚时期的冬眠政策。霍浦金斯找到了帮助独裁者，同时又为自己发一笔大财的一个机会。这位圣公会主教的儿子，一度是教会的风琴师和水手，是个不安定的游客，他的才智使他看到和南美经商的大好机会。1845年6月16日，他辞去海军里的职务，这使他的上司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辞职后，有一天霍浦金斯说服詹姆斯·K·波尔克总统提名他为驻巴拉圭的特别代表。他当时二十二岁，充满了赤诚、急躁、热情和充沛的活力，而且敢作敢为达到轻率的程度。波尔克总统的国务卿詹姆斯·布坎南，指示他的年轻代表去决定是否应该承认巴拉圭。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项秘密使命，因而霍浦金斯不到必要时是不能显示其政府官员身分的。特别代表霍浦金斯，象在他之前的卡维萨·德·巴卡那样，从巴西徒步走到亚松森，这不是为了节省时间，而是为了得到关于这个国家的直接知识。在首都，霍浦金斯显示自己是一个重要人物，向洛佩斯保证美国会很快承认他。1845年11月，他写信给布坎南说，巴拉圭是次于美国的“新大陆中最富强的

一个国家”。

霍浦金斯在他这次为期仅两个月的第一次访问中，除流露乐观主义外，还做了一些其他的事。他提出调解巴拉圭和罗萨斯之间的争执，并训诫罗萨斯应该怎样行事。虽然以后霍浦金斯的行动没有得到美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代办威廉·小布伦特和布坎南的承认，但他却遐想更伟大的事情：即实现玻利瓦尔关于建立一个解决美洲人之间全部争执的联盟或委员会的梦想。他的行动虽被否定，但并未挫伤这个阿尔及尔[1]式的冒险家。以后的五年中，他对巴拉圭和其他国家进行了长期访问，会见了知名人士，乘独木舟勘查巴拉圭河和巴拉那河。哈罗德·F·彼得森认为，“也许他比任何巴拉圭人还要了解巴拉圭；肯定地说，他是对巴拉圭的政治和自然资源最精通的美国人”。他在国内不时地写文章，赞扬巴拉圭的前途，竭力主张贸易往来，还介绍巴拉圭的历史。在美国对墨西哥、中美和古巴进行掠夺性远征的那十年中，他是

① 阿尔及尔（Horatio Alger，1834—1899）：美国作家，以写少年读物出名。所写小说多种，主题都是一个，即穷孩子由于美德与勤劳，可望得到财富与名誉。——译者

头等的“好邻人”。霍浦金斯要求有良好的外交工作和科学的探险，要求贯彻“门罗主义”的创始人所曾提出的主张。至于他个人，他请求洛佩斯授予他组织的一家轮船公司在巴拉圭河流上有十五年的垄断航行权，以及引进工业机械装备的垄断权，以此作为制造砖、卷烟、木材和纺织品的起点。

霍浦金斯经常向美国官方请求任命他做领事，最后在1851年2月14日得到了这个职位。那时他在巴拉圭，洛佩斯就要提名他为赴美国的特使。2月25日，独裁者决定这一任命，并向其代理人详细指示了他应完成的任务。这些指示说，霍浦金斯长期侨居巴拉圭，熟悉共和国的一切情况，他的高尚品德使他成为代表洛佩斯去华盛顿的理想人物。和阿根廷的不和，也许就是洛佩斯寻求新友好国家的原因。1846年不是曾经有美国的使者调解过他们的争执吗？由于战争的再次威胁，巴拉圭需要外界的支持。因此，一位从美国来的公使，肯定会受到欢迎，而且可能在亚松森签订一项通商条约。霍浦金斯必须使美国政府深刻了解巴拉圭需要和平，它对孤立和经常备战感到厌倦。同时，他还必须发现罗萨斯在各国的代理人在干什么。

霍浦金斯为此伸手要一笔私礼：这就是他曾一再要求的在巴拉圭河上轮船航行的垄断权。这种垄断权不应给未承认巴拉圭独立的国家的公民；但是，霍浦金斯如果能乘一艘结构最好的轮船返回亚松森岂不壮观得多？如果他出使成功，他就能得到十年的垄断权。加之，由于世界对南美洲的内陆如此无知，巴拉圭会欢迎和帮助一个科学家的水上探险。霍浦金斯可能要招致麻烦，科学的探险也会招致麻烦，而洛佩斯不批准1853年的条约①，将会招致更多的麻烦。

霍浦金斯于1852年返国，为洛佩斯所要求的一切而奔走，而且取得很大成功。他以十万美元的罗德艾兰②的资本组成了“美国和巴拉圭航运公司”。霍浦金斯作为该公司的代理人，将分享一部分利润和适当的薪金。作为美国驻亚松森的领事和该公司的代理人，他的事务是可以兴旺起来的。由该公司派去的第一艘河运轮船“巴拉圭号”，运

① 指1853年3月洛佩斯与美国签订的通商航运条约。——译者

② 罗德艾兰（Rhode Island）：位于美国东部的一个州。——译者

去了各种机械设备："蒸汽机、道路刮土机、切纸机……蒸汽轮锯、榨甘蔗机"和许多工匠。但"巴拉圭号"在巴西海面沉没，损失了大部分的船货。霍浦金斯带着他所能抢救出的货物，于1853年10月17日到达亚松森，受到洛佩斯的热烈欢迎。在亚松森及其南面十哩的地方，各种工程在霍浦金斯指挥下开工了。锯木厂开业了，砖制造出来了，烟草加了工。事情顺利地进行了一些时候，但到1854年7月，洛佩斯开始翻脸。先是瞪眼皱眉，接着就是想要没收霍浦金斯的企业，并令人吃惊地指控霍浦金斯是走私犯。一天，一名巴拉圭军人用军刀砍了霍浦金斯的兄弟。霍浦金斯手持马鞭身穿骑装，狂怒地要求洛佩斯惩罚犯罪者。洛佩斯最初有和解的意思，但霍浦金斯坚持必须在《周报》上登出这次处罚的报道，洛佩斯就发怒了。这是霍浦金斯在巴拉圭的结局，但不是在南美洲的结局。洛佩斯撤销了他的领事认可书，没收了公司的执照，而且驱逐了一度曾是他的伟大的好朋友。1855年12月至1862年8月，路易斯·班伯格担任美国驻亚松森的领事，没有取得什么成就。"美国和巴拉圭航运公司"曾向华盛顿长期大声呼吁，直到1858年仍无

效果，而这时“水妖号”卷进来的麻烦已经发生了。

巴西和阿根廷沿河省份争取的目标之一，是要开放拉普拉塔水系的航行权。这一要求由乌尔基萨在 1852 年 8 月28日发布的一项命令完成了。“许多能通航的河流开放了，这些河流为一块不少于八十万平方哩的地区提供了与大西洋相联系的通路”。因为有关拉普拉塔河流的资料很少，美国承担了科学考察任务，这个任务在1853年2月委托给托马斯·杰斐逊·佩奇中尉。在其他任务中，佩奇还负责谈判一项同巴拉圭通商和航运条约。供这次探险用的“水妖号”是一只四百吨、吃水九呎、带边轮的汽船，装有三门铜曲射炮。4月，在里约热内卢，巴西政府授权佩奇溯流航行直到阿尔布开克，后又给予他勘查流经巴西领土的巴拉圭河各支流的许可证。佩奇于10月抵达亚松森，受到洛佩斯很好的接待，而且允许为他提供燃料和其他供应。根据中尉的观察，洛佩斯有“高度才智和学识，并熟悉外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他也是一位熟练的，但象我后来所发现的不讲理的外交家”。当霍浦金斯接受副领事的任命到达时，佩奇还在亚松森。

佩奇向上航行到巴西领土的科仑巴，又转回

亚松森。可是,这时洛佩斯已对霍浦金斯发生了怀疑,因而也以恼怒的语气申斥佩奇越出了巴拉圭的国界。他说,巴西会立即要求同样的特权。虽然如此,但是洛佩斯仍允许佩奇用一只亚松森制造的小船去贝尔梅霍河进行勘查。佩奇在绘制河流图和收集矿物、动物标本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当洛佩斯与霍浦金斯的纠纷已严重到迫使公司停止活动时,佩奇曾试图调解。洛佩斯不听。霍浦金斯及其同伙准备万一洛佩斯不发给护照,就乘"水妖号"离开。这位独裁者总算同意了,但仅仅同意给公司成员发护照并由海关发给放行他们财产的许可证。他们离开以前,警察虐待了其中一些人,佩奇向洛佩斯申诉无效。霍浦金斯启程时,发现洛佩斯想要公司所有的文件,包括土地购买证在内。尽管有这么多困难,佩奇还是使他们安全脱身了。他报告说,洛佩斯害怕了,因为他料想会有炮轰,准备乘车逃跑。这个行动如此不合情理,可能是个虚构的情节。

1853年3月4日,洛佩斯和美国签订了一项条约,签订后不几天就被批准了。条约在技术上的错误多得使美国参议院不得不对它进行修正并由

国务卿威廉·马尔西责成佩奇去交换批准修正文本。但因佩奇的信使于1854年10月带到亚松森的英文照会没有西班牙译文，巴拉圭外长拒绝阅读。1856年11月，专员理查德·菲茨帕特里克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向尼古拉斯·巴斯克斯外长解释这个修正问题，这位巴拉圭人通知他说洛佩斯已批准了条约的原本，于是事情搁在那里了。

有一次，"水妖号"不在跟前，洛佩斯发布命令封锁巴拉圭的河流，不准外国战舰出入。佩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补充了供应后，准备去勘查巴拉那河，这是一条具有国际性的河流。1855年1月底，佩奇自己去萨拉多，留下威廉·N·杰弗斯中尉驾驶"水妖号"上溯巴拉那河。在离汇流处，即巴拉那河和巴拉圭河汇合点不几哩远的地方，有一个巴拉圭人的伊塔皮鲁哨所。2月1日，当这只船驶到这一哨所的对面时，受到有人用西班牙语的盘问。杰弗斯使船从沙洲上脱出后，就顺着靠近巴拉圭岸边河道航行，拒绝停止前进。为此，从要塞发来一炮，打死了舵手，还打掉了舵把。杰弗斯还击，可能打死数名巴拉圭人，然后返航报告。他向舰队司令W·D·索尔特汇报了这一无礼行动；但由于

军舰“日耳曼城号”和“大草原号”正在拉普拉塔河上航行，索尔特拒绝采取任何行动。

来自“美国和巴拉圭航运公司”的控诉，现在和条约事件以及“水妖号”事件联系在一起了。布坎南总统在1857年12月致国会的咨文中，申述了这些事件并要求授权坚决与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交涉。1858年6月，国会表决以一万美元作为惩戒的支出，10月17日，詹姆斯·B·鲍林从纽约启航前往处理这些事件。鲍林不是只身前往的，有两千五百人分乘以二百门炮武装的二十艘军舰随行。到1858年底，鲍林由舰队的一小部分护送抵达亚松森。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巴拉圭同意赔偿“水妖号”舵手的家属一万美元；1859年2月4日签订了一项给予巴拉圭河航行权的条约；“美国和巴拉圭航运公司”的请求有待仲裁。给予鲍林的指令是，他可以接受五十万美元的现金赔偿，或者如果必需使用武力的话，要坚持一百万美元的赔偿。沃什伯恩认为，乌尔基萨将军得知美国远征队到达蒙得维的亚后，甚为惊慌，因为一场美巴战争对恩特雷里奥斯省会产生有害影响。有人，也许是鲍林自己，让乌尔基萨得到了指令的副本，以便把它

送给或带到洛佩斯处，敦促他避免这场冲突，并争取支付一笔较小的赔款。这样，就使洛佩斯好好地准备和鲍林交涉。独裁者否认巴拉圭欠霍浦金斯任何东西，但仍然提出愿付二十五万美元以了结这一纠纷。踏入巴拉圭的谈判者从来没有象鲍林那样天真，他宽宏大量地提出把这一案件提交仲裁。

仲裁委员会于1860年6月在华盛顿开会，听取公司的辩护律师提出的申诉，但霍浦金斯和他的朋友在仲裁委员会的申诉程序中完全失败了。J·曼德伊列·卡利斯累为巴拉圭辩护，反对公司提出的关于实际的和无形的损失赔偿费超过一百万美元的要求。凯夫·约翰逊和何塞·贝尔格斯审理了这一案件，作出巴拉圭什么也不欠这家公司的裁决。他们认为，霍浦金斯没有按1854年8月的法令行事，该法令要求每一个外国的商业代理机构和企业必须得到巴拉圭的特许执照。霍浦金斯事实上申请过执照，但被洛佩斯拒绝了。仲裁委员们不承认谁申请执照巴拉圭就会发给谁的这种单纯假想。贝尔格斯争辩说，霍浦金斯购买圣安东尼奥的锯木场地基时，没有付款给真正所有主；

另外，这笔买卖和其他几笔买卖，公司并未得到政府的同意。约翰逊痛斥这家公司高喊损失而迫使美国只得受理这一事件；痛斥它“靠着不严密的记账方法不断地增加赔偿要求，这不是罪恶的也是惊人的夸张；对巴拉圭总统和人民的恶意的和预谋的攻击——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把钱装入原告的腰包这个唯一目的”。

公司的赔偿要求尽管被夸张了，但也称不上是犯罪。在霍浦金斯的坚持下，布坎南总统要参议院重新审查这一裁决；参议院知道它没有权力这样做，严肃地拒绝了。但公司并未罢休。1861年7月，林肯总统指示查尔斯·艾姆斯·沃什伯恩处理这件事；但洛佩斯拒绝重审这一案件。在三国同盟之战中巴拉圭战败后，美国国务卿贝阿德告诉美国代办 E·培根再次提出这一问题。这次巴拉圭外长何塞·塞·德科德于1887年 8 月12日同意以九万美元的黄金支付给公司，但议会否决了这笔拨款。1888年5月，一项新的议定书再次被否决。几个月后，霍浦金斯死于华盛顿。不管鲍林曾是多么愚蠢，但在一个不利于公司的仲裁决定后，美国仍坚持提出这种性质的要求，是不体面的。

卡洛斯·安东尼奥又胖又老，他知其寿命将尽，就准备了一项法令，实际上是将政权传给他的儿子弗朗西斯科·索拉诺。这项法令是完全合法的，因为唯命是听的议会已经授权洛佩斯提名一个临时的继承者；但是宪法却剥夺了弗朗西斯科·索拉诺的资格，因宪法上写明政府不能成为任何一个家族的世袭财产。多少年来，巴拉圭已经成为洛佩斯家族的世袭财产，而且将会在弗朗西斯科·索拉诺统治下继续下去。

巴拉圭的狡黠的独裁者死于1862年9月10日。以隆重的仪式将他葬于距首都四哩的圣特斯马·特里尼达德教堂的圣坛之前。巴拉圭同他一起被埋葬了，因为八年后他的国家濒临灭亡的边缘。卡洛斯·安东尼奥曾试图成为明智的独裁者。他结束了弗朗西亚的与世隔绝的政策，改进了交通，建立了一支军队，增进了对外贸易，而且在和强有力的对手的斗争中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就。也许他是统治这个国家五十多年的三个独裁者中最好的一个。在“泛美联盟”的《公报》这个对任何事情都只褒不贬的杂志中，马里亚·伊里纳·约翰逊对卡洛斯·安东尼奥描写道：“他有一个非凡的灵魂；

它梦求伟大，尽最大的努力去打破障碍，克服困难。说他是他所处的环境的产物，毋宁说他领着一支救世十字军对抗这个环境。”这篇华丽的颂词大部分是一派胡言，他不过是个巴拉主人，不过是他的环境的产物。

第十三章

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与强权政治

按照卡洛斯·安东尼奥的法令条款规定，将由一个三头执政进行统治，直到人民选出一位新总统为止。作为副总统的弗朗西斯科·索拉诺不仅控制了三头执政，而且还控制了开会解决继任权的议会。他的步兵和骑兵包围了政府官邸，以备万一。有两个敢于指出按巴拉圭宪法他没有被选资格的人，第二天开会就不见了，以后开会再没有见到。必须指出，有些作者否认关于三头执政的说法，坚持认为弗朗西斯科在他父亲死后立即夺取了政权。教会长老菲德尔·迈斯是这一说法的权威：卡洛斯·安东尼奥起初提名他的小儿子贝尼尼奥作为副总统来召集议会，但是当弗朗西斯科听到这个指定后，匆忙从乌迈塔赶回，逼迫老独裁者改提他的名。不管实际情况怎样，洛佩斯第二在

1862年10月16日正式上任，做了巴拉圭共和国的“最高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位新“元首”上台不几周，就开始进行镇压。到1862年12月，菲德尔·迈斯和其他四百多人遭到怀疑，或被投入监狱或被监视，其中有贝尼尼奥·洛佩斯，他被因禁家中，关在他自己的一个庄园里。

要得出一个有关洛佩斯第二的客观看法几乎是不可能的。许多书把他贬为国家的狗屎堆；也有一些书走到了另一极端。在后一类书中，有胡安·奥莱亚里写的史诗《索拉诺·洛佩斯元帅》——这篇颂词格外值得注意，因为作者的母亲和许多亲属都被洛佩斯拷问过。雷沃德把奥莱亚里从一个怀有刻骨仇恨的反洛佩斯派转变为一个怯懦的崇拜者的原因，归之于恩里克·洛佩斯给了他五十里格① 土地作为礼物。奥莱亚里的序言应详细摘引，这不是由于它的真实，而是把它作为盲目到极点的一个代表。我们可以抽出其热情洋溢的几段作为样本：“受过敌人恶言的嘲笑，也受过颂扬者褒词的尊崇，他已觉察生前死后最灿烂的荣誉高峰和最深沉的谴责暗影。此时此刻，他巨人般的形象

① 原文如此，里格恐系平方里格之误。——译者

依然屹立于高台之上，顶着激怒的飓风和时间的毁损，没有东西能将它推倒，没有人能贬低他悲壮的一生……在他宏大的墓冢上，在他山似的寝陵上，总是点燃着一盏‘永不熄灭的葬灯’。透过它颤动、飘忽的光辉，子孙后代看到他宛如在熹微的晨曦中，庄严地显现在遥远的地平线上，脚踏大地，额顶青天，犹如普罗米修斯[①] 在哀思。”让圣马丁和玻利瓦尔脱帽侍立一旁，而弗朗西斯科·索拉诺带着神光走过，用他的元帅杖指着佩德罗二世身旁的一大盘金刚石。天上出现了一颗新星——神祇的圣冠上又一颗光彩夺目的宝石。

这个巴拉圭的第三位独裁者有极为复杂的性格。熟知他又恨透他的马斯特曼仍然比较公正地描写他道：“从个人说，他并没有很威严的仪容，只有五呎四吋高，特别胖——晚年更加臃肿蹒跚。脸非常扁平，几乎没有什么贵相。头长得还端正，但前额窄小，后脑勺却很发达。脸的下部又宽又结实，一副凶相，这是从他的瓜伊库鲁祖先那里得来

① 普罗米修斯 (Prometheus)：系希腊神话中赋予人类以生机的神，因偷天火并教其用法给世人，因而获罪，被诸神之王缚于山上，每天命一鹰啄其五脏以苦之。——译者

的特点，而且这标志着他的性格，这是一张残暴和好色的脸。一双长得有些过分贴近的眼睛，未能使这张脸有所增色。他高兴时，神态还很谦和；但狂怒时，就凶相毕露；一个未开化的印第安人从一层薄薄的文明外衣下透露了出来，就象哥萨克从一个发怒的俄罗斯人身上表现出来一样。不论在公众场合还是在私人交往中，他的谈吐很好，虽然由于缺少下牙他的发音有缺陷，而且音调低得离他较近的人才能听清楚他讲话的大意。"乔治·汤普森中校由于在巴拉圭居住十一年，在和平时期和战时曾忠实地为洛佩斯效劳而了解他。这位自学的军事工程师透露，这个独裁者是一个爱好奢侈品、华丽服装、佳食、美酒和贵重烟草的人。他自私、阴沉、懒惰、狡猾、自尊心强、傲慢、意志坚强而有才智。洛佩斯能讲西班牙语、法语、瓜拉尼语，英语也会点。这位独裁者能做到举止温和，和有文化的欧洲人一样和蔼，至少外表看去是个有身分的人。他还是有感情的，如果对他的许多别的孩子没有表现什么感情的话，对林奇夫人所生的几个孩子却是钟爱的。

甚至奥莱亚里也不能说他所赞美的英雄的一

生象山巅的白雪一样纯洁。在卡洛斯·安东尼奥独裁统治的日子里，首都城外的一所小茅屋前，有一个装饰着精致丝带和美丽花束的黑色木十字架。一个可爱的穿丧服的姑娘在抽泣，在没有人走近去看时，就对着路边的神龛跪下，独自地倾吐她的悲情。她就是卡梅里塔，一度是亚松森的美人，唐·卡洛斯·德科德的未婚妻。弗朗西斯科·索拉诺动了心，暗示要和她私通，遭到了她的嘲笑。此后不久，唐·卡洛斯·德科德和他的兄弟被捕，指控他们阴谋刺杀独裁者。当然，他们都被处决了。唐·卡洛斯赤裸裸的尸体被扔在他母亲门前的大街上。卡梅里塔在那里看到了。这黑十字架就成了她被惨杀的爱人的纪念碑。卡梅里塔的呜咽和孤独的猫头鹰不绝的悲鸣交融在一起，这是对要反抗弗朗西斯科淫荡要求的别的姑娘的警告。

卡梅里塔不过是许多反抗洛佩斯家族的勇敢的姑娘中的一个。恐怕更悲惨的是潘查·加门迪亚事件。她本是个孤女，成长为“亚松森的骄傲和珍珠”。许多青年竞相求婚，但都被弗朗西斯科·索拉诺吓跑了，因为他渴望霸占她，如同他霸占过许多别的姑娘一样。潘查宁死不从。这个被嘲笑的

浪子一直等到成了总统后才去报仇。于是他把潘查·加门迪亚监禁了起来，施以毒刑，但未能使她屈服。最后，两下枪刺结束了她的生命。这位亚松森少女贞洁终生，帕德雷·菲德尔·迈斯这个头号拷问手曾颂扬道："潘查·加门迪亚，美丽而不幸的潘查，是女性的淑德和光荣。正如法国奥尔良的圣女贞德[①]一样，她是巴拉圭的圣女。"

要对弗朗西斯科·索拉诺的性格作出任何评价，都必须考虑他在三国同盟之战期间的兽行。这个恶魔似的独裁者怀疑他周围的每一个人，对成百的无辜受害者处决之前，进行严刑拷问。一般的鞭打、重镣铐、饥饿以及其他拷问的方法，同那在折人脊骨和意志方面起显著作用的"乌拉圭阿纳"刑罚相比，只不过是儿戏。一个英国石匠阿隆索·泰勒以亲身的经历描述了这种刑罚及其使用方法："我坐在地上双膝上举，双腿首先被紧紧绑在一起，然后把双手绑在后面，手掌朝外。一支毛瑟枪绑在双膝下面，另有六支枪束成一捆放在肩上，上下的毛瑟枪一头用皮绳结在一起，另一头从下

① 圣女贞德（Joan of Arc）：英法百年战争中解救了奥尔良城之围的法国女英雄。——译者

到上打个活结；两个士兵在这一端用力把绳拉下，强使我的脸贴到我的双膝，然后绑上。”一个囚犯经过这种刑罚不几小时，就往往什么罪都情愿供认了。有的时候，如果这种“乌拉圭阿纳”刑罚失败了，囚犯的手指就会被木槌捣碎。

战争期间，除洛佩斯以外，谁都知道巴拉圭无疑地被打败了。而这位独裁者却相信他揭露了一个谋害他的生命和国家的大阴谋——他认为他的生命和国家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洛佩斯的多疑的思想里，一个可恨的蜘蛛坐在蜘蛛网的中心。这个蜘蛛名叫查尔斯·艾姆斯·沃什伯恩，是美国驻巴拉圭公使。因为这一臆想的阴谋，成百的人被逮捕和处决。据官方数字，从1868年6月19日到12月14日，五百九十六名囚犯死掉了。怜悯也好，对兄弟姊妹、性别和年龄的考虑也好，一概不妨害这位总统的虐待狂。他的爱哭鼻子的下属，唯恐危及自己的生命，在他们认为可以讨好主人的暴行中，狂热地努力争功，他们不过是十恶不赦的卑鄙的恶人的走卒。

在那场战争的早期，洛佩斯对他的军队遭到失败非常愤怒。巴埃斯博士写道：“他在圣费尔南

多建立了他的行营，在那里，他对臆想的叛国阴谋犯和奸细组织拷问和虐杀。根据参谋长弗朗西斯科·伊西多罗·雷斯金的可信的日记以及唐·何塞·法尔康的确认，由于臆造的罪行被处决的有名人物达一千人，至于七、八千因稍有冒犯而被枪毙的士兵，以及几百个仅仅为了夺取他们的珠宝和白银而被枪杀的家族还未计算在内。在这个暴君的牺牲者中间，有人估计有成百个高尚的妇女和年轻姑娘，其唯一的罪行就是因为她们是假想的阴谋者的母亲、妻子、女儿和姐妹。”这些话是苛刻的，但这位巴拉圭卓越的历史学家讲的并没有到此为止。“这个给人初次印象是一个活跃而精力充沛的人，投入了他的宠人儿——一个英国女人伊莱扎·阿利西亚·林奇的怀抱。他把国家的命运委弃于他所挑起的一场战争冒险之中。”没有人能相信独裁者所许诺的东西：“自从洛佩斯征召所有十一岁以上的男子入伍后，妇女被迫成为供给士兵衣食而在田野里劳动的志愿队。她们栽植木薯、玉米和葫芦给他们吃；栽植棉花，给他们做衣穿。这位专制者颁布法令，对纺织布匹的贫苦妇女给予奖励；但这些奖励从来没有给过任何人。在五年

中，所有的战时劳动都由人民无偿提供。在此期间，专制者强制征收金银币和家庭珍宝以饱其私生子的母亲的私囊。”

简言之，他的批评者指责洛佩斯把战争作为牺牲富有家族而使自己致富的一个借口，制造阴谋骗局以消灭财产所有人，命令驻外使节把他们占有的钱财送至各个欧洲国家开设账户，占夺教会的金银器皿归他私用，把政府公款送到伦敦存入他私人账户，利用军队为他的姘头和孩子们建设房屋，而且经常侵吞公款给伊莱扎·林奇。

弗朗西斯科·索拉诺的严厉批评者承认他偶尔宽宏大量，兴之所致地对囚犯从宽处理，摆出仁慈的姿态。但他们也谴责他对其兄弟和亲属怀有深刻的嫉妒和不信任，这种嫉妒对一个把自己看成巴拉圭的拿破仑的人来说是十分不相称的。人们不用过分费力去想象，就会承认他对国家是绝对忠诚的。如果在什么时候他曾有过不忠之念的话，在他的行动中却从未显示出来过。在三国同盟之战期间，巴西和阿根廷“始终准备为他建起一座金桥”，如果洛佩斯接受他们的建议，本来可以为他的余生带来他所一向爱好的安逸生活，但他蔑

视所有这一类的提议。这位独裁者酷爱华丽的服饰，镶金边的猩红色斗篷、最好的皮革做的靴子、银马靴刺、富丽的家具甚至一顶拿破仑式的王冠。一个皇家头饰的石膏模型从巴黎运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也许这个王冠是林奇夫人的理想，无疑地她宁愿做个皇帝的情妇，而不愿做个独裁者的情妇。

据荒诞的传说，在三国同盟之战期间，有个美丽的女冒险家骑着一匹骏马，带领巴拉圭妇女参加战斗。这个传奇式的女骑手就是伊莱扎·阿利西亚·林奇——一位漂亮而可爱的（即使稍有缺陷）姑娘。1835 年她出生于爱尔兰的一个正派人家，十五岁那年，她嫁给一个叫让·路易·阿蒙·德·卡特勒法格斯的法国军官，和他一起生活了三年。根据她的毁谤者所流传下的故事，她的丈夫离开她之后（也许有充足理由），伊莱扎使一个俄国贵族着了迷。关于伊莱扎的身世与众不同。她的健康不佳，她的婚姻不完全合法。她回到英国和她母亲一起生活了一些时候，又和她叔父一家住在一起。后来和她的母亲到巴黎，生活得很正派。1853年遇到了洛佩斯。这位未来的独裁者爱上了

伊莱扎；她有极大的野心，看出这个佩带勋章的巴拉圭人会把她载往五彩云端的天国城堡。她成了他的情妇，随他到了巴拉圭。她那华丽的长裙、迷人的美貌、语言的技巧、奢靡的筵席以及端庄的豪饮，使本地人感到惊奇。

林奇夫人——人们这样称呼她，在现在的西班牙大街巴拉圭旅馆一侧有个舒适的寓所；至少，传说是这样。她给洛佩斯生下五个或六个孩子，即使不能使他继续爱她，也能做到对她宽容；尽管身段渐粗，有了“双下巴”，但风韵犹存。伊莱扎作为一个“马背上的女人”和特鲁埃战争中的海伦[①]一样都不是巾帼英雄。同样可笑的说法是，在巴拉圭战争中她自始至终在她爱人身边。她确实和他在乌迈塔要塞呆过，和他一起逃到阿基达班河，最后在塞罗科拉埋葬了他和她的一个儿子于浅坟之中。但是，至于打仗，则是另一回事。也许她喜爱她的怪物情夫，没有他，她在亚松森社会里的处境是不愉快的，因为正派人总是在孩子下生前结婚的。

---

① 特鲁埃战争中的海伦 (Helen of Troy)：出自希腊神话，海伦系斯巴达王的王后，因被巴里斯拐去，遂引起特鲁埃战争。——译者

林奇夫人既然得不到一种合法的私通的愉快，就不得不满足于某种不甚稳当的身分。

1855年早些时候，年轻貌美的伊莱扎带着八百盎司黄金来到巴拉圭。十四年中，她使这笔不多的金额象变戏法一样翻番增殖。她除了通过情夫的赠礼得到许多房产以外，在皮科马约河南还有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公顷的土地，在巴拉圭河东有五百万公顷的土地。1865年，当战事有成为灾难的危险时，洛佩斯托法国军舰“德西迪号”把大笔款项运出国外，其他的珍宝、黄金和白银等财物据说运到了美国。洛佩斯和他的情妇可能曾希望在那里度过他们的晚年。1868年2月，撤出亚松森时，许多家族将其所余财物寄存于美国使馆，甚至伊莱扎也把几个珠宝箱在那里存放了一个时期。在1868年的阴谋案中，帕德雷·菲德尔·迈斯和西尔维斯特雷·阿维罗少校所拷问过的许许多多牺牲者的财物，都到了林奇夫人手里，并在这一年末都从安戈斯图拉运了出去。确实如查尔斯·沃什伯恩所谴责的那样，拷问和杀害了成百的人，使“这个缺德的、自私的和残忍的女人”发了财。1869年7月，美国公使沃什伯恩的继任者麦克马洪将

军离开巴拉圭时，据塞西略·巴埃斯指控说，他曾带出了四千四百盎司的黄金和五千六百枚银元，用威廉·斯图尔特医生的账户存入英格兰银行。这位医生给了伊莱扎一个声明书说明这些财宝是属于她的。不能运出口的珠宝箱被埋在洛佩斯最后出逃的沿途，而那些埋箱子的人也和财宝一起被埋葬了。甚至今日，巴拉圭人还谈论守护洛佩斯所藏财宝的幽灵。

洛佩斯知道他血腥的生涯快要结束，给麦克马洪将军一个注明1868年12月23日的遗嘱附录，把他所有的财产留给伊莱扎·林奇。1870年战争结束时，这位女冒险家被放逐欧洲。她在法国住了几年，花光了她的财产，到耶路撒冷苦行赎罪，最后死于贫困之中。对洛佩斯·索拉诺的影响之大谁也超不过伊莱扎。她忠实于主人，而且在巴拉圭悲剧中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

历经巴黎的繁华生活后，亚松森在伊莱扎看来未免有些单调，但弗朗西斯科·索拉诺答应改变这些状况。他想作一个建设者。堂皇宏大的建筑物必须在亚松森修建起来，好向世界宣扬洛佩斯的伟大。建筑了一个有院墙和拱门的大剧场，但没

有房顶，因为建筑师不知道怎么盖上去；总统府很堂皇，但未完成；火车站、邮政局、海关署都处在不同的建筑阶段；所有这些都留下来希望作为纪念碑，虽然不是完工的纪念碑。这个城市的两万居民依然住在弗朗西亚时代他们所住的平房内。凋敝的河运贸易利用着倾塌的码头，一条浑浊的小河把码头和城市隔开。小河上有一座随时都有坍垮危险的古老桥梁。过桥到市中心去，右边有一个未建成的兵工厂。洛佩斯很聪明，没有亲自去管理，而是雇用了一位叫W·怀特黑德的英国人来管理这项工程；但是怀特黑德大约在1865年死去，留下了这座未完成的建筑。

在兵工厂的对面，有一所有廊柱的医院，引人入胜的《巴拉圭动乱的七年》一书的作者乔治·弗雷德里克·马斯特曼曾以主任军务药剂师和药物学讲师的身分主持过这个医院。在医院和河流之间有一座配有八门炮的炮台，使马斯特曼相当担心。那所“讨厌得使人对它的动工只能表示遗憾”的海关署，显然更使他心烦。他象罗伯逊之流和其他有优越感的英国人一样，发现他的谐调观念因巴拉圭人不注意外形和对称而被破坏。弗朗西亚

的城市建设计划补救了街道型式上的一些缺点，因为长方形的设计使街道非常规整，虽然还是砂子路而不是铺石路。“元首”看来刺眼的条条山涧仍然流向不定，而在雨季倒是些有效的排水沟。沿街排列着低矮的房屋，使旅行者想念有着罗马式的砖块、厚厚的城墙、宽敞的门廊、有柱子的庭院和闪光的天花板的庞贝城①。

1864—1870年的战争期间，伯顿舰长曾访问过亚松森，感到这个首都没有什么可称赞的："没有公共厕所、街道肮脏、排水沟系统作梦还未想到，而且从礼拜堂到剧院每三座建筑中就有一所未建成。商店是些可怜的小铺，象阿根廷共和国'帐篷集镇'上的那些一样。邮局在一所私人住宅里，只有两个小房间。兵营和教堂、城堡和阅兵广场都安排得不合理。每所大一点的房屋都属于洛佩斯统治者家族。而臣民，如果不在炮台附近的兵营或进拘留所，就必须自己满足于极简陋的茅屋、一面坡房顶的小房以及由柱子而不是由墙壁支撑的瓦棚里。他们无需把悲惨状况显示出来，连接大

① 庞贝城（Pompeii）：意大利古都，被维苏威火山灰埋掉。——译者

建筑物的长而无窗的砖墙遮住了这种悲惨状况，有钱人是看不见的。一座巨大的高价建筑的兵工厂、河边船坞、一条市内电车道，一条铁路，这使一切披上了一层薄薄的文明外衣，但是这种外衣是最新和最显而易见的东西，它表明：对进步的要求是极其浅薄的；在巴拉圭共和国时代，经耶稣会教化过的瓜拉尼人所显示出来的进步痕迹也是非常轻微的。”

让这位英国人去反对吧！“经耶稣会教化过的瓜拉尼人”还是可爱的人。巴拉圭人慷慨、孩子似的天真烂漫、喜爱歌舞、深知生命的短促，有尽量利用各种机会的决心，他们都有一种尊严和豁达大度的精神，这是值得那些最庸俗世故的人赞扬的。普通男女的服装简单而舒适。汤普森对他们服装的描述具有外国评论和观察的特色：“巴拉圭人的装束，男人和现在欧洲人一样戴黑色高帽，衬衫前面和袖头都绣得很美，穿一条白色衬裤、带有一呎长的下垂到地面的穗子，在穗子以上三或四吋处绣着花。在裤子外面用一块腰布（‘奇里帕’）或一块包布，从腰下到裤子上绣花处把腿围了起来，扎上一条大红丝绸腰带，不穿鞋，肩上披着斗篷。

妇女穿短袖的白色衬衫，镶着绣花边，衬衫的上端周围用黑丝线绣花。衬衫外面至腰部不再穿什么，而用一条大红腰带扎一条白裙，裙子下半部中间绣一条宽的黑带。她们不穿鞋。这些仅是乡下人和市镇下层人们的装束。这种妇女衬衫叫做'图波伊'，非常美丽媚人。城市的士女们的服装和欧洲人一样，而且妇女一般都显示出有很高的审美力。她们有贵妇人的派头，很幽雅。在亚松森任何人参加舞会时，几乎都会设想自己已置身于巴黎。"

要不是由于政治上的不成熟而产生暴戾的独裁制，以及受巴西和阿根廷之间互相敌对的影响，巴拉圭人本来可以很幸福的。巴西的历史学家安东尼奥·巴普蒂斯塔·佩雷拉，在他的论文《文明反对野蛮》中，说得很巧妙："弗朗西亚是巴拉圭三段论法的大前提，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是它的小前提，而索拉诺·洛佩斯是它的结论。"这个三段论法在拉普拉塔流域的强权政治所引起的一场冲突，即三国同盟之战中结束了。倘若没有战争，洛佩斯会有什么成就倒是一个有兴趣的，当然也是完全没有用处的猜想。

决不要设想仅仅是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

佩斯挑起了这场几乎使他的国家毁灭的战争。已故的佩勒姆·霍顿·博克斯博士在《巴拉圭战争的根源》一书中，以非凡的精力和技巧，陈述了对战争起因所提出的最合理的解释。河流自由通航和边界问题是巴拉圭和阿根廷长期存在的争执。巴拉圭由于成了巴西的工具，曾和科连特斯联合起来反对阿根廷联邦。由于拒绝接受以阿帕河作为北部的边界和未能协助推翻罗萨斯，巴拉圭惹起了巴西的敌意。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于1850年和1855年曾先后两次从巴拉圭所要求的领土上驱逐巴西的守备队，后一次行动险些引起战争。1858年，巴西曾迫使巴拉圭允许在它的河流上自由航行。这些事件本身就足以引起战争。再加上巴拉圭在巴拉那河以南的传教区丧失给阿根廷和巴西，以及乌拉圭的政治动乱，就使人奇怪：战争为什么不曾早日爆发。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诞生经受的痛苦达到了极点。这个史实曾一再地叙述过，但是无法使这个复杂问题讲得简单明白。幸而，也许可以用违反历史叙述规则的办法，略去阿根廷和巴西的长期对抗，而只对巴拉圭在这次战争中的地位加以概括。

弗朗西亚，由于不介入外国纠纷，避免了卷入乌拉圭的政治危机。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没有这么聪明，但是直到他独裁统治结束，却没有超出对分裂的阿根廷只作些战争姿态。他在几乎要卷入推翻罗萨斯的联盟时，及时认识到这一危险而保持了不稳定的中立。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缺乏他父亲的明智和幸运，结果引起了南美洲历史上最有破坏性的战争。

1852年，罗萨斯倒台后，布宜诺斯艾利斯拒绝参加阿根廷联邦，七年后它进行反对其他省份的战争。这一企图失败后，布宜诺斯艾利斯接受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的调停，但这次调停旷日持久，足以使布宜诺斯艾利斯再次致力于打败乌尔基萨① 的高卓人。弗朗西斯科·索拉诺作为调解人，赢得了巴托洛梅·米特雷和许多人对其所作努力的高度赞扬。贝南西奥·弗洛雷斯及其激进的红党控制乌拉圭的努力失败后，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了他们的避难所。米特雷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其他首领策划重新控制蒙得维的亚。有布宜诺斯艾利斯对蒙得维的亚的袭击，也有蒙得维的

① 当时阿根廷的恩特雷里奥斯省的统治者。——译者

亚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袭击。1858年初，乌拉圭的白党剖腹杀害俘虏的极端残酷的暴行，使他们失去了很多的支持者。最后，白党政府断绝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关系，并在1858年要求乌尔基萨和唐·佩德罗二世渡过拉普拉塔河帮助攻打他们的敌人。接着出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阿根廷联邦一个短期的和解。1860年，米特雷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总督，1861年与乌尔基萨作战，到1862年 2月几乎控制了整个阿根廷，于是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成了总统。然而，阿根廷的统一尚未完成。

贝南西奥·弗洛雷斯，这个乌拉圭的红党流亡者和他的朋友们为米特雷战斗，打得很好。下一步是要对付乌拉圭的白党。弗洛雷斯立即准备一次远征去推翻白党总统贝尔纳多·P·贝罗。贝罗完全了解乌拉圭的脆弱性，因为这一国家容易遭到来自阿根廷和巴西的攻击。乌拉圭人和巴西人在边境上为了各种理由，或者纯粹是胡作乱为、别无理由地长期互相杀害。由于贝罗在1862年严格地遵守中立①，米特雷已承认这一事实，因而答应

① 指对布宜诺斯艾利斯与阿根廷其他省份之间的纷争保持中立。——译者

设法不使乌拉圭的和平遭到干扰。但他如何能报答贝南西奥·弗洛雷斯的恩情而又保证他对贝罗的诺言呢？他又如何能防止乌尔基萨和恩特雷里奥斯省去支持白党呢？白党看到弗洛雷斯的远征准备，派遣奥克塔维奥·拉皮多博士向米特雷提出抗议。米特雷告诉他，如能证明弗洛雷斯在阴谋叛乱，他将拘留他的伟大的好友。拉皮多提出了证据，甚至出版的报纸都足以说服最顽固的怀疑论者。但米特雷未采取行动，这也许因为他知道贝罗总统已经诱骗弗洛雷斯接受一个红党人的邀请去参加乌拉圭的叛乱，也许因为布港人的意见压倒多数地支持弗洛雷斯。1863年4月，米特雷正在罗萨里奥主持科尔多瓦铁路通车典礼时，弗洛雷斯在乌拉圭登陆了。4月19日夜，他和三个同伴疾驰而去，会合高卓朋友们。立即有五百个骁勇善骑的牧人斗士向巴西边界而来，他们知道那里还有别的人要集合起来支援他们。尽管布宜诺斯艾利斯对他们有公开的同情，但米特雷和他的外交部长拉菲诺·德·伊利萨尔德博士对此仍不正式承认。安德列斯·拉马斯博士从蒙得维的亚前来抱怨阿根廷把军火走私给弗洛雷斯了，他虽然发现

伊利萨尔德回避问题，但遵照蒙得维的亚的指示紧追此事。欧洲的外交官们参与了这场口头摩擦，但美国公使罗伯特·C·柯克却保持谨慎的沉默。

1863年6月后，事态疾速变化。在这个月，乌拉圭在一只阿根廷船上查获了战争违禁品，阿根廷要求赔偿，乌拉圭要和解，但阿根廷是好战的，拒绝对这一争端进行仲裁而以战争相威胁。6月22日，阿根廷封锁乌拉圭河，6月23日乌拉圭立即和它断绝外交关系，到6月29日两国又和好，互相以二十一发礼炮致敬。米特雷已经作了准备，就差战争了，因为他不相信乌尔基萨——他可能领导恩特雷里奥斯省支援乌拉圭。还也许因为乌拉圭已将其困难处境告诉了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贝罗总统已派拉皮多到亚松森，这位特使答应在调解争端中给洛佩斯与巴西相等的地位。米特雷拒绝接受这位傲慢的家伙作调解人，带着轻蔑的口吻说："人们可以同样祈求支那的调解。"[1] 这样一来，由巴西公使华奥·阿尔维斯·洛雷伊罗安排的协定书，主要由于乌拉圭人对洛佩斯做过

① 支那，对中国的轻视的称呼，系指当时我国清政府。——译者

上述的保证而失效了。给弗洛雷斯的走私在继续。1863年11月，一支远征队被乌拉圭俘获，导致了另一次的关系破裂。米特雷下令在乌拉圭河口的马丁加西亚岛建筑炮台并且增加了军队。1864年3月，米特雷派何塞·马莫尔去和巴西达成一项协议。

唐·佩德罗二世继承并一贯奉行一项三重政策：侵占巴拉圭的领土，干涉乌拉圭，反对阿根廷恢复原拉普拉塔副王管辖区的计划。许多红党在巴西南部避难，准备并渴望帮助弗洛雷斯；还有后来在三国同盟之战中闻名的许多巴西高卓人将领，也不能加以忽视。可能，里约格朗德的奴隶主希望看到在乌拉圭重建奴隶制，从而既可以从这一共和国的领有地上又可以从俘获在那里已得到自由的奴隶身上攫取极大的利益。费利佩·索萨·内托将军曾以一千名高卓人帮助弗洛雷斯，并于1863年晚些时候来到里约热内卢，要佩德罗二世的政府对他的愿望有个深刻了解，这一政府在乌拉圭内战中一直企图保持中立。巴西的官员们怨恨乌拉圭企图把洛佩斯拖入争吵，但继续力争不使内部冲突扩大并拒绝对阿根廷挑起争端。

1864年早些时候，事情发生了变化，帝制派的自由党控制了巴西的下院。由于内托将军对他们的怂恿，这些好斗的公鸡要求和乌拉圭较量。来自阿根廷的马莫尔在里约热内卢保证米特雷对巴西的友谊。5月，一位叫何塞·安东尼奥·萨赖瓦的特使，从巴西到达乌拉圭，声称一支巴西的军队在边界上要阻止乌拉圭人对边界的侵犯，并要求赔偿损失。与此同时，海军舰队副司令华金·马凯斯·利斯沃阿、塔曼达雷男爵率领一支拥有五艘军舰的舰队前往蒙得维的亚。

乌拉圭这时的总统阿塔纳西奥·克鲁斯·阿吉雷，是个爱国而鲁莽的白党人，他的一些顾问着重指望依赖洛佩斯的援助去反对巴西和阿根廷。乌拉圭的外交部长唐·胡安·何塞·德·埃雷拉可能是这一计谋的设计者，虽然洛佩斯决不是不愿意的。萨赖瓦机智地执行着他的任务。他知道乌拉圭的内战不过是炸弹上劈啪作响的导火线，这个炸弹的爆炸将会震撼南美洲。在交换备忘录中，埃雷拉表露出几分胜利：他使巴西的要求显得荒唐可笑，从里约热内卢的帝制派的叫嚣来看是一个可悲的错误。萨赖瓦向政府要求并取得了在试图

保持和平方面的广泛权力以准备应付万一。

阿根廷又参加到这场纠纷中来。1864年6月，在米特雷的要求下，英国公使爱德华·桑顿陪同伊利萨尔德到达蒙得维的亚同萨赖瓦和埃雷拉进行会谈。时间很快过去。桑顿、萨赖瓦和伊利萨尔德动员舆论要求停止内战，成功地说服阿吉雷总统同意给弗洛雷斯以有利条件，并许诺一次自由选举。6月18日，弗洛雷斯接受了，同时在乌拉圭开始停战。但是因为阿吉雷拒绝在弗洛雷斯解散军队之前改组内阁，内战又起。萨赖瓦在安抚乌拉圭问题上失败了，但他还可以使阿根廷对巴西友好。在与米特雷会谈时，他建议联合干涉。米特雷不愿走得这样远，但约定不反对巴西的干涉。这时，乌拉圭派至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特使安德列斯·拉马斯，警告阿吉雷说巴西将提出最后通牒。他忠告要预先考虑通牒的条件是正确的，但阿吉雷未予理会。1864年8月4日，萨赖瓦送交了最后通牒；在8月底前他又和阿根廷签订了一项在乌拉圭问题上两国取得一致的议定书。1864年8月16日，一艘巴西的炮艇向乌拉圭轮船“比利亚·德尔·萨尔托号”开火。长期惧怕的战争开始了，如

博克斯博士所陈述的，“以巴西对小邻国的‘强压措施’开始的这场巨大的暴风雨，五年来在一出战争与革命、血和泪的戏剧中，从蒙得维的亚到最远的塞罗科拉要塞，猛袭拉普拉塔河整个大地”。

人们也许不知道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该怎样处理在乌拉圭内部和周围的纠纷。许多年来乌拉圭一直谋求与巴拉圭联盟。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虽然恨巴西和阿根廷，但一直拒绝这一联盟。1863年7月，乌拉圭白党外交家奥克塔维奥·拉皮多到亚松森，企图说服弗朗西斯科·索拉诺缔结一个反对阿根廷的联盟未能成功。拉皮多怂恿洛佩斯要求米特雷对乌拉圭的态度进行解释，希望在乌拉圭打算同巴拉圭和阿根廷的一些省份（恩特雷里奥斯、科连特斯以及其他愿参加的省份）组成一个联盟的问题上予以帮助。当然，米特雷知道这些计划。从他同意巴西在乌拉圭自由行动看，他在显示政治家手腕。如果战争发生，阿根廷不会孤立；但若米特雷试图反对巴西，阿根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就会破坏他孜孜以求的统一。

洛佩斯在外交上并非新手。拉皮多可能自以

为在要弄何塞·贝尔格斯及其主人，但这位独裁者有他自己的打算。洛佩斯把暴露白党怎样刻骨地仇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拉皮多的机密急件原文送给了米特雷，这显然是希望促进这场危机。这样，也许米特雷会请求洛佩斯出来调解争端。这会置巴拉圭于中心地位，给弗朗西斯科·索拉诺以一个炫耀自己的机会。据美国驻亚松森公使——这个深受毁谤而有趣的查尔斯·艾·沃什伯恩说，这个惊人的、有意的步骤增加了米特雷对洛佩斯的怀疑，洛佩斯还公开指责阿根廷帮助弗洛雷斯。

在亚松森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不断交换备忘录。米特雷和伊利萨尔德同洛佩斯和贝尔格斯打交道是坚决的，但也是和解的。洛佩斯确信战争不可避免，1864年3月在塞罗莱昂设置了军营。到8月，他已有六万四千名受过局部训练的军队，而沃什伯恩认为他正在准备一支军队来保卫他所梦想的皇冠。无论如何，这个军队的存在，也许作为对阿根廷的一个威胁，肯定会加强巴拉圭在拉普拉塔河事务中的发言权。8月，巴西向乌拉圭提出最后通牒时，乌拉圭驻亚松森的公使巴斯克斯·

萨加斯图梅请求洛佩期干预。这一请求带来了8月30日的抗议，它通知巴西说巴拉圭不能袖手旁观。巴拉圭人民在一场对巴西的战争中准备支持洛佩斯吗？如果能相信《周报》的话，则他们是支持的。这一官方机关报刊登了许多效忠的声明；但是如沃什伯恩写给 W·H·西沃德的信中所说的，“如果谁拒绝在这种纸上签名的话，他会立即发现自己重镣加身进监狱”。

1864年10月，乌拉圭之战疾速发展。门纳·巴雷托将军在越过边境线时耽误了三个月之后，沿乌拉圭河从北面由陆路南下；海军司令塔曼达雷从南面溯流而上。由莱安德罗·戈麦斯防守的派桑杜大约在12月1日被围。这时，弗朗西斯科·索拉诺俘获了巴西轮船“奥林达侯爵号”，这一事件发生在11月12日。两天后，巴西驻巴拉圭的公使塞萨尔·绍万·比亚纳·德·利马要求回国，并在沃什伯恩帮助下取得了护照。三国同盟之战开始了。

巴西人的外交方针现在是劝诱阿根廷参战。佩德罗二世政府派出它卓越的西尔瓦·帕兰奥斯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力图挽救塔曼达雷在外交上

犯下的重大错误[①]。米特雷希望保持中立。乌尔基萨在恩特雷里奥斯依然是个不稳定的因素，而且正为阻止他的追随者与乌拉圭的白党联合遇到困难。西尔瓦·帕兰奥斯这时拚命了。他害怕洛佩斯先发制人进攻南里约格朗德州，害怕围攻派桑杜会疏远阿根廷。巴西需要乌拉圭作为对洛佩斯作战的基地，西尔瓦·帕兰奥斯迫使弗洛雷斯援助巴西，作为巴西帮助他反对白党的报酬，从而借此取得这一基地。这样，巴西必须尽快打败白党，让弗洛雷斯掌权，然后再进而攻打巴拉圭。米特雷准备调解；但是阿吉雷总统拒绝了所有外交使团提出的有关此事的建议，从而失去了从政治上和道义上孤立巴西的最后机会。乌拉圭杰出的驻阿根廷公使安德列斯·拉马斯，遇到了低能的但更有权的政客们给予的另一次挫折。现在，巨大的灾难方兴未艾，他除了哭泣以外别无他法。他看到“毁灭之神……正在蒙得维的亚上空张开它黑色的翅膀”，而巴西和红党“正把蒙得维的亚供奉在巴拉圭的祭坛上！”阿吉雷期待乌尔基萨和洛佩斯

① 指塔曼达雷围攻派桑杜一事，会得罪阿根廷。——译者

赶紧来支援他；但他二人都没有这样做。乌尔基萨依然未动，洛佩斯则侵入巴拉圭北面巴西的马托格罗索。1865年2月中旬，托马斯·比利亚尔瓦接替阿吉雷成为乌拉圭总统，并立即和巴西签订了一项议定书使弗洛雷斯成为独裁者。

西尔瓦·帕兰奥斯扑灭了乌拉圭的战争后，极力使阿根廷参加反巴拉圭的联盟。米特雷进退维谷。正如博克斯博士所看出的，“一旦巴拉圭和巴西之间的战争爆发，拉普拉塔河就会变成真正的火药库——构成这个火药库的因素有：乌拉圭的革命，巴西和弗洛雷斯反对蒙得维的亚政府的战争，巴拉圭对巴西的战争，巴西的代理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花费大量金钱进行的种种阴谋，布宜诺斯艾利斯新闻界公开反对巴拉圭和洛佩斯的运动，由于要求米特雷政府对乌拉圭的态度进行解释所引起的阿根廷与巴拉圭间的紧张关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自由巴拉圭人委员会’所进行的反洛佩斯的宣传，米特雷内阁对巴西反对白党与巴拉圭的斗争的同情，阿根廷各省对巴拉圭和蒙得维的亚政府的普遍同情（这种同情体现在恩特雷里奥斯大考迪罗的儿子瓦尔迪诺·乌尔基萨上

校率领的援助白党的一次小规模远征)。”无怪乎米特雷要想继续中立。在给乌尔基萨一系列信件中，他与这个伟大的爱国者关于阿根廷的作用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阿根廷决定保持中立，但是一旦有人侵犯它的领土则只有战争。洛佩斯要求准许跨过科连特斯，而犯下了大错；他还宣战，简直成了白痴。1865年3月5日，成员经过挑选的巴拉圭议会举行会议。3月18日，它以四项根据批准了对阿根廷的战争：阿根廷拒绝答应跨过科连特斯，不承认巴拉圭对米西奥内斯省的所有权，阿根廷支持巴拉圭流亡者，以及阿根廷新闻界支持巴西。

唐·佩德罗二世也可以抱怨新闻界的诽谤。巴西的历史学家安东尼奥·巴普蒂斯塔·佩雷拉认为著名的反巴西诽谤运动是唐·何塞·贝尔格斯掀起的。他认为贝尔格斯抵上一个军团。在这项工作中，他曾得到胡安·包蒂斯塔·阿尔维迪的帮助，他是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的朋友和阿根廷最著名的政治学家，他对巴西的仇恨与日俱增，而且不倦地告诫要提防唐·佩德罗的帝国。1865年，阿尔维迪和贝尔格斯都在伦敦，可能共同策划反巴西的宣传。贝尔格斯随后又去美国，

在新闻界煽起对巴西更大的反感。战争发生后，各大报纸都对巴拉圭表同情。由于懂得宣传的价值，贝尔格斯指示在阿根廷的巴拉圭代理人应不失时机地指出自由的巴拉圭正在对一个奴隶制帝国进行战斗，可能由于这样的批评加速了巴西取消奴隶制的运动。但是，谁使洛佩斯作出人权拥护者的姿态？巴拉圭在1845年废除奴隶制的法令直到1870年还是一纸空文。至于阿根廷作家们坚持说五万个"国家的奴隶"武装了起来——这是一个荒诞的数字，除非整个巴拉圭人都是奴隶。

把这场战争打扮成自由人民反对奴隶制的战争的任何企图都是荒谬的。这场灾难恰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被粉碎一样，压垮了巴拉圭，而灾难的根源在于巴西人对巴拉圭领土的侵占，在于巴西和阿根廷对乌拉圭的干预，在于巴拉圭想在拉普拉塔河流域的政治中起决定作用。但是洛佩斯促进了这场战争，对巴拉圭遭受的一切不幸，他必须负更多的责任。

第十四章

三国同盟之战

人们默想在一场四年多的战争中小小的巴拉圭竟然英勇地抗击三个敌人时，他们的想象可能被激发到狂乱的程度。乌拉圭对这场战争的贡献诚然是不足道的；但是，阿根廷和巴西在南美，甚至当时在整个拉丁美洲是两个最大的强国，它们拥有的资源足以粉碎一个幅员数倍于巴拉圭的国家。其他的事暂且不顾，巴拉圭使如此强大的敌人这么长时间不能接近，这一成就可算是个奇迹。世界也许为之惊奇；爱国的巴拉圭人却把他们的英勇抗战看作一种天经地义的事情。曼努埃尔·多明格斯在《种族之魂》一书中，解释巴拉圭为什么如此善战时，断言巴拉圭人在种族、天赋才智、机智、侠义、体格、冷静、敏捷、耐久力、军队士气、兄弟般的团结、民主平等以及其他等方面都比侵略者要优越。他说，“巴拉圭作为一个国家来说，比各

个同盟国都要优越。它不象阿根廷共和国那样是一个彼此仇恨到极点的布港人和外省人、联邦主义者和中央集权主义者的异体混合物；它不象巴西那样分裂为共和派和帝制派，奴隶主和成百万的奴隶。”

洛佩斯以为巴拉圭对战争已准备好，从而走上了一条不可避免地把他的国家引到失败、被蹂躏、无限灾难和丧失领土的道路。这位独裁者可以出动一支三万人的军队而不致造成人力资源过分紧张；稍加努力能增至六万人；把少年和老人拉进来，他的军队就会超过十万人。这个军事力量对一个人口约为五十二万五千人的国家来说是不可轻视的。加之，守卫巴拉圭河的乌迈塔及其他地点的要塞炮台的工事加强了，任何南美洲的小舰队都未必能强行通过。在巴拉圭河和巴拉那河上的炮舰为数不多，能和岸上炮台协同作战的总数可能有十二艘左右。一条二百七十哩长的电报线联系着亚松森和乌迈塔防御系统。然而，交通联络方面缺乏的东西还不少。尽管皮革加工厂造出了军事装备，亚松森兵工厂加强了它的生产，但制造工业是不多的。

巴西人在准备包围乌拉圭港口派桑杜时，洛佩斯还迟疑不决。1864年11月10日，巴西轮船“奥林达侯爵号”载送马托格罗索的总督费德里科·卡尔尼罗·德·坎波斯上校前往科仑巴赴任途中，于亚松森停泊。数年来，巴西的船只一直在这条河上自由航行，而且这是前往马托格罗索唯一可行的道路。洛佩斯让这只引人注目的轮船驶离，于是突然挑起了这场几乎毁灭巴拉圭的战争。他派炮舰“塔库阿里号”将“侯爵号”及其载运的两千支毛瑟枪于11月12日带回亚松森，不久，“侯爵号”就被改成一艘巴拉圭的炮舰。船上的船员和坎波斯总督被投入监狱；有些船员在几个月后被释放，但坎波斯于1867年死去时仍然是个囚犯。

布港人对本城以外的事情总是轻视的，现在对巴拉圭的行动也多少有些惊异了，而且几乎没有那个真正有理智的人期望阿根廷被卷进去。他们曾嘲笑说洛佩斯是一个可笑的自命不凡的粗鲁的野蛮人、一个印第安小屋女眷的守护人，但是那些懂得一点军事问题的人却不能藐视巴拉圭的军队。和一个民族的其他属性相比，武力在拉丁美洲总是受到较广泛尊重的。按照这一标准，阿根廷由

于它的常备军很不足道，并有一些忠顺可疑的省份，是不能博得邻国的高度重视的。巴拉圭的第一个战役——对马托格罗索的入侵，给阿根廷以几周的时间去判定局势，这时米特雷总统显然已确信，一旦证明不可能中立时，阿根廷应该和巴西共命运。

既然战争已经开始，洛佩斯本来可以派出一支远征军跨过阿根廷的领土或者绕道通过巴西到乌拉圭去帮助白党。或许对乌拉圭白党来说，一场在巴拉圭北面马托格罗索进行的战争，不比在查科未开化人当中进行一次卫生运动来得更有价值些，但洛佩斯知道他在做什么。巴西人对防守南马托格罗索已准备了好几年，在巴拉圭附近储存了大量的军火和一百多门铜炮。但他们在这个州没有驻扎足够的防守部队，却妄自尊大地认为蚊子伤害不了鳄鱼。洛佩斯需要这些军事物资和速胜的声势，1864年12月派了两支军队进入这个州。一支三千人的水上分遣队分乘八只船在12月26日驶至科英布拉下面停泊。第二天派出的一支武装侦察队遭到惨败，证明巴西驻军是会打仗的。确实，如果不是那个胆小的巴西司令在第一次冲突后就

下令撤退的话，科英布拉本来能够抵抗巴拉圭人，即使不能长久地坚持下去，也能坚持一些时候。巴拉圭的指挥者维森特·巴里奥斯上校缴获了三十二门铜炮和很多军用品立即送回亚松森。地处河上游的阿尔布开克和科仑巴，实际上没有进行抵抗。在科仑巴，巴里奥斯竟允许他的士兵犯下奸淫劫掠和屠杀居民的罪行。在“伊波拉号”上的士兵竟然以一串串的巴西人的耳朵装饰船的外篷。这一暴行受到洛佩斯的申斥，他的礼尚观念告诫他，当外国观察家在周围时，割掉耳朵的事不应该如此喧闹地加以宣扬。耳朵、妇女、私人掠夺物不计在内，巴拉圭人在马托格罗索得到的军需品就足够供给全军用许多个月。

当马托格罗索战役正在进行时，洛佩斯继续招募新兵，到1865年 4 月，他已有一支装备不好的八万人左右的军队。大约五分之二的人有火器，其他的人带着长矛和大刀。在整个战争期间，除了开始的几个月外，洛佩斯必须更多地依靠他的炮兵而不是依靠步兵，一方面是因为很多战斗都是防御性的，另方面也是因为步兵一直没有完全武装起来。有理由使人相信，如果它的军队规模小一

些，巴拉圭本来可以更好地坚持这场战争，因为从农村抽出去那么多的劳动者，使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损害。一万五千人左右，大致等于现在的一个加强师的兵力，驻扎在潮湿的乌迈塔防御系统内，他们大批地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

关于英雄的巴拉圭士兵已经写过那么多了，必须对他再讲一两句。没有人能比得上巴拉圭的土著人更忠诚地热爱他们的国家，这不仅是由于盲目服从权威，他们才甘愿为保卫国家而流血牺牲。一个看问题比较敏锐的观察家理查德·弗·伯顿爵士发现巴拉圭士兵是一种有趣的人物："身材稍稍有些矮胖，但长得很匀称，四肢非常短小而灵巧，外形优美。宽而短的头颅披着一束长而直的蓝黑色头发，除混血种外，一般人胡须稀疏。扁圆的脸，长得丰满；颧骨高，侧面突出；前额低，和宽大而长的、高度发达的下巴颏成了显明的对照；眼睛常常向上斜吊，有一双浅色的或深褐色的眼瞳，浓眉，卷曲的睫毛，长而密。"巴拉圭人本来是素食者，由于缺乏农业劳动力，农产品不足，不能不吃过多的肉食，而长得不好。巴拉圭人不怕死，坚信一个人完全可以抵得上六个敌人，使他们成为又

可怕、又可敬的敌人。他们在侦察工作中很勇猛，以打肉搏战为荣。缺乏才智和创造精神，盲目地依靠不可信赖的军官，这是他们最大的弱点。

巴拉圭人决心或者甘愿坚持战斗的意志，使他们不顾那些足以挫伤士气的境遇。随着战争的进行，疾病在发臭的医院里蔓延开来。在那里，少数幸运的受害者两个人躺在一张简陋的病床上，其他的病人则安排在地板上，在敞开的柱廊里受折磨。有一个时期，在亚松森总医院里，一千名伤兵拥挤在原定三百张病床的地方。在任何一次较大的战役结束前，麻疹、天花、霍乱和肺炎在军民中一样流行，可能使死亡人数增加到五万人。成千上万的巴拉圭人英勇地默默地忍受着死亡的痛苦，在难以形容的恐怖状态中死去。在洛佩斯全军覆灭期中，巴拉圭也许有理由为它的人民的坚韧不拔的英雄气概而自豪，但是这个国家如何能为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而骄傲，却是不可思议的，是一点也不合乎逻辑的。

随着马托格罗索战役的胜利，洛佩斯要求阿根廷准许他跨过科连特斯省，在一个致命点上进攻巴西。1865年1月，这一要求遭到拒绝。接着他

就向科连特斯进攻，但从这两件事中洛佩斯发觉乌尔基萨在以全力支援米特雷总统。要是洛佩斯不侵入科连特斯，本来有某些理由设想乌尔基萨会帮助他反对巴西的——巴西是乌尔基萨对之只有憎恨的一个国家。错上加错，1865年4月13日洛佩斯拿下了科连特斯城，这是在乌迈塔下游大约六十公里的一个不设防的河上港口。几周前，3月18日，米特雷已经准许运往巴拉圭的武器结清关税，而且宣布他不同意巴西封锁河流，但是现在洛佩斯却强行制造事端。1865年5月1日，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形成了三国同盟。巴托洛梅·米特雷将军任盟军陆军总司令；唐·佩德罗二世的宠臣、海军中将塔曼达雷子爵统率海军。米特雷提出以下口号："一天内打到敌人的兵营，两周内拿下科连特斯，三个月内拿下亚松森！"

阿根廷的领导者和人民，象他们的盟国巴西一样，大大地低估了他们面前的任务。包括《新闻报》、《民族报》和《论坛报》在内的报刊，也都表露出他们对巴拉圭的轻蔑，这正附和乌拉圭的一种说法，"只有懦弱的民族才会因想象敌人的腐败无能而变得狂热起来"。米特雷以前驻巴拉圭的代表

安纳尔卡西斯·拉努斯警告，不要小看巴拉圭的军事力量，无效。4月24日，一营阿根廷军队开往科连特斯，该省总督下令所有十六岁到六十岁的男子都武装起来。在罗萨里奥的一次战争歇斯底里的大发作中，把巴拉圭的领事监禁了起来；一群人扯碎了巴拉圭国旗，用军服和一张洛佩斯像作实弹射击的靶子。在恩特雷里奥斯省，乌尔基萨在透露了洛佩斯曾对他作的建议后，集合八千人，用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供应把他们装备起来，然后看着他们在关键时刻大批地开小差散去。要在恩特雷里奥斯省建立一个师的其他种种打算也落了空，尽管乌尔基萨出售了足够的牛群和马匹给同盟国而使自己十分富裕起来。甚至谣传米特雷不愿信任这位大考迪罗，买走这么多牲口是为了阻止他建立一支军队。许多谣传都没有抓住这个真相，即恩特雷里奥斯省愿意跟随乌尔基萨，但不愿参加一场布港人的战争。

只有在人们低估面临的严重困难时，反巴拉圭的同盟才看来似乎是令人丧胆而稳操胜算的。由于没有公路或铁路伸入巴拉圭，他们必须上溯巴拉圭河攻打设防坚固的阵地，或者在两河汇流

处和恩卡纳西翁之间强渡巴拉那河。人员、军需品和粮食必须经远距离运输。巴西和阿根廷是传统的敌人，很难在一起谐调地工作，加之两国的强有力的反对党分别开始了反对佩德罗二世和米特雷总统的激烈斗争。巴西指挥官们缺乏速战速决所必需的军事天才，他们从一开始就确信必得"一棵棕榈接一棵棕榈"地去征服巴拉圭，然而事实证明是陷入了"一个泥淖又一个泥淖"。第一位盟军陆军司令米特雷是一个外行、笨蛋。洛佩斯作为一个打攻击战的战略家和战术家同样是无能的，但擅长防御，又因在本国和在他自己所选择的地区作战而大大有利。

洛佩斯元帅，用他的最高的自封头衔，取得全国的拥护。这种支持，不管是怎样取得的，是敌人所不易理解的。同盟国宣称他们的战争是对专制者而不是对人民，这种可笑的陈词滥调已经用得太经常，无论在那个时代都要受人怀疑。林奇夫人激励妇女们把一小部分珠宝饰物捐献给政府，虽然很明显这些玩意儿的绝大部分，不是挂到了夫人的胸前，就是大都进入了夫人的珠宝箱。宴会、游行、演说、舞会以及人为的普遍的热情都坚定一

个信念，即巴西和阿根廷这两个对与世隔绝的巴拉圭农民来说，只是听说过名字的国家，必然很快地屈服在天才的元帅的面前。当然，洛佩斯是一个天才。他自己不是已经在他的官方的报纸《周报》上这样宣称了吗？

双方都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无知、自负与纯粹的愚蠢。巴西人和阿根廷人以轻蔑的眼光看巴拉圭人；巴拉圭人则以同样心情对待敌人。参战者双方对彼此的力量都不甚了解。轻易地攻陷马托格罗索使趾高气扬的巴拉圭官员们妄自尊大起来。洛佩斯太过于自信了。事实证明，他粉碎敌人的机会是极少的；而敌人却有几次机会因没有利用而被错过了。从来没有哪一个同盟国比阿根廷、巴西、乌拉圭更毫不在乎地丢掉了自己的有利条件。他们的司令们的愚蠢本身就是对文明的犯罪：一场本来一年内可以结束的战争却一拖再拖，直到既使最后胜利者遭到惨重损失，又使巴拉圭在完全屈服时，人口减少了约60%。

洛佩斯有一个全面的作战计划。文塞斯劳·罗夫莱斯将军带二万五千人向巴拉那河下游进军，同时安东尼奥·德拉·克鲁斯·埃斯蒂加里

维亚上校带领一万二千五百人沿乌拉圭河南下。这两支部队预定在乌拉圭边境上会师。巴拉圭的舰队和罗夫莱斯并行，试图肃清河上敌人。这一联合行动太不协同一致，指挥得太糟也太晚，终于没有成功。它还预先假定在南里约格朗德的乌拉圭的白党会来援助埃斯蒂加里维亚，同时恩特雷里奥斯和科连特斯会起义反对米特雷来帮助罗夫莱斯。但这两种情况都没有成为事实。

当罗夫莱斯沿巴拉那河左岸南下进军时，佩德罗·伊格纳西奥·梅萨舰长试图俘获一支拥有九条船只的巴西舰队，这支舰队在科连特斯下游十哩左右的里亚丘埃洛河对面的一个相当安全的位置封锁了巴拉那河。根据乔治·汤普森中校的材料，这时乌迈塔要塞和外围工事全部仅有九十门炮，这比巴西舰队所装备的炮要少。一次巧妙和持久的强袭也许就除掉了这个“南美洲的塞瓦斯托波尔”，因为守卫的部队除了一个架设十六门炮的堡垒外都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乌迈塔的名声显然吓住了巴西人，他们的舰队未曾使洛佩斯感到担忧。

1865年6月10日，把士气旺盛的第六营的五

百人部署在具有九只炮艇的巴拉圭舰队上。几乎一切都准备就绪。洛佩斯没有忘记进行训话，士兵们回答：誓把巴西的铁甲舰抓回亚松森。倘若记住船上带铁抓钩的话，誓言可能会实现。进攻的计划很简单。夜里巴拉圭人顺流而下，黎明到达巴西军队下游的一个地点，然后转回头向上游进攻。每只炮艇拴上一艘巴西战船，人攻上去，然后带着战利品返回亚松森。巴拉圭舰队架了三十四门炮，外加六只驳船上拖带的六门能发射六十八磅重炮弹的大炮。一艘炮艇在途中发生故障，其余八艘带三十门炮前进。

梅萨舰长率领的这支舰队，没有计算好舰队挺进的时间。当吃惊的巴西人发现敌人在科连特斯下游向他们逼近时，早就天亮了。在对巴西大炮有利的距离内，双方舰队互相开炮。梅萨舰长没有立刻调转方向，反而驶到里亚丘埃洛河，使敌人有时间起锚和取得更加有利的位置。巴拉圭的一艘炮艇“赫胡伊号”失去战斗力，在里亚丘埃洛河抛锚；另一艘又搁浅了。当巴西人冲向他们的大胆的敌人时，巴拉圭的三只船“奥林达侯爵号”、“塔库阿里号”和“萨尔托号”向“巴拉那伊瓦号”进攻未

取得战果。倘若有人记住在船上带铁抓钩的话，“塔库阿里号”和“萨尔托号”可能抓住敌舰。事实是，约有三十名巴拉圭人从“萨尔托号”跳到了敌人舰上，暂时俘获了“巴拉那伊瓦号”。一个有点妙得使人不可相信的传闻说，巴西的士兵有的涌到了甲板下，有的跳入水中，但巴拉圭的军曹没有关紧舱口盖，反而走来走去敲打起床鼓。隆隆的战鼓声引致巴西人从船舱冲了出来，结果轮到巴拉圭人跳下水去。真实情况似乎是，巴西的旗舰“亚马孙纳斯号”来到船侧，用葡萄弹扫射了“巴拉那伊瓦号”的甲板，击毙了登船队的三分之二。“亚马孙纳斯号”撞击“巴拉瓜伊号”，在解决战斗中起了显著的作用，战斗中四艘巴拉圭炮艇设法逃掉了。对梅萨舰长来说很幸运，巴西人的一枪使他免除了受元帅——总统惩罚的一切危险。

这次以改装的商用明轮汽船对现代化的铁甲舰的袭击似乎是唐·吉诃德式的。汤普森报道一个巴西人自认，这次战斗“好险”，如果梅萨舰长“立即靠拢而不是向下驶过”敌舰的话，巴拉圭人本来是可以获胜的。马斯特曼说得也近乎情理：“四个半小时的战斗实际上决定了这场战争，因为

它使同盟军掌握了河流的控制权。如果那九艘军舰被俘获，我敢肯定洛佩斯会得胜，因为他会立即出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蒙得维的亚的面前，以炮轰相威胁，强迫他们接受他的条件。”而且，他可能已注意到，罗夫莱斯将军已带着至少二万五千名士兵到了巴拉那河东岸的贝利亚比斯塔附近，准备通过恩特雷里奥斯杀出一条路。当里亚丘埃洛河失利的消息传到这支地面部队时，罗夫莱斯匆忙折回科连特斯附近一个地点，在那里沿着河岸来回徘徊，浪费了时间。7月23日，洛佩斯派他的作战部长维森特·巴里奥斯将军以不服从命令的正当罪名逮捕了罗夫莱斯。

里亚丘埃洛之战后，同盟军对河流的控制再没有受到严重的挑战。没有飘扬巴拉圭军旗的舰队会炮轰拉普拉塔河畔的首府，没有庞大的军队会威胁乌拉圭。但埃斯蒂加里维亚上校8月初仍然侵入了巴西。他不知道里亚丘埃洛河的失利。上校从伊塔普阿打过了乌拉圭河，占领了左岸南里约格朗德的圣博尔雅和乌拉圭阿纳后停了下来。与此同时，一支不和的同盟军经唐·佩德罗二世去视察加以抚慰后在准备进攻。埃斯蒂加里维亚上

校错误地把他的部队二千多人留在河的两岸，在8月17日的亚太战役中，他们被弗洛雷斯将军所率领的乌拉圭人歼灭了。埃斯蒂加里维亚寡不敌众，完全与巴拉圭隔绝，又不知道罗夫莱斯那里发生了什么事，9月18日在乌拉圭阿纳率余部投降。宏大的洛佩斯攻势就这样结束了，大约损失“一万三千兵力、五艘轮船、十只驳船、四十二门大炮和十八面军旗”。亚太和乌拉圭阿纳战役后，许多被俘的巴拉圭人遭到各种厄运。有些被卖为奴隶，其他的编入营中被迫为同盟军卖命，还可能有几百人被屠杀。洛佩斯因这些失利惩罚了除他自己以外的每一个人。对指挥官员，只要他能抓到手，都给以拷问或处决。他们的亲属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或者在没收他们的财产后被流放。这些行动是独裁者陷入困境时的典型措施，它会挫伤任何不如巴拉圭人那样坚韧不拔的人的士气。

直到1866年4月，同盟军才侵入巴拉圭。他们在埃斯蒂加里维亚投降以后，于1865年11月收复了科连特斯；那个时候，甚至在一个用假炮防守的市镇前巴西人还犹豫了五天。他们还允许罗夫莱斯的继任者弗朗西斯科·伊西多罗·雷斯金将军

不受干扰地撤退了二万七千人。普库小道，这是在巴拉圭河和尼姆布库河淤地之间、乌迈塔东南比较干燥的一条狭长地带，它成了洛佩斯的司令部所在地，而同盟军给了他充分的时间去改进他的防御。一支由四万巴西人、一万八千阿根廷人和四千乌拉圭人组成的六万二千人的同盟军部队驻在巴拉那河的河湾，由设在两河汇流处的一个圆形小岛上的炮台保护着，但没有采取行动，米特雷仍然希望谋求和平。1866年4月10日，洛佩斯派了一万二千人对这个岛进行了一次无益的拂晓攻击。虽然有八百人冲进了该岛，但在那里丢下了五百人，有的伤亡有的被俘，而且几乎所有撤回来的人都受了伤。这次以伤亡一千人为代价的微小胜利，使同盟军胆壮起来，一星期后他们开始跨越巴拉那河。

洛佩斯进行4月10日的袭击时，正是同盟国烦恼的时候，这一点他也许不知道。2月25日，米特雷将军在科连特斯召开了一个作战会议，会上他表示希望绕过在两河汇流处的帕特里亚小道的沼泽地区；塔曼达雷海军司令却认为只有从帕特里亚小道登陆，他的舰队才能给以较好的掩护。米

特雷主张宁可在巴拉那河上游更远的地方登陆，从两翼包围乌迈塔防御工事，并直接向亚松森进军。倘若他真是这样做，战争会很快结束。4月16日，总攻开始，由六十五艘轮船、四十八只帆船和无数小船组成的同盟军舰队是这些河上从来没有过的最大的舰队。洛佩斯预料到敌人要进攻巴拉那河上游离汇流处约十哩左右的伊塔皮鲁要塞，于是使用步兵和骑兵防守该地。他还分派三千人去监视波尔托·阿莱格雷男爵——他是在4月15日带了九千三百人在伊塔普阿对岸渡过巴拉那河的，此外还派了一个步兵营和一个骑兵中队去防守大河的汇流处。

4月16日，同盟军部队早在清晨以前就开始上船。一万五千名巴西人担任开辟滩头阵地的任务。炮舰向伊塔皮鲁疾驶，压住那里小炮台的火力，与此同时，运兵船只直插过河。船到中流时突然改变方向，顺流而下驶往汇流处，然后溯巴拉圭河上驶一哩左右。路易斯·奥索里奥将军指挥这次入侵。他率领军队登陆，并且亲自带领不多人向前侦察，“在紧急时刻放弃了庄严的阿加梅农统帅的职责，而去扮演一个机智的阿溪里斯勇

士[①]的角色”。何塞·伊格纳西奥·加门迪亚将军插入这一个希腊神话，来指责总司令如此愚蠢的暴露。奥索里奥观察了地形，断定在这一地区进攻是不可能的，下令停止部队前进；但是维埃拉·费雷拉舰长拒绝中断登陆。

巴西人入侵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洛佩斯。离他最近的机动部队在伊塔皮鲁，离这一滩头阵地有十二哩多。当这支部队赶来抗击登陆敌军时，原来在那里的小量的守卫队已慢慢地退了下来。一场大雨使这次战斗过午就结束了，当弗洛雷斯将军趁着黑夜率乌拉圭部队登陆时，那里除了巴拉圭狙击兵偶尔发出的乱射外，已无抵抗。

4月17日，洛佩斯派三千人去攻打奥索里奥和弗洛雷斯所率领的一万五千名入侵者，显示出了他的愚勇蛮干。他的长长的左翼已暴露在巴拉那河上的炮舰的火力之下，这可能给他造成一些损失，但是，一次指挥得当的突击，可能打垮这时正在沼泽泥泞地带挣扎着组织防御的同盟军。数量上比人少、计谋上又比人差的巴拉圭人，带着他

① 阿加梅农系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统帅，阿溪里斯是这次战争中的著名英雄。——译者

们特有的勇敢精神战斗，但遭到了完全的失败。四百人死亡和一百人受伤的数字证实了他们进攻的凶猛。在这次弗卢维尔（水路）战役后，洛佩斯放弃了伊塔皮鲁，重新部署乌迈塔防御系统外围工事已有准备的阵地。这一行动在4月19日完成；三天后全部同盟军在原巴拉圭阵地帕特里亚小道设营。加门迪亚将军屏息回忆这次登陆，写道："巴拉那河道上的米特雷可与安第斯山中的圣马丁①媲美。"

帕特里亚小道决不是一个好地方。北部是洪水淹没的贝利亚科河淤地；西面是无路可通的沼泽地与营地接界；其他两面围着咸水湖。有三条小道即锡德拉、卡雷塔和皮里斯从贝利亚科河淤地通到乌迈塔。同盟军完成集结后，米特雷命令弗洛雷斯带一千三百名乌拉圭人和一千九百名巴西人守着这些小道。在这一掩护部队后面，巴西人占据沿河左边的阵地，阿根廷人占据右边阵地。

1866年5月2日，风和日丽。同盟军士兵嬉戏于秋天阳光之中，没有想到他们无忧无虑的笑闹会立刻为恐怖的喊叫和死亡所代替。一支侦察小分

① 参看254页注解①。——译者

队和看来是巴拉圭的巡逻队交了火，但是很显然没有重视这一遭遇战。同盟军不了解，洛佩斯正在集结他的步兵、炮兵和骑兵要对巴西人的左翼和阿根廷的右翼发动进攻，企图进行双重合围。正午，巴拉圭部队涌过防守很差的小道，狂叫着，以六千人向前卫部队进攻。在这可怕的突然袭击下，同盟军一营接一营地溃退和逃散，他们的指挥官大为震惊。洛佩斯下令士兵进行抢劫，他们就拚命地照办。正当他们这样痛快地干着时，奥索里奥将军带巴西第六师和其他的部队前来营救。紊乱的巴拉圭人尽快地从战场上逃走，结果损失二千五到三千人，同盟军则损失一千五百人。什么是这次袭击的全部意义？为什么只以六千人去进攻四万人而对不可免的撤退无所准备？不能把整个部队用于这场进攻，因为这些小道过于狭窄，但洛佩斯至少能以三万人的一小部分用于图尤蒂，那效果要好得多。这次袭击往好里说是轻率的冒险，往坏里说是愚蠢的错误。

洛佩斯没有从他在5月2日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同盟军的首领们却最后的领会到一个事实：巴拉圭人也许领导无方，但他们能够，而且也将会不

怕以寡敌众，完全不顾死活地打下去。此后，同盟军的警戒加强了，侦察经常化了，并由一个同盟军委员会决定下次进行战斗的时间。加门迪亚滔滔不绝地说："热情非常高涨，因为我军士兵的精神是崇高的、侠义的、开朗的，他们知道他们的事业是神圣的，他们是在为反对最后一个专制制度的战争而洒出鲜血，这种专制和旧殖民地野蛮暴行喷出的毒焰一样，正在成为美洲一角的威胁。"同是这位阿根廷的战争讴歌者宣称，巴拉圭人仅仅为专制恐怖所驱使。

米特雷将军和他的委员会确定5月20日为总攻日，企图强占小道，把洛佩斯从图尤蒂赶出去。一旦横过贝利亚科河淤地，第二步就是立即进攻图尤蒂。在中心的锡德拉小道是要害地点，似乎是轻率地由一支小分遣部队在齐胸的土墙后面防守着，胸墙的右面是一小片棕榈树，要是敌人逼近时，守卫者可以把它作为掩蔽所。小道附近明显地没有大部队的集结，这使同盟军指挥官意识到，洛佩斯打算把他们引诱到后面较远的更为有利的地带的埋伏中去。

5月20日破晓后，三支同盟军纵队向小道进

发。弗洛雷斯将军率领乌拉圭人向锡德拉小道进攻，以巴西步兵加强师为后备。弗洛雷斯在炮兵集中掩护下，夺取他的目标，并派遣巴西部队迅速地冲过开阔地占领防御工事。巴拉圭炮火很凶猛但效果不大，于是防守部队便散开进入附近的树林。在同盟军的右翼，阿根廷的骑兵轻易地占领了卡雷塔小道。洛佩斯放弃了图尤蒂逃到乌迈塔防御系统的四边形工事内。加门迪亚将军无论如何也不懂这位独裁者的战术。洛佩斯在这小道上本来可以使同盟军遭受惨重损失的，但不是这样，他仅作象征性的抵抗就撤退了。

倘若人们能够确定某一个日期作为转折点的话，洛佩斯是在1866年 5 月24日战败的。这天，发生了图尤蒂战役，也就是有名的贝利亚科河淤地战役。同盟军仍然忙于设营和准备自己的攻势，这个结合的行动为洛佩斯进行袭击提供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时机。阿根廷人在同盟军右翼，乌拉圭人和巴西人在中线和左翼，在沼泽地南边形成一个逐渐没入罗哈斯河淤地（或称北贝利亚科河淤地）的弧形。同盟军在一个持久的和穷追猛打的强大进攻下是可以被摧毁的。恩里克·维斯内尔·德·

莫尔亨斯特仑上校劝告要谨慎和防御，不要轻率地进攻，而洛佩斯要进攻。同盟军约有三万二千人，包括一万八千名巴西人，一万二千名阿根廷人和一千四百名乌拉圭人，分成七十五个步兵营和七十个骑兵营，并有八十门大炮掩护。胡安·安德列斯·赫莱—奥维斯将军是阿根廷的代理司令，弗洛雷斯仍然率领乌拉圭的先锋队，路易斯·奥索里奥将军指挥巴西部队。至于巴拉圭，洛佩斯是总司令、参谋长，同时兼管一切其他事务。面对同盟军左翼巴西人的，是巴里奥斯将军所率领的七千名步兵和一千名骑兵；何塞·爱德维希斯·迪亚斯少校带四千步兵和骑兵在中线；雷斯金将军带八千人面对阿根廷人。按照加门迪亚的材料，连同后援部队在内，总数为二万三千六百四十人。巴拉圭的计划是巴里奥斯和雷斯金合围同盟军的左右两翼，同时迪亚斯向中线进攻。5月23日晚，巴拉圭部队进入阵地准备进攻。

一个美丽、晴空万里的秋季日子，天色如同阿根廷国旗一样蔚蓝，这是5月24日。暮色降临前，六千具残缺不全的尸体在等待火葬。尽管拂晓时已有巴拉圭骑兵在运动的报告，同盟军也未料到

这一攻击迫在眉睫，米特雷太埋头于他自己的进攻计划。在这一天稍晚时，他曾要同盟军提防袭击，而十一时三十分巴拉圭人开始进攻时，他的部队正在进入阵地，迟了两个多小时。雷斯金将军对阿根廷人的进攻，由于出其不意而获得了初步胜利，但援军、适当的炮位以及熟练骑兵的机动性决定了这次战果。虽然巴里奥斯将军进攻巴西人的士兵战斗得这么勇猛，一时胜负难分，但因缺少后备军，终于让奥索里奥取得了胜利。下午二时，战役似乎已经结束，当时只在左翼殿后部队听到一些枪声。这是巴里奥斯在最后拚命的冲击。他派两个骑兵团的部分兵力，以步兵为支援迂回巴西人的侧翼。有十二个营以上的巴西部队匆忙投入这一战斗，终于把巴拉圭人围歼了。

从投入战斗的人数看来，损失是惊人的。洛佩斯在战场上丢下了五千死者，三百五十名被俘，另有八千名受伤。倘若这一估计正确，则巴拉圭这次参加战斗的不到二万人中，伤亡总数就达一万三千三百五十人。同盟军伤亡总数为三千九百一十三名，其中九百七十一名被击毙。单是巴西的伤亡总数就超过了三千名。纵使人们可以怀疑加门迪

亚关于“图尤蒂战役称得上是最巨大的南美洲军事事件”的断言，但它无疑是一次最血腥的事件。巴拉圭人可能把5月24日这个日子牢记在心，因为在两个贝利亚科河淤地环抱的土地上，洛佩斯丧失了挽救巴拉圭败局的机会。马斯特曼认为巴拉圭的损失有重大意义：“贝利亚科之战可以说灭绝了巴拉圭的西班牙种族。在前列的是这个国家所有最上等家族的男子，他们几乎被杀剩一个了；许多家庭，特别在首都，没有留下一个丈夫、父亲、儿子或者兄弟。被留在乌迈塔的老人、印第安人、奴隶和少年现在都被编入国家军队的稀疏的行列。”对死者的处置情况是：“同盟军埋葬了他们自己的一些死者，但是他们将巴拉圭人的尸体和木柴一层夹一层堆起来，堆成五十到一百堆，然后烧掉。他们抱怨说巴拉圭人瘦得烧不着。”进行这番观察的汤普森当时在场。他在战役后六个星期作了一次考察，补充了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在树林里和林间空地上仍然扔满了5月24日战役中的死尸。这些尸体还没有腐烂，但完全干枯了，皮肤干巴在骨头上，尸体呈黄褐色，骨瘦如柴。”

这一罪过的悲剧在继续进行，部分原因是同盟军陆军将领和海军缺乏互相配合。1866年11月，巴西部队的司令和次年2月任总司令的卡格西亚斯公爵，偶尔显示过英雄的气质，但是华奥·潘迪亚·卡洛赫拉斯称他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则是糟蹋了这个名词。洛佩斯挑动同盟军于7月16日到18日再次进行战斗，使五千人伤亡，二千五百人失踪。1866年9月1日至3日的一次战斗中，米特雷和他的盟友，主要是巴西人攻打并占领了位于巴拉那—巴拉圭河汇流处与乌迈塔之间河流中途的库鲁苏炮台。洛佩斯再次蒙受重大损失，退缩到接近主要工事的库鲁派蒂，于是要求米特雷举行停战谈判。这一会议在9月12日召开，但因同盟国坚持要洛佩斯滚出巴拉圭而完全失败。

米特雷将军显然相信洛佩斯已退到乌迈塔，于是下令9月22日对库鲁派蒂进行一次全力的进攻。在这次袭击中，巴西部队在战线上有部分进展，但阿根廷各营部队在主攻战中遭受重大伤亡，有四千多名同盟军士兵被弃于战场。这个数字似乎有些错误，因巴拉圭的损失数字仅为五十四人。这对洛佩斯似乎是一个追击和完全击溃他的敌人

的机会。倘若他在4月和5月不曾浪费掉大部分的军队，这位独裁者可能会做到这点；现在，没有战地防御工事的保护，他几乎什么也不能做。

库鲁派蒂战役对巴拉圭是一个胜利，但它使巴拉圭最后失败成为定局，因为库鲁苏战役后就已开始的调停，现已没有继续的希望。官方报纸《周报》以令人作呕的赞词吹捧巴拉圭的救世主。于是又举行首饰和黄金的强迫捐献。六位头面人物顺流而下去给洛佩斯元帅晋献礼品。这些可怜的家伙在如此威严的谒见中惶恐万状、局促不安，把合适的演说词讲得结结巴巴，其中一个人甚至喊出："唐·佩德罗万岁!"当然，不需要去相信这个故事。

同盟军戴着拖泥带水的胜利桂冠，垂头丧气地在库鲁派蒂前面构筑工事，他们继续封锁河面，互相谩骂。有十八个月，舰队几乎天天炮轰库鲁派蒂；有时，在破晓前几小时，有几千发炮弹倾泻在巴拉圭的阵地上。也有两个炮台从库鲁苏给洛佩斯增加炮火压力。巴拉圭人以"嘟嘟嘟"的嘲弄人的号角声迎接炮火的喧扰，他们勤快地拣起成千个未爆炸的炮弹和成吨的碎弹片，以便在将来加

重地回敬敌人。虽然汤普森对围绕巴拉圭阵地的战壕加以改进，但在东面仍有一大片未设防的地区，如果敌军通过这里向侧翼活动，就能轻易取胜。

外国人和本地人的创造才能，在克服由于长期封锁引起的严重物资匮乏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妇女们恢复了为衣著而纺织棉毛的手艺。一个外国人开办了一个用棉花和野生菠萝纤维造纸的土纸厂，还从绵羊皮造出政府公文用的优质羊皮纸；一种黑豆和灰混在一起经过处理后制出墨水；士兵们制造出自己用的肥皂；经常缺货的盐，部分地从河泥中、部分地从厚叶树中提炼出来。用从黄铁矿石蒸馏出来的硫磺和“从尿和腐烂的动物体中制出的”硝石，制造出劣质火药。亚松森兵工厂在英国工程师领导下，设计和铸造了大炮，变换来福枪筒中的来福线和大炮筒的尾部去适应拣来的敌人弹药，并在解决一个又一个的困难问题中发挥出了少有的创造才能。

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曾有过军用航空术，现在起的作用很小。在一个费用很大的气球证明无用之后，1867年6月两个美国人进行了一次成功的

升空试验。詹姆斯·艾仑和他的兄弟俩人，操纵了至少十四次高达约五十呎的气球升空。当近距离射击不能破坏这种空中侦察时，巴拉圭人使用一种粗制的烟幕很有效果。最后，8 月15日，炮艇终于通过了库鲁派蒂，停泊在保护乌迈塔的三条链子的横河铁索的跟前。

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早在1855年同巴西以及美国关系隐约出现危机时，就已开始在这个地方设置要塞工事。小洛佩斯很重视在巴拉圭河湾的大马蹄形地带设置要塞的可能性，维斯内尔上校和汤普森上校帮助他完成了这项防御工事。乌迈塔建在高出河面二十到三十呎的高地上，两边以沼泽地为界，估计架设了至少二百门大炮，在欧美被誉为南美洲的直布罗陀或塞瓦斯托波尔。它的炮台布置得很零乱，炮有各种口径和不同的出厂期，准确性更是各不相同；战地防御工事粗糙到极点。茅草屋顶的、砖的或砖坯的营房，只比牲口棚强一点，住着为疾病所折磨的守备队。独裁者、林奇夫人和主教的非常舒适的寓所也远未达到奢侈的标准。一条和亚松森联系的电报线使洛佩斯在“收发关于最琐碎的事情的电讯”中消磨许

多时间。青蛙的咯咯声把夜晚吵得格外烦躁；闪闪的萤火虫以清冷的磷光织成图案，叫人头晕目眩；成群的蚊子使十分潮湿的空气更加昏暗。

从乌迈塔渡河上溯约十哩，在查科一边的廷博，有原来的特别机动队帮助守卫河防。这个要塞工事有四十门不同口径的野战炮，架设在台子上，用简陋的壕沟和胸墙网保护着。在营棚和小屋住着少数守备队，照例还有大堆的跳蚤和其他害虫。廷博在乌迈塔的守备队撤退后已无用，1868年早些时候被拆除和放弃了。

巴西的铁甲舰冒险急速驶过库鲁派蒂炮台之后，就停泊在远离乌迈塔的安全地方，不时地炮轰一所教堂，它是炮手们看得见的唯一建筑物。因为未能有足够数量的部队沿河登陆，同盟军只有攻打巴拉圭防御工事的外围，或者改变进攻的方向。后一方针是唯一明智可行的；洛佩斯常常预料会有一次迂回侧击其左翼的行动，因而对同盟军的战略家未能利用他们的有利时机感到惊异。敏锐的战争观察家也这样，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米特雷和卡格西亚斯要把他们的部队陷在巴拉圭河下游的沼泽地和定期水淹的洼地的泥淖中，并在洛

佩斯所选择的地方作战。和这种打法相比，单是对一次右翼的包围，特别在河面控制已万无一失的情况下，会轻而易举得多。米特雷和卡格西亚斯这些军事科学上愚笨的生手走的却是艰难崎岖之路。

在库鲁派蒂撤守前，洛佩斯对敌人进行最后一次较大的突击，当时敌人的主力被北贝利亚科河淤地分开了。同盟军主要营地的一部分——图尤蒂是一个引人注意的目标。1867年11月3日拂晓，巴拉圭八千个成年人和少年人突然发起进攻，使同盟军陷入极大混乱。一些部队退到巴拉那河，同军官和随军人员争抢渡河工具。按照命令，巴拉圭人实际上是解散了去抢劫丰富的储藏品。由于这种无组织状态，同盟军才没有遭到重大失败。援军冲了上来迫使巴拉圭人撤退，在战场上丢下了大约一千二百人。同盟军有一千七百人伤亡和被俘，储存物资、军用品和大炮受到严重破坏或被掳走。一次组织完好的进攻会瓦解同盟军的绝大部分，但洛佩斯未抓住这个机会。后来，这位独裁者把大部分部队从前沿阵地撤到贯通普库小道高地新修的较短的工事中，以缩短他的防线。

1867年，在巴西和阿根廷的部队中，霍乱病造成严重死亡，补充兵员弥补这一损失后，实力达四万八千人左右。有了一支骑兵劲旅，备有充分的武器和军需品，还完全控制了去乌迈塔的河面，从而保证了一条主要补给线。洛佩斯的部队则已减到一万五千人左右，而且半数是少年人和老人。在乌迈塔阵地上，保林诺·阿伦上校有三千名半饥饿和几乎光着身子的士兵布置在一万五千米长的战壕里，其余的部队大致分布在河防堡垒的东南面。当同盟军的铁甲舰最后趁涨水期于1868年2月18日越过敷设水雷的铁索链时，这些胆怯的攻击者还不想进行决战，这只是给时间让巴拉圭的军队挨饿。洛佩斯知道固守乌迈塔和库鲁派蒂将不可能。在撤出库鲁派蒂时，他设计并运用了最巧妙的战争中的军事诈术，放一阵假炮、杂乱无章的射击、部队来回调动，就在这使同盟军迷惑的当时，洛佩斯让他的炮兵上了驳船渡过巴拉圭河。3月2日洛佩斯本人离开普库小道，于第二天进入查科。这支褴褛的部队在极困难的条件下行军到了查科这一边，然后再渡巴拉圭河，在特维夸里河正北面的圣费尔南多设防。

至少有一个月，巴西—阿根廷的领导者还不知道库鲁派蒂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了。显然，卡格西亚斯最后揣测到了巴拉圭的这个把戏，在3月21日下令对库鲁派蒂的老防线进行武装侦察。小守卫队克尽职守，击退了这一进攻，并于 3 月22日撤退到乌迈塔。阿伦上校忠实地守住乌迈塔，直至供给逐步消耗殆尽。由于和洛佩斯的联系被切断又没有解围的希望，这位上校曾试图自杀未遂。大约在同时，铁甲舰上的观察哨报告，乌迈塔正在撤守，卡格西亚斯就决定于 7 月16日猛攻这个要塞以博取荣誉。约有六千到一万二千人参加这次攻击，结果同盟军损失二千人。这是乌迈塔临终前的喘息。7 月24日实实在在地撤退了，只留下那些太弱而不能逃跑的人。在这些逃亡者耗尽体力和弹药后，巴西部队才在查科俘获了这支守备队的一半人左右。洛佩斯把逃出的残部当作一群内奸来对待，拷问后枪毙了阿伦上校，又处决了阿伦的副指挥官的妻子和母亲，因为他在 8 月 5 日带残部投降。谁也不能使洛佩斯称心，除了极少数人由于某种奇迹才不受他的惩罚。

在拆除乌迈塔时，洛佩斯加强了他在圣费尔

南多的营地。他派汤普森上校在特维夸里河和巴拉圭河汇流处建立炮台要塞，然后他本人也迁往圣费尔南多。就在这里，“在一小块约有三十平方米的干地上”，建立了司令部，一支八千人的部队设营于泥泞地上。在这里，洛佩斯还拷问和处决了许多“谋叛者”。汤普森在要塞曾把两次冒险驶过炮台的同盟军船只当作实弹射击的靶子取乐。

7月，乌迈塔的陷落使洛佩斯从巴拉圭河向上撤退到比列塔，这是在亚松森南面约三十公里的一个小村子。1868年8月，在圣费尔南多的一支后卫部队使巴西的追击者遭到二百多人的伤亡，这提醒人们：被打伤的毒蛇仍能咬人。在比列塔下面的安戈斯图拉，汤普森负责指挥他于战争期间已准备好的最后阵地。同盟国部队缓慢地跟来，在巴拉圭河西岸的查科登陆，修筑一条包围比列塔阵地两翼的道路，然后对它进行围攻。据谣传，洛佩斯这时喝上酒、信了教以求得慰藉，并以拷问和处决许多忠顺的公民取乐。和弗朗西亚一样，洛佩斯用惩罚打击那些甚至最忠于他的部下。曾积极为巴拉圭效劳的英国人，包括乔治·弗·马斯特曼在内，在毫无道理的口实下遭到下狱和拷问的

折磨。普通的囚犯，拥挤于十分闷人的、寄生虫猖獗的地牢里，他们所受的拷问较之纳粹死亡营有过之而无不及。监狱中特有的霍乱，在军队和居民中间迅速地蔓延开来，使亚松森的人口仅仅由于这一原因在1868年就减少了四分之一。

洛佩斯对待囚犯——不论他们是巴拉圭人还是外国人，都是一部仅仅在细节上稍有出入的暴行录。少数几个外国人奇迹般地逃出虎口。其中一人就是架设从亚松森到乌迈塔电报线的 R·冯·费歇尔一裘斐尔德。他被指控为一桩莫须有的推翻洛佩斯阴谋案的同谋犯，于 1868 年 10 月被捕。在比列塔附近的拉斯洛马斯，他受到了不寻常的待遇，但远比独裁者的兄弟何塞·贝尔格斯和其他许多人受到的待遇要好得多。这个德国人由于意外的幸运，保住了性命。威廉·斯图尔特医生，被巴西人俘获，是另一位幸运的人。这位英国冒险家在巴拉圭曾过得很富裕，虽然在1869年1月5日巴西人占领亚松森后，他在兵灾中损失了一万美元。

同盟军部队的深入迫使洛佩斯把他的主要囚犯，包括他的近亲从圣费尔南多转移到比 列 塔。

1868年9月,在这一转移途中,几名特殊囚犯——被指控为阴谋案的同谋——加入到一千多囚犯的行列中。马斯特曼是这里边的一个受害者,他曾写道:"男人、妇女和儿童,分成三部分,徒步的或骑马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把他们围住,手持棍棒痛打那些走出界的或因体力不支而摔倒的人;同时,军官们举起出鞘的剑在这些人中间骑马而过,肆无忌惮地、残暴地左右抽打……夕阳的红光在人圈内飞舞着的剑锋上不时地晃动,而在人圈外的刺刀丛中更是闪烁不停。一小群一小群人被拉在后面,从那里发出的可怕的嘈杂声——从远处听是一片混乱的喊叫声——变得更响了;四处响起猛烈的殴打声、沉重的砰击声、急速的鞭抽声,和此伏彼起的镣铐的叮当声、呻吟声、吆喝声、哭喊声和咒骂声——交相呼应,混成一片。这一切使我想起一场战斗结束时的情景,那时只有无依无靠的罪人走向屠场。"贝南西奥和贝尼尼奥·洛佩斯,和洛佩斯的妹妹唐尼亚·伊诺森西亚·德·巴里奥斯和唐尼亚·拉斐拉·德·贝多亚一样,都被拘留在拉斯洛马斯,她俩的丈夫经拷问后被枪决了。

关于对洛佩斯拷问过他妹妹和至少威逼过他

母亲的指责，还不能毫无疑问地被证实。M·T·麦克马洪将军——接任沃什伯恩的美国公使，在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上作证道，当他在巴拉圭时(1868年12月到1869年5月)，洛佩斯对待他母亲和姐妹如同“国家的第一夫人……她们当时的寓所离皮里维武伊只数哩远。我离开时，我的房子——皮里维武伊最好的房子之一，就移交给这位总统的母亲，她和她的女儿们住在那里，在许多场合给我的印象是他对她是非常孝顺的”。另一方面，沃什伯恩却作证说，这些妇女被囚禁于她们的寓所，而斯图尔特医生又坚持说他曾看到这位独裁者的姐妹被捕入狱。

1868年10月1日，四艘铁甲舰驶过安戈斯图拉炮台，一个月后，和其他几艘炮舰会师于比列塔外的停泊处。11月，三万二千巴西人在比列塔上游登陆；12月5日，他们占领了横拦通向巴拉圭防线的一条小河上的一座桥梁。经过几次决定性的战斗后，巴拉圭军队从八千人减到三千人，卡格西亚斯对这位独裁者的司令部发动进攻。在这场从12月21日到27日的洛马斯—巴伦蒂纳斯或皮基西里战役中，巴拉圭军队被歼灭。洛佩斯向北逃去。卡格

西亚斯本来能够追击和俘获他；但是这位巴西的司令官更关心的则是进入亚松森和宣布战争的结束，1869年1月5日他实现了这一愿望。

但是战争并未过去。在亚松森东面的山脉中，卡阿库佩朝圣地的村子附近，洛佩斯集结了少数部队继续进行游击战，当时许多妇女儿童已因饥饿而死。1869年，奥尔良的路易斯·费利佩·马里亚·费尔南多·加斯顿、德欧军区司令、唐·佩德罗二世的女婿接任同盟军司令。至少，他不次于卡格西亚斯，然而大多数战斗已经结束。他的军队只在8月里包围过洛佩斯；但这个被猎取的对象又逃脱了。流窜几个月之后，洛佩斯最后在亚松森北面二百多公里的阿基达班河两岸遭到突袭。历史学家们，如同争论他的生平一样，对洛佩斯如何死去的问题也未取得一致意见。有些人主张说，一个叫何塞·迪亚沃的普通士兵，在1870年3月1日用长枪刺死了这位独裁者。别的人说，洛佩斯在一次散兵战中腹部受伤，而枪刺不过是免于他死前痛苦的一击。佩德罗·卡尔蒙则说："他死的象中世纪的一个骑士。"

一场如此长期而残酷的战争，可能被认为已

使巴拉圭国土变成一片废墟，其实物质损失很小。皮拉尔（尼埃姆布库）于1867年9月沦入巴西人之手，征服者抢劫了那里几乎一切值得带走的东西。其他的居民点，包括亚松森在内，都因士兵们的传统特权而受到破坏。伯顿舰长把罪责归于“西班牙巴斯克人和意大利人的随军小贩”，并且承认他的同胞“也出了名：一个人偷走了教堂的钟，另外两个人打扮成活象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像那种样子，穿着蓝外套帆布裤，假装他们的伙伴喝得烂醉，手挽着手，搀着他向港口走去”。承认这样的抢劫，承认牲畜的毁灭以及偶尔放火烧掉一家农舍，但其活动范围依然太小，不能算作大规模的破坏。

巴拉圭最大的损失是人力。虽然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但我们可以采用五十二万五千人这一估计数作为1865年相对可靠的人口数字。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在1857年为一百三十三万七千四百四十九人的数字显然有些夸大。1871年，在征服者监督下进行的一次计算，确定这个国家的人口数为二十二万一千零七十九人。在这些活着的人当中，妇女为十万六千二百五十四人，儿童为八万六

千零七十九人，而男人则为二万八千七百四十六人。虽然由于单纯的生物学上的原因，这一不平衡状态在不到两代的时间里就自己纠正过来了，但巴拉圭女人超过男人完全是由战争引起的看法却持续了许多年。在余下的妇女当中为取得男人的欢心迅速展开了竞争。这是导致广泛的乱婚、私生和男人懒惰的一个条件。但这些特点绝非世界的新现象。

这个国家丧失了大约五万五千平方哩的领土给阿根廷和巴西，承受了一笔巨大的但从未能偿付的赔款，沉到了南美洲各共和国中的最底层。博得伯顿如下的赞美词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引起全世界注目的所有事情很少有比这场悲剧更动人心弦的了。这场毫不畏缩的斗争在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坚持了这么长的时间，而且到了种族灭绝的真正边缘。有着一种印第安'斯巴达'的坚韧不拔的勇猛精神和半强制的英雄气概，它的唯一弱点——河上防线……曾是用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种顽强的意志、野性的刚勇和持久的拚死斗争精神来保卫的。"

一个哀悼失去爱人、家庭和朋友的少女也许

会向灰色的伤心鸟——乌鲁托(猫头鹰)哭诉:

呜呜夜枭啼,
棕榈枝头栖,
故土巴拉圭,
面目已全非。
呜呜夜枭啼,
其声何凄凄,
同生马黛地,
共洒丧国泪。

第 十 五 章

处于困境的外交官

在"三国同盟战争"中对洛佩斯和他的敌人双方都采取敌对行动的查尔斯·艾姆斯·沃什伯恩，属于一个后代享有名望的、富有的家族。这位未来的美国驻巴拉圭专员与公使，1822年生于缅因州，1848年毕业于鲍登大学，在威斯康星州当律师。他是个不安定的青年人，经常依靠弟兄的接济生活，1850年被吸引到加利福尼亚州。三年之后，成为一家报纸的编辑。1861年，林肯总统为抵偿对沃什伯恩家族的一部分债务，任命他为驻巴拉圭专员。1862年提升为全权公使。沃什伯恩是两本平凡小说的作者：一本是《菲利普·扎克斯托》(*Philip Thaxter*, 1861)，一本是《蒙哥马利的哥马利》(*Gomery of Montgomery*, 1865)；1871年出版了两卷《巴拉圭史》。1889年去世前，他发明了活版印刷机和其他机器，还写了各类文章和许多书。查

尔斯·艾姆斯·沃什伯恩是个出类拔萃的人才，具备一切，惟独缺少构成伟人的品格和见识。

林肯的国务卿威廉·H·西沃德不太想成为一个关心巴拉圭事务的总理。布坎南[1]总统对于“美国和巴拉圭航运公司”要求赔偿的裁决不满意，但又不想发表加以否定的声明。林肯政府认为事情尚未解决，决定派遣一个驻节专员到巴拉圭去重新谈判。这个职位并不重要，它的第一任也同样不是个重要人物。沃什伯恩于1861年7月27日离美，11月24日到达亚松森。由于美国内战，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敢于无礼对待。他既拒绝和公司的代表谈判，又拒绝和沃什伯恩进行磋商。1862年弗朗西斯科·索拉诺当了独裁者，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执行他父亲的政策。

在一段时间内，沃什伯恩除了欣赏这个国家外，没有别的事可做，在那里，他看到到处是砖坯房，“室内空气凉爽，宅旁有稠密的柑林和葡萄藤棚，草木茂盛，水果丰富，一般看来人们怠惰而奢

① 布坎南(James Buchanan, 1791—1868)：美国第十五任总统，林肯的前任，其任期为1857—1861。——译者

靡，给人一个印象，这里必是‘懒惰城’郊，整个人生不过是一场懒散闲逸、与世无争的安乐梦”。这些砖坯房是用茅草覆盖的粗糙的建筑物，一般都是两三间。农场主家的附近则有奴仆住的小茅屋，有许多柑子树，还有简陋的糖坊和库房。只有小块地是开发了的，种植甘蔗、玉米、棉花、木薯、烟叶。在草原公地上放牧的牛群如此之多，致使肉价极为便宜。卖烟叶的收入用来购买马黛茶、衣著、首饰。人们爱好的食物是普切尔——大米炖牛肉或鸡肉，煮木薯，奇巴（玉米或木薯粉做的面包）加上一种蜜饯作尾食。柑子非常丰富，在农村实际上不值钱。

时间愉快地过去，这个美国专员逐渐熟悉了这块外国殖民地，那里有许多英国人往往同情美国内战中的南部同盟。沃什伯恩在显灵教堂附近弄到一所大房子，后来房主控告他没有付房租。在这里他认识何塞·毛里西奥·卡萨尔，这个人住在林皮奥，离他住地大约二十哩远。唐·何塞是个鳏夫，一度非常富裕："家有银盘估计不是成吨的话，也有好几百磅。最贵重的丝织品，用金银丝镶织的浮花锦缎，买了贮藏起来，而屋内必要的家

具、摆设价值总共也许不到一百美元”。卡萨尔或许通过给政府送厚礼而博得弗朗西亚的欢心；但洛佩斯家族剥夺了他的农场、银盘及其他一切，只剩下存身的茅顶砖坯房。沃什伯恩在他那里消磨过许多时间，打猎、午睡、喝马黛茶、吸烟，倾听唐·何塞美丽的女儿们用西班牙语和瓜拉尼语唱忧郁悲伤的小调。还游览了全国，其中包括1863年4月到耶尔巴产地的旅行。沃什伯恩在他的《巴拉圭史》中关于耶尔巴备制过程的一段描述，是对这个巴拉圭主要工业的经典说明。

另一个朋友是唐尼亚·卡梅里塔·希尔·德·科尔瓦尔，她的兄弟在乌迈塔打仗，她的丈夫是一个有钱的人，被迫入伍当赤脚兵，早已死于战争。唐尼亚·卡梅里塔恨透了洛佩斯，乐于向有同情心的美国人诉说她的不幸。威廉·斯图尔特夫人，一个英国医生的妻子，是常受使馆欢迎的客人，当沃什伯恩离开这个国家时，顺利地把价值六千美元的银器和珠宝带给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姐夫。唐尼亚·胡安娜·卡里略·德·洛佩斯——弗朗西斯科·索拉诺的母亲和她的女儿拉斐拉明白地向这位美国公使吐露她们的苦恼。沃什

伯恩熟悉林奇夫人，在他向麦克马洪将军提出应该告诉他“一些关于林奇夫人和她的小家伙们的情况的要求中，流露了他对这位独裁者的爱尔兰情妇的评价”。

批评查尔斯·艾姆斯·沃什伯恩的人，责难他缺乏外交上取得成功所必需的品质，未具有完成出使巴拉圭所必要的手腕、勇气与坚韧不拔的胆识。1868年秋，伯顿舰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看到他时，沃什伯恩几乎是一个丢魂丧魄的人：“他的许多主张是那些对自己的行动几乎不负责的人的主张。”但是，只要人们想到外交官在亚松森的遭遇，那么，这位公使还能多少有条理地讲话，已是一件奇迹了。假如说他不算是我们最熟练的国民外交官——借用约翰·亚当斯的一个词，他也决不是最坏的。考虑到巴拉圭的状况，责备他几乎是没有根据的。他使自己的政府对事态保持消息灵通；他不受“新大陆”最坏的暴君的欺骗和威胁；他和洛佩斯公开对抗，这种对抗在当时很可能意味着牺牲生命；他利用时间从事历史著作(大部分的调查研究是波特·科尼利厄斯·布利斯作的)，这本书虽然不可避免有偏见，但在用英文写的、到

1868年为止的巴拉圭史书籍中仍不失为最好的一本。

沃什伯恩的工作，一直到1865年1月16日他请假离任，双方政府都是满意的。为什么他选择那样一个关键时刻离职，这是很难说的。他的未婚妻——他离任回国同她结婚后，一起返任——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下本来是可以等待的。巴拉圭处在战争中，沃什伯恩的健康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坏，而且肯定他家中没有大宗财产需要他去照料，虽然他可能梦想向一家有轨电车公司投资。9月他离开美国返任，大约10月1日到达里约热内卢，这时他才发现通过巴拉圭河上的同盟国封锁线，需要得到海军的帮助。

沃什伯恩的求援信送到海军少将S·W·戈登那里，戈登于1865年6月21日担任南大西洋舰队（包括“苏斯奎汉纳号”，“胡尼亚塔号”，“尼普西克号”，“肖纳特号”，“沃斯普号”与“沙莫金号”）的指挥。戈登为公使的傲慢态度所激怒，回答说没有船只可供旅行，只有“沃斯普号”短期内可以指望。沃什伯恩等得不耐烦了，11月4日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戈登的借口是有破绽的，因为“沙莫金

号"完全能够出航，用煤在蒙得维的亚、布宜诺斯艾利斯、罗萨里奥、科连特斯等地都有。戈登对强行通过同盟国封锁线一事，犹豫不决；擅自决定沃什伯恩无需驻亚松森；他把自己看作是拉普拉塔地区美国的主要代表，还认为文职外交官都是政治骗子。同盟国方面当然不愿美国公使再往巴拉圭，因为怕他在巴拉圭出现会在道义上支持洛佩斯。本来，从处理这类事务的国际法和美国与阿根廷间的条约规定来看，戈登完全有权要求允许带沃什伯恩通过封锁线的。

这个耽误触怒了国务卿西沃德，他在内阁向海军同僚告发。海军当局于1866年4月26日命令戈登把沃什伯恩送到任所，但直到10月5日，"沙莫金号"舰长皮尔斯·克罗斯比才得到指令把沃什伯恩及其家属送往亚松森去。几天之后，戈登给克罗斯比写了一张私人便条，表明他并不关心公使是否到达。但要求克罗斯比十分注意这位使节。戈登写道："给我弄一打巴拉圭制的戒指，在上面标明价格——给别人带的。我要一些巴拉圭香酒或甘蔗酒。"这样，1866年11月5日"沙莫金号"把沃什伯恩送回任所，想来总会为戈登捎回了戒指

和甘蔗酒吧。

沃什伯恩提出调解战争时，还没有接到这样的指示，而是根据自己的意见，试图于1867年 3 月结束这场战争。他和洛佩斯磋商，然后和卡格西亚斯磋商，提出“国家相互独立，保留洛佩斯本人为巴拉圭政府的首脑”。同盟国要求洛佩斯下台为和平的必要条件。沃什伯恩不顾常理，轻蔑地耸耸肩，给卡格西亚斯写了封愤慨的信。为什么不要求唐·佩德罗二世退位呢？巴拉圭受到了不正确的对待，同盟国拒绝了荣誉的和平。这封信在《周报》上发表，公使得到洛佩斯暂时的感谢和同盟国永久的责难，这种情形使他的名誉许多年来受到损害。洛佩斯后来责备沃什伯恩在巴西军营中曾提出如何打败巴拉圭人的忠告。从沃什伯恩1868年离开巴拉圭时想要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卡格西亚斯这点看来，这个指责似乎不尽是荒谬的。审慎行事不是他突出的一个长处。

马里兰州的詹姆斯·曼洛夫少校事件的发生，使洛佩斯和沃什伯恩的关系更疏远了。曼洛夫以前是美国南部同盟军的一个军官，他和英雄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在一起干过。这位冒险

家出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报纸描述他是一个一贯杀害巴拉圭人的刽子手。1866年 8 月，曼洛夫没有携带任何证件来到巴拉圭军队司令部向洛佩斯献策，说至少可以间接地援助这个内陆共和国。他建议组织一支海盗队，发给他们捕拿敌船的许可证，去扫荡阿根廷和巴西的船只。洛佩斯听了这个意见之后发笑，怀疑曼洛夫为什么能那样容易地通过敌人防线，于是把他送到了亚松森，以便加以监视。沃什伯恩以为能宽恕一个从前的叛乱者而满怀自以为是的正义感，设法帮助曼洛夫跳出自投的罗网。公使向洛佩斯求情遭到冷酷拒绝时，就抛出星条旗的保护外衣来掩护这个先前是星杠旗[1] 的追随者，但美国国旗也未能拯救这个南部同盟军人，他于1868年晚些时候被处死刑。

1868年 2 月当同盟军炮舰驶过乌迈塔时，恐慌笼罩着首都。尽管没有收容老百姓的任何准备，洛佩斯下令撤退，人们便用车推着、或用头顶着、用背驮着财物涌向卢克。许多人把贵重的财物留

① 星杠旗(Stars and Bars)：美国内战时期(1861—1865)南部同盟所用的旗帜。——译者

在美国使馆。外交部长唐·何塞·贝尔格斯把撤退令转达给沃什伯恩，美国人拒绝离开。其他外国人在美国使馆受庇护直到7月1日，他们中间有洛佩斯雇用的许多英国人的妻子。正是在这个时候，曼洛夫和波特·科尼利厄斯·布利斯成为沃什伯恩的幕僚。两艘同盟军炮舰2月24日炮击亚松森，但亚松森未遭损失，炮舰随即撤走。沃什伯恩呆在那里不走，不顾洛佩斯来赶他。曼洛夫违犯命令上街，落到警察手里，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8月，行刑队结束了他的生命。沃什伯恩曾一再试图援救他。

公使和洛佩斯之间最严重的纠纷产生在给葡萄牙代领事何塞·马里亚·莱特一佩雷拉先生以庇护权，这个人的领事承认书1868年6月就撤销了。这位领事曾向巴西罪犯提供钱物，犯了错误。巴拉圭外交部得知他到沃什伯恩处避难，曾要求沃什伯恩解释，但外交部被告诉说这不关它的事。几天以后，前外长何塞·贝尔格斯以叛国罪入狱。政府追查一包文件，怀疑贝尔格斯将它交给了沃什伯恩。沃什伯恩回答，从贝尔格斯那里除正式公文以外没有接到过什么。但巴拉圭政府一再追

索，还加上一条说某些受庇护者有策划阴谋的嫌疑，应逐出使馆。后来不知沃什伯恩坚持多久，或是洛佩斯尊重使馆特权多久，这些人决定自己投案由巴拉圭审判，相信他们会被证实是无罪的。葡萄牙领事就是7月13日那批离开使馆的人之一。

随之而来的是捏造的大阴谋：沃什伯恩本人成了暗杀总统的密谋主犯。整个阴谋计划似乎发生得很离奇。1868年2月巴西的铁甲舰停泊在亚松森时，首都政府官员开会商议对策。他们明白，一个装有一百五十磅火力炮弹的要塞只能进行象征性的抵抗，但还是下令抵抗了。当洛佩斯听到有关这次会议的情况时，他只有一个解释——阴谋！他召来自己的姐夫萨图尼诺·贝多亚进行拷问，逼供出有一个密谋。第二个见证人唐·贝尼尼奥·洛佩斯经受了同样的拷问。于是向这两人追问同谋者，这样辗转揭发，最后这一串牵强附会的告发集中在沃什伯恩身上。巴雷特在他的《马背上的女人》一书中让我们相信林奇夫人发现是独裁者的母亲、兄弟、姐妹策划的阴谋。一个小说家确有其便利之处。胡安·埃米利亚诺·奥莱亚里写来好象洛佩斯自己在回顾似的，直截了当地断言沃什

伯恩是“这场活动的中心人物”。

这些荒诞的阴谋罪一定早已把沃什伯恩吓住了，他不够慎重，缺少外交手腕，弄得不知所措。他不是对整个事态干脆置之不理，或称之为愚蠢的捏造，而是详尽地回答那些荒谬的谰言，这就加深了或引起了嫌疑。后来连最初控告沃什伯恩的新任外交部长唐·古梅辛多·贝尼特斯也被逮捕作为罪魁枪决了。林奇夫人到使馆力劝沃什伯恩供认。诚然，公使是非常直率地表达自己对洛佩斯及巴拉圭的看法的，象他这样做法的这种类型的外交官确是不应再有的；但是把一个为自己发迹而谋害洛佩斯的罪名加诸于他，是完全荒唐可笑的。甚至在那时候他还利用布利斯给他准备的长稿写了《巴拉圭史》的一大部分，叙述到1810年。洛佩斯在使馆里一定会有奸细，如果发现这份原稿的话，沃什伯恩是否会再烦扰他的弟兄就很难说了。

虚构的阴谋案疯狂地喧闹一时之后，使馆人员受到孤立。沃什伯恩在美国众议院一个委员会上作证说：“令人感到弥漫着一种阴郁的气氛。在路上碰到的巴拉圭人不敢注视我，在兵工厂工作

的一些英国人和其他人也是这样。我们所有的人都很清楚地预见到，如果事态再继续下去，洛佩斯会要杀害我们全体。”恐惧是有理由的。根据雷斯金将军的日记，6月以来洛佩斯以惊人的速度枪决罪犯。这个记录在洛马斯—巴伦蒂纳斯战役中被巴西人缴获，包括的时间是从1865年5月31日到11月14日，显然不完全。雷斯金所开列的名单上有四百个巴拉圭叛国罪犯、逃兵、间谍，有的被枪决，有的死在监狱中，有的死在从一个拘留地到另一拘留地的途中，其中四分之三是以叛国罪枪决的。外国人也免不了受到同样处理。巴西人三十三个，阿根廷人二十五个，意大利人十五个，西班牙人九个，法国人六个，葡萄牙人三个，德国人二个，英国人二个以及其他许多人遭到死亡或被枪决。这些不完全的数字表明了洛佩斯的恐怖统治。恐怖的谣传渗入到被围的使馆内，说包围使馆的卫兵等待机会抓走马斯特曼、布利斯及其他避难者。每晚，窗子和窗帘一拉上，沃什伯恩“就能听到卧室的窗前警察在窃窃私语，刀剑铿锵作响”。在这种凶兆的气氛里，沃什伯恩夫人帮着丈夫将珍爱的手稿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最后安

放在一张大桌子的桌布下面。

国务院并没有忘记沃什伯恩的困境，驻巴西公使詹姆斯·沃森·韦伯将军尽一切可能营救他。戈登的继任者海军少将C·H·戴维斯派“沃斯普号”上溯巴拉圭河，但巴西人不让它越过距亚松森二百公里的库鲁派蒂。韦伯将军警告，如再干涉就要和巴西断交，接着戴维斯少将就下令“沃斯普号”冲过封锁线，并这样做了。炮舰指挥W·A·柯克兰找洛佩斯，告诉他沃什伯恩是格兰特将军[1]的朋友，如果伤害了沃什伯恩，美国将要独裁者的脑袋。此外，柯克兰还说六艘浅水炮舰正待命到洛佩斯跟前叩击亚松森。洛佩斯同意让沃什伯恩撤走，除马斯特曼和布利斯之外，使馆所有人员都发给护照。8 月29日，“沃斯普号”停泊在距亚松森几哩远的地方等候沃什伯恩以及他的随行人员。公使不愿撇下这两人而去，和他们商量以争取最好的出路。

他作证说：“我们的一致意见是，如果我能走

① 格兰特 (U.S.Grant，1822—1885)：美国将军，于1869—1877年任美国第十八任总统。——译者

掉并把关于他们的情况向我们舰队告急，那将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了。他们认为，可能在被杀害之前有机会得救。我让眷属走在我们的前头，这样可以不让她们看到可能发生任何的事情。法国的、意大利的领事和我们一起走上轮船。我们必须从我房子的前门走，而我们刚走出走廊上街时，就有五十名左右的士兵……冲进来抓走了布利斯和马斯特曼……随即把他们送到监狱。”沃什伯恩就这样走了。在下驶途中，他向舰长柯克兰要求让他在乌迈塔上岸会见卡格西亚斯元帅，要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洛佩斯的兵力、其所在地点与实力以及行动计划”全部告诉那位同盟军统帅。柯克兰很正当地拒绝停泊。

波特·科尼利厄斯·布利斯多少是个奇才。这个有才气的、古怪的冒险家是在纽约印第安人中间传教的牧师阿谢尔·布利斯的儿子。波特生于1839年，1858年进汉密尔顿学院，一年后转耶鲁大学。虽然在哪个学校也没有完成学业，但汉密尔顿学院授予他名誉文学士学位。由于缺少钱，布利斯给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许多会员工作，他在历史研究方面的非凡才能，博得埃弗里特、班克罗夫

特、朗费罗[1] 等人的夸奖。他拿着东部学界的介绍信到华盛顿，想要林肯任命为印第安事务官。但他遇到韦伯将军后忘掉了印第安人，而要求当驻里约热内卢美国使馆的秘书。韦伯拒绝了他的要求，但提出带他去作他孩子的家庭教师兼私人秘书。布利斯接受了，在韦伯之前去英国，在国外和公使会面，一道乘“泰内号”赴巴西。阿普尔顿出版社任布利斯为代理人，翻译、介绍出版社的一些书籍到南美去。沃什伯恩也在“泰内号”上，他对布利斯评价很高，在里约热内卢分手后和他保持通信。布利斯在巴西首都上层社会中活动，甚至唐·佩德罗二世“在不同场合接见了他，对他表示很大的好感”。

如果布利斯把自己和佩德罗二世谈话看得比尽一个家庭教师的责任来得重要，应该是无可责备的。韦伯责骂布利斯没有花足够时间教育他的孩子们尊重真理，虽然公使本人不象是一个爱教

① 埃弗里特（Edward Everett，1794—1865）：美国教士、演说家及政治家。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1800—1891）：美国历史学家。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美国诗人。——译者

训别人的人。这个失职决不意味着布利斯是个“天生的说谎者”，如有些人指责的那样。公使完全相信他秘书的誓言，并钦佩他是个学者，学外文有非常的能力。布利斯要求解约，于1862年12月随韦伯乘美轮“詹姆斯城号”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不懂西班牙文；但在一个月内就“和多数外国人一样”地讲西班牙语了。韦伯和爱德华·奥·霍浦金斯说服阿根廷官员委托布利斯负责领导一个团体进行印第安语言的研究工作。为此目的他去贝尔梅霍河旅行，回来后担任《拉普拉塔河杂志》的主笔。工作一年后，1865年 1 月 1 日，他出航巴拉圭，以便在返美之前获得有关印第安人及其他问题上更多的知识。

在那些日子里，亚松森不欢迎外国人。布利斯溯流而上时，沃什伯恩正休假外出，没有见到，因此，他在巴拉圭首都没有朋友。洛佩斯布置密探监视这个坦率地承认同在巴西的韦伯和阿根廷政府都有联系的嫌疑分子。布利斯为了维持生活同时缓和对他的怀疑起见，向洛佩斯建议，由他写一本关于同巴西的边界纠纷的小册子，在这个争议中他实在是同情巴拉圭这一方的。完成这个研究后，

布利斯在档案调查的基础上着手写一本巴拉圭史。因为这个国家的档案不能为他的调查而开放，布利斯访问了许多知道弗朗西亚的人，用第二手材料进行写作。这部历史以手稿的形式写到1810年。不用说，洛佩斯在殖民地时期的事件中并不占很显著的地位，布利斯没有提到这位独裁者。这个失误的结果撤销了他一直接受的微薄的报酬。这时沃什伯恩休假回来，需要一个私人秘书。他对巴拉圭史也有兴趣，特别是布利斯呈送给他一份长手稿，似乎已无必要再进行搜集资料了。

当同盟军炮舰接近亚松森时，沃什伯恩以为军队几天内就会随之而来。他想为巴拉圭的和外国的朋友们尽点力，如前所述为他们提供了避难所，还为一百多人保管贵重财物。这些活动使他感到通信往来是一桩繁重的负担，因此聘请布利斯为使馆译员，这位业余史学家非正式地担任这个职务已有一些时间了。为此沃什伯恩为他请求一张护照。

马斯特曼和布利斯由于触犯了一个独裁者，所付出的代价可能是沉重的。他们戴着紧卡在脚脖上的沉重镣铐，被送到圣费尔南多总部，投入监

狱。其他受害者至少有六十五人——牧师、巴西士兵、巴拉圭人，还有外国人。马斯特曼看到许多人“几乎处于痛苦的绝境，有的差不多光着身子，遍体鳞伤”。布利斯证明，他们“除了一天给两次少量的动物内脏，由他们自己煮着吃，此外就得不到食物了”。名声极坏的神甫菲德尔·迈斯，一度也是个犯人，是主要的审讯者，挑刺的人。经残酷拷问后，马斯特曼和布利斯供认了解“阴谋”案件，洛佩斯用此作口实杀害了在巴拉圭的几乎每一个有点声望的人——不管声望多小。沃什伯恩告诉他的朋友们，爱讲他什么就讲什么，如果对他们有帮助的话。无论如何没有一个神志清醒的人会相信拷问出来的口供。按照马斯特曼和布利斯的自述，俩人对“乌拉圭的刑罚”忍受了一些时候，后来就承认沃什伯恩确是搞反洛佩斯阴谋的中心。布利斯靠同意写一本沃什伯恩的详细传记而赢得时间。这本书叫《北美公民查尔斯·艾姆斯·沃什伯恩的使命秘史》，由洛佩斯给出版。没有一个有理性的人不把它看作是全属虚构的。布利斯为了那些可能多少有些迟钝的人，则不但把艾姆斯拼错为艾莫斯，而且加进了不少显然是可笑的情节和罪

状。结果成了一篇令人目瞪口呆的描述，读了这三百二十三页的书，一定会不止一次地把人弄得心神不安。1869年布利斯一到美国，立即在报纸上发表全部收回这本书的声明，并说明这部幻想作品是怎样写成的。该书完成于1868年12月 2 日。两天之后布利斯得到自由，不久美国海军官员营救了他和马斯特曼。

故事就是这样在众议院委员会上陈述的。可是，将所有证词扔在一旁为这些有趣味的人物一洒同情之泪前，请注意一个在布利斯登上“沃斯普号”时和他谈过话的人，名叫托马斯·Q·莱克隆的誓言吧：“我讲了……他遭受了三个月的拷问和软禁后，发现自己重新和那些有权力和决心保护他的人在一起，必定是一个真正的安慰。他然后说，就拷问而论，从未受到过，甚至类似的威胁也没有；他没有戴过镣铐；他和马斯特曼先生有一间棚屋和巴拉圭人住的一样舒适；每天发给他们足够的牛肉、木薯和耶尔巴；他唯一抱怨的事是从营房出来不管走多远都得让一个巴拉圭士兵陪伴着。”

一定有一个人在说假话。拉姆齐舰长报告，弗雷德里克·斯金纳医生说马斯特曼和布利斯没有

受过拷问；马里阿斯·杜瓦尔医生证明他们没有受刑的痕迹。有一件事是确实的：至少马斯特曼是几乎惊吓得死去。对这样令人痛心的情节表示怀疑，是太不应该了；但是甚至沃什伯恩也称马斯特曼为“声名狼藉的撒谎者”。同时具有惊人记忆力的布利斯说，马斯特曼的《动乱的七年》一书充满讹误。然而，威廉·斯图尔特医生证实布利斯和马斯特曼所说的一切，并赞誉沃什伯恩救了许多外国人的性命。对于真实性的问题也许我们最好就讲到这里。

沃什伯恩没有忘掉这两位被议论的人物。9月20日他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后，就把他们被捕的事告诉英国公使，然后到里约热内卢。在那里，他遇到他的继任者马丁·T·麦克马洪将军，正由海军护送前往亚松森。海军少将戴维斯的舰队拥有“格雷里号”、“波尼号”、“奥因伯格号”、“坎萨斯号”与“沃斯普号”。他于10月5日了解到马斯特曼和布利斯被捕，但一直到1868年12月3日才带着麦克马洪到安戈斯图拉。麦克马洪起初要求，后来只得恳求，将他们释放。这些不幸的人于12月10日象囚犯一样登上“沃斯普号”，1869年到达纽约，立

即准备备忘录提交国会。在离开巴拉圭前，布利斯写信问洛佩斯，对于别人告发他接受几千美元一事应该怎么处理。没有比这类冷酷的幽默更甚的了，洛佩斯告诉他留着它，同时送一些金币作为临别赠礼。

作为布利斯—马斯特曼备忘录的结果，众议院于1869年3月19日决定审查沃什伯恩和指挥南大西洋舰队的海军官员们的行为。听取证词会于3月30日在华盛顿开始，4月27日休会，沃什伯恩是第一个证人。10月21日由小组委员会在纽约重开听取证词会，11月在华盛顿结束。委员会在提出的报告中说："关于这个证词，其中许多带有矛盾性质，同时暴露出不同的海军官员之间、海军和政府的外交官员之间都有讥讽和怨恨的情绪……这对有关当事人的声誉有不利的影响，对政府有权要求它的官员的办事效能方面也是有害的。"

委员会本身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大多数人谴责海军少将戈登没有搭救沃什伯恩，认为布利斯和马斯特曼的被捕、拘留是"对美国的荣誉和尊严的一大侮辱"，对海军官员未能和外交官员合作应加教诫。少数人的报告书认为逮捕是一个侮辱，沃

什伯恩默许逮捕有损国家尊严，是“不能以个人安全的考虑来辩解的”，沃什伯恩不应当接受一个不让他使馆人员全部撤退的护照，沃什伯恩对洛佩斯采取敌对态度并让布利斯和马斯特曼（一个是英国人，洛佩斯认为他和国内外敌人有合搞阴谋的嫌疑，两人都是冒险家和信誉可疑的人）参加使馆工作，是不慎重的；舰队司令官戈登和戴维斯不应受到非难。

除了“海军永远第一”论者，读了三百一十四页的证词和提交委员会的文件后，不能不作出结论，南大西洋舰队的许多美国军官骄横自大，未必是谨慎地从事战斗准备的。麦克马洪将军进入巴拉圭后，有几个月同盟军切断了他的所有往来联系。最后，据马里阿斯·杜瓦尔医生谈，弗朗西斯·M·拉姆齐中校要求麦克马洪允许和他妹妹结婚，海军舰队司令戴维斯让他乘客船去亚松森，司令的儿子同往。“年轻的戴维斯……回来之后说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时刻，和林奇夫人乘一辆四驾马车，特别喜欢林奇夫人细小的安排，几个穿得很薄很薄的最漂亮的巴拉圭姑娘侍候吃饭”。也许拉姆齐和年轻的戴维斯实际上是去传达信件的。

在布利斯和马斯特曼被交出后，1868年12月12日麦克马洪将军向洛佩斯递交国书。他不完全同意沃什伯恩的方针，而决定和那位独裁者搞好关系。在总部呆了几天后，这位公使去巴拉圭政府的所在地皮里维武伊。麦克马洪见洛佩斯四、五次，敦促他停止战争。1869年5月他被召回，但是拖延了几个星期才离开。他对国家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贡献，就是使两个声名狼藉的拘留犯获得自由；但是如果沃什伯恩的非难是真实的话，他为洛佩斯和林奇夫人作出了更有价值的事情。

也许麦克马洪将军能讲明白，林奇夫人被逐出巴拉圭后怎么在欧洲度日的。这位特别外交官，谣传是独裁者临终遗嘱的执行者，当他从亚松森启航时有许多件行李。沃什伯恩断定："除了那些皮箱料想是装他带进巴拉圭的行李而外，其中还有十一捆马黛茶，还有许许多多的箱子和包裹。从洛佩斯营地来到巴西人的占领区，他们为他准备了交通工具，将这些勤劳的报酬运送到亚松森，在那儿逗留了几天，他搭乘一艘商轮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里人们感到最好奇的是想知道，从洛佩斯营地来的这些箱子里究竟装了些什么，成捆

的马黛茶是否纯是马黛茶，还是用来包装那些从洛佩斯及林奇夫人杀害的牺牲者手中偷来的金银和珠宝。尽管如此，在他离开拉普拉塔去法国时，准许带走了他的一切。"如果这个严重的告发属实的话，麦克马洪就会成为巴拉圭两个最大的恶棍的帮凶，而留下污名。确实，他完全不适于外交工作，这是他和查尔斯·艾姆斯·沃什伯恩的一个共同特点。

第十六章

两战之间的五十年

遭到破坏和肢解的巴拉圭，为摆脱它犯罪的独裁者，承受了极大的苦难。领土的丧失、巨额的赔款（从未偿付）、直到1876年的军事占领，这些都是巴西和阿根廷强加在小小的共和国身上的。从前也曾有过艰难的岁月：那时候工业品远远满足不了实际需要，纺织品缺乏，人们半裸着身躯或是穿兽皮制成的衣服外出，成群的蝗虫毁坏了庄稼。但那些日子的影响还是比较轻微的。在这块土地上很少见到严重的饥馑，真正的饥荒从未冲击过这个国家。大战以后，情况就不同了。艾伯特·阿默兰在那些绝望的日子里访问了巴拉圭，发现“现在到处都是贫穷、匮乏、腐化……放逐者、流浪者、冒险家们道德败坏，人类的渣滓……在战争结束后迁徙到这里来侵吞瓜拉尼死者的地产，用安慰骗取成千上万失去亲人的寡妇和少女”。这在巴西

几乎没有什么同情者，那里的君主制度反对者不让人们忘记自己财产和生命的损失；在阿根廷也是这样，人们仍然确信巴拉圭人不管怎样总是野蛮人。先前的同盟国彼此猜疑，使军事占领的效力有所减弱，也使巴拉圭不至于完全丧失它的独立性。

巴拉圭是巴西和阿根廷争夺的小卒，在这场争夺战中，双方都害怕对方独吞它们先前的共同敌人。如卡卡诺在《巴拉圭战争》中所说的，军事占领是“同盟国之间为清算合同进行的一场战争”。巴西，因为它的军队占领了亚松森而处于有利地位，它的政治家对巴拉圭官吏下命令，它的军官和当地渴求男人的女人来往，甚至结婚。阿根廷的少数军队闷闷不乐地继续前进，在西方镇渡河，希望得到增援，以便把他们国家的边界越过查科扩展到内格腊湾。两个大胜利者蚕食巴拉圭国土，但又相互防止鲸吞；同时玻利维亚神经质地站在一旁，希望有利于它对查科的暧昧要求。按照阿根廷的说法，何塞·马里亚·德·西尔瓦·帕兰奥斯、里奥布兰科子爵，在恩特雷里奥斯和乌拉圭花言巧语地煽动内战，以便使阿根廷在别处分散精力。

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冷战，进行了六年；这期间谈判者与外交部长们力图结束占领。1874年，一群巴拉圭激进派试图达到同样目的。海梅·索萨·埃斯卡拉达、阿道弗·阿尔西纳、尼卡西奥·奥罗尼奥和阿根廷前外长、现驻巴拉圭公使卡洛斯·特赫多联系。他们的计谋很简单：要霍维拉诺斯辞去总统职务，带着弗朗西斯科·F·费尔南德斯作秘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签订一项和约，然后带回，要求议会批准。但驻巴拉圭的巴西独裁者——阿拉瓜亚男爵听到了这个策划的风声，挫败了这一计谋。他利用一个巴西的傀儡，胡安·包蒂斯塔·希尔带头反掉了萨尔瓦多·霍维拉诺斯总统，并派遣索萨代表巴拉圭驻巴西。杰出的爱国者索萨尽管受到唐·佩德罗宫廷的忽视，但和调任到里约热内卢的特赫多谈判仍取得成功，两人于1875年5月签订一项条约。当阿根廷报纸为索萨—特赫多条约而欢呼的时候，巴西的保守党内阁认为索萨的行为是一个叛乱，派出一艘炮舰到亚松森，要希尔总统不予批准。希尔总统顺从地于5月召开议会否决了这个条约，同时宣布索萨是一个卖国贼。其实，在那个几乎找不出忠诚

的时期，索萨是巴拉圭的一个十分忠诚爱国的人。

阿根廷为巴西对巴拉圭的控制所挫败，就更换人手进行谈判。参议员达尔多·罗查到西方镇视察阿根廷占领区，然后到亚松森，和希尔及外长法昆多·马查因商谈。由于割让西方镇得不到也不可能得到同意，他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便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1875 年里约热内卢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都更换了内阁，出现了结束外交僵局的前景。巴西对开支浩大的占领感到厌倦，希尔总统摆脱了巴西的箝制，阿根廷也派遣曼努埃尔·德尔基驻亚松森代表它的利益。德尔基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1875年末，马查因就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签订正式条约。巴西派公使去乌拉圭参加讨论，进展良好，终于在1876年 2 月 3 日结束了这一场神经战。以后不几个月，最后一批外国军队撤离巴拉圭。

洛佩斯在塞罗科拉死去前几个月，政治改革就开始了。在同盟国监督下，1869年 8 月，组成一个缺乏效力的临时政府，企图建立某种秩序。西里洛·安东尼奥·里瓦罗拉、卡洛斯·洛伊萨加和何塞·迪亚斯·德·贝多亚代表人民三头执政。1870年 8 月15日，他们召开了立宪会议，会议期间

塞进了各种法令，力图改造政权。他们不得不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工作。这些法令有：救济饥荒，设置司法和治安官员，开放对外贸易港口，取消对开发天然资源的限制，成立农业部，建立各种学校，废除奴隶制，等等。唐·费德里科·吉雷尔莫·巴埃斯在开会时满怀希望地在会上说：一个没有暴君的巴拉圭新时代来临了，未来的发展会是迅速的，商业的扩展会使巴拉圭人在文明的民族中占有他们适当的地位。立宪会议在何塞·塞贡多·德科德的领导下努力工作，结束了三头执政，于1870年9月1日选举西里洛·安东尼奥·里瓦罗拉为临时总统。新宪法生效，他从11月25日起任总统四年。里瓦罗拉是洛佩斯家族的一个老对头的儿子，战时遭受监禁，在最后一次战役中曾英勇战斗。他做不好总统，不善于交际，不停地吸烟，不愿意动脑子。然而，由于巴西人实际上统治着这个国家，他是哪一类总统都没有什么关系。

1870年间，巴拉圭人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至少在政党制度方面是如此。政党从未发展到超出宗派主义的程度，从未作为正式的组织而存在，也没有传统的发行物。报纸企图激起读者对办报人

的热情。《新生报》、《人民之声报》、《社会舆论报》都努力吸引信奉者。一个有名望家族的杰出后裔胡安·何塞·德科德和何塞·塞贡多·德科德同坎迪多·巴雷伊罗和胡安·西尔瓦诺·戈多伊一样，都是报刊的主笔和政治家。法昆多·马查因博士，在流窜回国的年轻流亡者支持下，组织了“人民大俱乐部”；退伍军人团结在人民俱乐部的首领巴雷伊罗的周围。激进派把总统里瓦罗拉吵得只好遵照巴西人的命令，于1871年10月解散议会，接着在12月新议会开会时就辞职了。

1874年左右，最卓越的、活着的战争英雄贝纳尔迪诺·卡瓦列罗将军创建保守的共和党（或红党），控制政府达三十年。卡瓦列罗和帕特里西奥·埃斯科瓦尔将军，任意地立某人或不立某人当总统，很少受到自由党的干预。自由党是唐·安东尼奥·塔沃亚达为尽快实现对自由选举的要求于1887年组织起来的。1904年8月到12月，自由党人叛乱，直到签订皮科马约协定时才告结束。这次叛乱把红党赶下台达三十年，但其间也有几次流血的对抗。胡安·何塞·索莱尔说：“1904年8月的革命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人民运动。”这次运

动是由塞西略·巴埃斯博士和贝尼尼奥·费雷拉将军——一个自由党人和一个军人的联盟——发动，而由曼努埃尔·J·杜亚尔特、曼努埃尔·冈德拉、埃利亚斯·阿亚拉、爱德华多·沙埃尔埃尔、费利克斯·派瓦以及其他自由党人实现的，但阿道弗·索莱尔是中心人物。阿道弗·索莱尔的儿子胡安·何塞协助安东尼奥·塔沃亚达、路易斯·A·里亚尔特等人创办《自由主义者》作为宣传党的政纲的工具。自由党人和红党人在以后八年中寻求政治事务正规化都没有成功，这期间上台下台的总统有九个。从1870年到1932年，巴拉圭共有二十九个总统，就是说平均每人的任职时间只有四年任期的一半稍多一点。

巴拉圭的军事力量，经过战争的破坏，直到和玻利维亚冲突时还是微不足道的。军事训练是偶然的事，军队的声誉很低，队伍尽是地方当局任意挑选来的新兵。四年服役期被看作判处入狱一样。约有三十年之久，军队是由一个步兵营、两个骑兵营、两个到四个炮兵中队与一连机关枪手构成。政府有时派遣青年人到阿根廷、智利去学习军事，以便他们回来成为新老部队的军官。

1904年革命后，自由党人解散了这支军队，重新开始建军。他们建立总参谋部和一所军事学校，用现代化装备增强新部队战斗力，同时只征募十八岁到二十岁的优秀青年入伍。在阿根廷和智利教官的指导下，自由党军队有了少许进步，1908年另一次革命把它分成几派。造反者的领导人阿尔维诺·哈拉少校当了陆军部长。他改组了军队，把全国分成若干军区，压制总参谋部，关闭军事学校，并扩充武装部队人数。1909年9月开始实行征兵制，代替招募的军队。1911年1月17日和2月11日的两次军事骚动，使这个国家受到一些震荡，但没有推翻政府。军队陷入无政府状态，这一直继续到1912年，陆军部长曼努埃尔·冈德拉再一次把它解散并加以改组。这一次改组标志着巴拉圭军队复兴的开始，它创建了一支部队，后经外国使团的训练，在查科战争中表现良好。

革命，对巴拉圭来说已是习以为常了。可以回溯到1544年那个4月里的日子，当时，愤怒的王室官员策划把阿尔瓦尔·努涅斯·卡维萨·德·巴卡戴上脚镣手铐送回西班牙。在两次真正的战争之间的六十年内，多次反对现政权的军事暴动使

人民和牲畜常常遭到最沉重的损失，而不动产几乎未受损害。这些叛乱不是一时的现象。它们是巴拉圭生活的一部分，是人民的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巴拉圭的革命，如在整个拉丁美洲那样，是一种社会的疟疾——发烧差不多不加警告地袭来，接着退烧，然后又发烧。革命也是政府长寿和自我保存的一服良药，因为在拉丁美洲政治中有一句格言，政府是不落选的。在巴拉圭从未有过长期的内战（1947年的内战延续了五个月），也没有一次内战带来过有条不紊的进步以取代先天的混乱。从未有过一次反对大地主的人民起义，或是一次反对教士特权的战争，如在墨西哥那样。政治和经济的争论，直到最近的十年，仍然湮没在私人之间的争论中。甚至1947年反对伊希尼奥·莫里尼戈的二月党人(Febrerista)叛乱，虽因阿根廷的干涉而可能复杂化了，似乎仍然按着三国同盟战争后巴拉圭企图恢复稳定的那些年代里的老一套方式进行。

1870年后发生的每次革命，有它动人的情节，它的英雄主义、恐怖与悲哀。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在《美丽如画的巴拉圭》一书中这样描述了一次由

代表自由党激进派的哈拉少校领导的1908年军事暴动。7月2日天亮前，哈拉和少数伙伴俘获了炮兵军营的岗哨，在街道角落架起了枪炮，以控制去公共建筑的通道，把一个步兵团部署在要害地点，等待天亮开始射击。警官们发现哈拉的布置，特别当停泊在港口的“解放号”炮击警察局时，表现出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贝尼尼奥·费雷拉总统聚集了大约一百人保卫总统府，在维利亚里卡的指挥官仓促应援，带来二百名农民，他们对叛乱毫无所知也更少关心。哈拉的人切断铁路和电报线，开始猛攻各类公共场所，并对从康塞普西翁带着援救总统的崇高决心而来的一团人进行拉拢。费雷拉将军——本人是打败勇不可当的贝纳尔迪诺·卡瓦列罗的胜利者，三天后辞职。这次小小骚动死伤大约四百人，被称为“对国家的一次天命注定的政治罪行”。

更剧烈的一次暴动发生在1911年，这也是巴拉圭的一个多事的年头。曼努埃尔·冈德拉总统拒绝把哈拉留在内阁，1月17日哈拉就强迫冈德拉辞职，由自己担任这个职位一段时间后，于7月交给利维拉托·罗哈斯。冈德拉的追随者设法推

翻了罗哈斯。罗哈斯派接受挑战；巷战猛烈进行了两天，死亡四百人。罗哈斯回到首都，然后试图把冈德拉派赶出离首都二百五十哩远的皮拉尔。出发进行这次袭击的有三千人，回来只有七百人。冈德拉将军弄来更多的枪炮，包括架设在一辆火车车厢上的一门海军炮。进攻的罗哈斯派抓住一个火车头，装上烈性炸药，疯狂地使它沿铁轨倾冲下去。海军炮的炮手拚命地打，直到一发命中火车头，造成令人震惊的后果。这次暴乱的最后片断显然于1912年5月11日发生在巴拉瓜里。政府军在镇外打败了冈德拉派一小股兵力，尔后满怀信心地进军入镇庆祝胜利，误认为他们已经击败了叛军的主力。在进军途中遇到伏击。冈德拉派停止射击时，“尸体堵塞了道路、门口，甚至窗槛。日落时，这个南美小国只剩下一派了”。这个判断过于乐观：那里仍然有激进的自由党人，民主的自由党人，普通的自由党人，温和的自由党人！

虽然巴拉圭为政治混乱所阻碍，但从银行和大规模企业的建立中能看出经济上的恢复。1887年开业的农业银行，1894年通过增设农业与工业委员会而扩充了业务，在推动巴拉圭富饶土地的

科学利用以及介绍新作物方面都是积极的。190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拉普拉塔河法国银行帮助政府建立共和国银行。几家私人银行的出现表明了对国家未来的信念。1890年用德国资本创办的巴拉圭商业银行,得到充分的发展,到1916年建立了五个分行。也在这一年,西班牙—巴拉圭银行开业,不久就有了两个分行。伦敦—拉普拉塔银行引进大量英国资本,同时南美德国银行设立了一个巴拉圭分行,因业务健全、对待顾客殷勤不久就博得令人羡慕的信誉。虽然当暴乱者掠过百叶窗门前时银行的经理们有过许多不安的时刻,但这些机构总算经住了政局的不稳定而存在下来。

三国同盟战争后七十多年间,巴拉圭对矿产资源的开发没有作过什么努力。这个国家本来能有重工业,只是缺少资金和事业心。他们太忙于开拓极其肥沃的土地,生产那收获量难以置信的棉花、烟叶、玉米、咖啡、甘蔗、木薯、稻子与柑属水果,以及那些林产品如耶尔巴、橡胶、破斧木与其他木材。政府给外国资本家以开发这些天然资源的特权。包装工厂、破斧木工厂以及其他企业出现了。外国资本投资完成通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

铁路，供给政府自身活动的基金，开辟江轮航线和投入公用事业。这些事业大部分是个别外国移民、财力充裕的公司与农业垦殖团所经营的。投资在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与阿根廷的公司之间分配得十分均衡，以致人民中没有出现什么排外情绪，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是怎样被剥削的。

巴拉圭对入境移民提供了不可否认的有利条件。移民的权利以最受赞许的民主形式得到1870年宪法的保护。外国人享受所有赋予本国公民的权利，生命、自由、财产受到不被剥夺的保障，还有必不可少的宗教、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只是缺乏不受革命扰乱的自由。有利的土地法鼓励在这个国家的十五万平方哩的领土上进行大小规模的垦殖。按1903年法令，一家之长只需拿来三十个金元，政府就会临时供应他们住处，他们的财产和用具可以免费、免税上岸。除此而外，巴拉圭政府还给二等船舱免票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亚松森。据估计，一户四口之家的移民大约有三百四十个金元就能建造一所茅屋，以栅栏圈围开垦出的大约十二英亩的土地，维持收割前八个月的生活。纵有

宣传和有利的法令，外来移民仍然是小规模的。虽然也有显著的例外，最成功的农业移民都是作为殖民团的成员前来的。

移民使人口增加有限。1905—1925年间总数不过一万三千二百五十八人，德国人、西班牙人与意大利人占了将近60%。根据阿道夫·N·休斯特博士的《巴拉圭》一书，1928年在这个国家有八千西班牙人和将近二万意大利人。从阿根廷来的移居者有一千六百五十九人；从巴西和乌拉圭来的，合在一起只有三百二十三人。二十年内移民一百人以上的其他国家只有奥地利、俄国、瑞典和法国。仅就有职业者而言，农民占总数的一半稍多一点。

十分明显，从1870年到1929年，欧洲移民对巴拉圭几乎不加注意。主要的人群流向美国，较少的人群流往阿根廷和巴西；尽管这个国家的赞助者做了工作，到遥远的巴拉圭来的只是极少数。在英国人之中怂恿本国人来瓜拉尼乐园寻找财富的有亚历山大·K·麦克唐纳。他在这个国家住了十四年之后，1911年出版了《美丽如画的巴拉圭》，在书中描绘了一幅引人入胜的画图，特别是在“一个美

丽的乡村”里，一个长发辫的可爱的姑娘，拿着一束鲜花衬托着黑面纱的长穗，面纱悬垂在诱人的双肩。为她也是值得移居的。这个华丽的佳人却未必适合于麦克唐纳的如下描述：“许多出身在乡村的巴拉圭姑娘，就健康来说，过着理想的生活。她通常天一亮就起身，赶到最近的市场去，头顶着一筐水果或蔬菜，负重好几哩远到市镇去不当一回事。她放平肩膀，把头伸直，吸进早晨的新鲜空气，感到生活完美的愉快。到了城镇，她跟人快活地闲谈，卖掉她的货物，买进两三磅肉和食品杂货，带着好胃口奔回家来，这时看家的老奶奶已经把家常饭准备好了。然后她到泉边去洗衣服，要不也许在一家人耕种的小块田地上除草。午间睡一晌觉，然后在木臼中将玉米捣成面粉，用作晚餐。使用重木槌使得手臂和胸部的筋肉强壮有力，同时提供一个极好的呼吸运动。以后，挤完牛奶，吃完一顿普通的晚餐，然后就寝——除非邻居有个舞会，那她就要把自己盛装打扮起来……无疑地正如伦敦西区社交活动中戴着珍珠钻石的某个小姐一样，以她自己的方式玩个痛快。要是农家女在精神上也和在身体上一样地好好照顾的话，那她真是过

得愉快的。可惜，即使在这方面那种小姐有时也不比我们偏僻林区的农家女更高尚一些。”麦克唐纳不是在说笑，但如果他补充说，这个轻快地长途飞奔的小精灵是赤着脚，闻着有蒜味，抽一支短黑雪茄，有钩虫病，实际上工作起来象匹马似的，那就更接近于实际了。至少，这个快活的美人儿是个勤快的姑娘。

难以忍受的暑热、成群的蚊子、吃人的老虎、有毒的蜘蛛、致命的热病，还有可怕的蛇，这些荒唐的传闻使移民事业多少受到损害。但这些过甚之词并未使一些国家的大胆的企业家为之气馁。一个法国植物学家本哈明·巴朗萨，1876年利用生长在河东的大量柑子树开创柑油工业。两三年后，另一个法国人多曼果·巴特在东部沿着巴拉那河六百里格的土地上动手开发。他靠耶尔巴、香蕉、木材及其他产品积蓄了这么多的财富，不久他的产业就扩张到巴西和阿根廷。他的商业帝国包括船只、港口、锯木厂、牧场与庄园。意大利人的后裔何塞·法萨迪，1897年组织合股公司建立了一个蒸汽机锯木厂。到1914年，“何塞·法萨迪—西亚公司”被公认为这个国家最兴盛的厂家之一。象这些

成功的故事能有许许多多。失败的就略而不谈了。

由少数或许多投资者支配的公司，从事许多的活动，在垦殖、制造工业、加工工业与运输业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巴拉圭地产公司”在东巴拉圭拥有最大的、组织得最好的牧场。这个法国公司在靠近巴西边境河东两三公里的地方占有二百三十四平方里格，用阿根廷的赫雷福德公牛和本地母牛交配，使养牛业发生革命。他们繁殖马的实验也得到巨大的成功。在河对岸查科，1905年创立的一家英国企业“威廉·库帕尔叔侄公司”，仿效“巴拉圭地产公司”经营了八十平方里格土地。另一个英国公司“产业巴拉圭”1888年开始营业。这家公司最初从事耶尔巴生产，到1910年，每年运出的大约五百万公斤马黛茶，是从四百五十六里格[①]的耶尔巴地取得的。养牛、木材与橡胶的生产，在另一片六百八十四里格[②]的森林和草原上进行。“巴拉圭地产与养牛公司”拥有一百六十八万七千五百公顷土地，养牛四万五千头；“纽约和巴拉圭公司”开发靠近皮纳斯科港的查科地三十

① 原文如此，估计里格为平方里格之误。——译者

② 同上。

七万五千公顷；"基白生巴拉圭地产公司"拥有土地十五万公顷，养牛一万头。这些不过是大规模开发的一些例子。这样的开发大大地帮助了巴拉圭的经济复兴。爱·奥·霍浦金斯曾作过一番先驱者的努力，但总的说来是太早了，美国的"国际产品公司"的人员不见得想到过他，而他们正是在他曾经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的。

1880年到1915年间，巴拉圭政府处理了查科的大片土地。在那熙熙攘攘的年代，在投机和狡猾手段的狂热中，国家产业消失了。不少人和公司取得的大量土地实际上都不花代价。卡洛斯·卡萨多、"英国一巴拉圭"与"得克斯"理卡德便是其中的几个。正如汉斯·托尔滕在《迷人的旷野》一书中所说的："一切浸没于钱财之中……今天他们买进，明天他们又卖出。利润挥霍在淫乐之中……五个金生太伏[①]买一英亩地不算稀罕，到第十个卖主以后才达到二十个生太伏一英亩。"后来采取临时证券的诡计，同一块土地卖给许多买者。这种投机狂热以大量土地落入外国金融家之手而告终，

① 生太伏（centavo）：货币名，等于百分之一比索。——译者

这已大大超过对国家有利的程度了。

1886年卡洛斯·卡萨多建立卡萨多港，同时创办查科最繁荣的企业。这家公司开始时拥有三千平方里格，较比利时和卢森堡合在一起还大一些，把一千二百平方里格分块让给私人企业，同时开设工厂，加工它富饶的领地上的各种产品。1928年卡萨多港是一个有三千人口的市镇，有电灯、卫生管道工程、学校、一所医院、一家旅馆、教堂与法庭。一条窄轨铁路伸向内地一百五十公里，延伸的另外一百二十公里在修建中。在公司的模范牧场里饲养牛二万头以上；一个雇用一千工人的鞣酸厂年产破斧树皮精七千到一万五千吨。

外国垦殖事业大部分是由在国外组织的团体创办的，多少蒙受公司竞争的损害。然而，每隔十年都发现较多的抱着希望的移民在巴拉圭寻求财富。在1870—1920年的半个世纪里，就有三十二块垦殖地开始拓殖，仅1918年就有九个。其中有几个最初是一个国籍的，其他的是外国移民和巴拉圭人混合的，都不是很大。圣贝纳尔迪诺垦殖地是1881年由贝纳尔迪诺·卡瓦列罗将军在伊帕卡拉伊湖北岸建立的，1888年它是一个中等繁荣的村

子，其中有德国人和巴拉圭人。"莱比锡公司"于1887年7月在亚松森东北大约二百一十公里的一块十二平方里格的授予地上建立"新日耳曼"。这块垦殖地致力于种植柑子、香蕉、咖啡、棉花、耶尔巴与甘蔗，1915年耕种土地约有一千五百英亩。1898年德国人在恩卡纳西翁附近获得二百九十五平方公里的授予地，两年之后出现定居者，开始建立"奥恩瑙"垦殖地。头几年这个企业进展一般，以后玉米、耶尔巴、小麦、葡萄、木薯、豆子以及其他作物的生产都发达起来。1915年这块垦殖地以奥恩瑙村为中心，约有居民一千人。"加沃托"位于亚松森和特维夸里河之间，1901年由德国人、西班牙人、阿根廷人、巴拉圭人开始搞起来的，尽管地区条件较差，到1915年比"奥恩瑙"还要大些。

到十九世纪末，意大利学者的论题愈来愈转向于巴拉圭。这个多产的半岛把富于生殖力的人们成百万地倾注到阿根廷、巴西、美国。他们之中有些人在巴拉圭开办银行、公用事业与商店发了财。塞尔索·普辛尼里—伊霍斯开办了第一家巴拉圭制鞋厂。"意大利—美国垦殖社"的主要发起人斯特法诺·帕特诺博士建立了两块农业垦殖地。

第一块叫“特里纳克里亚”，开始于1898年，授予地约三万公顷，位于亚松森以北六十哩左右，适于养牛及一般农业。1915年这块授予地上有一百四十五户，分成若干小居民点。“新意大利”开始于1906年，在亚松森南的兰巴雷和安戈斯图拉之间，只有“特里纳克里亚”一半那么大。“新意大利”的每个居民，在占有三年之后就取得一块十六公顷的土地权，在这上面他必须种一千棵柑子树或其他的树，和二百棵葡萄树。满足这些条件之后，垦殖地居民得以二十个金元一公顷购得另一块同样大小的土地。到1915年，在“新意大利”耕种四百三十三公顷的一百户人家颇为兴旺。

维利亚里卡以北的“新澳大利亚”的来历带一点吉诃德式的空想。威廉·兰纳，一个澳大利亚社会主义者、自由撰稿记者，在澳大利亚劳工力图通过一次总罢工以争取对劳工权利的承认遭到失败后，把巴拉圭看成一个可以重获天堂的地方。兰纳组织“澳大利亚合作协会”，向巴拉圭政府要求授予地，而得到一百平方里格的上等地。兰纳的第一批移民二百五十人于1893年乘“皇家水兵号”到蒙得维的亚，转乘江船驶抵亚松森。这些社会主义者

甚至在还没有着手之前就开始争吵他们的乌托邦应该怎样经营了。在弗雷德里克·吉特把原“新澳大利亚”引至非社会主义方向时，兰纳愤怒退出这一团体，于1894年另建“科斯梅”。两个垦殖地的发展都较一般。

在这个国家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垦殖组织也许要算卡萨多港以西的门诺教徒[①] 的查科居留地了。塞缪尔·麦克罗贝斯将军，前纽约查丹姆一菲匿克斯国民银行总经理，1921年从卡萨多买到三十二万三千七百英亩土地，后来大部分用来换取门诺教徒在加拿大的小麦地。迟至1926年，装有明轮的汽船“阿帕比号”载着为数三百零九人的第一个分遣队来到约定的土地上。到1927年4月末，大约二千个宗教放逐者定居在查科的门诺垦殖地。门诺·西蒙斯的追随者寻求与世隔绝达四百年之久，他们曾为寻找一块能实践其教义而不受战争骚扰的地方而经常迁徙。1783年他们到南俄罗斯，

① 门诺教徒（mennonite）：基督教新教的一个小宗派的教徒，因其领袖门诺·西蒙斯（Menno Simons，1492—1559）而得名，其教义为濯足，仅与同派教徒通婚，对暴力不加抵抗等。——译者

后来到加拿大和美国，这些勤劳、严肃的人们期望在那里得到和平的生活。最后他们在巴拉圭发现这里的政府愿意给与土地，并让他们的子孙永远免服军役。1921年7月发给特许状，保证实际上的自治，满足生活基本需要的进口物品十年不纳关税，十年免征赋税，并有移居的完全自由。感谢弗雷德·恩琴的准备工作，使最先的到达者避免了为新垦殖事业经常遇到的一部分困难。在卡萨多港给预备好一家舒适的旅馆、临时的住处以及其他生活所需，供应三个月，直到在查科的住宅建成。

愈来愈多的门诺教徒从俄国、波兰、德国、满洲[①]、加拿大、美国来到这里，至1933年有五千人分布在三十六个村子。几个牧场购置了优良品种的牲畜，似乎呈现出这样一个希望：人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喃喃地“带着一种安慰的叹息说：‘这是美的；这好极了’”。那是水井干涸、成群的白蚁和蝗虫带来一场巴比伦灾难[②]之前的情况。当大蚱蜢啃得庄稼只剩下光杆的时候，花生成了主要的食

① 指我国东北。——译者

② 巴比伦灾难（plague of Babylon）：指一场大灾难。传说古巴比伦王国灭亡时，天灾降临。见《圣经》。——译者

物。但是，1933年传开的谣言，说花生长期以来就是门诺教徒的唯一食粮，那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在查科，生活肯定是困苦的，同时由于交通很差，把农作物运到市场极端困难，因此这种困苦状况得不到减轻。面对着费用的上涨，三个美元获得一英亩土地也似乎太昂贵了。查科战争有把门诺教徒的村落卷进去的危险，为此巴拉圭指挥官有一次曾下令让他们疏散。但因玻利维亚人在巴拉圭人的坚决进攻下退却了，就取消了这个命令。爱好和平的垦殖地居民感激得敞开家门，款待他们的拯救者。

不是所有的门诺教徒都愿意忍受在查科的考验的。头一年就有许多逃亡的，以后的分遣队也不象从加拿大来的这些人那样容忍了。从俄国来的新移民，1930年5月到达，在六万英亩土地上组织费尔埃姆垦殖地。这个团体中八百多人于1937年离开那里，在河东亚松森附近建立弗里斯兰特垦殖地，不久，三百多赫特尔教徒在弗里斯兰特附近买了二万英亩土地。1943年费尔埃姆垦殖地自称约有一千四百五十人。

巴拉圭公立学校制度的建立真正开始于1870

年3月7日里瓦罗拉总统颁布的一个法令。各省省长和各镇的长官在他们管辖区域内都须设立一个或更多的学校。要求父母送子女上学。两年后建立公共教育委员会，提出改进教育的建议，并通过一项立法，授权总统聘请外国教师。那时国民学院正开办起来。五年后，即1877年，改组为中等学校并继续办下去。和国民学院相衔接，1874年开设一所师范学校。七十年代末，农村有八十个男校和二十个女校。至此教育制度还是处在形成时期。改良在时断时续地进行。1882年设立的一所“法律学校”是国民大学的“著名前身”，这个大学是根据1892年10月18日的法令成立的。到1900年，由巴拉圭学校毕业的优秀律师、作家、新闻记者开辟了民族文化的黄金时代——如曼努埃尔·多明格斯、塞西略·巴埃斯、曼努埃尔·冈德拉、富尔亨西奥·R·莫雷诺、布拉斯·加赖等等。这些人在法律、历史、文学、地理、政治科学及其他方面的贡献表明，从1870年到1910年，巴拉圭在智力上的进步比以前三个世纪都要大。当时只有一所公共图书馆尚在积极兴建中，它在1875年成为一个博物馆。

二十世纪初，教育设施极不充分，不能满足人

们的需要。1905年有学校三百四十九所，学生二万九千六百人，到1914年学校增加为六百一十八所，学生七万一千三百二十四人。教学质量离要求相差很远，但这个统计表明仍有一些进步。公共卫生、农业、机械工艺、儿童保护以及其他领域的教育都大大地落后于需要。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公共卫生问题有所关心，给巴拉圭保健协会一笔补助，在全国各地设立教育中心和诊所。在亚松森的协会中央办事处，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本地的医生为减少钩虫病及其他疾病的祸害耐心而熟练地进行工作，这些疾病在减弱民族的活力。一个有才干的年轻医生，芝加哥人约翰·奥斯汀·克尔，1928年初来此接手这项工作。在巴拉圭仅有的几公里的改良公路上，以及在那联结协会农村办事处的仿佛无尽头的马车道上，右手驾驶黄色蒲克牌自动车的克尔，成了人们所熟悉的形象。1929年初何塞·帕·古贾里总统对建立武装比促进卫生事业更有兴趣，因而巴拉圭政府未能为保健协会提供一份基金，克尔医生只得回里约热内卢。总之，在巴拉圭乐于受援助的愿望有余，而奋力自助的愿望不

足。他们在查科打玻利维亚人要比在内部和钩虫病作战热心得多。

可以毫不踌躇地说，这个国家最好的一所私立学校乃是基督传教联合会资助的“国际学校”。1920年3月这个学校开办时，克莱门特·曼利·莫顿是学校的校长。他拟定的一项建筑计划，得到政府官员的支持和小小的外籍垦殖地的热情支援。1926年罗伯特·B·莱蒙接任莫顿时，“国际学校”已是这块土地上最好的中小学了。课程慢慢扩充，注册人数也有增加，在学校供职的有巴拉圭教师和外国教师，为适应不断增加的入学需要，还增添了新校舍。二十年代增设的其他学校大大地提高了巴拉圭人的文化水平。1908年停办的国立大学医学院1928年改组重建；一所私立农学院，时断时续地办在伊帕卡拉伊，后因有了一所政府办的农业学校而有所逊色；这所公立农校成立于1925年，设在亚松森美丽的植物园内。二十年代末，这个国家共有四十五所私立的和七百三十三所公立的小学，注册学生十万四千零八十九人。亚松森及其近郊人口约十三万人，中年级和高年级的学生就有一万零八百九十四人，看来很可观了。阿根廷

共和学校是最大的小学，学生人数超过一千人。

不幸的是，教育未能免于政治上的考虑。甚至在小学教学中军事长官也干预课文，目的是消除被最近的军事政变所推翻的政权的影响。胡安·何塞·索莱尔——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在阿根廷靠奖学金资助受教育的四位教师之一，回忆自己为一年级和三年级写的两个课本在1908年怎样被新政府取缔的。教师遇到这类官方干涉并不失望，而是通过国家教育委员会继续为发展教育而工作。这类干涉都出自于政客，他们对教育并没有真正的兴趣。索莱尔、曼努埃尔·贝尼特斯、曼努埃尔·冈德拉与欧塞维奥·阿亚拉是本世纪最初二十年为巴拉圭努力准备教育基础的教育家，只有在此基础上民主政治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国民大学的教授们鼓励敏感的青年人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太热心了。其实几乎不需要鼓励。一经开始，活动就搞得如此厉害，甚至大学本身也划分为党派集团，有的集团强大得可以强迫教授要么在它的社会、政治行动纲领下共同合作，要么辞职。1927年，几个学生看到1918年后阿根廷的大学改革，就要求有更大的管理权，这就是结束学部的

暴政，建立有半自治权力的“大学共和体”。为答复这个要求，1929年的法令决定创办一个自治的大学。这种自治意味着学生自己管理自己，不是美国胆小的大学董事会所允许的那种平淡而琐屑的东西，而是一种真正的自我管理，只给予“大学最高委员会”最低限度的立法干涉。每个学院或学部有它自己的指导委员会，包括教师和学生；每个学院、校友、教授在大学最高委员会都有代表。

农业在两次对外战争之间大有进步，但是可利用的资源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棉花、烟叶、稻子、甜薯、甘蔗、玉米、花生、紫花苜蓿以及各种令人眼花撩乱的水果，绝大部分还是小规模生产。木薯在所有农作物中占首位，1928年产量近六亿公斤；甘蔗、玉米与甜薯是其他主要作物。柑子、菠萝与香蕉是丰富的。没有人去计算柑子树的棵数，但香蕉的调查表明，1929年种植的约有六十万棵。

葡萄的栽培，在殖民地年代曾享有一个短期的繁荣，1907年，来自巴西南部的移民卡洛斯·博伊特使它得到复兴。他开始用葡萄树试验培植一种可以在维利亚里卡附近茂盛生长的酿酒葡萄。

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从自己的葡萄园和邻近栽培他所培植的品种的葡萄园中生产出来的酒，达到二万八千公升。博伊特先生希望，喝葡萄酒能最后取代喝甘蔗酒的恶习。可是巴拉圭人会说：这算什么希望！另外，不幸的是，对一些农作物来说，肥沃的土地和良好的气候，它同样助长害虫，如伊绍和阿克克一类的蚂蚁，就大量大量地在繁殖。

大规模经营的农业即使遇到灾害也能繁荣起来。"巴拉圭糖业公司"沿特维夸里河在维利亚里卡附近耕种广阔的田地，1927年产糖二千五百短吨[①]以上。这个公司的分厂加工耶尔巴、油类、肥皂、大米及其他产品。那年全国有八家糖厂（1914年只有三家），产量合计五千短吨。棉花种植在农业银行的指导下显著增长。这种作物在这个国家的若干地区生长得很不错，但它的产量还远远落后于生产潜力。农业银行分发几吨种子，取得良好结果，1934年产量达到一千七百五十万磅，1935年十万英亩棉田，平均亩产原棉六百二十五磅。

① 短吨（short ton）：重量单位，相当于二千磅或九百零七点二公斤。——译者

猪在美洲的征服中差不多和西班牙人一样重要，虽然更高贵的马受到更大得多的欢迎。当1541年伊拉拉迁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居民时，留下一头公猪和一头母猪让它们自己在圣加布列尔寻欢作乐。显然也有公猪和母猪陪同移居者来亚松森，立即繁殖起来，于是猪肉变成了普通食物。繁殖生猪的方法是不科学的。1928年巴拉圭只有四万五千多头猪，人们可以接受这个说法，但怀疑为什么这么少。驱车到乡间走一走，就马上找到答案。农民并不致力饲养生猪，也不管理它的繁殖。在阳光普照、尘埃满布的道路上，一个粗心大意的汽车司机说不定突然感到一下颠簸，车轮倾斜，在一团肉块上压下了深深的车印，这肉块很可能是一头精力不足、卷不起尾巴的猪，而每个农民都知道，一头长得欢的猪都爱把尾巴卷起来。小猪差不多完全是本地种①，背弓得老高，腿长，肚子鼓鼓的，没有希望制成脂润的火腿和美味的腊肉。六千头左右的约克夏种、二百头左右的巴克夏种与少数的

① 本地种（criollos）：指殖民初期引进，以后在拉丁美洲繁殖生长的品种。——译者

杜洛克—杰尔赛种是最好的猪种。

1928年农业调查表明各类牲畜头数有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伊拉拉的副手努夫里奥·查维斯1550年从秘鲁把山羊和绵羊带回亚松森。山羊几乎全是本地种，1928年为数不到一万四千头。绵羊要发达得多。本地种约计十六万四千头，公羊与母羊比数大约是一比七，这表明试图控制繁殖。三万头以上的洛谟尼—马许、林肯与蓝波尔特种羊正用来改良一般羊的品质。马、骡、驴在1928年为数比一般想象的要少，但总数仍达二十一万头左右，每五个人大约有一头。良种牲畜只占总数很小一部分。

养牛业是一种较典型的边地拓荒事业（巴拉圭从最初征服起到现在已有四个世纪，却仍保留着许多边地拓荒的特征），它给人一个较深刻的印象。1870年剩下大约一万五千头牛，恢复得非常快，1926年发展到接近三百万头。赫雷福德、波尔特·安古斯、杜哈姆与塞布种，占总数10%。其余都是本地种，即自由交配形成的混合种。巴拉圭正开始利用它的机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产牛国。它的二十二万平方公里的良好牧场能维持很大的牛群而不损伤茂盛的草原。“卡洛斯·卡萨多公司”、

"地产公司"、"国际产品公司"是养牛获利的仅有的三家大公司。许多较小的行号,例如"圣胡安·德·里戈维尔托·卡瓦列罗牧场"、"菲德拉·罗萨斯牧场"、"加纳德拉·莫霍利"以及"博特雷尔—伊霍斯"都在这事业中获得厚利。三家主要肉食加工厂是"国际产品公司"、"利维格肉精有限公司"与"地产公司"的腌肉厂。1927年"利维格公司"除其他许多产品外,生产肉末一百六十一万五千零八十八公斤,肉精五十九万二千三百九十公斤。同年,"国际产品公司"制出罐头牛肉一百三十一万四千一百五十公斤,"地产公司"生产干腊牛肉一百二十万公斤以上。

二十年代生产大量皮革在巴拉圭是可能的,因为兽皮、鞣酸精与熟练工人这三个要素都有;但集中生产供出口的制鞋用皮妨碍了这个国家生产足够的皮革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设在查科巴拉圭河附近的工厂鞣酸生产很发达,那里有无边无际的有色破斧树林,原料是取之不竭的。"卡洛斯·卡萨多公司"拥有的卡萨多港和"国际产品公司"修建的皮纳斯科港,都是为生产破斧树皮精和肉制品而建设的小城市。从1925年到1927年,破斧树

皮精平均每年出口五千六百三十九万五千九百八十四公斤，大部分运往阿根廷和美国。

另一个相当重要的工业就是柑油生产，它从苦味柑的树叶中提取，用于制作香料。1927年那一年，这个国家出口这种油八万一千三百七十二公斤。木材采伐业虽然尚在它的幼年时期，但已能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并有大量出口。仅“何塞·法萨迪—西亚公司”一家在它设在圣胡安·内波穆塞诺区的工厂里就投资了一百五十万金元。巴拉圭工业用的燃料大部分是木材和木炭。

纺织业差不多仍然处于手工阶段。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建立起两个近代化的工厂，虽然羊毛和棉花生产是可以保证工厂生产需要的。漂亮的花边——精美的尼安杜蒂，继续在家内生产，特别是在离亚松森约三十公里的城镇伊塔瓜。

巴拉圭在两次战争之间几乎没有经历到那种困扰高度工业化国家的困境。金融恐慌、劳工纠纷、失业、领取救济面包的队伍以及其他调整经济的精密措施，都是显然不存在的。由于缺乏工业化，劳工运动未引起重视。1928年现有的十四个工会没有总联合会，它们也没有为会员赢得很高的

工资。铸字机打字工每月赚二千到三千一百比索，相当四十五到七十五美元；木匠和油漆匠每天得零点五〇到二美元；鞋匠一天能有零点三五到一点八〇美元；内河船员一个月能赚二十美元就是幸运的了，上等厨师一个月只有十美元。这是亚松森普遍的工资水平，在较小的城市和乡村工资要低得多。

这个国家1928年还不到一百万人，只能提供有限的进口市场和小量的出口。然而，自从三国同盟战争把这块土地变成巨大的坟场以来，它迈开了惊人的步伐走向复兴。正如巴勃罗·马克斯·因斯弗兰博士所说，这种复兴"是生命力和精力的一个真正的奇迹"。在外来资本和企业家的帮助下，国外贸易1927年达到二千六百万美元左右。进口值略小于出口；出口货是由从天然物提取原料的企业和农业企业提供的，进口主要来自阿根廷、美国、英国与德国，有来往的国家共达四十多个。

在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期里，巴拉圭的交通运输设备仍不充分，虽然共和国通车最早的一段铁路只比阿根廷晚三两年。现在的巴拉圭中央铁路，1861年就通车到巴拉瓜里，离亚松森有四十五哩，

但等到1885年才又继续修建。这条路线最后通到巴拉那河畔的伊塔普阿，与阿根廷铁路联接，直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巴拉圭境内的铁路线总长七百二十三公里，这条线占四百四十一公里。其他二百八十二公里是私人企业所有的窄轨路。河道运输远比铁路为重要。轮船从亚松森以北二十公里在查科一边的阿耶斯镇，行经二十个主要港口，最后到巴拉圭河上游的内格腊湾，溯流八百六十公里。亚松森以南有十三个港口，从兰巴雷到伊塔皮鲁，全程三百三十公里，供下巴拉圭利用。恩卡纳西翁在巴拉那河畔，是这条河运的分界点。轮船溯流而上，大致朝东北方向，航行五百零五公里，经过二十三个港口；西向巴拉圭河，航行三百五十公里，有六个港口。因此，巴拉圭河和巴拉那河共有河运航道二千公里以上，港口六十二个。“阿根廷航运（尼古拉斯·米安诺维奇）公司”是最重要的航运公司，有好几十艘大小轮船、舰艇、汽艇与载牛驳船。有六艘舒适的轮船来往行驶于亚松森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旅行者都有令人陶醉的体验。另一航运公司“阿尔塞、莫斯西亚罗—西亚公司”要小得多。“巴拉圭马塞利诺·卡米奥尔特航运与商

业公司”1925年开始在巴拉圭河行驶，有三艘轮船和三艘较小的船只。河运和轮船航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全国仅有几公里改良公路。现代公路到1939年才不算非常稀奇的事物。1928年亚松森装设电话系统，在这以前电报是传送消息唯一迅速的工具。1926年约有电报线路三千公里，另有三百公里在修建中。

游客们，主要来自乌拉圭和阿根廷，为了接触一下异国情调，或是为了避开拉普拉塔河上使人不舒适的严冬腊月，前来巴拉圭游览。他们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乘火车、乘轮船、乘飞机来。1928年空中航线尚处在试验阶段。有的人沿巴拉圭河旅行，经有名的乌迈塔和兰巴雷到亚松森之前，到著名的伊瓜苏瀑布一游。有的人(较少数的)，逆流而上抵康塞普西翁，那是个有趣的小城市，1773年为阿古斯丁·费尔南多·德·皮内多总督所建，从这里他们可以短途旅行到神秘的查科去打猎、参观大牧牛场或观看破斧树采伐工人劳动。那些很少知道康塞普西翁的人对这港口的活动力，坚固而又美丽的住宅，以及供应充分的电力(那是1918年建立的一个工厂发的电)感到惊奇。当然，亚松森

是吸引力的中心。游客用不多久就能把这城市的名胜地点走遍，但也不能象来自波士顿的女士那样走马看花，在南美“活动”三个月，在巴拉圭呆三天。在这样短的期间，就很难有时间在圣贝纳尔迪诺住下来，照例轻松地休憩一下，愉快地游一游伊帕卡拉伊湖或是到巴拉圭旅社和东方旅社去享受一下美味，更不用说到东方酒吧间去品尝品尝各类混合酒了，在那里，人们可能听到闲谈关于玻利维亚人在查科所做的事情。

第十七章

谁的查科？

查科战争是从过去拖延下来的一次对抗行动，是殖民地边界争端的延续，这个争端本来在玻利维亚和巴拉圭赢得独立后不久就应该由它们来解决的。由于外交事务管理的凌乱，由于三国同盟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这两次较大冲突的插入，就铸成了这个时代的错误。在上列两次冲突中，巴拉圭和玻利维亚都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受害者。列强对领土的贪欲，使如此为人珍爱的词句“超越的兄弟情谊”，成为笑柄。

太平洋战争（1879—1883年）后许多年来，玻利维亚人梦想收复丧失给智利帝国主义的沿海领土。后来，出现了1904年的条约，由此玻利维亚认识到一个不愉快的事实：它失去的领土再也收不回来了。维护玻利维亚领土完整的主张，收复失地的意志，慢慢地消失。但在智利和秘鲁之间发生塔

克纳—阿里卡① 长期争议的整个时期内，闪出了1904年条约无论如何多少可以得到修订的希望。到1928年,那种希望,犹如一团云雾消失在愈益浓重的黑夜里一样，也在高原的稀薄空气中化为乌有了。

在群山和盆地的那边是查科。它同太平洋沿岸土地相比只是个贫瘠的替代品,但是根据地图、殖民地司法管辖区与地理勘探情况，那是玻利维

① 塔克纳—阿里卡(Tacna-Arica)：地名，指今智利、秘鲁、玻利维亚三国交界处的沿海五百哩地带。独立以来三国边界长期未定，该地区发现硝石矿后，各国矿主展开争夺，导致智利与玻利维亚之间的战争（即太平洋战争），结果智利战胜，在英国支持下1883年订立安康（Ancon)条约，玻利维亚沿海领土全部丧失。战争中秘鲁是玻的盟国，丧失其南端省份，而塔克纳—阿里卡地区按条约规定由智利统治十年，以后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归属智利或秘鲁。后智利又与玻利维亚约定，一旦取得这一地区的永久性主权，即转让与玻利维亚。1904年，智玻两国边界协定，由智利建一条铁路从阿里卡到拉巴斯并给玻利维亚若干沿海市镇的自由出入权。但1893年以后，上述公民投票问题形成纠纷，未能进行，直到1929年初智利与秘鲁才达成协议；塔克纳归秘鲁，阿里卡归智利，而玻利维亚仅保有沿智利和秘鲁两国边境线从利亚特（Llate）河口到玻利维亚境，在阿里卡—拉巴斯铁路以北十公里的地区。——译者

亚可以要求领有的一个地区。这就是北查科，即皮科马约河以北的查科，那里的平原、森林与沼泽伸展至巴拉圭河，后者经拉普拉塔河，流入大西洋。学者们知道查科，一般人并不知道。历史学家相信玻利维亚有无可争辩的领有权，但历届小独裁者未曾实现这个要求。他们妥协了，和巴拉圭签订了条约和议定书，但只是推延了不可避免的冲突。也许学者们错了，也许巴拉圭人在尽力搜集并精心选择证据之后，也能发现同样可以证实的领有权。胡斯托·罗塔斯·埃吉诺在《查科战争》一书中抱怨政府近视，未能充分认识东玻利维亚对未来所能具有的意义。但他没有考虑到一个确切的事实：东玻利维亚也就是西巴拉圭。而巴拉圭，在1870年后也有领土丧失给侵略者，当时，随着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之死，1864年的战乱才结束。在贝尔梅霍河和皮科马约河之间的中查科，划归了帝国主义阿根廷；如巴托洛梅·米特雷所承认的，阿根廷寻求弄清它的边界。从皮科马约河到贝尔德河北查科的一大片土地所有权，由拉瑟福德·伯·海斯总统于1878年确定下来给了巴拉圭，但那次裁决并不能损害玻利维亚对同一地区

的领土要求,如果有的话。

巴拉圭人自古以来就把查科视为自己的领土。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一致认为,从1617年12月16日起,即当腓力三世划分巴拉圭为两个管辖区时起,这个国家就为它的领土而斗争。R·B·坎宁安·格雷厄姆曾非难巴拉圭人,说他们在独立前不肯抵抗查科印第安人的侵略,接受这样的责难会是错误的。殖民地总督曾有力地,虽然不是经常地,打击瓜伊库鲁人及其他查科部落,而决不是对之漠不关心。有些远征讨伐队还把驻军留在查科,其中一次于1662年由拉萨罗·奥尔特加·巴列霍斯率领的巴拉圭西征,历时六个月,结果修建了五个要塞。1675年,雷赫·科尔瓦兰总督又在亚松森对面的河西岸建筑了一个要塞。埃利亚斯·阿亚拉等人,在《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在北查科》一书中所记载的这些资料,从以亚松森为中心的传教工作那里可以得到证实。瓜伊库鲁人难于期望信基督教;但姆巴亚人、阿维庞人、托瓦人等较为顺从。1787年佩德罗·梅洛总督在亚松森以北二十哩的巴拉圭河西岸,即现今的阿耶斯镇地方,建立梅洛蒂亚归化区。对查科的印第安人作战已

够糟的了，但另有一个更危险的敌人威胁巴拉圭。1629年巴西人把耶稣会教士赶出瓜伊拉，1632年又把他们赶出伊塔廷(在巴拉圭北部)，并强使里卡镇和雷亚尔镇的居民迁移到巴拉那河以西的地点。到1734年，这些巴拉圭的地方已牢牢地掌握在巴西人手里。公社派之乱帮助了巴西人把这一大笔赃物弄到手。1772年，阿古斯丁·费尔南多·德·皮内多建立康塞普西翁的雷亚尔镇以箝制这北方的外来威胁。纵有这些事实，亚松森人马里亚诺·安东尼奥·莫拉斯在1840年写道，巴拉圭河是西部的实际边界。

玻利维亚对查科的领土要求主要是依据1559年建立的一个司法地区——查尔卡斯王室法庭的司法管辖区。有各种类型的王室法庭：副王的，如在墨西哥和利马；地方长官的，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新格兰纳达；从属的，如在基多和查尔卡斯。对查尔卡斯王室法庭及其当权者所管辖的司法区域，曾有各种法令使它扩充或缩小。1563年它的东部边界是拉普拉塔(丘基萨卡)，但后来这王室法庭的司法职能也扩展到了巴拉圭——司法的，而不是行政的。法官安特克拉作为检查官曾去亚松

森检查迭戈·德洛斯·雷耶斯·巴尔马塞达总督的治理情况，由于安特克拉超出司法的职权范围，把自己看成了总督，副王申斥王室法庭，王室法庭回答它从未僭取行政权力。玻利维亚人雷内·莫雷诺说，查尔卡斯王室法庭是个检察院或是个最高法庭。此外，1783年4月巴拉圭被置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长官王室法庭之下，而和查尔卡斯王室法庭不发生什么关系。

行政区划在西班牙殖民地是很不明确的。要不是地图上不相一致的界线使人绝望地陷入迷宫的话，是可以引用绘制的或重绘制的地图来确定的。教育家、史学家兼外交家塞西略·巴埃斯博士在《巴拉圭》一书中发表的一张地图明确地表示，1620年查科是巴拉圭的。在制图斗争中玻利维亚史学家以地图对地图和他们的对手相抗衡，但既没有证明什么，也没有推翻什么。原因是清楚的。除了大海本身构成为边界以外，西班牙先前的殖民地在开始进行独立事业时就没有那一个是明确地规定了，又明白地设置了边界的。因此殖民地采取占领地保有主义（uti possidetis）：1810年占有了的就应保持它。那倒是一个好原则，可惜没有人

确切地知道1810年谁占有了什么地方。公正地考察一下地图和记载，使人相信，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对查科的领有要求各有正当的根据。这些要求互相抵销，剩下来最好的标准是用占领来测定。这个说法未必使巴拉圭人满意；它还可能在玻利维亚这个拚命想得到一个出海口的国家引起脑溢血。

抛开地图和老查尔卡斯王室法庭，抛开探险家和传教士，抛开学究式的、不可信的地图上的人为界线，记住这不可否认的事实：诚然人数稀少，巴拉圭已经在沿河一带的查科边缘地区定居下来了。巴拉圭已经开发过一些内地，已经给予过外国人运出和加工处理破斧树的特许权。可能所有这些都是非法的。玻利维亚人是这样想的。但可能是在一种领有权的口实下进行的，这个口实如果不比玻利维亚的更好的话，也和它的一样好，巴拉圭人是这样想的。谁对呢？不幸，这件事不能由法庭来决定。实际上，两个国家都不对，直到查科战争才解决了这个争端。

当巴拉圭人对查科已不是漠不经心的时候，玻利维亚领导者正集中注意力于采矿和力争获得一个太平洋港口。罗塔斯·埃吉诺及其他批评家

说，玻利维亚忽视了查科。这个责难决非正确。1879年，一个玻利维亚外交家劝诱一个巴拉圭人签订一项条约放弃对一部分查科的权利。在这很早以前，玻利维亚人在查科勘探，建立传教的印第安保留地，同时创建农业的和军事的垦殖地，开始一寸一寸地掠取教化区。这种教化工作，特别从玻利维亚的进展以里格计算以后，就不可避免地最后要和巴拉圭人的同样努力相冲突。这个进入查科的活动明显地约在1836年北部奇基托印第安人的地方开始的，它远在玻利维亚的太平洋省丧失给智利之前。虽然玻利维亚政治家对扩展国土的要求并不是那么起劲的，但无论如何他们没有忽视查科。他们的军垦地，和巴拉圭的那些一样，称之为要塞。原来是为防御野蛮人和偷牛贼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事要塞。要塞的周围往往有一道战壕，它由一连人的兵营、军官的营棚、一口水井与畜栏所组成。

有些玻利维亚作者严厉地攻击他们那些近视的、甚至是盲目的政客，抱怨上层人物的愚蠢。罗塔斯·埃吉诺简洁地概括这些责难道：在查科战争之前，玻利维亚的政客想过没有，阿根廷会不会

在斗争中起一种“超越的、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是否了解阿根廷在拉普拉塔地区的作用?玻利维亚的外交机构有没有研究过阿根廷对巴拉圭的政治、经济或命运的影响?或者说,玻利维亚外交官有没有计划过对付阿根廷的行动方针?从来没有!玻利维亚在道义上、精神上与贸易上被孤立了。直到1925年修通一条铁路以前,和阿根廷没有联系;和其他南美共和国的关系也非常松懈,以致战争开始时玻利维亚发现自己没有朋友。

玻利维亚政治家觉得自己难以在思想上作一番基本的、重大的调整,这是不足为奇的。殖民地时代玻利维亚是上秘鲁。太平洋战争前近三个世纪,它的方针是向着西方,向着太平洋,这样长期的习惯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智利的征服逼使玻利维亚与太平洋隔绝,而寻求新的联系。这就只能是和拉普拉塔诸国建立的那些联系,而阿根廷是这个地区的强国。玻利维亚作为拉普拉塔诸国大合唱的新来客,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一个时期痛苦的再调整,而别的国家也要同样感到这种痛苦的。如果要建立新关系而不引起剧烈的纷扰,那就要求巴拉圭和阿根廷具有真正的政治家风度了。但

那种政治家风度是缺少的，因为两个国家中没有那一国的政界人物了解玻利维亚被迫改变方针是怎样重要。真的，近几年来几乎没有一个作者对重订对玻利维亚利益和前途具有严重意义的方针这个事实，给予重视的迹象。不能期望几遭三国同盟战争毁灭的巴拉圭会出现能看到这个变化的思想家。而阿根廷又太忙于本身的令人惊异的经济发展。必须有另外半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天亮，而另一场可怕的战争是必定要发生的。

为什么玻利维亚不在1870年，当巴拉圭不比一条死带齿鱼更有武力的时候，进军这个有争议的地区呢？这有三个原因：玻利维亚、阿根廷与巴西。玻利维亚还干不了；巴西和阿根廷无论如何不会允许这样的行动。以后，太平洋战争来临，玻利维亚的好战精神完全消失了，至少在国际水平上是如此。但在同一个时期里，两个国家都恢复了它们的野心；在同一时间两个国家都拥有了外国训练的军队；在同一地方两个国家都梦想着广阔的、未发现的或不存在的油田；1907年后两个国家开始修筑前哨地点。奇怪的是战争很久才到来。

详细地叙述解决争端的许多无效的努力会使

人厌烦又不得要领。条约有：阿塞瓦尔—塔马约(1887)、德科德—基哈罗(1879)、贝尼特斯—伊查索(1899)与索莱—皮尼利亚议定书(1907)。1927年到1928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曾举行一次会议。在会上沉闷地交换了备忘录。分界线绘在地图上，最后商定一个条款，实质上和谈判者在十九世纪后期所画的几次边界至少有两次相似。哪一条都远比战争好，为什么没有一个条约为双方所批准呢？玻利维亚认为，查科纠纷是巴拉圭各个政党唯一争论的口实。解决这个纠纷，巴拉圭就失掉那个争论中心，失掉了那个把巴拉圭团结成为一个民族的、带有粘着性的因素。何塞·帕·古贾里在任职期满后宣称，玻利维亚的威胁给巴拉圭相互敌对的政党提供了主要的争论点。有理由相信古贾里正确地分析了形势；但玻利维亚人也能同样地利用巴拉圭人的"侵略"。没有什么比得上国外起火更能使一个独裁者在家得到温暖。1926—1930年玻利维亚总统埃尔南多·西莱斯肯定是照这样行事的。抽看两国报纸就能证明这个结论，各个政党有效地利用了查科冲突。巴拉圭报纸——《祖国报》、《民族报》、《论坛报》与《每日新闻》连续几年

保持着激情,支持它们国家的领土要求,批评总统的无所作为,教人提防玻利维亚人的诡计,极力主张备战。《秩序报》的一位擅长讽刺、署名"O.I."的作者谩骂攻击埃利希奥·阿亚拉——"矮子埃利希奥"——因为这个矮小精悍的政治家太明智了,因而不那么好战。玻利维亚报纸对巴拉圭的新闻攻击针锋相对,它和外交家交换意见所用的圆滑词句完全不同。

阿根廷的激进党总统马尔塞洛·T·德·阿尔维尔尽力排解查科纠纷,1924年提出由阿根廷调停。这个提议的结果,两个国家于1927年4月22日签订了一个议定书,同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一次会议来决定需要付诸裁决的内容。这个会议从1927年9月29日开到1928年7月12日,没有达成协议,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玻利维亚顽固地坚持要把巴拉圭坚定不移地认为根本不存在任何所有权问题的领土也付诸裁决。玻利维亚同意裁军;巴拉圭坚持要玻利维亚拆除它的要塞设备。在这些无益的谈判中,和蔼的、有教养的、世界主义的学者欧塞维奥·阿亚拉博士,总统的继承人何塞·帕·古贾里与查科专家富尔亨西奥·R·莫雷诺

是巴拉圭的代表。他们坚持大多数地区是没有争执的；既然让与门诺教徒的土地无可否认地落在巴拉圭领土上，这对玻利维亚就谈不到威胁。玻利维亚可以这样回答：让与威廉·H·莫雷公司的土地也清楚地在玻利维亚领土之内。读了每个国家为坚持自己的要求而提出的许多文件之后，必然得到这样的结论：查科纠纷不能靠引证历史资料去解决。争论者所能采取的方针有四：直接协商、仲裁、继续争论或战争。他们选择最后的方针。触发战争的偶然事件不久就发生了，巴拉圭袭击班加迪亚要塞，发动了战斗。而那时候巴拉圭还强调玻利维亚人开的第一枪。

既是班加迪亚事件触发了查科战争，回顾一下双方的争论是有益的。陆军少校拉斐尔·弗朗哥（后来曾当临时总统，几次起义的领袖，包括1947年的叛乱）当时指挥内格腊湾的军队，这支军队的一部分在1928年9月4日下午9时从加尔庞要塞出发。玻利维亚人报道，巴拉圭骑兵、步兵四百多人在9月5日清晨要班加迪亚要塞投降。接着是半小时的战斗，玻利维亚人死五名、被俘二十三名。在巴拉圭军队回加尔庞要塞途中，一个巴军

下士和一个士兵打死两个走不动的俘虏。即令巴拉圭人可以否认这个事件，但这样残暴的事，他们——玻利维亚人也是这样——是完全能干得出来的。玻利维亚人揭发，对班加迪亚要塞的袭击是预谋的战役的一部分。巴拉圭的军事参谋机构在11月就已把本部设在班加迪亚要塞附近的康塞普西翁了。玻利维亚人很快地为他们所受的损失进行报复。12月14日天亮以前，一支一百五十人的兵力进攻洛佩斯要塞，击溃守军三十五人，俘获正乘车由里瓦罗拉要塞到赫内斯要塞去的一个小分队，并占领博克罗恩要塞。再发生几个这类的事件必将导致展开一场游击战，最后导致一场全面的战争。巴拉圭土地上又一次沾染鲜血，随即血流成河。外交关系很快地断绝了。在巴拉圭代办奉令撤出拉巴斯的第二天，即12月 9 日，拜隆·梅尔卡多博士离开了亚松森。

就在查科战争的首次事件在班加迪亚要塞发生的当时，一个调解仲裁的会议正在华盛顿开会。玻利维亚全权公使爱德华多·迭斯·德·梅迪纳和巴拉圭代办胡安·维森特·拉米雷斯博士接受了会议提出的调停。玻利维亚指责巴拉圭12月 5

日袭击班加迪亚要塞，破坏了1928年7月12日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协定；巴拉圭否定这个指责。于是调解仲裁会议组成一个调查委员会解决这个特殊争论。在包括交战国、墨西哥、古巴、哥伦比亚、乌拉圭、智利与美国代表在内的九人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之前，双方承诺不再发生任何事件。富兰克·R·麦克考埃少将主持这个委员会，1929年3月13日在华盛顿开始工作。敌对的双方代表团竭尽全力向委员会陈述他们的理由。正在此时，巴拉圭派出一个小分队去弄清班加迪亚要塞的确切地点，在邻近处发现一个新哨所。小分队在5月4日与5日遭到玻利维亚人的射击，两匹马伤亡。委员会所关心的原是研究备忘录和尽力使争执双方扣留的对方国民遣送回国，后来断定调解分歧是不可能的，于是提出一个仲裁查科纠纷的建议。两国重申要求仲裁的诚意，但对仲裁什么彼此互不同意。

在班加迪亚要塞事件前后，学者和冒牌学者写出几十本书来表达他们国家的要求，那是必然的。富尔亨西奥·R·莫雷诺的《边境问题》，曼努埃尔·多明格斯的《北查科》与埃利亚斯·阿亚拉的《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在北查科》是巴拉圭人最好

的辩护书中的几本。罗塔斯·埃吉诺的《查科战争》和米格尔·梅尔卡多·莫雷拉的《北查科》与《玻利维亚的查科》在玻利维亚人作品中列为上等。在这些作者以及其他作者之中，有些是优秀的历史学家，他们都在同一根据、同一旧文件上花费心思，达到和先入的偏见相符的结论。他们至少完成了一件事：使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的历史得到了深入的分析，不管结论如何混乱。例如，曼努埃尔·多明格斯分析玻利维亚人的论证，断定它"不过是玻利维亚人论文……的残渣"。而梅尔卡多·莫雷拉又把它们收集在一起了。

玻利维亚人不了解拉美大部分人同情巴拉圭。美孚石油公司在玻利维亚有租让地，而人们对外国剥削的愤恨又那么大，这就使其他国家的人民轻易地相信这样的谎言，说美孚石油公司在武装玻利维亚，为了开采查科想象中的巨大石油矿藏而煽动战争。事实是玻利维亚的武器主要来自"伦敦维克斯公司"，虽然许多拉美共和国都曾利用美国贷款从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家购买剩余军备存货。巴拉圭外交部知道维克斯—阿姆斯特朗合同及贷款；亚松森的外交部长赫罗尼莫·

苏维萨雷塔博士曾详细介绍过那经过拙劣伪装的载运货物怎样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走陆路或溯河而上继续前进的。没有必要把美孚石油公司扯进来。也应记得，在1937年，即查科战争结束后两年，玻利维亚就征用了美孚石油公司的财产。这就是玻利维亚对美孚石油公司供给它战费的一份好报酬。

对美孚石油公司提出的许多条罪责中，有一条需要还足够的证据。传闻卡洛斯·卡萨多是阿根廷总统胡斯托的亲戚。卡萨多在查科有最大的租让地，因此对这场战争极为关心。1935年8月，美孚石油公司被责难说，它用管子从玻利维亚油井输送了九百零一万八千九百五十桶[1]石油到贝尔梅霍河阿根廷一边，从那里运进巴拉圭供汽车之用。“石油大王”美孚供应巴拉圭，而玻利维亚不得不从秘鲁、阿根廷与美国去购买。“英国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则被认为在英国—阿根廷财团的鼓励下正在为巴拉圭提供经费。另一个传说是东玻利维亚的美孚油井需要在巴拉圭河有一个出

① 每桶(barrel)相当三十六加仑。——译者

口。英国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试图封锁这个出口。传闻阿根廷总统的儿子唐·利沃里奥·胡斯托曾说过:“那是这次血染大陆的战争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把战争归罪于英国—阿根廷公司的,说它想取得美孚的玻利维亚油井。奥古斯托·塞斯佩德斯认为这个解释太简单了。这种解释忽视了阿根廷是支持巴拉圭的,它否定“阿根廷对巴拉圭的殖民化、提供资金、加以武装,并在经济上和外交上扼杀玻利维亚,以便占有查科的帝国主义本质”。

整个查科石油问题经常地提出来讨论,确实需要给它稍多一点的注意。在查科本部可能有石油,但地质学家过去,以至现在对它都抱有怀疑。玻利维亚的油田座落在安第斯山麓的小山群下。九个辛迪加在一个大约一百哩宽、七百五十哩长的地带获得租让权。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是唯一的一家采取积极行动的公司,它开发了一块油田。在蒙特斯镇以北九哩一块八万六千英亩的租让地上,美孚于1923年着手勘探,钻了几眼井,建了两个小炼油厂。查科战争开始时,这些油井日产约三百桶,根据租让条件全部拨归玻利维亚。在和平

时期玻利维亚怎样才能把石油运到市场呢？阿根廷对从亚奎巴（其铁路尽头在蒙特斯镇以南的边界上）运出的货物课以高额关税，又拒绝让修建的油管经阿根廷领土到巴拉那河。为什么不经过查科修建一条油管呢？巴拉圭占有河的西岸，这条油管要通到那里为止。玻利维亚不愿进行协商，怕会损害对查科的领土要求。从这些因素和美孚的微小投资来看，责难美国石油商支援玻利维亚多少是可笑的。

玻利维亚比巴拉圭大得多，人口也多于它，本来能保持一个较大的军事编制。而巴拉圭人引为骄傲的是他们在1870年后迅速增长的军队士气和传奇式的临危不惧，这些足以抵销玻利维亚在人力、物力上的潜在优势。对玻利维亚的战争几乎是无疑的了——甚至热切地期望这个机会，以证明法国人教导的、阿根廷训练的伊比利亚—瓜拉尼人要比德国训练的伊比利亚—克丘亚人和伊比利亚—艾马拉人[1] 优越。巴拉圭的尚武精神过去和

① 伊比利亚指西班牙；克丘亚(Quechua)和艾马拉(Aymará)是玻利维亚境内印第安人的两个主要部族。——译者

现在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巴拉圭人知道，以人对人在世界上善战者之中他们是第一流的。不管真实与否，这个信念是存在的。

玻利维亚黩武主义的种种迹象，以及有关玻利维亚和维克斯—阿姆斯特朗这样的公司签订军火合同的消息，很自然地使巴拉圭作者多少感受到迷惑，因为他们过分强调了玻利维亚的军事准备。他们唤起对那些准备情况的注意是对的，他们不知道玻利维亚的军队比巴拉圭的潜力要差。他们对自己军队英勇善战所作出的表面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夸张的舆论，却引导他们得出正确的结论。如1931—1932年担任玻利维亚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的安赫尔·罗德里格斯陆军中将在他的《一次战争的剖析》中写道："玻利维亚军队已经作了二十年的宣传，这是无数次军事检阅在逻辑上的自然结果，人民相信他们军事机关的组织，也知道它自夸有一支受过训练的后备军；但没有人知道的是，组织军队的人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检阅时显示它。这军队是个政治的工具，而从来不是个作战的工具。这个共和国的许多总统要求的和考虑的就是这样。"

巴拉圭—玻利维亚战争一旦发生，南美较大的国家会做什么？智利已经轻率而有意地把玻利维亚和太平洋的联系切断；但为了保持大陆的力量平衡，至少必须给玻利维亚以道义上的支持，以便与阿根廷对巴拉圭的支持相抗衡。巴西是阿根廷在拉普拉塔河流域的一个长期对手，可望其偏袒玻利维亚。高原的居民盲目地渴望某种程度的同盟。他们误解了巴西的立场。那个巨人意图对谁都友好；它对查科战争的干涉将限于温和的外交行动。巴西人首先专心致志于内部问题，使广阔的、人烟稀少的内地充实起来。

查科战争开始时，阿根廷肯定处于一个不愉快的地位。巴拉圭和玻利维亚是阿根廷试图组织的新拉普拉塔河流域合奏曲中的两个重要的音部，他们都注定要牢牢地依赖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现在却在一个宽阔的区域内打了起来。1928年，班加迪亚事件那年，老伊波利托·伊里戈延作为激进党总统又重新当权。两年后，1930年9月，将军们与保守党人结束激进党的统治。在整个查科战争时期，何塞·乌里武鲁将军和他的继任者阿古斯丁·P·胡斯托将军占据了总统职位，直到1938年。

1930年的革命，开始了一个最初以乌里武鲁、胡斯托和卡洛斯·萨维德拉·拉马斯为首的军事民族主义时期。萨维德拉·拉马斯，一个熟练的外交家，对美洲中立国家和国际联盟积极调解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之间的纠纷表示愤慨。调解的失败，增强了阿根廷的声誉。当战争开始时(1932年6月)，萨维德拉·拉马斯获得美洲各共和国对1932年8月宣言的一致同意：凡以武力征服的领土将不予承认。纵使玻利维亚打败巴拉圭，没有哪个美洲共和国会承认它的胜利果实。这个宣言是针对玻利维亚的，看来这个交战国要取胜。但巴拉圭人使自封的专家感到意外，打败了玻利维亚，占领了无可争辩的玻利维亚领土。1932年8月3日宣言，在1935年6月12日签订的停战协定中以及1936年1月21日的附加条款中，起了保护玻利维亚的作用。萨维德拉·拉马斯因结束这次战争而获得声誉，并荣获诺贝尔和平奖金。而这种奖金荣获者的候选人范围实在很小。

阿根廷的同情肯定是在巴拉圭一边。如罗塔斯·埃吉诺所说，阿根廷报纸决不是中立的，它试图表明“查科战争只能用玻利维亚的征服野心和

计划来解释；是玻利维亚，一个大国、受过军纪训练的、又有德国将军作军队指挥的、被认为是第一等的军事国，对巴拉圭这样的小国发动了一场突然进攻；巴拉圭，贫穷、连个比索也没有、没有武器、没有贷款、一个被确认为爱好和平的民族，在一夜之间冷不防遭到作为外国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孚石油公司工具的玻利维亚的侵略”。大报《新闻报》和《民族报》在冲突中更倾向巴拉圭，但它们的编辑尽力以求公允。对于那些如果玻利维亚赢得查科就要受重大损失的阶级的代言人来说，那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第十八章

查科战争

何塞·帕特里西奥·古贾里政府的最后两年是极端困难的。他就职于1928年8月，正当埃利希奥·阿亚拉给了这个国家1899年以来第一个四年国内和平之后。和赫伯特·胡佛[1]一样，他在繁荣时期上台，而这繁荣已快完结并急剧地陷入世界萧条之中；当然，萧条不是他所造成的。宪法时期开始于1870年，古贾里继续并结束了这个时期。他对政治上的反对者持温和态度，力求统一自由党，但眼看着他的绝大部分工作为查科战争所破坏。

当头脑发热的人在大声叫喊战争的时候，古贾里热心地为和平而操劳。1928年12月的班加迪亚要塞事件把公众的怒火点燃到了危险的程度，使过多的注意力集中于查科，而当时的公共收入

① 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1929—1933年）。——译者

低到难以维持适当的学校、保健事业与内政改良措施。1927年国家就着手改建亚松森港，这项工程是在四年之后相当困难地完成的。公路、桥梁、学校、医院的建设计划都被搁置下来，因为对玻利维亚的战争看来更加不可避免了。况且，既然南美的许多国家在1930年都经历了暴乱，古贾里若想和平地结束他的任期，必须是非常的机敏或幸运才行。1931年3月，甚至亚松森市郊格兰德兵营里的驻军也因有“革命分子”而如此不安定，使国家有陷于混乱的危险。武装部队代理指挥官何塞·费利克斯·埃斯蒂加里维亚下令把对政府不忠的部队开赴查科。4月，他亲自到卡萨多港去“延续他的国家的历史”。

埃斯蒂加里维亚到达卡萨多港之后不多久，玻利维亚一个巡逻队进犯，占据了靠近巴拉圭西南查科基地纳纳瓦（阿亚拉）要塞的马萨马克莱（阿瓜—里卡）要塞。这次侵占是激怒群众的那些事件中的另一个事件。它给“当政者”的敌人——自由党、富豪、外国利益集团——一个行动的机会。古贾里按着埃利希奥·阿亚拉规定的计划，逐步地武装这个国家，参谋本部在使用了一次武力

侦察未能夺回这个要塞之后，对马萨马克莱事件也情愿表示冷淡态度。到1931年8月，在查科双方交锋日益增多的情况已十分明显，所以1929年参加调停的各大国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协定。9月，冲突，即在不同地点的小规模战争发生了。谈判家加紧他们的努力，军事家也这样。在中立国首都进行谈判的同时，军队开进查科。1931年10月23日，一群激昂的、极端爱国分子在亚松森骚动起来，表示对古贾里和平主义政策的不满。仅仅由于1922—1923年革命后得以更生的军队的忠诚，才避免了一场严重的暴乱。胡斯托·帕斯托尔·贝尼特斯相信，一场暴乱必将意味着查科丧失给玻利维亚。

这个见解似乎很有道理。1932年4月，据紧急电讯，玻利维亚在它的要塞或附近有七千人或更多的军队在作战争动员，还疯狂地在增加军备。安第斯国[1] 的政治家自信必能迅速获胜，因而对为避免战斗而提出的种种让步统统加以拒绝。丹尼尔·萨拉曼卡总统及其军事顾问以为他们以四千人就能扫平查科。罗德里格斯将军写道，这说

① 安第斯国(Andean country)：即玻利维亚。——译者

明为什么玻利维亚仅以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与一个炮兵中队就发动了战争。这些部队严重缺员，充其量不到二千人，而不是如报纸所报道的七千人。玻利维亚参谋本部请求必需品，作出为萨拉曼卡总统所漠视的计划，试图为“萨拉曼卡的战争”动员资源，并无望地期待着，而最后的失败却正在形成。

1931年在查科值勤的玻利维亚人充分了解，一场战争在进行着。应征的新兵用斧子和弯刀在灌木丛和森林里砍出通道，把查科中心地区的要塞连接起来。这一系列连锁点可以控制巴拉圭人的渗透。萨拉曼卡总统对这些通道对抗击巴拉圭以后的侵犯的战略价值是看得很清楚的；但是，奥古斯托·塞斯佩德斯抱怨，甚至那样的大人物都没有发觉“在那暗指的进军目标的后面，隐藏着一个有力的资本家寡头集团，他们正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写字桌上、办公室里，准备利用半裸体的巴拉圭士兵的双手火中取栗，并在适当时机，利用玻利维亚士兵修筑的那些道路来染指玻利维亚山坳里被垄断的石油”。

以后在战斗中被消灭的因加维团和弗洛里达

团，以小分队形式从事修建这些道路。在那些军官中有英雄弗朗西斯科·曼切戈少校和赫尔曼·博什，他们的事迹变成了传奇。11月的雨水淹没了山林中的小路，牛车陷进泥泞之中。“灰色的天空滴沥滴沥地下着雨，把无边无际的森林淹没在云雾里。沼泽分布犹如斑斑油点，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大湖，漫出平地二十厘米。上面草木向地面倾斜，给水的重负压弯了”。与12月的大雨相较，11月的雨不过是阵雨。半年以后，贪婪的太阳放射出饥饿的阳光夺走了地面上的水，烤得土焦地裂。漫天的飞尘夹杂着一群群绿头苍蝇。这时赤热笼罩着人和牲畜，“象一件热橡皮斗篷一样”。

查科的夏天是一个期待下雨带来暂时解脱、挖掘深井寻求水源和守望秃鹰阴影的漫长的恶梦。有个还活着的人写道：“该有个人在什么地方打开一扇窗子让空气进来。天空就是巨大的石块，太阳被囚禁在它下面。”1933年某一次，一个玻利维亚小分队花了七个月凿了一眼井。凿下去三十米、四十米、五十米，再深下去他们也没有发现水。有关这口井的消息，传到帕塔皮拉斯（玻利维亚人这样称呼他们的敌人）的耳朵里，敌人就奋力进

攻，以便夺取这件宝贵的战利品。凿井的人死命保卫他们的井穴，如同保护一眼喷泉一样。这个又深又干的坑洞，成了他们之中八个人和五个敌人共同的墓穴。

拉巴斯的群众集会，亚松森的群众集会……总统们在他们的阳台上……国家的荣誉……欺诈的敌人……我们的祖国在危险中……钟声响，钟声鸣……铙钹打，号角吹。战争！在安第斯街道上，在通往巴拉圭河的木块和鹅卵石路上掷满了鲜花。战争！把艾马拉和克丘亚人从他们的高原抓来，把他们送进"绿色的地狱"①。把瓜拉尼人从木薯地里抓来，让他们去听猫头鹰的哀鸣，为他们的黯然退却永远哀鸣。战争在查科，在那个草木丛生、遍地泥泞、沼泽、尘土的地狱。而当成千上万的士兵洒尽鲜血之后，让他们的主子聚会一堂在地图上去划线，在这些地图上，棕种人白白地死掉的地方是决不会标示出来的。

1932年8月15日，欧塞维奥·阿亚拉博士继古贾里之后接续自由党的统治，当时，巴拉圭是幸

① 指查科。——译者

运的。这个五十八岁的执政者，1921年到1923年当过临时总统，当时没有新来者接任这个位置。他是一个律师、新闻记者、教育家兼银行家，以非凡的才能向各方面作出的努力都获得了声望。三十五岁那年他被选为国民众议院主席，以后进参议院，任驻美公使、驻秘鲁大使，在1932年5月8日一场吵吵闹闹的选举中当选为总统。在巴拉圭政治生活中没有人比这个杰出的、正直的、有教养的巴雷罗一格兰德人更适合于这种高位了。他势必受到激烈的民族主义者的诘问与责难，因为在处理查科纠纷中镇定而有节制；他势必受到群众的嘲笑，因为迟迟未宣布战争；他势必为“二月党人”所推翻，因为他敢于在1935年和玻利维亚签订一项休战协定。他流亡布宜诺斯艾利斯，于1942年6月4日死去，巴拉圭和南美失去了一个真正伟大的人。

何塞·费利克斯·埃斯蒂加里维亚和欧塞维奥·阿亚拉是巴拉圭最后胜利的联合缔造者。1888年2月21日，埃斯蒂加里维亚生于卡腊瓜太，属于早期殖民者巴斯克家族。确是属于这个族系的高贵分支的，人们能找到这样的名字，如弗朗西亚的朋友胡安·维森特·埃斯蒂加里维亚博士和

三国同盟战争时在乌鲁瓜亚纳率军投降的何塞·安东尼奥·德拉·克鲁斯·埃斯蒂加里维亚上校。查科英雄的父亲唐·马特奥是个农民兼银匠，一个有相当多的瓜拉尼血统的梅斯蒂索人。他母亲唐尼亚·卡西尔达·因绍拉尔德也能夸耀她的显赫门第。卡腊瓜太在亚松森以东稍偏北八十公里，阿亚拉的出生地巴雷罗—格兰德附近。这个地方以女子秀丽男子强壮闻名，大部分是白人。这个总算没有遭到大战最恶劣影响的繁荣的村镇，躺在小山群的怀抱里，那里有欣欣向荣的养牛业，辅以肥沃的红土所出产的丰富的烟草和棉花作物。就在这里，年轻的何塞·费利克斯"以一个接近大自然的村童"度过他的少年时代，长大成为一个漂亮的男子，容貌端正、褐色眼睛、敏感的嘴唇、黑色的卷发，外貌上看就象是个电影明星。他的一个至友说，埃斯蒂加里维亚一天只吸一两支烟，从来不喝马黛茶。

埃斯蒂加里维亚1903年在莫伊塞斯·S·贝尔托尼博士主持的桑蒂西马·特里尼达德农业学校上学。在那里毕业后，他接着进入亚松森国民学院。1908年7月2日革命时，这个青年人加入了造

反者行列。两年后他参加军队。1911年8月一次暴乱过后，他在智利进一步接受军事教育。在国外两年后，埃斯蒂加里维亚回巴拉圭，1914年成为陆军中尉。惯例的任命使他没有空闲。1921—1922年骚动中他仍然坚定地效忠政府，那是临时总统阿亚拉不会忘怀的。整个1923年他掌管军事学校。作为忠实于职务的奖赏，1924年埃斯蒂加里维亚上尉出洋到法国进一步研究军事，在福煦元帅门下学习。在法国期间，他转而确信巴拉圭军队有两个历史任务：拯救查科和重建国家。1927年回亚松森，一年之后成为参谋总长，1931年为陆军训练总监。作为军队的指挥官，他完成了第一个任务，第二个任务也进行得不错，直到1940年去世结束了他的事业。

阿亚拉和埃斯蒂加里维亚两人是巴拉圭在战争时期最倚重的。这个“在战神示意下降生”的国家，同心协力作他们的后盾来保卫查科。人民和政府在危机中验证了他们旺盛的精力，甚至那些不喜爱阿亚拉的不满分子也不再试图暴动，那样会使查科拱手让与玻利维亚。唯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才能赢得这场不到七十年内发生的第二次战

争。

军事的和非军事的领袖一样，都未能预见到迫在眉睫的战争的型式。他们料想是步枪手或骑兵队的一系列冲突，在这里重炮和自动武器很少有用处，摩托化设备最初以为不必要也用不上，因为查科还没有公路系统。相反，这场战争却是现代化的，有重装备、卡车、大炮、机关枪，甚至飞机起着显著的作用。玻利维亚和巴拉圭都不曾相信各自可能维持五万人作战，同时另有五万人搞给养和辅助勤务；交战的双方也都没有估计到对方所能武装的程度。波利卡波·阿尔塔萨在《阿亚拉、埃斯蒂加里维亚与自由党》一书中使我们确信，自由党政府从1906年到1932年七次向德国、英国、智利、西班牙、比利时、瑞士购买军需品。这些购进物包括来福枪和卡宾枪四万六千一百支、重机枪二百六十八挺、轻机枪五百七十二挺、迫击炮三十六门、军用飞机三十二架、卡车三千辆、大量弹药和炮弹、被服、医药用品以及其他军需用品。人们得知全部情况后，怀疑阿根廷或许巴西不会在直接或间接援助巴拉圭的国家名单中遗漏掉。

阿亚拉就任时继承下来的冲突，慢慢地扩大

着范围。人们可以从1928年12月5日到1932年9月9日的几个日期中任选一个作为战争的开端，就看你要的是偏袒玻利维亚人的日子还是偏袒巴拉圭人的日子。选择后者，我们会接受1932年6月15日作为从一个偶然事件和冲突的战争到一个战役的战争的转折点。在那天，玻利维亚的奥斯卡·莫斯科科少校率领三百人成功地袭击在门诺教徒垦殖地以北大约一百哩的皮蒂安图塔要塞。传说维克托·乌斯塔里斯·阿尔塞上尉7月末率领玻利维亚人夺得了中查科的几个哨所；很大一部分仗是在中查科打的，那里要塞最为密集。第二天，8月1日，亚松森的议会要古贾里总统进行动员。在不到两个月内，埃斯蒂加里维亚的第一军团有一万五千人应征入伍。中立的大国又一次要求双方签订休战协定。8月10日、11日战争暂停两天。巴拉圭人坚持要玻利维亚归还博克罗恩及新夺去的哨所。玻利维亚人拒绝了。暂停结束了。8月12日，巴拉圭人夺回皮蒂安图塔。三天之后欧塞维奥·阿亚拉当了巴拉圭总统。中立者又开始抱希望。为什么不在查科设立一个中立地带并同意一项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停战协定呢？没有一个国家

同意对方的条件，各自继续努力加快一场全面的战争。埃斯蒂加里维亚当时是陆军中校，正计划反攻博克罗恩，同时，英雄的查科高卓人普拉西多·哈拉率领着他的骠悍的敢死队向玻利维亚阵地进行挫敌锐气的突击。

胡斯托·帕斯托尔·贝尼特斯在《埃斯蒂加里维亚——查科的保卫者》一书中讲了一个关于他的英雄怎样对待上级的有趣故事。1932年7月30日一个军官从参谋本部飞到第一军团，要卡萨多港以西一百四十五公里的哨所传达密令。埃斯蒂加里维亚上校仔细地看了这命令，然后说，象这种打算的防卫行动不应加以考虑。他反而要立刻出击，以防止玻利维亚第四师充分动员。他发令："告诉最高统帅部给我增派两个师和炮兵！"他写信给统帅说，如果要拯救这个国家，有必要在二十天内派来一切可能的增援。几天后参谋总长自己到卡萨多港，用电话传呼到埃斯蒂加里维亚那里。上校简略地听了，就说："告诉他回首都去加紧动员，并送给我一张查科的地图。我没有什么要和他说的，我非常忙。"

他的计划和那些要求沿河防御的计划不一

致，他觉得后一政策将会放弃全部查科给玻利维亚。埃斯蒂加里维亚要进攻，沿着整个战线打击敌人。但在1931年晚些时候当他竭力主张这样行动时，他的全部兵力只是一支五百人的队伍，小股地分散在广阔的领土上。一年以后，有少量军队归他指挥，他仍赞成上述的战略。当参谋本部要打一场防御战时，他劝告要大胆。他希望在敌军纵队未能在要害地区的任何一个地方集结并迫使巴拉圭进行“不能动弹的沿岸防御”之时，以攻为守。他相信尽管资源有限，胜利是可能的。同时他熟悉查科。阿亚拉总统完全信任这个勇敢的军人为他防范政敌，给他以不受政治影响的自由。当埃斯蒂加里维亚要求收复博克罗恩时，总统告诉他前进。

7月31日玻利维亚人按照轻易地拿下博克罗恩那样，计划于9月11日向埃斯蒂加里维亚的司令部伊斯拉—波伊发动进攻。埃斯蒂加里维亚知道了这个计划，就采取攻势打击敌人。9月9日第一军团大约八千人从伊斯拉—波伊发动进攻。玻利维亚人认为博克罗恩为一万一千人到一万四千人所包围；尽管如此，他们只是从西南三十哩的阿尔塞要塞派出些小分队，力图援救博克罗恩守军，

结果无效。经过二十天的战斗，埃斯蒂加里维亚的战士胜利地长驱直入，宣称俘虏了一千人，虽然要塞守军起初可能还不到六百人。玻利维亚第四师防御部队为饥渴所战败。以后玻利维亚人把兵力集中在他们的查科司令部阿尔塞要塞。这个据点10月23日陷落，投降和被俘的人很多。玻利维亚在阿尔塞究竟有多少人很难说，据罗德里格斯将军计算，仅有一千二百人分散在十四个据点内。这个玻利维亚军官还责难博克罗恩的围攻是巴拉圭人战术的错误。埃斯蒂加里维亚应该以一支较小的兵力围着博克罗恩，同时横扫阿尔塞、穆尼奥斯与普兰塔尼洛斯。但这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巴拉圭人相信自己是在和一个强大的敌人作战，那是由宣传而产生的一种信念。巴拉圭人继续向博克罗恩以西推进五十哩，但以穆尼奥斯要塞为目标的南面攻势在11月末达到萨维德拉前就受阻了。阿亚拉总统飞往前线，把他的指挥官提升为上校，并且说："你指挥巴拉圭战士是胜任愉快的。"

曾在埃尔南多·西莱斯总统下担任训练玻利维亚军队的汉斯·孔特将军，前去接任玻利维亚军队的指挥。他于1932年11月17日离开纽约去拉

巴斯，12月 6 日到达，随后把司令部设立在穆尼奥斯。这位德国人的到来使玻利维亚人恢复了在萨维德拉或南方前线的士气。玻利维亚人蜂拥而归，在北部夺回几个据点，并威胁南部巴拉圭的纳纳瓦根据地。他们借助于筑路、重炮、空中力量阻止了12月10日巴拉圭的攻势，使其在阿利瓦塔小道上受到重大伤亡。那时双方战时伤亡约为三万人。战争的全部惨状暴露在萨维德拉到阿利瓦塔的路上一小块开垦地叫“七仟米”的地方。玻利维亚的战壕和机枪网面对着巴拉圭的同样装备，远射程的比利时迫击炮把开花弹射落在巴拉圭人阵地上。巴拉圭人以重炮回答。参加这一战役的至少有二万人。

玻利维亚两个师在这次战斗中被大量歼灭。士兵们一小股一小股地迷失在丛林中，寻找回到自己战线去的归路。有一队也许是一百人，他们之间连一个指南针也没有，力图突破一个几乎全面的包围圈。一个引路的人领着他们穿过相当开阔的森林进入密密的丛林，那里缠结在一起的十呎高的灌木丛迫使他们用弯刀砍开一条通道。这样干了两天，把他们带近巴拉圭巡逻队。引路人变更

方向，又遇到了别的皮拉斯[①] 巡逻队。士兵们失去了时间观念，扔掉了空炊具和无用的背包，咒骂汉斯·孔特这个莽撞的德国佬，尔后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幸存者奋力逃命，汗水凝着尘埃，双唇焦裂，东张西望，眼神慌乱，臂上、背上被刮得伤痕累累。其中七人到达萨维德拉。

玻利维亚的战略（如果萨拉曼卡总统的轻率计划可以叫做战略的话），要求竭力收复博克罗恩，于是兵力从北部调下来，经过迂回的道路和其他部分相会合，攻打他们的目标以西六十五哩的科拉莱斯和托莱多。这支部队尽管因急行军而困顿不堪，但仍前进“在炽热的阳光下，他们的头脑晒焦了，许多士兵动脉管的血液凝结，死在丛林中，就象蝎子被炙热的炭火围住一样”。这次袭击开始于1932年12月31日，如果成功，玻利维亚人就能威胁伊斯拉—波伊，侧击博克罗恩。费利克斯·卡夫雷拉上校（1924年巴拉圭开始占据中查科时一些要塞的主要建设者之一）以三百人守在科拉

① 皮拉斯(pilas)：即帕塔皮拉斯(patapilas)，指巴拉圭人。——译者

莱斯。1933年1月1日黄昏时分，卡夫雷拉命令士兵退至以北二十五哩的托莱多，增援这个据点的防御。

巴拉圭人不打算放弃托莱多，这个简陋的营房有战壕、自动武器与榴弹炮保卫着。这些武器杀伤了匍伏穿过丛林、或沿着地面象蛇一样蠕蠕前进的玻利维亚人。整个连队在攻击中大部被歼灭，弹药用尽，水源断绝。玻利维亚炮兵试图为步兵前进开道，但那些致命的巴拉圭机枪不肯停下来。玻利维亚步兵从一处溃退，刚为他们的上校指挥官止住，然后又溃退了。1933年1月2日晚，玻利维亚人退回科拉莱斯。第二天，天空充满着“成群悲鸣的秃鹰”。塞斯佩德斯在他的《梅斯蒂索人的血》一书中为这次托莱多战役作了一个生动的描述。

与此同时，玻利维亚在北部打得很成功，促使巴拉圭赶紧从南部增援以保卫内格腊湾和通往康塞普西翁的铁路。1933年开始，玻利维亚人喜气洋洋，期望战争很快结束。现在巴拉圭人在南部战场的阵地已被削弱，汉斯·孔特将军下令向纳纳瓦来一次新的进攻。大雨使战斗暂停，到1月8日，纳纳瓦的一个前哨地点失守；但以后的袭击如在中

心战场对博克罗恩和阿尔塞的攻击一样，都失败了。1月28日天雨又使作战中断。

纳纳瓦要塞是个天然的据点，具有查科防御工事的特色，周围是灌木丛和树木，这些树木在一片广大的丛林中犹如海洋里的小岛。玻利维亚人突袭失败后就围攻这个据点，修筑了一条二十公里长的半圆形的战壕，接近要塞某处的一百米之内。巴拉圭人在主要阵地前小丛林中筑了一个坚固的机枪点，称为“要塞岛”，离玻利维亚用破斧树的木头保护的一个坚固据点大约八十米。这两个阵地相互开火好几个月，双方都没有严重损失。

纳纳瓦周围的战斗非常激烈，因此新闻记者开始把它称做“南美的凡尔登”①。在那里和在其他战场，战争已形成一系列无益的、但代价很大的进攻和反攻了。纳纳瓦所以能顶住玻利维亚人，穆尼奥斯所以能顶住巴拉圭人，部分地由于它们是查科唯一加重防筑并小心加以准备的阵地。玻利维亚在1933年3月的攻击中夺取阿利瓦塔、萨维

① 凡尔登(Verdun)：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和要塞，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德两军曾在此激战。——译者

德拉与血染的“七仟米”，而纳纳瓦仍岿然无恙。大雨再一次煞住了对纳纳瓦的“最后的”袭击，当时巴拉圭的士气低落，更深地陷入查科泥淖之中。

所有这些战斗都发生在宣战之前。3月，巴拉圭议会授权阿亚拉总统发出宣战书。1933年5月10日，他这样做了。巴拉圭曾批准凯洛公约①，玻利维亚则没有。因此，并不存在破坏那永久和平的纯洁希望的问题。战争正式地进行着，阿根廷、乌拉圭、智利、秘鲁、巴西急忙纷纷宣布再度保证中立，而同时他们的港口对交战国双方却大抵都是开放的。

1933年6月15日，两国虔诚的人们集合在他们的教堂里悼念他们的死者。国际联盟一再继续努力停止这场战争，但总是碰到难以克服的执拗。玻利维亚已丧失主动性；纳纳瓦仍然坚守着；疾病和伤亡已把汉斯·孔特的兵力减少到大约三万人，玻利维亚征召三十岁刚过的男子入伍。阿根廷封锁了皮科马约河边境，这样就妨碍玻利维亚南

① 凯洛公约（Kellogg Pact）：1928年，美、英、法、德、意、日等十五个国家在巴黎签订的非战公约，此后又有四十八个国家参加。发起人是当时美国国务卿凯洛。——译者

部军用品的运转，而巴拉圭得到了飞机，报复玻利维亚的轰炸。孔特将军不顾这些困难，带领二万五千人从7月6日至9日再一次攻打纳纳瓦。袭击开始，玻利维亚工兵点响了由一条长隧道安放在“要塞岛”下面的地雷。爆炸后尘雨落在前进部队身上达十分钟之久。但巴拉圭人的工事筑得那样好，使两辆敌军坦克、重炮及步兵火力都未能突破。8月，孔特将军转而进攻纳纳瓦以北约十哩的曼努埃尔—冈德拉要塞，又遭失败。原因主要在于埃斯蒂加里维亚上校巧妙的堡垒建筑。由于他的熟练的防卫，9月被任命为准将。

好多月以来，埃斯蒂加里维亚将军在南战场以纳纳瓦为主要基地一直在准备一次反攻。为了支持即将到来的猛攻，储备了大量物资，有来自国外的，有来自缴获玻军和军需品临时堆集处的。这次猛攻开始于10月23日，沿着一条七十公里的战线，兵力约二万五千人。在冈德拉要塞指挥的拉斐尔·弗朗哥中校以第一步兵师攻打玻利维亚的左翼；纳纳瓦指挥官路易斯·伊尔拉萨瓦尔上校以第三军团的另一支部队进攻玻利维亚右翼；军区司令官托雷亚尼·维拉率一师人留作后备。巴拉

圭军队以密集的乱丛棵子为掩护，从丛林中劈开通路，在玻利维亚几个据点的后面出现。1933年12月12日，阿利瓦塔、马萨马克莱与萨维德拉都落到巴拉圭人手里，俘获玻军八千人和相当数量的设备与军需品，俘虏中有许多穿着美国军服。那些军服引起太多的人一下得出个愚蠢的结论：美国必定在装备玻利维亚人。他们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剩余物资由各国和私商卖给了愿意要的任何国家。人们可以同样下结论说，大不列颠在支持玻利维亚，只是因为伦敦的维克斯—阿姆斯特朗公司卖给了那个国家大量的军需品。

那个“指挥战争之拙劣足以比得上一个威廉二世”[①]的汉斯·孔特将军到此完事。当灾难眼看就要临头时，玻利维亚人恩里克·佩尼亚兰达将军接手指挥玻军。两个师已被歼灭，只剩下一个师保卫穆尼奥斯要塞。幸好，在泛美会议于蒙得维的亚开会的同时，国联查科委员会于12月19日安排

① 威廉二世（William Ⅱ，1859—1941）：德意志帝国皇帝（在位期间1888—1918），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协约国所战败。——译者

了一次停战，暂时救了佩尼亚兰达。1934年1月8日战争恢复，埃斯蒂加里维亚开始猛攻皮科马约河上游远处的巴利维安要塞，当时玻利维亚人尽快地朝那方面退却。在蒙特斯镇东南一百三十哩的巴利维安，佩尼亚兰达出色地站住了脚。从3月到7月，在那里发生了这次战争中最猛烈的一场战斗，比在纳纳瓦的战斗还要厉害。巴拉圭百折不挠的猛袭，好几次突破坚强的玻利维亚防线。巴利维安战役正在进行时，其他巴拉圭兵力在他们流动线的北端向西扫荡。到9月末，几乎截断了蒙特斯镇（那是玻利维亚设在皮科马约河畔的总司令部），并有侵入到完全处在有争议地区以前的油田区的危险。1932年6月15日以来巴拉圭已经夺得了二万平方哩，代价是每一平方哩约有三个玻利维亚人和两个巴拉圭人死亡。

1934年7月和8月有某些迹象表明巴拉圭的时运可能被迫很快地变坏。在战线的南端，第三军团被阻于巴利维安，第二军团在玻利维亚人不断出击下正从卡朗达特退下来；同时第一军团在北端未到达帕拉皮蒂河就退却了。这时候，埃斯蒂加里维亚仅有二万一千人左右对付估计有五万的敌

人(或许太高了)，并且要在一条显然超过二百哩的战线上布置兵员。他在玻利维亚的戴维·托罗上校计陷第二军团失败后，重新集结皮奎瓦南北的第一、第二军团，然后恢复进攻。第一军团先攻打北部，并在11月9日至16日战役中在埃尔卡尔门获胜，俘七千人。11月17日巴利维安陷落，十一天后萨拉曼卡总统辞职。

12月中旬巴拉圭人又进至能达到帕拉皮蒂河和油田的地方。这时玻利维亚下令总动员，男少年和老头子都被征召入伍。何塞·路易斯·特哈达·索尔萨诺总统希望建立一支十万人的军队来继续这场无益的斗争。当时玻利维亚作者们轻信他们的力量即将处于时运的转折而巴拉圭人的一系列胜利已经到了尽头。

的确，这是止住巴拉圭的时候了。由于皮科马约河是斜行的，巴利维安的攻陷大大地缩短了战线，使埃斯蒂加里维亚能集中越来越多的人攻打蒙特斯镇和油区。1935年1月16日进一步的推进把他的部队带到了帕拉皮蒂河，使他们可以切断从蒙特斯镇北至博威贝的道路。国际联盟以取消武器禁运相迫，在想象中这对交战国双方都是有

效的。2月23日巴拉圭就宣告退出那个不起作用的世界组织。智利和阿根廷分别袒护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开始相互侧目而视。就连智利伟大的史学家兼外交家阿古斯丁·埃德华尔斯也宣称阿根廷一直在延长战争。

南美中立国家变得越来越不安时，玻利维亚人在2月守住蒙特斯镇并开始把巴拉圭人从帕拉皮蒂河赶回去。战线延长、运输困难，加上一个觉醒的玻利维亚阻止了埃斯蒂加里维亚的大步推进。安赫尔·罗德里格斯将军谦虚地声称自己是蒙特斯镇的拯救者。艰苦的战斗过去了，1935年6月12日签订了一项休战协定，两天后生效。

为什么以前制止战争的努力都如此不幸地失败了呢？回答是亚松森和拉巴斯政治上的顽梗要负责。有些讥诮的观察家坚持：阿根廷不希望结束战争，除非巴拉圭赢得了查科。另外的人指出，美国使国际联盟的每一项努力归于无效。诚然，美国宁愿看到泛美体系而不是国联在控制，但这和那种不管谁来调解都积极反对的态度是大不相同的。国联查科委员会曾经成功地达成一次从1933年12月19日到1934年1月8日的休战协议。国联

除了发表谈话和表示极大的诚意之外不能提供什么，而且没有一桩是有效的。当巴拉圭退出国联时，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巴西、美国正聚集在调解委员会，在那里达成了6月休战协定。玻利维亚的罗塔斯·埃吉诺引了一个未指名的中立国军事观察家的话说“达成一个协定是绝对必要的，尤其是停止战争，这不仅是为了避免一场巴拉圭的灾难，而且也是为了避免巴拉圭内部政治力量的毁灭”。这种说法在亚松森是不能博得喝采的，在那里报纸毫无一点灾难临头的暗示。玻利维亚的高级指挥十分期望赢得一个光荣的胜利是真的；但三年的行动使人几乎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期望巴拉圭富于作战经验的师团会响应一个外国观察家的意见而分裂。

玻利维亚外交部长托马斯·曼努埃尔·埃利奥博士在5月里以为休战和约会在里约热内卢商定。赫图略·巴尔加斯本来可以担任监督休战的和平使者这个角色的。但曾发起反战公约与凯洛公约相竞争的阿根廷的卡洛斯·萨维德拉·拉马斯一直在为取得这个角色作准备。智利外长建议布宜诺斯艾利斯为调解会议的天然地点；阿根廷

驻美公使敦促科德尔·赫尔[1]抑制巴西的野心。这许多手段，据罗塔斯·埃吉诺说，都成功了。埃利奥博士，前总统包蒂斯塔·萨维德拉博士和博学的卡洛斯·卡尔沃博士，和一般的专家们一起，去的不是里约热内卢而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埃利奥作为1933年对立方面的代表，曾非难阿根廷对玻利维亚不友好；他还一向赞成国联作为适当的调解人。

休战和约结束了战争状态，并规定军队各自撤到中立国军事委员会指定的防线；召开一个和会，通过直接谈判来解决所有争端；如这些谈判失败，争端由仲裁解决。这样，就由巴拉圭暂时占有它的征服地，没人设想巴拉圭会不抓住机会去巩固和加强那些阵地的。阿根廷的罗多尔福·马丁内斯·皮塔将军领导中立国军事委员会，委员会熟练又极端耐心地进行它的细致工作。其主要工作是安排遣送俘虏回国和说服军队从他们进占的地点后撤。偏袒一方，就受到另一方的责难，委员

① 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译者

会是否公平就从这些责难中看出来。由于巴拉圭人保持着对蒙特斯镇到博威贝公路的控制，玻利维亚人特别感到愤慨。

当中立国和交战国正式代表为一项和约而操劳时，查科地区有好多个月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1936年8月25日玻利维亚和巴拉圭最后同意重建外交关系，埃利奥博士还把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鹰大十字勋章赠给了萨维德拉·拉马斯。进一步的谈判最后导致1938年7月21日的条约。边界公断在确定的界线内，让巴拉圭取得大部分征服地。总统、外长、中立国和交战国代表都出席了签字仪式。那是个幸福的时刻，人们可以期望“如此英勇地洒下的热血……不会白流”。阿根廷总统罗伯托·M·奥尔蒂斯博士说：“美洲以至全世界都知道，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的战士带着史诗式的英雄主义而战，但不带着怨恨或复仇的欲望。”英雄主义，是的；但从来没有人打仗不带着怨恨。让好听的字眼落在查科未曾埋葬的尸体上吧——它现在既不能对人有什么好处，也不能使那些在一次历史上最愚蠢的战争中死去的成千上万的人复活。

第十九章
新巴拉圭

查科战争后的十年，是政治混乱的十年，这种混乱是由社会不安所引起的。自由党虽然执政多年，但不能解决日益强烈要求解决的迫切问题。自由党虽曾带给人们以形式上的民主，但他们是寡头政治，而不是一个平民的政党，并且受到党派斗争的损害。普通的巴拉圭人对政府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也找不到机会实施他们所要求的改革。明理的人都不会否认改革的必要，绝大部分的土地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生活水平太低；公共福利事业极不充分；劳动条件，特别在耶尔巴园里，十分恶劣；教育制度可能是南美最差的；再或许，这个国家受到"强大的经济利益集团的重压"的损害，它们拿走的远比贡献的多。还有其他种种怨言。但这些足以从反面表明普通人所要求的是什么。

谁有解决巴拉圭问题的方案呢？"外国利益

集团”会允许任何激烈的政治经济变革吗？一个不安定的民族能长期保持平静等待什么方案发挥作用吗？1936年2月拉斐尔·弗朗哥尝试当一当总统，可是1937年8月就被赶下了台。于是自由党人再次掌权，由费利克斯·派瓦博士上台，但也是换汤不换药。两年以后，自由党让埃斯蒂加里维亚当总统；这个军人宣布一种新型的国家政权，力图使新要求和旧形式协调起来，后因死于飞机失事，他的恢复国家活力的雄伟计划没有来得及实现。这就使伊希尼奥·莫里尼戈当了权，这个查科第三号英雄任最高行政首脑四年，他也许是镇压巴拉圭军事暴动的从未有过的最狡猾的政客。

巴拉圭想要逃避在世界和拉丁美洲起作用的势力对它的影响，那是奢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巴拉圭的邻国处在纷乱中，有的在政治两极之间犹豫不决，有的明确地倒向一边。阿根廷发生过一次革命，除掉了伊波利托·伊里戈延，换上了阿古斯丁·P·胡斯托将军，他一直任职到1938年，然后让位于罗伯托·M·奥尔蒂斯博士，一个真正的民主党人，其健康不佳是阿根廷的不幸。1940年拉蒙·S·卡斯蒂略博士以代理总统名义接任时，阿

根廷倾向于某种形式的又土又洋的极权主义，就更加明显了。到1943年6月4日阿图罗·劳松将军领导一次暴动，最终成立了一个由精力充沛的上校胡安·多明戈·庇隆——一个身穿摩登服装的军事领袖指挥的新“政权”，这时，这种倾向就清楚得再不容忽视了。巴西也有自己的麻烦。赫图略·巴尔加斯竭力为一个人为的社团国家鼓吹。玻利维亚的政治更是一团糟，意大利的、德国的极权制度在那里有很多崇拜者。人们还不应该忘记，“新政”[①] 和政府管制、公共工程规划，对许多拉美人来说，倒似乎适合于国家社会主义或类似国家社会主义的一般计划。巴拉圭青年有个易于动员的查科退伍军人组成的军团，他们考虑这些东西。如果它们对阿根廷、巴西、美国是可取的，为什么不能用于巴拉圭呢？

同政治思想体系密切相关的是，在许多国家里显现的新的经济国家主义。这个运动采取各种形式：更加强调移民、工业化、剥夺外国财产、由中

① 新政(New Deal)：指美国总统罗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1933年起采取的一系列应付经济危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措施。——译者

央政府投资兴办的大规模企业、农业的扩展以及种种辅助性事业的发展，如社会福利计划和成人教育。经济国家主义是拉丁美洲史上扎根较深的一棵树苗，但由于长期处于不利的气候下，它的躯干发育受到阻碍。在大萧条的激励下，经济国家主义在许多国家迅速成长。在巴拉圭，弗朗哥、埃斯蒂加里维亚、莫里尼戈的政府都试图在一个超国家主义的政权庇护下将它培育起来，而没有获得显著成功。政治家和哲学家宣告，这个国家就是“新巴拉圭”。

胡安·斯特法尼奇博士，也许比任何当代的巴拉圭人要突出，曾试图解释自己称之为“新巴拉圭”的哲学基础。他的修养和经历，以教学、写作与政治才能著名，使他有资格充当由弗朗哥和他的二月党人于1936年开始的革命的哲学家这样一个杰出角色。如果有人能解释二月党人的民主观点的话，那便是斯特法尼奇，他在《新世界》和《新巴拉圭》两本书中这样做了。这两本书分别出版于1941年与1943年，是二月党人运动的辩护词和解说。

斯特法尼奇有一套自己认为适合巴拉圭需要

的社会哲学，它是从各种源泉来的。他是个坚定不移的理想家和严肃的实际家的特殊结合，首先是个理想家。他写道："我们对思想的力量和对思维的创造能力具有信念，我们相信精神的丰富臆想和对生命的乐观看法，相信个人的努力和集体的行动，我们把崇高地位给予不屈服的意志，给予不凋败的希望，给予那以可爱的形象照亮人类生存道路的理想。"他想象一个正义的新世界可能从混乱、悲剧、死亡与悲哀中产生，他要求一种会保持过去的胜利而又超过 1789 年的理论家的新民主，一种同"世界节奏"相谐调的民主。

这都是在1940年 9 月写的。斯特法尼奇在向前看也向后看。两个月之后，他回忆1936年 2 月17日"开始了国家生活的一个新时代"。巴拉圭已再次响应天命的召唤，对和平会占优势的、新的、较好的世界做出贡献。"一次政治、社会、历史变革的伟大运动的黎明钟声给国家打开了新境界"。人们怀疑，斯特法尼奇在考虑一种由当时某统治派别所解释的新民主，在这种民主内，为使社会改革的完成不受阻碍，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和个人的一切自由皆须服从于国家利益。那可能是极权主义。

换句话说，那不正是独裁主义吗？

这种新思想体系为巴拉圭思想家所接受是有个过程的。有些事件虽然在发生时看来只对有限的参加者有意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重要性就逐渐增加。在建国百年纪念的前夕，巴拉圭正处于动乱时期，理想得不到实现，历历在目的诺言得不到履行。这都使五个青年思想家激动不安。1911年5月14日是他们无视当代独裁政治的极重要的日子，这些年轻人签订了一项盟约要为公共事业献身。1911年这个自由团体是五个人，1912年成为十二人，决定出版一种独立的报纸，致力于民族复兴事业。到1925年它已有一百人，他们确定了一个“道德的、政治的、社会的挽救”纲领。他们创办《民族报》，宣传他们的观点。到1928年他们又由一百人发展到一千人，信徒来自知识阶层。“国家独立同盟”出现了，它不是个政党，而是为将来准备的一个“给‘民主’以新方针和新认识”的协会。斯特法尼奇相信，在1931年巴拉圭完成伟大的民主转变而不牺牲公众自由的时刻已经到来。国家必须统一，自相残杀的争斗必须停止，外国敌人必须击退，外国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必须反对。1931

年10月23日斯特法尼奇、阿德里亚诺·伊拉拉与“国家独立同盟”的其他成员鼓动一次“学生”示威，遭到失败，并造成几人死亡。以后斯特法尼奇企图组织包括反对派记者、学生领袖与工人的“国家阵线”未成功。接着，查科战争来临，阿德里亚诺·伊拉拉以及那么多的人死于战争，但“新民主主义者”并没有忘记他们。

查科战争为人民做了巨大的贡献；它“是革命的伟大试验场。它使国家的全部力量开动起来，赋予集体力量以特殊的意义，组织物质资源，唤起这个民族蕴藏得最深的道德和精神潜力，转移所有内地的大量居民，灌输给他们一种团结与力量的强烈感情，给他们……对自身力量的信念和公民的勇气去面对未来”。斯特法尼奇说，在战场上，政治上的党派性消失了，在那里，这都似乎太愚蠢，在那里，新巴拉圭成熟了。当思想力量在流血的战斗中成熟之前，旧政体在1936年二月革命中“象烂了的果实一样掉了下来”。虽然新人物——拉斐尔·弗朗哥的追随者，没有宣言，没有纲领，但他们是有力量的、现实的。据称是这样，在不到两年内，二月党人在经济和行政事务方面重新

建立了秩序。但是他们建成了吗？巴拉圭为“新时代”准备好了吗？

新巴拉圭有个意识形态上的酝酿过程。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纳粹主义与旧的党派竞相争流。含糊不清、唱高调是不够的；二月党人忽视了事先采取一个明确的纲领以补充他们的哲学；应该做什么，在这上面恰好没有统一起来，但弗朗哥宣称，新巴拉圭将是一个根据新宪法建立的、有益于人民的自然的民主，一种“代议制的、职能的”民主。“国家革命同盟”正式出现于1936年11月15日，采用了一个为有势力的“全国退伍军人协会”所认可的宣言。这时旧的“国家独立同盟”任务完毕，自行消亡了。

为什么强调“新”民主呢？斯特法尼奇检查旧的根据发现缺少些东西。人是自由的，人是社会的。还有什么？人是协同的，不可分割地彼此结合在一起。这个协同(solidaridad)的条件——团结和利害一致，“是政治、社会秩序的新原则和新的起调节功能的真理。它是新民主的脊柱”。也许，谁接受这个定义，谁就是二月党人；但是，斯特法尼奇的思想有更多的东西值得政治哲学家认真研究

的。总之，人们可以说（也许这样说对一个杰出的思想家是不公正的），“协同的民主”是力求吸取个人主义的民主政治、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精华，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构成对美洲现实有效、又能适应复杂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一种政治哲学。或许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二月党人的行动看起来好象极权主义。

巴拉圭在查科战争中的损失加深了国家的经济萧条和增加了国内的不满。军队的领导者，“新民主”的信徒们，反对欧塞维奥·阿亚拉对玻利维亚谈判的处理，和他根深蒂固的民主偏见——这按二月党人的观念是一种时代错误。作为一个自由党人，阿亚拉对外国公司的代理人也是友好的，这是大多数自由党领导人的一个特点，他们十分乐于让巴拉圭继续作为阿根廷政治的、经济的殖民地。查科战争的英雄拉斐尔·弗朗哥上校在三百名军官和四万名退伍军人的支持下，利用不满，于1936年2月17日推翻阿亚拉。而阿亚拉仅在十一天之前刚把弗朗哥流放，说他是个共产党人！二月党人举行暴动取得胜利时弗朗哥不在，但他回来掌权并没有什么麻烦。虽然这次暴动广泛地被

看作是军队拒绝接受由阿亚拉谈判商定的查科休战，可是弗朗哥2月19日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前向代表们保证，他的政权将尊重已经达成的协定。

弗朗哥受到不满现状的压力集团的支持，他们为他沿着极权主义的路线努力创造一个新国家而欢呼。大学学生、查科退伍军人、劳工领袖，还有一大部分武装力量把他看成是一个果断的政治家，会结束自由党对祖国的“背叛”。弗朗哥究竟要干什么是很难说的。他谈论社团国家，停止政治自由，为军队动员新兵，反对外国资本，命令他的国家劳工局关心劳资纠纷。显而易见，“国家革命同盟”走到哪里都和它的“新民主”紧密地连在一起，活象对流行的法西斯主义的拙劣仿效。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这个果断的人物可以作为巴拉圭军国主义的象征，而弗朗哥却竭力把他当作一个民族英雄，这里就有某些不祥之兆。他完成了由洛佩斯开始兴建的万神殿，而把这个暴君的尸骨供奉在中厅。

弗朗哥又一次使阳台闻名起来。1936年2月24日，他站在政府大楼的阳台上宣告了一个新时代，宣告恢复在独裁统治下尽人皆知的荣耀——

巴拉圭又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他的意图在3月10日的法令中更加清楚了，这个法令所建立的不是一个极权国家就是一个独裁国家。在新巴拉圭，“解放的革命”和国家是一个东西，二月党以外的所有政治活动被禁止一年，所有劳资纠纷必须由内政部长加以解决。2月18日报纸曾被扣留，以便设立新闻检查制度，对出版自由的这一箝制，因禁止任何人在报刊讨论极权法令变得更紧了。最后，看来“查科退伍军人协会”和“全国学生联盟”对驱逐外国资本出境可能有他们自己的办法。然而，弗朗哥的目标未能得到所有退伍军人的充分同意。埃斯蒂加里维亚将军的朋友们，放逐的和在家的，于5月策划起义，但弗朗哥行动很快，暂时保住了他的地位。新的一批自由党人——未来的起义领袖，在官方的要求下，离境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为防止起义而被监禁的欧塞维奥·阿亚拉和埃斯蒂加里维亚将军，获释后不久便与他们会合一起。

二月党人认识到和巴拉圭邻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必要，决定支持大陆政策。1936年12月外交部长斯特法尼奇博士参加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查科会议

和美洲维护和平会议。他寻求和阿根廷改善商业关系,并于12月31日签订一项协定,规定由一个阿根廷一巴拉圭委员会来研究相互间的问题,推荐改善贸易往来的途径。可是两国政治上的变化使这项工作归于无效。1937年1月斯特法尼奇到蒙得维的亚签订一个类似的协定,驻里约热内卢巴拉圭公使伊西德罗·拉米雷斯博士4月和巴西签订第三个协定。这三个基本协定为二月党人希望借以恢复巴拉圭经济、增进大陆内部贸易的贸易和政治关系,预示了光明的前景。

对查科停战的不满被人利用来发起一个短命的“新时代”;而对和平谈判的不满却致它于死命。战争结束时,巴拉圭军队控制了从蒙特斯镇到博威贝的公路。1937年1月9日,弗朗哥依照中立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同意从这条公路撤军。不幸的是,他曾竭力使人相信,阿亚拉的休战签字阻止了巨大的军事胜利。同样的说法也在玻利维亚造成叛乱,它在两个国家已被利用到这种程度,以致没有哪一方敢在确定的和约上签字。1937年6月弗朗哥命令军队从公路撤退;斯特法尼奇博士在亚松森一家戏院讲话三个小时,解释为什么撤退是

必要的，为什么这并不破坏弗朗哥的诺言，但没有效果。

这道命令造成弗朗哥的垮台。查科指挥官们拒绝服从总统，1937年8月13日拉蒙·帕雷德斯中校实行军事政变，迫使弗朗哥内阁辞职。实行这一政变（它仅使弗朗哥苟延在位两天）是为了“重新贯彻1936年2月的理想”，同时也清楚地显示出在不远的未来这个国家将为一个军官集团控制。谁控制这些军官呢？也许是自由党人，而自由党人又控制在阴险的外国势力手里。斯特法尼奇博士把这次叛乱称为国家的耻辱，说叛乱政府愚蠢之极。叛乱者肯定不是二月党人，然而他们可能企图大讲特讲“二月”理想以赢得支持。8月15日国民大学法学院院长费利克斯·派瓦博士取代弗朗哥。派瓦是一个可利用的人。他第一次作为代理总统是在1920年，当时本是副总统，因爱德华多·沙埃尔埃尔的追随者背叛了曼努埃尔·冈德拉总统而暂时执政。

为什么弗朗哥失败了呢？外国观察家们把他的下台归之于缺少群众的支持。他关于土地和较好的社会条件的诺言没有实现，因为他不敢没收

外国持有地，特别是阿根廷的持有地，以分配给无地的人。1936年5月他签署了一项法令授权政府征用五百万英亩未开垦土地，以证券偿付，分成二十五至二百五十英亩的小块，卖给农民。“泛美联盟”的《公报》发表，到8月有一万五千户已获得土地，年末有一万户已定居在二十万七千零四十八英亩土地上。这确是个极好的开端，但在一个外国资本和在经济利益上要求维持现状的少数上层阶级联合统治的国家里，国家社会主义是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实现的。一个为显贵、为外国利益所接受的所谓独裁者可能维持住几年；没有这种支持，任何标记的独裁都不能成功，不管人们叫它“协同的民主”还是别的什么。

派瓦的暂时统治未能使查科战争退伍军人、大学学生与军队中的一些派系满足。他们责难推翻弗朗哥是自由党恢复权力的一个策略，而人所共知，自由党的领袖是和外国利益紧密地打成一片的。弗朗哥不能将国家社会主义带给巴拉圭了；他的支持者决心不让自由党人永久保持旧日的控制。显而易见，因为这个理由，1937年9月7日在胡利奥·哈拉中校和费德里科·维德尔·史密斯

上校领导下发生一次反叛乱。他们要求派瓦辞职、弗朗哥复职。夜间亚松森不时发生战斗，后来派瓦的支持者撵走叛乱者；弗朗哥上校乘飞机进入亚松森而后又退出来。他的二月党的追随者并未停止策划。无政府状态必须中止，但不能在二月党人获得控制权之前。不到两个月后，11月2日，亚松森实行戒严以应付发生于上游远处康塞普西翁的军事暴动。在首都也有一个团叛变，但查科师团仍然效忠政府，暴乱昙花一现，以失败告终。

埃斯蒂加里维亚将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圣保罗、蒙得维的亚受到殷勤款待时，似乎远离了巴拉圭的政治纠纷。他从1937年4月起到1938年2月住在乌拉圭首都，执教于高级军事学院。1937年8月，反弗朗哥势力的领袖们发去电报邀请他从流放中归来。1938年2月9日这个著名的军人在亚松森上岸时，受到胡安·辛福里亚诺·博加林大主教所组织的盛大欢迎。热情的巴拉圭退伍军人、大学生、军事学校学生以及老百姓共五万人集合起来，向打败玻利维亚的胜利缔造者致敬。

派瓦总统授予英雄出使华盛顿的职位，埃斯

蒂加里维亚接受了。巴勃罗·马克斯·因斯弗兰博士，一个杰出的自由党政治家兼语言学家，和他一同前往。他这一任务曾因1938年7月21日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签订对玻利维亚和约而中断，事毕返任，完成了一项用于修建亚松森—卡瓜苏公路及其他用途的美国贷款谈判。

费利克斯·派瓦政府以两件重要成就著名：一是在混乱时期获得一次暂息机会，一是与玻利维亚媾和。埃斯蒂加里维亚在塞西略·巴埃斯的要求下出任巴拉圭代表团团长。他了解和玻利维亚达成明确协议的利益所在，尽管在亚松森肯定要出现反对者，他毫不迟疑地在条约上签了字。这个决定使条约免蹈覆辙而得救。公民投票以十三万五千三百八十五比一万三千二百零四的票数批准了这个条约。

埃斯蒂加里维亚在华盛顿时，成了自由党的总统候选人，路易斯·A·里亚尔特为他的竞选副手。他是个名孚众望、没有反对的被提名者。他乘阿根廷军舰回亚松森参加就职典礼时，整个首都好象都等着欢迎他。他于1939年8月15日就职，许诺一个力图接受二月党人某些理想的比较自由的

统治。

四年内出现的第二个新时代几乎没有持续到就职周年。不协调的因素太多，难以把它们捏合到一个合作的、和平的社会中去。红党自从1931年以来一直在进行政治抵制，拒绝参加实质上是自由党的内阁和议会。学生罢课，反对党的恶意逼迫，二月党人的多次阴谋，搅乱了这个国家。弗朗哥关于新巴拉圭的讲话，曾唤起或曾利用那长期为殖民剥削所压制、所沉溺的成千上万人要求改善生活的潜在希望。这个国家的新局面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已开始，要是没有查科战争，或许在1936年二月党人上台以前就出现了。埃斯蒂加里维亚感到自己必须去领导、去左右这汹涌澎湃的时代精神，以避免无政府状态，即使这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意味着背弃自由党人迁就二月党人。

1940年2月18日——曾成为有利于采行新政策的月份——埃斯蒂加里维亚总统发出一项宣言。他尽力恢复1870年的政治宪章，报纸享受了无限制的自由，反对党受到了鼓励，政府还制定了一个“在从未设想过的范围内对国民经济极为重要

的"公共工程规划。为确立法治的理想经过半年的努力无效，现在，国家已趋于无政府状态的边缘。"巴拉圭人为怨恨所分裂。对大宪章、法律和权威的尊重已被丢到一边"。为防止危及国家的前途，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1870年的个人主义民主业已完成它的使命"。现在必须取得社会和经济的民主。政治上的对抗必须结束，将召集国民会议制定宪法"以应（人民的）需要和他们的民主理想"。因此，总统宣布："鉴于议会集体辞职（2月17日），基于我以虔诚信念效忠国家的态度，为一个忠诚的军人和公民的良心所驱使，并寻求全能的上帝对我的行为的支持，从即日起，在为保证巴拉圭的国家秩序与稳定的和平、为保证它的伟大与繁荣所必要的时间内，我承担起政治权力的全部责任。"

总统的言词是高尚的、诚恳的，没有这类声明中通常见到的虚伪。对显要的人物没有人权剥夺，对法庭和大学没有干涉。政治对抗必须停止，但内阁将代表广泛的意见。胡斯托·帕斯托尔·贝尼特斯写道："2月18日的运动不是向权力统治倒退的一步，而是一个插曲，一种制止混乱的手段，是不但值得军队支持而且值得国家绝大多数代表

人物支持的一次法律地位的修正。”埃斯蒂加里维亚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使国家沿着新途径走向繁荣。他要做全体人民的总统，不当少数受惠者的喉舌。

作为临时独裁者，埃斯蒂加里维亚行动起来精力充沛。新宪法在制定时他让大学开学，让共和国银行复业，兴办公共工程，加强垦殖局，为偿还短期公债提供资金，改进市政管理。这些措施和弗朗哥的政策很相似，赢得所有阶级，特别是工人的支持。3月1日起生效的土地法规定征用土地，巴拉圭人每户给一小块土地。垦殖局接收恩卡纳西翁区被弃置的土地十七万八千英亩，分给一千八百户。埃斯蒂加里维亚还仿效弗朗哥，于1940年6月发布一项法令箝制出版物。法令宣称，出版物的绝对自由乃是少年心理的特征。

不大爱批评的人可能容易接受这个统治制度的合作者贝尼特斯赞扬的话：“从来没有比埃斯蒂加里维亚更高大的美洲巴拉圭人了。”他是美洲人，不在于如伟大的北方共和国政治家那个意义上的，而在于他超然不偏的爱国主义，毫不自私的献身于巴拉圭，他的忠实和正直。他懂得“总统座

椅下常有炸弹”，但这个认识只激起他把政务处理得更加正规，甚至不惜以自由为代价。关于巴拉圭他有许多宏伟的计划，如果再多统治几个月，这些计划也许就会付诸实施。国家需要木材以外的燃料、关税协定、较低的运输费用、一个现代的公路系统、一个较好的货币本位、一支商船队、一条通往巴西的铁路、一条横过查科到玻利维亚油田的油管。埃斯蒂加里维亚计划了这些事项；大部分由伊希尼奥·莫里尼戈去完成它们。

埃斯蒂加里维亚政府是独裁制，其方针趋于极权体系。对莫里尼戈的“恐怖统治”人们曾给以这么多的强调，而往往忘记了它发端于埃斯蒂加里维亚，是他保护了法西斯团体。学生卡利斯托·博加多的经历可作为一个典型例子。他1940年7月18日为秘密警察所逮捕，被阿德里亚诺·克维多虐打、拷问三天。尔后他和八个工人被送到培尼亚埃尔莫萨，在那里，几百个人很快享受到埃斯蒂加里维亚德政的恩典。1941年1月博加多获得自由，当时已病得不堪再从事反法西斯工作了。此后，秘密警察定期地找他，最后将他流放。

埃斯蒂加里维亚以他的冲淡的“协同的民主”

的商标，利用出版物、群众集会、无线电及其他宣传工具来教导人民。这类宣传的代表作是何塞·安东尼奥·佩雷斯·埃齐古伦的短文和演说，以《巴拉圭革命的轮廓与范畴》出版，书中把埃斯蒂加里维亚和二月党人等同起来。国内的紊乱必须停止以容许进步；政治形式必须改变以适应新的条件；强调个人主义的十九世纪民主必须让位于新民主。在这里，国家对政治、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干预。在巴拉圭，真正的革命已经发生；国家已经再生，在国家新的生活中个人私利必须服从于国家利益，埃斯蒂加里维亚正把巴拉圭引向一个文化、面包、自由与正义归于全体的壮丽的未来。这一切不是经过极权国家，而是经过强有力的全民国家去达到。革命不是一个纯粹的插曲，而是一个主要的阶段，它开始于2月18日，不到巴拉圭完全改造好是不能结束的。立宪体制要准备。这个宣传肯定是官方的，而且预先透露了以埃斯蒂加里维亚的名义发表的、和副本装订在一起的1940年宪法的序言的内容。

1870年宪法规定的政府体制，在解决问题和应付紧急情况方面太迟钝了。埃斯蒂加里维亚宣

布："目前的改革更多地涉及到组织，而不是内容；我们将继续是一个和我们传统一致的、代议制的民主共和国。" 新宪法的目标不是一个极权国家，而是一个臻于完备的民主政体。"巴拉圭需要一个本国化的宪法，但不是贬低'费拉德尔非亚宪法'[①]和1853年阿根廷宪法所包含的、以及由于一场大灾难而为我国1870年宪法所采纳的美洲民主的基本原则……新宪法授予政府以更大的职权，服从于普遍的利益，而不是有利于自然人或法人、政党或社会的任何阶级。它寻求坚强的执行权，而非专制的执行权；所负的责任越大，给予其实现这一责任的机会必须越充分"。现代国家决不能是个单纯的警察，而是调节和保卫社会的一种工具。经济利益、阶级冲突、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需要一个坚强的、有效率的、受尊重的行政部门。现在的政权必须负责任，"当问题敲政府的门要求解决时"，往往没有时间去考虑。因此，议会必须是立法的合作者，而不是难以驾御的、反应迟钝的政治论坛。司

---

① 费拉德尔非亚宪法（Constitution of Philadelphia）：指美国独立后，1787年在费城通过的宪法。——译者

法部门将继续它的历史作用，只需很少的变更；商法和民法需要注意；法庭必须是保障个人权利的不偏不倚的场所。旧议会是不实在的：参议院仅是另一个人数减少了的众议院，不象在联邦共和国是个州代表团体。为了在议院有个制动器，设立国务委员会(Council of State)作为立法、行政部门的居间人。在旧制度下选举太多，引起混乱的刺激物也太多，这就产生"一个职业政客阶级，他们决不是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政治家"。新文件规定，五年进行一次普选，以防止暴政。它保护人的传统自由，但不把自由置于社会之上；它不象在一个专制国家那样，压制传统自由，而是对自由加以改进，以免陷于无政府状态。在巴拉圭这样的国家里，个人进取心必须受到约束。"对政治组织必须给以新的方向。有必要以更新的职能分工理论来代替权力绝对均衡的古典理论，对上一世纪宪法论者如此珍爱的制约与平衡之说不要抱偏袒之见"。

巴拉圭的新宪法是埃斯蒂加里维亚和以塞西略·巴埃斯为首的法律学者委员会艰苦工作的结果。试图在文件中只包含概括的权力，在基本骨架上补充具体内容的任务适当地留给普通法。陆海

军领袖、部长会议、社会知名人士在1940年7月10日文件公布前就予以承认。8月4日的公民投票有十六万人以上赞成这宪章，十一天后举行仪式正式颁布。这个压倒多数的赞成票表明对埃斯蒂加里维亚的拥戴甚于对文件本身的承认。

1940年宪法使巴拉圭的根本法起了激烈的变化。议会是一院制，每二万五千个公民选出一名代表，每年开会一次。国务委员会由行政各部部长、大学校长、巴拉圭大主教、一名商业代表、两名农业代表、一名加工工业代表、共和国银行总裁与两名退休军官所组成。实际上它是一个官方的、起咨询作用的“智囊团”。经济活动，从企业家到工人，都要受到严格的控制。不再有阶级斗争，不再有垄断，不再有操纵，全体公民指望通过有益的工作谋取生活。有这些自由：“选择职业；工作和从事所有合法的商业和产业，由于考虑国家利益的社会经济理由，(可以)经法律强令限制者不在内；只要是关系全体利益的问题，在出版物上发表他们的意见无须事先审查；处理他们的财产；为合法的目的而结社；自由地信奉任何宗教；学习与教学。”实行普选制，年满十八岁以上的公民都必须参加

选举。

不幸的是，在巴拉圭如在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人们学会了怎样制定宪法，而缺乏实现它的决心。这个文件在埃斯蒂加里维亚统治下究竟怎样起作用的是一件供臆想的事情。命运没有给它机会。

为了在周末得以免除公务的操劳，埃斯蒂加里维亚和他的妻子唐尼亚·胡利娅·米兰达·奎托飞往圣贝纳尔迪诺，到伊帕卡拉伊湖畔 休 息。1940年 9 月 7 日星期六，巴拉圭总统一家准备惯例的短期旅行——十五分钟的飞行。早晨总统和唐尼亚出现在机场时，天空多云，烟雾弥漫，从皮纳斯科港起飞的座机尚在途中，迟迟未到。于是埃斯蒂加里维亚吩咐驾驶员卡尔梅洛·佩拉尔塔少校起飞一架查科战争中幸存的旧飞机。出亚松森几哩，飞机坠毁。由政府颁令，追赠这位查科英雄为埃斯蒂加里维亚元帅，通维利亚里卡的新公路用他的名字命名。唐尼亚·胡利娅和他合葬于国家公墓。

第二十章

莫里尼戈

随门多萨航行的征服者的名册中间，有个名叫“明·德·莫里尼戈”——马丁·德·莫里尼戈的人。这个不出名的人物，在征服中所起的作用肯定决不显著，但他是第一个用上面的名字住在巴拉圭的人。也许他就是继承埃斯蒂加里维亚的那个忠实可靠的军官——伊希尼奥·莫里尼戈的远祖。

1940年5月2日，埃斯蒂加里维亚让莫里尼戈当海军与作战部长，政府中的自由党人或许以为他们能控制得了他。这职位使他控制了当最高行政首脑所必要的支持者，而且这或许是造成任命他作两个月临时总统的原因。莫里尼戈必须小心谨慎地行事。陆军领袖们不满自由党的政策。有些人认为埃斯蒂加里维亚还没有向极权国家走得太远，另有些人则认为他忽视了他们的神圣利益。

军队内外的二月党人正等待时机在国内再显身手，他们相信只有自己才是国家前途所值得信托的人。如果莫里尼戈希望继续当权，就必须在这些人和其他党派之间小心周旋。

内阁风潮几乎立即展开了。四名自由党人部长于9月30日辞职，军人代替了他们，其中拉蒙·帕雷德斯上校起着突出的作用。11月25日帕雷德斯辞职，又一次内阁动荡把另一个陆军集团推到前台。五天后，莫里尼戈攫取政府全部权力，“要一劳永逸地为巴拉圭革命确定方向”。这象是二月党人说话的声音；自由党人当然不听埃斯蒂加里维亚的后继人说出埃斯蒂加里维亚的显灵话，因而反对莫里尼戈这样做。莫里尼戈责罪自由党人在阴谋推翻政府，于12月25日逮捕了其中绝大多数的著名人物，将一百八十人投入监狱，其他的送到培尼亚埃尔莫萨军事监狱。

1941年，有个时期人们怀疑总统能否在军事暴乱一出现时就加以镇压。两个例子足够说明阴谋在国内外不断地进行着。4月18日，二月党人图谋政变失败，莫里尼戈要求乌拉圭政府引渡流亡中的弗朗哥回国。整个内阁辞职，十名陆海军官被

怀疑不忠，失掉职位。在第二次军事暴乱中，皮拉尔驻军企图暴动，在7月4日轻易地被粉碎了。这次暴动显然是由于莫里尼戈将三名以前的反叛领袖送至监狱待审这个行动所引起的。7月26日，独裁者发布一道惩治叛乱者的法令：妄图杀害总统者处以死刑，妄图颠覆政府者判二十五至三十年徒刑，同谋者五至十年徒刑，将不利国家的情报送往国外者判二至四年徒刑，等等。

莫里尼戈就职后不久，自由党领导人纷纷出国。在大量捕人下狱后，1942年5月总统镇压了自由党，6月4日该党最卓越的领袖欧塞维奥·阿亚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流放中去世。独裁者在他的“少年英雄”支持下对国家的统治是不稳的，但是是厉害的。1942年9月29日，他已感到很安全，因而宣布军界朋友坚持要他留任到1948年。据说拉斐尔·弗朗哥上校在蒙得维的亚经营一家肥皂厂，渴望在亚松森用喝马黛茶的芦苇管吹肥皂泡[1]。从蒙得维的亚传来信息，这位二月党领袖希望在特殊的单一候选人选举中投票，这次选举在

① 说他幻想回到亚松森。——译者

1943年1月16日到2月4日的几个周末举行。弗朗哥动身回来参加选举。阿根廷政府在莫里尼戈要求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制止了他。莫里尼戈于1943年8月15日举行任期五年的总统就职典礼，尽管这样，只要有弗朗哥在，就总是有叛乱的可能。莫里尼戈要任满他的任期，希望是很小的。

显然，巴拉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比任何国家都疏远些。没有海洋航运，缺乏必需的战争物资，共和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利益几乎完全是政治上的或意识形态上的。最后，如果说一次大战对巴拉圭经济上有利可图，那也不是因为这国家本身重要，而是因为它碰巧在拉丁美洲。租借法案货物[①] 与美元，它的牛肉罐头、生皮、棉花与破斧木的市场增大，较高的价格和较高的工资，大部分由巴西和美国贷款支付的公共工程规划，还有许多外国委员会，所有这些都带来一种繁荣的气息，这不能不在政治上帮了埃斯蒂加里维亚和莫里尼

---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国会于1941年3月通过租借法案，规定美国对反轴心同盟国提供武器、弹药、战略原料、粮食与其他物资，战后清偿。按此法案提供的货物，称为租借法案货物。——译者

戈的忙。

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巴拉圭至少初步有了价格管制制度，这可以追溯到1936年4月。在弗朗哥总统发布的囊括一切的法令下，所有生活必需品都可以加以管制。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实际上并没有用这权力干过什么，以后才为食品、纺织品、衣著及其他项目定出最高限价。1939年11月的新法令除了扩大法规范围外，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些权力归农业、商业和工业部所有，但直到1941年还很少使用。定量配给、资源分配、输出管制甚至比固定价格还要重要。7、8两月规定了农业上的最低价格，以后最低价格又扩充到其他产品；1月，许多商品的最高价格定在接近市场价格水平，而且时时加以提升以允许合法利润。在亚松森以外的地方，因为实际上没有人民的支持，固定价格很少成功。对肉类输出的需要非常大，因此1942年1月以后，从事饲养的人必须出售他们供家用的牲畜的60%。生活费用不顾政府的管制而急剧地增长。1939年到1941年，价格上涨平稳，接着就陡然增长，到1944年有些商品达到两倍、三倍于战前价格。许多不同身分的美国人来巴拉圭

随便花钱，抬高了房租，到后来亚松森普通房子的租费每月要一百美元。富裕的城市居民生活费用上升300%，贫民的生活费用上升50%。

莫里尼戈应付外国表现得很有手腕，利用它们的相互猜忌和野心进行纵横捭阖。巴西希望增进它在巴拉圭的影响以打破阿根廷的独占，美国图谋离间莫里尼戈和轴心国的亲密关系。独裁者抱定要获利最大，损失最小的态度。1939年用美国的钱修成了从亚松森到维利亚里卡的公路；另一笔贷款是四百万美元，除于1942年完成通往恩卡纳西翁的公路外，剩下的用于其他各种事业。来自巴西的一笔贷款五百万美元用于公共工程的六年计划。幸运的是，除了进出口银行贷款外，没有美元负债；巴拉圭中央铁路运输量的增加正在带来利润；1942年上半年还累积了大约一百万美元的贸易顺差。

1942年的成就不过是1943年将要发生什么事的征兆。莫里尼戈总得想法满足阿根廷的要求，同时按一按它的痛处。阿根廷金融势力通过这些商号，如卡萨多、本赫—博恩、米阿诺维奇、多明戈·巴尔特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弗朗西斯科—门德

斯银行集团，统治着巴拉圭。在约六千万美元的外国投资中，阿根廷足足控制了75%。巴西的主要利益在巨大的马特·拉兰赫伊拉公司，这公司在巴拉圭北部有较大的所有权。总统1月到巴西和赫图略·巴尔加斯商谈。他以开辟圣托斯为自由港区换取圣保罗铁路延长到康塞普西翁的许诺，并提出一项新的贸易与航运条约在这一年更晚的时候签字。然后他旅行美国，不怕他的敌人乘他不在时发动一场叛乱。这次访问的官方记录仍然保密，但据了解，这次商讨了互惠贸易协定，后来，租借法案设备开始运往亚松森，其数量到1945年7月1日共值一百三十八万七千美元。

莫里尼戈访问美国受到较好款待的标志之一，是福德姆大学的欢迎会，那可能是国务院鼓动起来的。该大学校长罗伯特·I·甘农牧师授给莫里尼戈名誉法学博士，并说："作为一个大学，福德姆高兴地在这位新的精力充沛的行政首脑身上看到曾在战场上赢得荣誉的军人的突出典型，而他又重视学识，把促进真正的教育事业作为政府的主要任务；他是一个勇于判断的人，能鉴别可在纳粹德国找到例证的极权国家的可恶弊端（这不是

讽刺吗?),同时又强调树立一个以义务和责任的严肃理想为基础的精神观的必要性。”然后,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约翰·F·奥哈拉主教赞美莫里尼戈统治的精神基本上是耶稣会传教区的精神。这里没有加以评论的必要,但可建议主教更仔细地读一读巴拉圭史,定会从中获得教益的。

财政变革,与玻利维亚达成的协定,进一步增进了巴拉圭的国际地位。政府正力图放弃贬值的纸币比索时,来自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专家研究了巴拉圭的财政。1943年11月7日,“瓜拉尼”成为巴拉圭的货币单位,其最初比值是三点零七瓜拉尼相当一美元,一个瓜拉尼合一百个旧纸币比索。一年以后,采纳联邦储备银行专家的建议,革新共和国银行改名为巴拉圭银行。

为改善与宿敌的关系铺平道路,莫里尼戈于1943年7月在拉巴斯会见恩里克·佩尼亚兰达总统,那时财政变革还在酝酿中。四个月之后,两位总统和他们的参谋长、外交部长为查科战争死者树立一个十字架,然后移到蒙特斯镇会谈,签订了商业协定。特别有意义的一个条款,就是敷设一条油管,把玻利维亚的内陆石油输送到巴拉圭河。

外国贷款和增加收入应该使巴拉圭处于一个有利的财政地位，但国库仍然经常遇到困难。对一个非常贫困的国家来说，预算太大，而且着着上升——1943年约为五百万美元，到1945年增为一千万美元。财政部长胡安·普拉特博士反对1945年预算中军队分得的份额，它达到预算总额二千八百二十七万四千瓜拉尼的37%，沉重的额外费用还不包括在内。参谋长贝尔纳多·阿兰达上校不喜欢听这样的话：在十六万三千个小学适龄儿童中约有七万四千个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一半儿童在第一年末就退学；六分之五儿童上学不超过二年。阿兰达不在乎文盲。“看看国际形势！”他叫喊着。于是普拉特只得卸任。战争阵线——一个政治上有力的军官集团，只要它的领导者能继续当权，对国家发生什么问题则毫不关心。

除了租借法案的援助支持莫里尼戈掌握国家之外，美国在公共卫生方面做出了它的最大贡献。美洲公共卫生组织1944年7月1日在亚松森设办事处，由理查德·J·普龙克特博士主持。这个组织以一笔一百万美元的创办赠款进行工作，建造医院、建立药厂、为饮用水提供过滤设备、安置自

来水总管、组织公共卫生站、还着手公共卫生教育计划。虽有这些贡献，巴拉圭知识分子仍怀疑美国，而它的大使对社会事业的兴趣比保卫政治自由要大。总之形势多少有点使人恼火。法西斯组织很突出，莫里尼戈及其一伙希望得到阿根廷的欢心，这样，不管谁来领导巴拉圭政府，他几乎必定是个独裁者。或许最好的政策是买好——尽管充其量是一笔靠不住的又短命的交易。

甚至这种明显而生硬的迂就也不能解释令人吃惊的巴勃罗·斯塔尼案件。此人是巴拉圭空军头目，一个直言不讳的轴心国同情者。美国官员知道，斯塔尼曾随时以极不友好的态度对待美国专家。约·埃德加·胡佛[1]不喜欢这人的经历，参谋部情报科长知道这个人，国务院也知道。但是，据《美洲杂志》的材料谈，驻亚松森美国陆军使团的约翰·康西丁上校还推荐邀请斯塔尼于1944年秋参观美国飞机工厂。国防部似已同意，但和人们所预料的刚刚相反，科德尔·赫尔的下属反对。尽管

① 约·埃德加·胡佛(John Edgar Hoover，1895—1972)：自1924年起一直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译者

如此，1945年早春斯塔尼作了这次旅行。国务院官员再次说“不同意”——那就是，除了天真的阿弗拉·沃伦而外，都不同意。这样，斯塔尼看了巴拿马运河地带防御工事和飞机工厂，后来约·埃德加·胡佛拒绝对可能发生的事情负任何责任。当问到为什么允许斯塔尼去旅行时，据报道国防部发言人(这是在冠冕堂皇、卑鄙无耻的言词后面隐名匿姓的好办法)对此质问耸耸肩，讲道：“这完全是虚构。”事情必定是有过的，但就这一代和下一代来说，所有的事实都不会重见天日了。

莫里尼戈加入联合国是纯粹的伪善，因为巴拉圭是轴心国同情者兼代理人的一个据点——这是巴拉圭的永久耻辱。1941年12月10日独裁者声明和美国团结一致；1942年1月25日和轴心国“割断”外交关系；1945年2月8日对轴心国宣战；1945年2月14日他的驻美大使在联合国宣言上签字；1945年3月他的代表团在查普尔特佩克条约[1]上签字，该条约包含关于基本人权国际保障的美好

[1] 查普尔特佩克条约(Act of Chapultepec)：1945年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美洲会议在墨西哥城查普尔特佩克举行，订立该条约，并宣布对轴心国宣战。——译者

言词；1945年6月他的代表团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无需乎问莫里尼戈是否愿在美国推荐的任何文件上签字——他似乎时刻准备着一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写的笔。

巴拉圭拥护这半球的协同一致，多少可以用外国对破斧木的控制来解释，那是巴拉圭相当大的收入来源。“美国国际产品公司”和“英国林地、木材与铁路有限公司”有一个卡特尔垄断阿根廷和巴拉圭的破斧木的生产和分配。莫里尼戈通过充分表演，取得租借法案军需品，使他能粉碎罢工和叛乱。使他成为强有力的，足以解散工会，将一千名潜在的领袖关在集中营里；但任何数量的租借法案货物都不能阻止莫里尼戈跟阿根廷的陆军上校们站在一起。

伊希尼奥·莫里尼戈对民主当然有独特的见解。如果人们相信他1940年12月13日的广播演说，那么巴拉圭的另一个新时代正在展开，在这里将没有私利、阴谋、欺诈、煽动行为与传统的巴拉圭权术的地位。他希望出现一个真正的民主：“巴拉圭革命的基本政治信条是国家利益超过个人的贪婪的私利。”他为预期的三年任期所制定的国家纲

领是广泛的、可赞美的，凡是这个国家所需的社会、经济改良都已纳入，很少遗漏。这个三年计划如果实行起来会了不起；但在此计划中传统的民主没有地位。

经两三次叛乱之后，莫里尼戈在1943年6月访问期间对美国国会讲了一些甜言蜜语。他说："法律方面的新理论鼓舞1939年的改革，这次改革寻求宪法与当代潮流相融合，并保证更大的一般公共福利。问题不在放弃迄今为止所遵循的道路另走不同的一条，而在矫正路线，并以合意的方式加快进度，既要避免阻碍又要避免幻想，与当代意识形态相协调地、与其他美洲国家所建立的程序相一致地前进。"作为对独裁的辩护，莫里尼戈的解释是极不充分的。一个月后，他在一家秘鲁报纸上发表的一段话，说的要明白得多："一个绝对的选举的民主，对一个未受过诚实而自由地投票教育的民族来说，是一出滑稽剧。它并不保证政府是为人民的，而只能是为独裁者、煽动家的……我们反对自由主义这个十九世纪的产物，因为它不容许国家进行积极干预以满足人类的需要……为了纠正社会的不公平我们提出干预主义的办法，首先

是在经济领域，特别在劳资关系上。自由主义国家的惯性必须让位于作为保护者和领导者的国家的动力论。”这些叙述清楚地表明莫里尼戈政府向极权主义进展了多远；或许它已接受了斯特法尼奇“协同的民主”的主要教义。

单从签订的文件记录来看，它对这半球的团结一致是有好处的。但是莫里尼戈对所有这些究竟是怎样想的呢？第一任驻巴拉圭美国大使韦斯利·弗罗斯特发现独裁者不愿发表实质性的政见去补充他的口头声明。莫里尼戈，象庇隆那样，为轴心国间谍提供避难所，他保护他们的间谍网，他听取他们的忠告，他拒绝驱逐人所共知的间谍，他鼓励德国人垦殖区和轴心国的宣传对口径，他压制亲同盟国的示威游行，他还煽动反犹太活动。

在巴拉圭的纳粹网是尽人皆知的，而且是重要的，虽然它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分支受到更多的注意。德国冬赈会从德国人、移民与他们的后裔那里聚集了大宗款项，把钱送交卡尔·托马斯，这个能干的家伙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亚松森，使德国银行成为外国人中间的宠儿。1928年当作者遇到他时，卡尔似乎是个好小伙子。当然，那时

他还不是个纳粹分子。发生在卡尔·托马斯身上的或许就是发生在巴拉圭许许多多德国人身上的事情：要么跟希特勒走，要么干点别的什么。

许多其他纳粹组织有巴拉圭分支。献身团在O·胡伯尔博士指导下从事纳粹政治活动；“体操与体育运动德国协会”，会员在五百人以上，是希特勒青年组织；“德国学校”是纳粹宣传的一个中心；“国家社会主义劳动阵线”是德国工人的一个纳粹工会；“国家社会主义妇女协会”，会员五百人以上，是纳粹妇女组织的一个对应机构；“德国男子合唱队”是另一个宣传机构；“巴拉圭德国工会”分发宣传计划；“德国友好俱乐部”把秘密警察头子马科斯·富斯特尔算作自己的会员；名单上还有“西班牙长枪会”与意大利的一些团体。在卢克、维利亚里卡及其他城市，公开进行纳粹活动。东南边疆的德国人垦殖区是阿根廷纳粹团体的联络点。德国驻恩卡纳西翁领事欧亨内·弗兰克在恩卡纳西翁区长官维尔木·贡特尔的帮助下指挥宣传系统的各分布点。无线电广播站在许多地点广播。亲纳粹的军国主义者在1943年6月接管阿根廷以前，有充分理由地说：“我们已经有了巴拉圭。”

检查政府对劳工组织的态度可以作为考验莫里尼戈是否实行民主原则的进一步的方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巴拉圭工会已进入发展的新时期，即成长迅速、倾向激烈到它们的领袖被称为共产主义者的时期。“工人委员会”加入隆巴尔多·托列达诺的“拉丁美洲劳工联盟”（CTAL），并派出代表参加1944年哥伦比亚的卡里大会。这个第二次全体会议赞成摧毁拉丁美洲的独裁制，这个立场不会得到莫里尼戈的欢心，因为他历来是反劳工的。1941年1月的总罢工是工人对当时的统治制度的一场宣战，结果二百多人被捕。8月、12月又爆发两次罢工，每次都有更多的人被捕。1943年11月莫里尼戈企图建立政府的完全控制（他称之为“统制”），结果引起了下年2月的总罢工。后来莫里尼戈任命陆军中校巴西利亚诺·卡瓦列罗·伊拉拉领导国家劳工局。这位开明的军官试图顺应劳工潮流，提出一个民主的劳工法，为此，他被放逐蒙得维的亚。1945年2月15、16日和5月1日至3日爆发新的暴动，证实了不怕镇压、不怕领袖关入集中营的劳工力量。

劳工纲领的绝大部分并不是特别过激的。工

人要求组织自由、罢工权、社会改革、恢复民主政府、支持联合国。从一家最大的外资企业中工人的情况判断，劳动条件必须改进。“国际产品公司”大约有一千个工人属于一个工会。1945年，这些人大多数每天收入一点六〇瓜拉尼，不到零点五五美元；工会要求增加到二点五〇瓜拉尼。在皮纳斯科港，工人一般住一间房子，到公司商店购买商品使他们永远处于负债地位。破斧木工厂的情况与此相似，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1945年2月总罢工在外资企业中得到那么强有力的支援。

出版自由可能并不是民主潮流的一个显著标志，但它从来不为独裁者所容忍。1940年6月，埃斯蒂加里维亚曾建立一个有限度的检查制，政府与劳工部可以指令某些事情应怎样对待，强使报纸免费刊登政府的宣传，接管它们需要的任何一家报纸。莫里尼戈是在那法令上签字的部长，该法令由1940年宪法予以修改。他担任总统后，通过从1941年10月22日起的一系列法令，建立了完全的检查制。按1944年12月11日法令组织起来的国家宣传局（德纳普罗）又多次颁发条例，扩大了这个检查制的权限。自然，立即出现了一个与国家主义

革命运动进行斗争的地下出版物。德纳普罗的监视扩充到出版、无线电、娱乐、体育比赛、旅游以及社会组织所有方面。公务人员未经德纳普罗的批准不得发布消息；所有报纸、印刷品必须领取执照；所有组织必须登记并定期报告其活动。未经德纳普罗的同意，人们不得广播，所有无线电节目和商业广播要检查，所有音乐广播至少三分之一必须是本地音乐。电影院只能放映批准的影片，甚至跳舞厅、运动场也必须领有执照。

德纳普罗的局长陆军上尉曼努埃尔·W·查维斯告诉卡洛斯·博尔切，他无意限制如报纸社论所发表的思想。那些编辑带着情感写写有关气候、河水涨落、蝗灾，被责罪为纯粹是耍诡计。为什么他们不评论一下吩咐他们评论的事呢？上尉认为这些都是很令人不快的。有影响的自由党机关报《国家报》的所有人波利卡波·阿尔塔萨当然有理由感到更不快了。莫里尼戈不满足于自己官方的《巴拉圭报》，把《国家报》夺了过来。以前亲民主的报纸变成亲纳粹的报纸，德国公使常常拜访编辑部。外国记者几乎得不到鼓励去发挥他们的才能。卡洛斯·博尔切的调查旅行是一个了不得的

特许，这可能是导致巴西《合作者日报》得以派记者埃德马尔·莫雷尔于1946年2月到巴拉圭的原因。这个不客气的采访记者回到巴西后发表了对莫里尼戈的激烈攻击。后来，里约热内卢的共产主义《人民讲坛报》编辑佩德罗·莫塔·利马先生企图作巴拉圭报道。莫塔·利马3月到达亚松森时，《巴拉圭报》发表一篇充满热情的编者欢迎词，但警察迅速地把他赶到阿根廷边境。莫里尼戈不喜欢外国新闻记者。

卡洛斯·博尔切是在一种特殊的条件下去巴拉圭旅行的。那是1945年7月3日，当蒙得维的亚的《国家报》的记者坐在桌旁不知道下一次报道从何而来的时候，受到了灵感。他抬头望见面前一群巴拉圭政治流亡者，其中有一个名叫巴德里·扬佩的避难学生。这个不幸的青年讲述的故事成了头条新闻。他于2月被捕，和其他三十二个学生、工人一起被送到查科一个集中营，受到集中营指挥官何塞·塞贡达·达科斯塔中校两个月严酷的折磨。饮食是玉米粒和小块的硬饼干，很少一点水，没有医疗，还强迫劳动。但扬佩还有气力逃往亚松森，到乌拉圭使馆避难。

莫里尼戈的驻乌拉圭公使胡安·纳塔利西奥·冈萨雷斯博士7月4日读了这个记事十分气愤。也许他来得及从上级获得训示；至少，就在那一天他写了一封信给蒙得维的亚的《国家报》的编辑，信中否认巴拉圭有这样一个集中营，同时邀请报纸派一位记者在完全自由行动的保证下，作一次调查事实的旅行。卡洛斯·博尔切接受挑战，详细说明要访问哪些类型的人。博尔切和一个摄影师于7月28日动身时，几乎不相信莫里尼戈真有邀请访问的意思，因为在为埃德尔米罗·法雷尔访问亚松森准备的前卫艇——“布鲁塞拉斯号”上就有二十个阿根廷秘密警察。一个独裁者怎么能这样大胆，或者这样愚蠢呢？他以后不会再干的，当然不会在博尔切发表《美洲的集中营》之后还这样干。

宣传局事务官在亚松森会见了博尔切，或许是为了避免反对派的成员过快地和他接触，也许仅仅是出于礼貌。记者在旅馆安顿下来后一小时内，秘密的民主运动组织就和他建立了联系。一个学生里卡多·弗朗哥拜访博尔切，离开时就为莫里尼戈的秘密警察（普拉圭埃斯）逮捕。不为弗朗

哥的恶运所吓倒，一个查科囚犯亲属的妇女代表团来访，出示从他们男人那里接到的许许多多封信。第二天，8月3日，博尔切服从卫兵的命令脱了帽子、扣上衣扣、丢掉香烟后，拜访莫里尼戈。傲慢的统治者诚挚地接见了他，并有礼地回答问题。允许议会选举吗？可能。什么时候？也许在1948年。宪法会恢复吗？也许，但要作些修改。允许哪些党派参加选举？红党，或许还有些新组织的团体，但大逆不道的自由党人不行。独裁者利用这次访问讲了一些为自己辩解的话："我的政府相信，应在资本与劳工之间寻求一致。但是在工人之间有许多煽动者，在学生之间也有。他们都被拘留和监禁在他们的家乡。你将亲自去看他们。他们都很好。很小的城镇，周围是树木。至于那些在查科的，据安迪诺将军讲，收容在那里的许多人已明确地决定，要在那地方安家，诚实地工作。有人说我是个独裁者。这是不真实的。你知道普通人民怎么来看我的。我只是不需要政党作为中间媒介。我直接和人民打交道。许多人来自远方，甚至带着对当局的控诉而来。我倾听任何人的意见。我从来没有警卫队。我随便走，也不隐蔽身分。"

这个乌拉圭采访记者享有行动自由，但不准他单独行动。秘密警察到处皆是——在咖啡馆、出租汽车、市内电车里，大街上，甚至旅馆走廊里。博尔切不怕这样的钉梢，和许多工人、学生谈话，得到囚犯的名单和集中营的名称和地点。8月5日他飞往查科，同机有两个美国人、两个巴拉圭人。第一站是过去的卡马乔要塞，现在称埃斯蒂加里维亚统帅要塞，从那里奥古斯托·古贾里上校指挥查科军区。上校向博尔切保证，他只有六十多个囚犯，与亚松森劳工协会所提供的名单未尽一致。追问之下，他承认其他人在因加维、伊林达格与穆尼卡驻营地。博尔切和古贾里一道乘吉普车沿着通向卡萨多港的公路东行几哩到穆尼卡驻营地。记者拿着名册点名，古贾里上校站在一边。博尔切名单上有一百零三名，大部分是工人和学生。有些被分发到其他十一个集中营，有些跑了，有些死了，少数已释放。他们为什么被拘留？因为他们反纳粹，赞成过立宪政府，或是向阿根廷独裁者提出过抗议。没有一个经过合法的审判，没有一个知道他们会被拘留到多久，所有的人被强迫劳动，连吃不饱饭的工资都没有，也不发给衣服。营盘周围

没有倒刺的铁丝网标界，也没有拷问室；但穆尼卡港是个集中营，较查科其他的好一些，那里一切在何塞·安迪诺将军统辖之下，他是一个以温和、具有民主倾向而出名的军人。

在巴拉圭所有监狱中最恶名远扬的是阿帕河和巴拉圭河汇合处附近的培尼亚埃尔莫萨岛。它是在1933年成为军事监狱的。这个小岛，据印第安人传说，是在卡梅洛特姑娘为免遭污辱投河自尽后一夜之间出现的。许多知识分子、政治领袖、前政府官员曾囚禁在那里。

在维利亚里卡，博尔切和反对党分子随便谈话。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巴拉圭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工会，不存在政党组织。“美洲同盟协会”和三个教育中心是表现民主的仅有的幸存者。博尔切访问那天，1945年8月12日，几个学生被捕。亲轴心国的同情者在维利亚里卡是不用担心的，如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逝世时在奥地利酒吧间举行的庆祝会上见到的，就有学校视察员何塞·P·蒙铁尔参加。

许多学生因为他们领导民主运动和后来进行反对莫里尼戈的地下活动，而进了集中营。1944年

近10月末，大中学校的学生分别举行大会，谴责军人干预政府。12月，大学校长胡安·博格奇诺博士、他大多数的同事、学生团体以及政党领袖恭恭敬敬地敦促莫里尼戈恢复立宪政府，结果却引起了1945年1月迫害和逮捕的浪潮。校长丢了职位；非常知名的学者如卡洛斯·R·森图里翁博士、卡洛斯·卡雷拉博士、阿古斯丁·莫拉莱斯博士被解职放逐。法学教授、最高法院院长安东尼奥·塔沃亚达于1月12日怯懦地提出“非常判决”，宣告请愿有罪。胡安·多明戈·庇隆教给他的巴拉圭朋友怎样对待教授和学生。尽管如此，大学学生联盟发动罢课，抗议法雷尔的8月访问。莫里尼戈的秘密警察包围这个组织，将联盟主席多明戈·巴尼乌埃洛斯送进集中营。

政党的领袖又怎么样呢？红党首领费德里科·查维斯博士声明，他的党坚决反对莫里尼戈，同时声称，党自成立以来也坚决反对自由党人。既然1940年宪法是不民主的，是倒退到暴力政体，就必须召集新的立宪会议。自由党领袖都被流放：何塞·帕特里西奥·古贾里博士、维森特·里瓦罗拉博士、赫罗尼莫·里亚尔特博士，还有很多很

多，他们称莫里尼戈的统治是否定基本公民权的暴虐、恐怖的统治。这些流亡者宣称，国家已破产："经济管制惩罚了生产者，弄穷了人民。"为恢复民主，该党提议紧急召集立宪会议，所有民主力量联合起来，实行比例代表制，恢复公众自由，释放所有政治犯。

二月党领袖拉斐尔·弗朗哥上校流亡在蒙得维的亚。他相信在人们中间存在着一个回到宪法秩序的强有力的愿望，虽然就是这个弗朗哥开创了使莫里尼戈有可能当权的时期。他主张让战争阵线的首领维多里亚诺·贝尼特斯·贝拉中校统治巴拉圭。弗朗哥否认在他短短的任职期间曾解散过过去的各个政党；他组织"国家革命同盟"是为了和它们竞选。他同意否决1940年伪独裁宪法，召开一次立宪会议，重建民主制度。也许有一天，天才者能告诉我们，巴拉圭政治家所指的"民主"到底是什么。

巴拉圭共产党，虽小而活跃，渗入工会，成为工会中一个分裂因素。该党拥护"民主"，要求一次大赦，要求立宪会议，赞成美国在旧金山会议后反对阿根廷，并欢呼纳尔逊·洛克菲勒辞职以结束

美国对拉丁美洲反动独裁者的姑息政策。

如果莫里尼戈真的召开议会，这些政党会怎样行动呢?也许他们会合作，形成新的宪法，然后，又如过去那样相互进行激烈的斗争。谁控制的军队最多，谁就统治这个国家，在巴拉圭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使人相信会产生真正的自由。镇压、流放、暴动以及小规模的叛乱倒是常见的。只要共产党人在被剥削的人民当中为他们的宣传磨盘找到用之不竭的谷粉，他们就能为自己极权主义的教条赢得支持。或许有一天乌托邦来到巴拉圭，但不会是共产主义者带来的。

不单单是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的与共产主义的巴拉圭人给莫里尼戈将军制造麻烦。三位一体的本国法西斯主义者——战争阵线的首领，认为总统应当跟随他们规定的路线。维多里亚诺·贝尼特斯·贝拉上校——1946年的参谋长，得到他的老朋友贝尔纳多·阿兰达上校和巴勃罗·斯塔尼上校的支持。这三个人似乎曾指挥莫里尼戈有五年左右。他们反对“时代派”(该派因1939年创办的《时代报》而得名)，这是一个赞同“天主教的社会服务国家”的团体。1943年内阁中的外交部长

路易斯·阿尔加尼亚博士，是时代派的一个领导者、反纳粹分子。战争阵线迫使他于1944年3月辞职。莫里尼戈耐心地等待机会摆脱巴拉圭上校们所锻造的脚镣。

在拉丁美洲，总统的就职典礼，常常是大陆精华荟萃的机会。1946年6月4日，胡安·多明戈·庇隆就任阿根廷总统，必须有巴拉圭的代表参加。莫里尼戈灵机一动，派贝尼特斯·贝拉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在他走后，莫里尼戈夺取了对格兰德兵营驻军的控制权，同时带信给斯塔尼和阿兰达，说要去看看他们。两位上校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就避难到他们朋友所不能及的地方。莫里尼戈然后重整内阁，等待这场冒险游戏的下一个动作。推翻他的革命企图，他已看到的有两打左右，正在酝酿中的大概还要多。玻利维亚发生的事件马上使独裁者想到自己的命运，幸喜他还没有落到那个下场。

一个被压迫的民族，由于他们的自由屡遭侵害而发狂，当反抗的情绪达到爆发点时，有时也会残酷地回击他们的折磨者。1946年7月玻利维亚达到了这一爆发点，这一个月，给许多杀人凶手带来了可耻的极刑，总统夸尔贝尔托·比利亚罗埃

尔上校半裸的尸体被挂在拉巴斯一根路灯杆上。在比利亚罗埃尔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前一天，莫里尼戈就提防了，虽然玻利维亚事件可能并不就是他突然爱好民主的决定性因素。7月20日，他给各政党以批评统治制度的权利；7月22日，他提名新内阁，在新内阁中红党人和二月党人可以有代表；8月1日停止对共产党人的人权剥夺，许许多多政治流亡者开始回来。其中有拉斐尔·弗朗哥上校，他从蒙得维的亚开办的肥皂厂归来。也许莫里尼戈在设置诱饵，以便伺机猛扑过去，一网打尽；也许他真想践约，将政府移交给经过公正的选举而自由选出的官员。谁也不知道，但每个人只要有办法都作好准备，必要时就溜掉。

莫里尼戈作为一个政略家显露出惊人的手腕，7月26日组织内阁，以同意在三两个月内进行选举为条件，说服红党人和二月党人在联合政府中任职。这个行动可能使他免遭多少类似于比利亚罗埃尔在玻利维亚的命运。三个内阁职位，三个党派各占一名，而最重要的内政部长落在胡安·罗维拉将军头上。确实，旧独裁制似乎是结束了；莫里尼戈说他随时可以离开，他要军队停止玩弄

政治，也希望自由党人停止玩弄军队。

弗朗哥流亡回来，打算干什么呢?问题似乎在8月4日有了回答。莫里尼戈作出一副任何拉丁美洲国家所罕见的姿态：派一个副官去迎接流亡者，自己呆在家里。码头上现成的拥护者就有二万人之多，弗朗哥本来可以说："到总统府去！打倒莫里尼戈！"但他没有说。这个著名的二月党人简短地、安抚似地向群众讲了话，然后就回了家。可能弗朗哥疲倦了；可能巴拉圭在政治上逐渐成熟了；但更象是二月党人要看一看以后几个月会带来什么。

这是不安的几个月。在这期间，讥讽的观察家预言一场暴乱瞬间就会发生。他们预先的警告显然在1946年12月12日夜间得到了证实，当时"无政府主义分子"夺取监狱、警察总署与军事学校的企图遭到了失败。这次拔除莫里尼戈的努力是在红党人和二月党人的联合破裂时发生的。军事领袖们好象要内阁顶住，直到能举行选举，但内阁于次年1月11日辞职，没给莫里尼戈留下选择的余地，只有组成一个军人政府。他于1月13日宣布戒严，时刻提防着倾向二月党的年轻官员。一定有什么在酝酿，但几乎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1月23日，九

个自由党人以阴谋闹革命的罪名被捕，但很快又被释放了。

1947年的大表演，于3月7日（星期五）从康塞普西翁开始，第一步兵师举起了反叛的旗帜，这是经过二月党人长期策划的。在同一时候，一次准备不充分的夺取亚松森的斗争失败。当叛军向其他部队请求支持时，莫里尼戈没有低估危险。效忠的飞机在叛军司令部附近猛烈轰炸，但塞萨尔·阿吉雷少校不久就有了一千五百人以上的支持者，他用这些人进攻，控制了康塞普西翁以北大部分领土。阿吉雷为什么而战斗呢？他说，为新的选举和新宪法。这次最近的暴乱有成为一次长期的、耗费大的内战的危险，谁是它的支持者呢？甚至它的军事领袖也不能断定。阿尔弗雷多·加莱亚诺上校，前第一骑兵师指挥官，1946年9月作为囚犯送至培尼亚埃尔莫萨。造反者夺得该岛后，将他释放，并由他指挥革命武装。莫里尼戈的反对者集中力量支持加莱亚诺。当逃亡的共产党领袖奥夫杜略·贝尔特在康塞普西翁出现时，进一步证明共产党人和二月党人在合作。自由党人也参加为指挥革命而组成的委员会。加莱亚诺继续指挥到3月

24日，以后由法维安·萨尔迪瓦·比列亚格拉当总指挥。拉斐尔·弗朗哥上校，不管他怎么躲在幕后，但他是革命的真正领袖，假如革命成功，他就是当总统的人。

1947年叛乱期间的军事事件，是内战所特有的一种混乱的典型。当查科英雄费德里科·维德尔·史密斯上校还不能阻挡住他们的时候，造反者控制了康塞普西翁以北巴拉圭的大部分，并准备全力进攻亚松森。阿尔弗雷多·拉莫斯上校率领向南突击。从进攻与反击的起伏中，清楚地暴露出一个事实：造反者夺取首都的行动失败了。4月，几个小分队在亚松森以南河边哨所布置了人，宣布赞成起义，但他们的成功只在于使政府军的供应可能被切断而已。部分海军造反，于4月27日进攻亚松森未成，这大胆的一击显然造成史密斯上校放弃指挥权，宁愿流亡阿根廷。他离开得太早了。效忠的军队在6月取得一系列小胜利之后，于7月31日攻克康塞普西翁，并预期很快结束战斗。

莫里尼戈喜气洋洋。为了这次虚有其名的征服，亚松森响起了钟声，拉起了汽笛；所以是虚有其名，因为康塞普西翁作为作战基地的任务一经

完成后,造反者对它的得失也就不在意了。一支箝制力量的象征性抵抗使莫里尼戈的第一军团不敢接近, 与此同时, 叛军的主力却在两艘炮舰保护下顺流向亚松森挺进。各国的外交官慌忙撤出首都,以免被围,莫里尼戈拚命地集合第二军团同估计有一万人的造反者作战。这次攻城时间不长。8月20日造反者全部溃散, 他们的领导者争先恐后地到邻国避难,弗朗哥8月19日再次亡命国外。

因为莫里尼戈不相信造反者能取胜, 内战中外国的调停努力都归于失败。巴西和乌拉圭的努力在这些尝试中最为突出,却遭到了有礼的、但是坚决的拒绝。在巴西,有些人感觉阿根廷的庇隆在帮助莫里尼戈。J·A·弗洛雷斯·德·库尼亚将军指责庇隆计划组织所谓伊比利亚集团在必要时进攻巴西, 而由大使弗朗西斯科·内格拉奥·德·莱马为首的巴西调停努力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庇隆援助了莫里尼戈。当然,庇隆的政府否认搞伊比利亚集团计划或阴谋反对巴西。8月初旬情况对莫里尼戈危急时, 里约热内卢的美洲防务会议敦促巴拉圭接受调解, 美国也通知其代理使节爱德华·特鲁布拉德——当造反者接近首都时, 在惊

慌中没有跑掉的少数外交官之一——提出斡旋。

革命后的政治情况有点混乱，但到11月，很清楚，莫里尼戈已选中红党，或是他或是纳塔利西奥·冈萨雷斯，将在1948年2月15日约定的选举中充当红党候选人。费德里科·查维斯、贝尔纳多·坎波斯及其他杰出的红党人不相信莫里尼戈的改宗换党，特别是因为这一行动带有夺取该党公认的理事们的支配权的精巧的政治诡计。当二十九万六千个登记的选民在指定日期走到选举地点时，他们发现选票上只有一个名字——胡安·纳塔利西奥·冈萨雷斯。那么为什么还要选举呢？在巴拉圭投票是强制的，投票者投票时要出示登记证加盖印记，以证明其参加选举。无论什么时候，满选举年龄的巴拉圭男子要想获得政府颁发的任何文件证书，必须交出这种加印的登记证——没有印记，就没有文件。所以，这个政权可以自称，莫里尼戈是以压倒的优势得到巴拉圭人承认的，因为他们选了他的候选人，自1948年8月15日开始任期五年。

伊希尼奥·莫里尼戈回顾他在职的狂风暴雨的八年，会相当满意。他曾是冷酷的，但没有搞不

寻常的血腥屠杀，他曾击败每个推翻他的企图，并使国家得到经济和社会方面相当的进步，这要感谢外国贷款和赠与。但在政治上，巴拉圭人向开明的自治方面的进展，如果有的话，也极小。自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以来，没有人曾如此成功地对付外国政府。莫里尼戈和阿根廷陆军上校们站到一起，看上去已足以成为其中的一员了；同时，他使美国官员相信他的良好意向，也做到足以使他从租借法案中领到相当大的份额。他向巴西卖弄风情，看来最终将使巴拉圭的国外贸易多少从阿根廷的支配下解脱出来。他对玻利维亚的和解可能最后使他取得满意数量的石油产品。在这些事情上，他为国家利益而工作，不是为个人的荣誉。也许巴拉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丧失了个人自由；但这丧失不会比在二月党人继续当权的情况下所能丧失的大。没有人能说莫里尼戈怎么好或怎么坏，除非我们有时间来验证，有对照的事物出现。

就人类而言，历史是没有止境的。因此，不管人们可以多么简洁地总结已经发生的事情，这总结也得不出什么结论，也很少能为预见未来的事

件提供什么依据。幸运的是，史学家不必是个先知，也不是规划的制定者，也不是自封的救世主，可以指点四百年的历史，挥舞圣笔教诫后人。巴拉圭有过光荣，有过失望，但从未蒙受耻辱。它的人民有着内在的活力，曾引导这个国家缓步前进，克服过巨大的困难，治好过可怖的创伤。只要那活力继续下去，巴拉圭人可以期望他们的土地早晚会成为瓜拉尼传说中的乐园。

附录：巴拉圭的总督、独裁者和总统
（1536—1948年）

1536年　佩德罗·德·门多萨 (Pedro de Mendoza)

1538年　多明戈·马丁内斯·德·伊拉拉 (Domingo Martínez de Irala)

1541年　阿尔瓦尔·努涅斯·卡维萨·德·巴卡(Álvar Núñez Cabeza de Vaca)

1544年　多明戈·马丁内斯·德·伊拉拉 (Domingo Martínez de Irala)

1548年　迭戈·德·阿夫雷乌 (Diego de Abreu)

1549年　多明戈·马丁内斯·德·伊拉拉 (Domingo Martínez de Irala)

1557年　贡萨洛·德·门多萨 (Gonzalo de Mendoza)

1558年　弗朗西斯科·奥尔蒂斯·德·贝尔加拉 (Francisco Ortiz de Vergara)

1574年　胡安·奥尔蒂斯·德·萨拉特 (Juan Ortiz de Zárate)

1581年　胡安·德·托雷斯 (Juan de Torres)

1586年　阿隆索·德·贝拉—阿拉贡 (Alonso de Vera y Aragón)

1592年　费尔南多·德·萨拉特(Fernando de Zárate)

1597年　胡安·拉米雷斯·德·贝拉斯科 (Juan Ramirez de Velasco)

1598年 埃尔南多·阿里亚斯·德·萨维德拉 (Hernando Arias de Saavedra)

1599年 迭戈·罗德里格斯·巴尔德斯 (Diego Rodríguez Valdez)

1602年 加西亚·门多萨 (García Mendoza)

1605年 埃尔南多·阿里亚斯·德·萨维德拉 (Hernando Arias de Saavedra)

1606年 弗朗西斯科·阿尔法罗 (Francisco Alfaro)

1611年 迭戈·马丁内斯·内格朗 (Diego Martínez Negrón)

1619年 曼努埃尔·德·弗里亚斯 (Manuel de Frías)

1629年 佩德罗·德·卢戈—内格朗 (Pedro de Lugo y Negrón)

1634年 路易斯·德·塞斯佩德斯·赫赖 (Luis de Céspedes Jeray)

1636年 马丁·德·莱德斯马·巴尔德拉马 (Martín de Ledesma Valderrama)

1641年 格雷戈里奥·德·伊内斯特罗萨 (Gregorio de Hinestrosa)

1647年 迭戈·埃斯科瓦尔·奥索里奥 (Diego Escobar Osorio)

1649年 贝纳尔迪诺·德·卡尔德纳斯 (Bernardino de Cárdenas)

1649年 塞瓦斯蒂安·德·莱昂—萨拉特 (Sebastián de León y Zárate)

1650年 安德列斯·德·莱昂·加拉维托 (Andrés de León Garabito)

1653年　克里斯托瓦尔·德·加赖—萨维德拉 (Cristóbal de Garay y Saavedra)

1656年　胡安·布拉斯克斯·德·巴尔维德 (Juan Blásquez de Valverde)

1659年　阿隆索·萨米恩托—菲格罗阿 (Alonso Sarmiento y Figueroa)

1663年　胡安·迭斯·德·安迪诺 (Juan Diez de Andino)

1671年　弗朗西斯科·雷赫·科尔瓦兰 (Francisco Rege Corvalán)

1673年　迭戈·伊瓦涅斯·德·伊拉拉 (Diego Ibañez de Irala)

1681年　胡安·迭斯·德·安迪诺 (Juan Diez de Andino)

1684年　安东尼奥·德·贝拉·穆希卡 (Antonio de Vera Múgica)

1685年　弗朗西斯科·蒙福尔特 (Francisco Monforte)

1692年　塞瓦斯蒂安·费利克斯·德·门迪奥拉 (Sebastián Félix de Mendiola)

1696年　胡安·罗德里格斯·科塔 (Juan Rodríguez Cota)

1702年　安东尼奥·埃斯科瓦尔·古铁雷斯 (Antonio Escobar Gutiérrez)

1705年　塞瓦斯蒂安·费利克斯·德·门迪奥拉 (Sebastián Félix de Mendiola)

1706年　巴尔塔萨尔·加西亚·罗斯 (Baltazar García Ros)

1707年　曼努埃尔·德·罗夫莱斯 (Manuel de Robles)

1713年　格雷戈里奥·巴桑·德·佩德拉萨 (Gregorio Bazán de Pedraza)

1717年 迭戈·德洛斯·雷耶斯·巴尔马塞达 (Diego de los Reyes Balmaceda)

1722年 何塞·德·安特克拉—卡斯特罗 (José de Antequera y Castro)

1725年 布鲁诺·毛里西奥·德·萨瓦拉 (Bruno Mauricio de Závala)

1725年 马丁·德·巴鲁阿 (Martín de Barúa)

1731年 伊格纳西奥·索罗埃塔 (Ignacio Soroeta)

1733年 曼努埃尔·阿古斯丁·德·卡尔德隆 (Manuel Agustín de Calderón)

1735年 布鲁诺·毛里西奥·德·萨瓦拉 (Bruno Mauricio de Závala)

1736年 马丁·埃乔里(Martín Echáuri)

1740年 拉斐尔·德拉·莫内达 (Rafael de la Moneda)

1747年 马科斯·何塞·拉腊萨瓦尔 (Marcos José Larrazábal)

1749年 海梅·圣胡斯特 (Jaime Sanjust)

1761年 何塞·马丁内斯·丰特斯(José Martínez Fontes)

1765年 富尔亨西奥·耶格罗斯(Fulgencio Yegros)

1766年 卡洛斯·莫尔菲(Carlos Morphi)

1772年 阿古斯丁·费尔南多·德·皮内多 (Agustín Fernando de Pinedo)

1778年 佩德罗·梅洛·德·波图加尔(Pedro Melo de Portugal)

1781年 华金·阿洛斯—布鲁 (Joaquín Alós y Bru)

1796年 拉萨罗·德·里维拉—埃斯皮诺萨 (Lázaro de

Ribera y Espinosa)

1806年 贝尔纳多·德·贝拉斯科—维多夫罗 (Bernardo de Velazco y Huidobro)

1807年 曼努埃尔·古铁雷斯 (Manuel Gutiérrez)

1809年 欧斯塔基奥·贾尼尼 (Eustaquio Giannini)

1809年 贝尔纳多·德·贝拉斯科—维多夫罗 (Bernardo de Velazco y Huidobro)

1811年5月15日 三头执政：贝尔纳多·德·贝拉斯科 (Bernardo de Velazco)，何塞·加斯帕尔·罗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亚 (José Gaspar Rodríguez de Francia)，胡安·巴列里亚诺·塞瓦略斯 (Juan Baleriano Zeballos)

1811年6月19日 洪达：富尔亨西奥·耶格罗斯 (Fulgencio Yegros)，何塞·加斯帕尔·罗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亚 (José Gaspar Rodríguez de Francia)，佩德罗·胡安·卡瓦列罗 (Pedro Juan Caballero)，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博加林 (Francisco Javier Bogarín)，费尔南多·德拉·莫拉 (Fernando de la Mora)

1813年10月15日 执政官：何塞·加斯帕尔·罗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亚 (José Gaspar Rodríguez de Francia) 和富尔亨西奥·耶格罗斯 (Fulgencio Yegros)

1814年10月30日 三年独裁者：何塞·加斯帕尔·罗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亚 (José Gaspar Rodríguez de Francia)

1816年6月6日 终生独裁者：何塞·加斯帕尔·罗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亚 (José Gaspar Rodríguez de Francia)

1840年9月20日 洪达：更换成员

1841年3月12日 执政官：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

(Carlos Antonio López)，曼努埃尔·罗克·阿隆索(Manuel Roque Alonso)

1844年3月12日　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 (Carlos Antonio López)

1862年9月10日　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 (Francisco Solano López)

1869年8月　三头执政：西里洛·安东尼奥·里瓦罗拉(Cirilo Antonio Rivarola)，卡洛斯·洛伊萨加 (Carlos Loizaga)，何塞·迪亚斯·德·贝多亚 (José Díaz de Bedoya)

1870年9月1日　西里洛·安东尼奥·里瓦罗拉 (Cirilo Antonio Rivarola)

1871年12月18日　萨尔瓦多·霍维利亚诺斯 (Salvador Jovellanos)

1874年11月25日　胡安·包蒂斯塔·希尔 (Juan Bautista Gill)

1877年4月12日　伊希尼奥·乌里亚特(Higinio Uriarte)

1878年11月25日　坎迪多·巴雷伊罗 (Cándido Barreiro)

1880年9月4日　贝纳尔迪诺·卡瓦列罗 (Bernardino Caballero)

1886年11月25日　帕特里西奥·埃斯科瓦尔 (Patricio Escobar)

1890年11月25日　胡安·瓜尔维托·冈萨雷斯 (Juan Gualberto González)

1894年6月9日　马科斯·莫里尼戈 (Marcos Morínigo)

1894年11月25日　胡安·包蒂斯塔·埃古斯基萨 (Juan Bautista Eguzquiza)

1898年11月25日　埃米略·阿塞瓦尔 (Emilio Aceval)

1902年1月9日　埃克托尔·卡瓦略 (Hector Carballo)

1902年11月25日　胡安·A·埃斯库拉(Juan A. Escurra)

1904年12月19日　胡安·包蒂斯塔·高纳 (Juan Bautista Gaona)

1905年12月9日　塞西略·巴埃斯(Cecilio Báez)

1906年11月25日　贝尼尼奥·费雷拉 (Benigno Ferreira)

1908年7月2日　埃米利亚诺·冈萨雷斯·纳维罗 (Emiliano González Navero)

1910年11月25日　曼努埃尔·冈德拉(Manuel Gondra)

1911年1月17日　阿尔维诺·哈拉(Albino Jara)

1911年7月5日　利维拉托·罗哈斯 (Liberato Rojas)

1912年3月1日　佩德罗·培尼亚 (Pedro Peña)

1912年3月15日　埃米利亚诺·冈萨雷斯·纳维罗 (Emiliano González Navero)

1912年8月15日　爱德华多·沙埃尔埃尔(Eduardo Schaerer)

1916年8月15日　曼努埃尔·弗朗哥 (Manuel Franco)

1919年6月9日　何塞·蒙特罗 (José Montero)

1920年8月15日　曼努埃尔·冈德拉 (Manuel Gondra)

1921年11月7日　欧塞维奥·阿亚拉 (Eusebio Ayala)

1923年4月11日　埃利希奥·阿亚拉 (Eligio Ayala)

1924年3月17日　路易斯·A·里亚尔特 (Luis A. Riart)

1925年8月15日　埃利希奥·阿亚拉 (Eligio Ayala)

1928年8月15日　何塞·帕特里西奥·古贾里 (José Patricio Guggiari)

1932年8月15日 欧塞维奥·阿亚拉 (Eusebio Ayala)

1936年2月17日 拉斐尔·弗朗哥 (Rafael Franco)

1937年8月15日 费利克斯·派瓦 (Félix Paiva)

1939年8月15日 何塞·费利克斯·埃斯蒂加里维亚 (José Félix Estigarribia)

1940年9月7日 伊希尼奥·莫里尼戈 (Higinio Moríñigo)

1948年6月3日 胡安·曼努埃尔·弗鲁托斯 (Juan Manuel Frutos)

1948年8月15日 胡安·纳塔利西奥·冈萨雷斯 (Juan Natalicio González)

参考书目简评

经过评注的有关巴拉圭的参考书目，需要占相当大的篇幅。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着大量的定期刊物、传记、正史、公开文件和专门论著，却没有这样一个令人满意的参考书目。本书虽然可以看作是作者因喜爱一个在美国很少为人知道的国家而进行的一项工作，但这种感情还没有达到编纂一个十分需要的、完整的巴拉圭历史参考书目所必需的那种盲目痴爱的程度。因此，我把这个评注仅限于本书行文所依据的大部分书籍。至于我受到很大好处的定期刊物已予以省略，因为我所提供的只能是一个不使这个参考书目过分冗长的样本。

在比较重要的通史中，可以查阅写过很多著作的、卓越的塞西略·巴埃斯 (Cecilio Báez) 所写的三本著作：《巴拉圭外交史》(Historia diplomática del Paraguay) (亚松森，1931—1932年版，共2卷)；《巴拉圭的历史沿革和现状》(Le Paraguay, son évolution historique et sa situation actuelle) (巴黎，1927年版) 和《征服时代至1880年巴拉圭历史纲要，附多明戈·马丁内斯·德·伊拉拉统治时期至现代的国民教育史》(Resumen de la historia del Paraguay desde la época de la conquista hasta el año 1880, seguido de la historia particular de la instrucción pública desde el gobierno de Domingo Martínez de Irala hasta nuestros días) (亚森松，1910年版)。吉雷尔莫·特尔·贝尔托尼 (Guil-

lermo Tell Bertoni)的《巴拉圭国民经济地理》(Geografía económica nacional del Paraguay)(亚松森，1940年版)尽管不是一部历史书，但是一本有深入分析的经济地理书。C·W·瑟洛·克雷格 (C. W. Thurlow Craig) 写了两本有趣的游记：《遥远的地方》(Land of the Far Distance)(纽约，1934年版)和《巴拉圭插曲》(Paraguayan Interlude)(纽约，1935年版)。何塞·塞贡多·德科德 (José Segundo Decoud) 的《巴拉圭史》(History of Paraguay)(华盛顿，1902年版)曾是一本出色的著作。具有法文知识的读者应查阅阿尔弗雷德·德梅瑟 (Alfred Demersay)的《巴拉圭的自然、经济和政治史与耶稣会事业史》(Histoire physique, économique et politique du Paraguay et des éstablissements des Jesuites)(巴黎，1860—1865年版，共2卷)。华奥·佩德罗·盖 (João Pedro Gay) 在《从拉普拉塔河的发现至1861年巴拉圭耶稣会共和国历史》(Historia da republica jesuitica do Paraguay desde o descubrimento do Rio do Prata até nossos dias, anno 1861)(里约热内卢，1863年版)一书中，提供一种批判的巴西人的观点，这种观点通过阅读胡安·安德列斯·赫莱 (Juan Andres Gelly) 的论文《巴拉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El Paraguay, lo que fué, lo que es, y lo que será)(巴黎，1926年版)(它最初于1848年用葡萄牙文出版，一年后用西班牙文出版)，多少可以得到纠正。W·H·凯贝尔 (W.H. Koebel) 写的两本书：《在耶稣会国里》(In Jesuit Land)(伦敦，1906年版)和《巴拉圭》(Paraguay)(伦敦，1916年版)是有学力之作，但分量单薄。查尔斯·艾姆斯·沃什伯恩 (Charles Ames Washburn) 的辩解书：《巴拉圭史；附个人

观察札记和对困境中外交的回忆》(The History of Paraguay, with Notes of Personal Observations and Reminiscences of Diplomacy under Difficulties) (波士顿，1871年版，共2卷)，读了可以得到益处，但读时必须小心。在安东尼奥·西尼(Antonio Zinny)的《1535—1887年巴拉圭统治者的历史》(Historia de los gobernantes del Paraguay, 1535—1887) (布宜诺斯艾利斯，1887年版)一书中，有关于总督和总统的许多可靠资料。

在上述书籍和一些标准的地理书中，对巴拉圭都有许多描述。在这些地理书中有：弗雷德·A·卡尔森(Fred A. Carlson)的《拉丁美洲地理》(Geography of Latin America) (纽约，1936年第1版)；普雷斯顿·E·詹姆斯(Preston E. James)的《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 (纽约，1942年版)和R·H·惠特贝克(R. H. Whitbeck)的《南美经济地理》(Economic Geography of South America) (纽约，1926年第1版)。佩德罗·洛萨诺(Pedro Lozano)的《地方志》(Descripción corográfico) (科尔多瓦，1733年版)是一本早期著作。C·B·曼斯菲尔德(C. B. Mansfield)发表的《巴拉圭、巴西和拉普拉塔河》(Paraguay, Brazil and the Plate) (剑桥，1856年版)是给英文读者写的一本启蒙读物。下面提到的许多书中包括有关印第安人的记述。在朱利恩·H·斯图尔德(Julian H. Steward)编的《南美印第安人手册》(Handbook of South American Indians) (史密森研究所，《人种学部学报》第143期，共4卷，华盛顿，1946—1948年版)中第1卷和第3卷是很好的提要。描绘巴拉圭的印第安人，我一般遵循殖民时代当时的叙述，这样做，毫无疑问会使一个科学家在人类学研究上

犯片面性的毛病。在莫伊塞斯·圣地亚哥·贝尔托尼（Moisés Santiago Bertoni）的《瓜拉尼人的文明……》（Civilización guaraní……）（贝尔托尼港，1922年版）一书中有高度赞赏瓜拉尼印第安人的巴拉圭人的解释。埃洛伊·伐里尼亚·努涅斯（Eloy Fariña Núñez）的《美学观念；瓜拉尼人的神话》（Conceptos estéticos; mitos guaraníes）（布宜诺斯艾利斯，1926年版）和埃内斯托·莫拉莱斯（Ernesto Morales）的《瓜拉尼人的传说》（Leyendas guaraníes）（布宜诺斯艾利斯，1929年版）记述了瓜拉尼人的传说。

巴拉圭的漫长的殖民地时代并没有被忽视，虽然从事这方面的学术著述还有广阔的余地。费利克斯·德·阿萨拉（Félix de Azara）写了几卷书，其中《巴拉圭和拉普拉塔河的历史与描述》（Descripción e historia del Paraguay y del Río de la Plata）（马德里，1847年版；亚松森1896年版，共2卷）是必不可少的。马丁·德尔·巴尔科·森特内拉（Martín del Barco Centenera）的《阿根廷和拉普拉塔河的征服》（Argentina y conquista del Río de la Plata）（里斯本，1602年版；布宜诺斯艾利斯，1912年版）含有相当大的虚构成分。关于探险和传教工作方面，彼雷·弗朗索瓦·哈维尔·德·查尔莱沃伊斯（Pierre François Xavier de Charlevoix）的《巴拉圭史……》（The History of Paraguay……）（译自法文，都柏林，1769年版，共2卷）即使有些偏见，但还是一本有趣的书。路易斯·L·多明格斯（Luis L. Domínguez）编的《1535—1555年拉普拉塔河的征服》（The Conquest of the River Plate, 1535—1555）（黑克卢伊特协会丛书第1辑，第81号，伦敦，1891年版）和曼努埃尔·多明格斯（Manuel Domínguez）的

《种族之魂》(El alma de la raza)(亚松森，1918年版)一书对殖民地时代都有一些研究。教长格雷戈里奥·富内斯(Gregorio Funes)所著的《巴拉圭、图库曼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民间历史随笔》(Ensayo de la historia civil del Paraguay, Tucumán y Buenos Aires)(布宜诺斯艾利斯，1816年版，共3卷；布宜诺斯艾利斯，1853年第2版，1部2卷)以较大的图景真实地叙述巴拉圭的殖民史。胡安·纳塔利西奥·冈萨雷斯(Juan Natalicio González)在他逃避革命以前写了两部优秀著作：《巴拉圭文化的演进和形成》(Proceso y formación de la cultura Paraguaya)〔亚松森—布宜诺斯艾利斯，1938年(1940年)版〕和《古拉·贝拉的生活、灾难和毁灭》(Vida, pasión y muerte de Güyrá Verá)(布宜诺斯艾利斯，1939年版)。R·B·坎宁安·格雷厄姆(R. B. Cunninghame Graham)的《拉普拉塔河的征服》(The Conquest of the River Plate)(伦敦，1924年版)是少数用英文写作的有关巴拉圭殖民地时代著作之一。

殖民地时期的历史研究者也必须参考何塞·格瓦拉(José Guevara)的《巴拉圭、拉普拉塔河与图库曼的征服史》(Historia de la conquista del Paraguay, Río de la Plata y Tucumán)(布宜诺斯艾利斯，1882年版)。历史小说家应把伊拉拉作为主人公，开始先读里卡多·德·拉弗恩特·马查因(Ricardo de Lafuente Machaín)的《总督多明戈·马丁内斯·德·伊拉拉》(El gobernador Domingo Martínez de Irala)(布宜诺斯艾利斯，1939年版)。和格瓦拉的著作同一类，但比它好的，有佩德罗·洛萨诺(Pedro Lozano)的《巴拉圭、拉普拉塔河和图库曼征服史》(Historia de la conquista del Paraguay,

Río de la Plata y Tucumán)(布宜诺斯艾利斯，1873—1875年版，共5卷）和《巴拉圭省革命史》（Historia de las revoluciones de la provincia del Paraguay)(布宜诺斯艾利斯，1905年版，共2卷)。马里亚诺·安东尼奥·莫拉斯（Mariano Antonio Molas）在监狱中为消磨时间写了《巴拉圭省古代史记述……》(Descripción histórica de la antigua provincia del Paraguay……)，后来由胡斯蒂尼亚诺·卡兰萨(Justiniano Carranza)校订出版(亚松森，1880年版)。富尔亨西奥·R·莫雷诺(Fulgencio R. Moreno)的《亚松森城》(La ciudad de la Asunción)（布宜诺斯艾利斯，1926年版）一书，内容远比书名所表示的要广泛。多明戈·穆列尔（Domingo Muriel)的专著《1747—1767年巴拉圭历史》（Historia del Paraguay, desde 1747 hasta 1767)，巴勃罗·埃尔南德斯(Pablo Hernández)译（马德里，1918年版），对研究这一时期是有价值的。

许多作者致力于维护或抨击耶稣会传教区，上面提到的所有关于殖民地时期的历史著作和许多其他著作，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挑选下列著作作为这方面的代表作。但对这方面的问题还有研究的余地。巴勃罗·埃尔南德斯(Pablo Hernández）在《根据卡洛斯三世的圣谕驱逐拉普拉塔河地带和巴拉圭传教区的耶稣会教士》（El extrañamiento de los Jesuítas del Río de la Plata y de las misiones del Paraguay por decreto de Carlos Ⅲ)（马德里，1908年版）一书中讽刺了耶稣会教士的敌人，并且在《巴拉圭传教区；耶稣会的瓜拉尼皈依者村庄的社会组织》（Misiones del Paraguay; organización social de las doctrinas guaraníes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巴塞罗那，1913年版）一书中为耶稣会教

士作辩护。何塞·桑切斯·拉夫拉多尔(José Sánchez Labrador)从1760年到1767年在瓜伊库鲁语系部族的一个支系姆巴亚人中居住过，他在《天主教的巴拉圭》(El Paraguay Católico)(布宜诺斯艾利斯，1910—1917年版，共3卷)一书中留下了出色的记述。V·马丁·德·木西(V. Martin de Moussy)在《拉普拉塔河流域耶稣会传教区衰落和灭亡的历史回忆……》(Memoire historique sur le decadence et la ruine des missions des Jesuites dans le bassin de la Plata ……)(巴黎，1864年版)中讲述了一个凄惨故事。洛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Lodovico Antonio Muratori)的《巴拉圭耶稣会神甫传教区中幸运的基督教》(Il cristianesimo felice nelle missioni de' padri della Compagnia di Gesu nel Paraguai)(威尼斯，1743—1749年版，1部2卷)提供了最好的耶稣会教士的观点。与这本书相比有些人宁愿看尼古拉斯·德尔·特乔(Nicolás del Techo)写的《巴拉圭省和耶稣会的历史》(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l Paraguay y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本书由曼努埃尔·塞兰诺—萨恩斯(Manuel Serrano y Sáenz)译自拉丁文(马德里，1897年版)。B·卡普德维列(B. Capdevielle)的《巴拉圭的耶稣会传教区》(Misiones Jesuíticas en el Paraguay)(亚松森，1923年版)，布拉斯·加赖(Blas Garay)的《传教区的共产主义》(El comunismo de las misiones)(亚松森，1921年版)和R·B·坎宁安·格雷厄姆(R.B.Cunninghame Graham)的《消失的世外桃园》(Vanished Arcadia)(伦敦，1901年版)，也都应当提到。

巴拉圭的独立运动是和何塞·加斯帕尔·罗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亚的事业分不开的，许多作者写出的成果都奉献给这位

共和国的奠基人。塞西略·巴埃斯写的《关于弗朗西亚博士和南美独裁政治的杂文》(Ensayo sobre el Doctor Francia y la dictadura en Sud-América)(亚松森，1910年版)是一本基本著作。在A·C·威尔格斯(A.C.Wilgus)编的《南美独裁者……》(South American Dictators……)(华盛顿，1937年版)一书中，刘易斯·W·比尔勒(Lewis W. Bealer)根据可信的材料写了一个很好的简要的概览。胡斯托·帕斯托尔·贝尼特斯(Justo Pastor Benítez)是一位著作很多的学者和政治家，他在《何塞·加斯帕尔·德·弗朗西亚博士孤独的一生》(La vida solitaria del Dr. José Gaspar de Francia)(布宜诺斯艾利斯，1937年版)中，以同情的又是批判的态度写了他。吉雷尔莫·卡瓦内利亚斯(Guillermo Cabanellas)写的《巴拉圭独裁者弗朗西亚博士》(El dictador del Paraguay, Dr. Francia)(布宜诺斯艾利斯，1946年版)是一本很可一读的传记。胡利奥·塞萨尔·查维斯(Julio César Chaves)完成了一项卓越的研究和写作，出版了一本权威性的著作《最高独裁者何塞·加斯帕尔·德·弗朗西亚传记》(El supremo dictador, biografía de José Gaspar de Francia)(布宜诺斯艾利斯，1942年版)。何塞·塞贡多·德科德(José Segundo Decoud)在《历史的回忆——纪念巴拉圭独立运动的伟人》(Recuerdos históricos. Homenaje á los próceres de la independencia paraguaya)(亚松森，1894年版)中向独立运动的领袖们致敬；而阿尔弗雷德·德梅瑟(Alfred Demersay)的《巴拉圭独裁者弗朗西亚博士：他的一生和他的政府》(Le docteur Francia, dictateur du Paraguay: sa vie et son gouvernement)(巴黎，1856年版)，是一本批判的书。

布拉斯·加赖(Blas Garay)的《巴拉圭独立革命》(La revolución de la independencia del Paraguay)(马德里，1897年版)和富尔亨西奥·R·莫雷诺(Fulgencio R. Moreno)的《关于巴拉圭独立的研究》(Estudio Sobre la independencia del Paraguay)(亚松森，1911年版)一样，都有公正的看法。

伍德拜因·帕里什(Woodbine Parish)所写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拉普拉塔河流域各省》(Buenos Ayres and the Provinces of the Río de la Plata)(伦敦，1834年版)有些启发性的引证。若昂·吕多尔夫·朗惹(Johann Rudolph Rengger)和马塞兰·朗夏穆普斯(Marcelline Longchamps)被允准离开巴拉圭后，发表了《巴拉圭革命的历史评论》(Essai historique sur la révolution du Paraguay)(巴黎，1927年版)一书。朗惹，也应归功于他从前的同伴，还出版了以《何塞·加斯帕尔·罗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亚博士在巴拉圭的统治；……》(The Reign of Doctor Joseph Gaspard Roderick de Francia,in Paraguay;……)(伦敦，1827年版)为名的英文本。J·P·和W·P·罗伯逊(J.P. and W.P. Robertson)兄弟写了引人入胜的《巴拉圭书简：包括在独裁者弗朗西亚政府统治下的共和国居住四年的记述》(Letters on Paraguay: Comprising An Account of A Four Years' Residence in that Republic,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the Dictator Francia)(伦敦，1838年版，共2卷)，以后，他们写了《弗朗西亚的恐怖统治——巴拉圭书简续篇》(Francia's Reign of Terror, Being a Sequel to Letters on Paraguay)(费城，1839年版，共2卷)。H·桑切斯·克尔(H. Sánchez Quell)写了一部很好的著作《巴拉圭的国际政策(1811年洪达，弗朗西亚和洛佩斯父

子)》〔Política internacional del Paraguay (La junta de 1811, Francia y los López)〕(布宜诺斯艾利斯,1945年版,第 2 版)。由本哈明·巴尔加斯·培尼亚 (Benjamín Vargas Peña) 编辑的《1810—1840年巴拉圭—阿根廷的外交关系》(Paraguay-Argentina, correspondencia diplomática 1810—1840) (布宜诺斯艾利斯, 1945年版) 一书中,有出色的论文和文件汇编。爱德华·路卡斯·怀特 (Edward Lucas White) 的《最高元首——巴拉圭大独裁者的罗曼史》(El Supremo, A Romance of the Great Dictator of Paraguay) (纽约, 1916年版) 是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恩里克·威斯内尔·德·莫尔亨斯特仑 (Enrique Wisner de Morgenstern)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写了一本传记,以《巴拉圭的独裁者何塞·加斯帕尔·罗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亚博士》(El dictador del Paraguay, Doctor José Gaspar Rodríguez de Francia) (阿根廷,孔科尔迪亚, 1923年版) 的书名发表。

象洛佩斯父子这样的人引起了最高度的赞扬和最严厉的谴责。在他们的传记作者中有少数人力图公正地评价他。塞西略·巴埃斯 (Cecilio Báez) 在他的《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元帅》(El Mariscal Francisco Solano López) (亚松森, 1926年版)一书中实际上把洛佩斯写成漆黑一团。威廉·E·巴雷特(William E. Barrett)的《马背上的女人——弗朗西斯科·洛佩斯与伊莱扎·林奇的传记》(Woman on Horseback, the Biography of Francisco López and Eliza Lynch) (纽约, 1938年版) 中又或许写得过分同情了。埃克托尔·佩德罗·布隆维格 (Héctor Pedro Blomberg)在《巴拉圭的贵妇人》(La Dama del Paraguay)(布宜诺斯艾利斯, 1942年版) 中对伊莱

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R·B·坎宁安·格雷厄姆(R.B. Cunninghame Graham)的《一个独裁者的画像——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1865—1870年的巴拉圭)》〔(Portrait of a Dictator, Francisco Solano López(Paraguay,1865—1870)〕(伦敦,1933年版),还考察了三国同盟战争。乔治·弗雷德里克·马斯特曼(George Frederick Masterman)在他写《巴拉圭动乱的七年;在巴拉圭人中亲身体验的叙述》(Seven Eventful Years in Paraguay; A Narrative of Personal Experience Amongst the Paraguayans)(伦敦,1870年版)的时候还在对洛佩斯发怒。胡安·埃米利亚诺·奥莱亚里(Juan Emiliano O'Leary)在他的颂文《索拉诺·洛佩斯元帅》(El Mariscal Solano López)(马德里,1925年版,第2版)中把所有好听的语调都使用上了。托马斯·杰斐逊·佩奇(Thomas Jefferson Page)在《拉普拉塔、阿根廷联邦和巴拉圭——在美国政府指令下于1853、1854、1855和1856年勘查拉普拉塔河支流和邻接国家记事》(La Plata, the Argentine Confederation, and Paraguay; being a Narrative of the Exploration of the Tributaries of the River La Plata and Adjacent Countries during the Years 1853,'54,'55, and '56, under the Ord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纽约,1859年版)中描述了他同老洛佩斯的关系。卡洛斯·佩雷伊拉(Carlos Pereyra)一定曾希望为他的《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和巴拉圭战争》(Francisco Solano López y la guerra del Paraguay)(马德里,1919年版)得一枚巴拉圭勋章。阿图罗·雷沃德(Arturo Rebaudi)在《洛佩斯主义》(El lopizmo)(布宜诺斯艾利斯,1924年版)和《南美暴君——弗朗西斯科·索

拉诺·洛佩斯》(Un tírano de Sudamérica, Francisco Solano Lópéz)（布宜诺斯艾利斯，1925年版）中发表了对立的阿根廷观点。埃克托尔·巴雷拉（Héctor Varela）以《伊莱扎·林奇》（Elisa Lynch）（布宜诺斯艾利斯，1870年版）为书名写了一篇早期的洛佩斯传记。

关于三国同盟战争，我们除了举出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外，不能再多举其他文献了。有名的阿根廷人胡安·包蒂斯塔·阿尔维迪（Juan Bautista Alberdi）在他的《面临美洲民主的巴西帝国》（El imperio del Brasil ante la democracia de América）（巴黎，1869年版）和《拉普拉塔两次战争及其特征》（Las dos guerras del Plata y su filiación）（巴黎，1867年版）中袒护了巴拉圭。格雷戈里奥·贝尼特斯（Gregorio Benítes）发表了《巴拉圭战争的外交和军事编年史》（Anales diplomático y militar de la guerra del Paraguay）(亚松森，1906年版，共2卷）和《巴拉圭战争；反对三国同盟的初期战斗》（Guerra del Paraguay; las primeras batallas contra la Triple Alianza）（亚松森，1919年版）。佩勒姆·霍顿·博克斯（Pelham Horton Box）在《巴拉圭战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Paraguayan War）(厄巴纳，1927年版，共2卷）中为我们提供了起因方面的权威性研究。理查德·F·伯顿(Richard F. Burton）以类似一个随军记者身分写了《巴拉圭战地通讯》(Letters from the Battle-fields of Paraguay）（伦敦，1870年版）。佩德罗·卡尔蒙（Pedro Calmon)的《哲学家国王：唐·佩德罗二世传记》(O rei filosofo : vida de Dom Pedro Ⅱ)（圣保罗，1939年版，第2版）是按巴西的立场写成的。在拉蒙·J·卡卡诺(Ramón J. Cárcano)

的《巴拉圭战争，三国同盟的作用与反作用》(Guerra del Paraguay, acción y reacción de la Triple Alianza)（布宜诺斯艾利斯，1941年版，共2卷）和《巴拉圭战争的起源和原因》(Guerra del Paraguay, orígenes y causas)（布宜诺斯艾利斯，1939年版）中表达了阿根廷的观点。J·A·科瓦（J.A.Cova）的概略性著作《索拉诺·洛佩斯和巴拉圭史诗》(Solano López y la epopeya del Paraguay)（布宜诺斯艾利斯，1948年版）所补充的内容很少。何塞·伊格纳西奥·加门迪亚（José Ignacio Garmendia）是阿根廷的战争歌颂者，在《乌迈塔出征记》(Campaña de Humaytá)（布宜诺斯艾利斯，1901年版）中他研究了这次战争中的一个战役。E·C·若娄丹(E.C. Jourdan)参加了这次战争，他写的《巴 拉 圭 战 争》(Guerra do Paraguay)（里约热内卢，1871年）和《乌拉圭、马托格罗索和巴拉圭战役史》(Historia das campanhas do Uruguay, Matto Grosso e Paraguay)（里约热内卢，1893—1894年版，共3卷）充分表露了巴西的观点。胡安·埃米利亚诺·奥莱亚里（Juan Emiliano O'Leary）写了《我们的史诗(1864—1870年巴拉圭战争)》〔Nuestra epopeya (Guerra del Paraguay, 1864—1870)〕（亚松森，1919年版）。本哈明·蓬瑟耳（Benjamin Poncel）的《近代巴拉圭》(Le Paraguay moderne)（马赛，1867年版）提供了一个当代的见解。应当注意阿图罗·雷沃德(Arturo Rebaudi)的四部著作：《巴拉圭共和国对阿根廷共和国的宣战书》(La declaración de guerra de la República del Paraguay a la República Argentina)（布宜诺斯艾利斯，1924年版）；《巴拉圭战争；阴谋》(Guerra del Paraguay; la conspiración)（布宜诺斯艾利斯，1917年版）；《巴拉圭战争，战

胜或死去》(Guerra del Paraguay, vencer o morir)（布宜诺斯艾利斯，1920年版）和《英勇的洛马斯》(Lomas Valentinas)（布宜诺斯艾利斯，1925年版）。乔治·汤普森(George Thompson)写的《巴拉圭之战，附巴拉圭及其人民的历史概略和这次战争的军事工程札记》(The War in Paraguay, with 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Country and its People and Notes upon the Military Engineering of the War)(伦敦，1869年版）是可信的。

许多巴拉圭人至今还确信查尔斯·艾姆斯·沃什伯恩图谋推翻洛佩斯，但是没有一个人已接近证明它是事实。关于沃什伯恩活动的最好材料，是他的一些没有出版的快邮报告。这些报告保存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里。写洛佩斯的作者们总觉得在洛佩斯的传记里有必要把这位美国公使写进去，这些作者通常是诋毁他的。美国国会的调查结果已公布于《巴拉圭的调查》(Paraguayan Investigation)（众议院，第41届国会第2次会议，第65号报告，第2卷；华盛顿，1870年版）。而且沃什伯恩在《巴拉圭史；附个人观察札记和对困境中外交的回忆》(The History of Paraguay, with Notes of Personal Observations and Reminiscences of Diplomacy under Difficulties)（波士顿，1871年版，共2卷）中提出了自己的答辩。

关于两次战争之间有趣的半个世纪的复兴，资料是不足的，但这个缺陷正慢慢地弥补着。艾伯特·阿默尔兰(Albert Amerlan)写了《巴拉圭河上的黑夜；战争实况和人物特写》(Nights on the Río Paraguay; Scenes of War and Character Sketches〔sic〕)，亨利·F·萨克斯多尔夫(Henry F. Suksdorf)译自德文（布宜诺斯艾利斯，1902年版）。塞西略·巴

埃斯（Cecilio Báez）与何塞·罗德里格斯·阿尔卡拉（José Rodríguez Alcalá）合写了《近代巴拉圭……》（El Paraguay moderno……）（亚松森，1915年版），胡斯托·帕斯托尔·贝尼特斯（Justo Pastor Benítez）在《瓜拉尼人的故土（二十世纪的巴拉圭文化概貌）》〔El solar Guaraní (Panorama de la cultura paraguaya en el siglo XX)〕（布宜诺斯艾利斯，1947年版）中追溯了巴拉圭的文化发展，这本书应同卡洛斯·R·森图里翁（Carlos R. Centurión）的《巴拉圭文学史》(Historia de las letras paraguayas)（布宜诺斯艾利斯，1947年版）一起读。C·W·多姆维尔—法伊夫（C. W. Domville-Fife）的《近代南美洲》（Modern South America）（费城，1931年版）中有各次革命的一些引人入胜的细节。阿瑟·埃尔伍德·埃利奥特（Arthur Elwood Elliott）写了一本概览：《巴拉圭，它的文化传统、社会状况和教育问题》（Paraguay, its Cultural Heritage, Social Conditions and Educational Problems)（纽约，1931年版）。胡安·纳塔利西奥·冈萨雷斯（Juan Natalicio González）和巴勃罗·M·因斯弗兰（Pablo M. Ynsfrán）写的《现代巴拉圭》（El Paraguay contemporáneo）（亚松森，1929年版）是必须读的。运动家会欣赏约翰·沃勒·希尔斯（John Waller Hills）和伊恩西·邓巴（Ianthe Dunbar）写的《优美的河川；巴拉圭的户外运动和旅行》(The Golden River; Sport and Travel in Paraguay)（伦敦，1922年版）。少数移民也许会为亚历山大·K·麦克唐纳（Alexander K. Macdonald）《美丽如画的巴拉圭……》(Picturesque Paraguay……)（伦敦，1911年版）一书所吸引；无疑也要被H·曼格耳斯（H. Mangels）的《巴拉圭；经济、博物和气候论文集》（Paraguay;

wirtschaftliche, naturgeschichtliche und klimatologische abhandlungen）（慕尼黑—弗赖津，1919年版）所吸引。W·L·舒尔茨（W. L. Schurz）的《巴拉圭商业和工农业手册》（Paraguay: A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Handbook）（华盛顿，1920年版）是本简明而有价值的书。阿道夫·N·休斯特（Adolf N. Schuster）的《巴拉圭：国土、民族、历史、经济生活和垦殖》（Paraguay; land, volk, geschichte, wirtschaftsleben und kolonisation）对移民和商人来说到现在为止是本最好的概览。E·德·布加迪·拉·达戴伊（E. de Bourgade la Dardye）的《巴拉圭：国土和人民，自然财富与商业潜力》（Paraguay: the Land and the People, Natural Wealth and Commercial Capabilities）（伦敦，1892年版）是一本较早的著作。奥托·比格尔（Otto Bürger）的《南美花园巴拉圭；商业、工业和移民指南》（Paraguay, der "garten Südamerikas"; ein wegweiser fur handel, industrie und eniwanderung）（来比锡，1927年版）可作为休斯特著作的补充。

查科边界纠纷引起了一些著作的出现。站在玻利维亚一面的，我们可以举出何塞·阿吉雷·阿查（José Aguirre Achá）的《进行外交谈判的玻利维亚—巴拉圭争议中的仲裁地带》（The Arbitration Zone in the Bolivian-Paraguayan Dispute through the Diplomatic Negotiation）（拉巴斯和纽约，1929年版）与同一作者的《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之间的争论和冲突》（El desacuerdo y el conflicto entre Bolivia y el Paraguay）（拉巴斯，1929年版），《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的边界冲突，它的起源和现实状况》（Bolivie-Paraguay, le conflit de délimitation de frontières, ses origenes et son état actuel）

(巴黎，1929年版)，《关于巴拉圭入侵玻利维亚班加迪亚要塞的文件》(Documentos relativos a la agresión del Paraguay contra el fortín boliviano Vanguardia) (拉巴斯，1929年版)；特尔莫·伊查索(Telmo Ichazo)的《边界争端，1894年的说明》(Cuestión de límites, exposición de 1894) (拉巴斯，1894年版)；米格尔·梅尔卡多·莫雷拉(Miguel Mercado Moreira) 的两本书：《玻利维亚的查科(对巴拉圭主张的注释)》〔El Chaco boliviano (Anotaciones al alegato paraguayo)〕(科恰班巴，1928年版)和《北查科(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的争执)》〔El Chaco Boreal (Litigio boliviano-paraguayo)〕(拉巴斯，1929年版)；里卡多·穆希亚(Ricardo Mujía)的《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对富尔亨西奥·R·莫雷诺先生"反驳"的注释》(Bolivia-Paraguay; anotaciones a la "réplica" del Señor Fulgencio R. Moreno) (拉巴斯，1916年版)。这些著作充分地申述了玻利维亚的主张。

在巴拉圭一边，许多历史学家、外交家和新闻工作者参加了辩论，以维护他们国家的权益。下列各书是他们研究成果的代表作：本哈明·阿塞瓦尔(Benjamín Aceval)的《巴拉圭的查科》(Chaco paraguayo) (亚松森，1896年版)；亚历杭德罗·奥迪维尔特(Alejandro Audibert)的《古巴拉圭省的边界》(Los límites de la antigua provincia del Paraguay) (布宜诺斯艾利斯，1892年版)；同一作者的《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之间的边界争端》(Cuestión de límites entre el Paraguay y Bolivia) (亚松森，1901年版)；埃利亚斯·阿亚拉(Elías Ayala)的《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在北查科》(Paraguay y Bolivia en el Chaco Boreal) (亚松森，1929年版)；塞西略·巴埃斯(Cecilio Báez)

的两本著作：《巴拉圭的查科》(The Paraguayan Chaco)（纽约，1904年版）和《巴拉圭与玻利维亚：他们的边界争端》(Paraguay-Bolivia: su cuestión de límites)（亚松森，1917年版）；马尔塞洛·德拉·普拉塞·乔瓦克(Marcelo de la Place Chauvac)的《格兰查科——南查科、中查科、北查科》(Gran Chaco —Chaco Austral, Chaco Central, Chaco Boreal)（亚松森，1916年版）；曼努埃尔·多明格斯 (Manuel Domínguez)的《北查科过去、现在和将来均属于巴拉圭》(El Chaco Boreal fué, es y será del Paraguay)（亚松森，1927年版）和他的《北查科——边界顾问委员会成员曼努埃尔·多明格斯博士为驳斥玻利维亚人的论点和阐明巴拉圭对上述地区的领有权提出的报告》(El Chaco Boreal. Informe del Doctor Manuel Domínguez, miembro de la Comisión Asesora de Límites que arruina las tesis bolivianas y expone los títulos del Paraguay sobre dicha zona)（亚松森，1925年版）；罗赫略·伊瓦拉 (Rogelio Ibarra)的《巴拉圭—玻利维亚：边界争端》(Paraguay-Bolivia: cuestión de límites)（亚松森，1924年版）；《白皮书——巴拉圭—玻利维亚边界争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的有关文件和会议的经过》(Libro blanco. Documentos relativos a las conferencias de Buenos Aires sobre la cuestión de límites paraguayo-boliviana y algunos antecedentes)（亚松森，1929年版）；富尔亨西奥·R·莫雷诺 (Fulgencio R. Moreno) 的两本著作：《巴拉圭—玻利维亚的外交——边界谈判的经过及其破裂的原因》(Diplomacia paraguaya-boliviana. Antecedentes de los tratados de límites y causas de su fracaso)（亚松森，1904年版）和《边境问

题》(El problema de las fronteras)(布宜诺斯艾利斯,1927年版);《巴拉圭—玻利维亚;边界争端》(Paraguay-Bolivia; cuestión de límites)(亚松森,1917年版);劳尔·德尔·波索·卡诺(Raul del Pozo Cano)的两本著作:《巴拉圭—玻利维亚——关于证明巴拉圭在北查科管辖权的新文件》(Paraguay-Bolivia; nuevos documentos que prueban la jurisdicción del Paraguay en el Chaco)(亚松森,1927年版)和《巴拉圭—玻利维亚:巴拉圭的查科和梵蒂冈》(Paraguay-Bolivia: el Chaco paraguayo y el Vaticano)(亚松森,1927年版),以及弗朗西斯科·罗隆(Francisco Rolón)的《巴拉圭和玻利维亚:边界争端》(El Paraguay y Bolivia: cuestión de límites)(亚松森,1903年版)。

读者在浏览了这些书籍之后,再阅读汉斯·托尔滕(Hans Tolten)的《迷人的旷野,在神秘南美的奇遇》(Enchanting Wilderness, Adventures in Darkest South America),菲迪·洛希(Ferdi Loesch)译自德文(伦敦,1936年版),就会愉快地松一口气。两国的争论意见可以从以下的报告中见到:《玻利维亚—巴拉圭问题调查和调解委员会主席的报告》(Commission of Inquiry and Conciliation, Bolivia and Paraguay, Report of the Chairman)(美国国务院出版物,拉丁美洲丛书第1集,华盛顿,1929年版);《关于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两国争端提出的证明文件》(Documentation Concerning the Dispute between Bolivia and Paraguay)(国际联盟,日内瓦,1928年版)和《补篇》(Supplement)(日内瓦,1929年版);《美洲国家调解与仲裁国际会议,1928年12月10日—1929年1月5日,华盛顿》(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States on Conciliation and Arbitration, Washington,December 10,1928-January 5,1929)(华盛顿,1929年版)；以及《玻利维亚一巴拉圭问题调查和调解委员会的会报，1929年3月13日—1929年9月13日》(Proceedings of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and Conciliation Bolivia and Paraguay,March13,1929-September13,1929)(华盛顿,1929年版)。

一部真正好的查科战争史尚待编写。胡斯托·帕斯托尔·贝尼特斯(Justo Pastor Benítez)的《埃斯蒂加里维亚，查科的保卫者》(Estigarribia,el soldado del Chaco)(布宜诺斯艾利斯，1943年版)是一本颂扬埃斯蒂加里维亚的书。奥古斯托·塞斯佩德斯(Augusto Céspedes)的《梅斯蒂索人的血，查科战争故事集》(Sangre de mestizos,relatos de la guerra del Chaco)(智利，圣地亚哥，1936年版)是一本印象派的史话。菲利普·德·龙德(Philip de Ronde)在《巴拉圭——一个英勇的小国家；巴拉圭与玻利维亚战争史话》(Paraguay, a Gallant Little Nation; the Story of Paraguay's War with Bolivia)(纽约，1935年版).中企图唤起人们对巴拉圭的同情，这样的书几乎不值得花费工夫去写。曼努埃尔·马里亚·奥利维尔(Manuel María Oliver)的《北查科战争,他们是怎样保卫巴拉圭的》(La guerra en el Chaco Boreal, como se defiende el Paraguay)(布宜诺斯艾利斯，1935年版)，恐怕是对这次战争的最好的叙述了，虽然还有广泛改进余地。胡斯托·罗塔斯·埃吉诺(Justo Rodas Eguino)在《查科战争；美洲国际政策的说明》(La guerra del Chaco; interpretación de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americana)(布宜诺斯艾利斯，1938年版)中有对玻利维亚外交的批评。安赫尔·罗德里格斯

(Angel Rodríguez) 在《一次战争（查科战役）的剖析》〔Autopsia de una guerra (campaña del Chaco)〕（智利，圣地亚哥，1940年版）中表露了一个怏怏不乐的玻利维亚将军的观点。

说明新巴拉圭情况的主要是新闻报导，但是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波利卡波·阿尔塔萨 (Policarpo Artaza) 的《阿亚拉、埃斯蒂加里维亚和自由党》(Ayala,Estigarribia y el partido liberal) （布宜诺斯艾利斯，1946年版，第2版）是维护阿亚拉而反对二月党人的。卡洛斯 博尔切 (Carlos Borche) 在《美洲的集中营（在巴拉圭的使命）》〔Campos de concentración en América (Misión en Paraguay)〕（蒙得维的亚，1945年版）中提出了一个不利于莫里尼戈的控诉书。关于埃斯蒂加里维亚统治下重建的国家，阅读《巴拉圭共和国宪法》(Constitución de la República del Paraguay)（亚松森，1940年版）可能是有益处的。西摩·E·哈立斯 (Seymour E. Harris) 编的《拉丁美洲经济问题》(Economic Problems of Latin America)（纽约，1944年版）多少阐明了一些经济问题。在何塞·安东尼奥·佩雷斯·埃齐古伦 (José Antonio Pérez Echeguren) 的《巴拉圭革命的轮廓和范畴》(Relieve y categoria de la revolución paraguaya)（亚松森，1940年版）一书中可以找到直率的报刊主笔的评论。瓦耳特尔·基林格 (Walter Quiring) 写的《德国人在查科的垦殖》(Deutsche erschliesen den Chaco)（卡尔斯鲁厄，1936年版）和《原籍俄国的德国人寻找一个家乡》(Russlanddeutsche suchen eine Heimat)（卡尔斯鲁厄，1938年版）两本书，讨论了移民问题。胡安·何塞·索莱尔 (Juan José Soler) 的《走向民族团结——政治生涯四十

年》(Hacia la unión nacional, 40 años de vida pública)(布宜诺斯艾利斯，1943年版)，沉迷于作传记。胡安·斯特法尼奇(Juan Stefanich)在《新世界：一个新民主学说》(El mundo nuevo: una nueva teoría de la democracia)(布宜诺斯艾利斯，1941年版)和《新巴拉圭，通过民主和自由走向美洲的新理想》(El Paraguay nuevo, por la democracia y la libertad hacia un nuevo ideario americano)(布宜诺斯艾利斯，1943年版)中说明了二月党主义的哲学基础。阿瑟·P·惠特克(Arthur P. Whitaker)编的《美洲国际事务》(Inter American Affairs)(纽约，1942—1946年版，共5卷)，包括1941—1945年，其中也有宝贵的资料。

索　　引

二　　画

三 画

四 画

五　　画

六　　画

七 画

八 画

九 画

十　　画

十 一 画

十 二 画

十 三 画

十 四 画

十 五 画

十 六 画

十七画以上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巴拉圭简史　（上、下册）　共２册
作者＝［美］哈·盖·沃伦著辽宁大学经济系翻译组译
页数＝７２３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１９７３年９月第１版